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名人轶事录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质

中国名人轶事录

毛泽东为一位判了死刑的妇女翻案

伍兰花是一个极善良的陕北妇女，竟敢诅咒毛泽东。问题严重，逐级上报，直到中央保卫部。保卫部为此判了她死刑，决定枪毙。毛泽东从《情况汇报》看到此事，出人意料，竟召见伍兰花，调查民情，不仅为伍兰花平反昭雪，还由此引出一项大举动，简直震惊了世界——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前还好端端一个天气，晴空万里，岂料会议开了一半，突然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突然间，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尚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中，枪炮声不时传来；再者，延安附近的村子里，又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此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不可掉以轻心，因而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伍兰花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领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的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之三十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所难以想象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5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历史的脚步走到四十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又突然来了几万人的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是不行的，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去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迟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以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们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清楚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中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然后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一声“缴吧，缴吧，缴了我

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马上把粮食没收充公！”

一直蹲在地上的傻子丈夫，听说要把粮食没收充公，立刻“哇哇哇”地嚷叫开了，人们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心里明白，他是在替妻子伍兰花辩护。

伍兰花也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粮食口袋，生怕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要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人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

“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火扑扑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我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她的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

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地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有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了《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

住在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文、文件和材料，但当他看到《情况汇报》后，还是抽时间把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篇文章详细地看了一遍。当他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他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觉得这件事他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他的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也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地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满脸怒气，像有什么事惹恼了似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说：“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里。

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

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1941年，张家村乡的负担，尽管比革命前的1934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公粮21万石……

看毕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那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报告中说，仅盘龙一区，就有五万多人因瘟疫而丧生。

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一支抽完又接一支。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也会失掉人心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需要他作出果断的处理，提出解决的办法。经过久久的思考，毛泽东宽广的额头终于舒展开来，他叫来一个通讯员吩咐说：“你立刻到延安去，让西北局和延安留守处的负责人明天来这里见我。”

“是”。通讯员敬一个礼，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凌晨，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同志急如星火地骑马来到枣园。他们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发现炉子上放着几个烤芋头，心里都不是滋味。

毛泽东脸色阴沉地坐在办公桌旁，招呼大家坐下后，便把那份来自张家

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丢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是来陕北干什么的！”

几个人匆匆地把两份材料传阅一遍。

他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谁也不说一句话，不时偷偷看一眼毛泽东。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静得连每个人的呼吸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是来革命的……”他又陷入了沉思，再不说什么了。又过了好一阵，他才接着说：“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的。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

在座的几位负责同志已听出了毛泽东召他们来枣园的意思了，不由赞许地点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的看法。

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哽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一下接着说：“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说到这里，他把手一挥，像指挥千军万马前进一样。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交换意见后，他们不愿过多地耽误毛泽东的时间，就告辞而去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发生在1942年那场震撼世界的“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而诞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查研究，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

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没有忘记临行前毛泽东的吩咐，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然后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有意照顾她，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神，还说毛主席就是让雷打，也是打不死的！”

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个战场打胜仗的消息频频传来；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毛泽东站在延安的黄土坡上，听了这位干部转述伍兰花的话，不禁放声大笑起来。

他笑得那样爽朗，他笑得那样开心……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智略交锋

五十年代后期，国际共运波诡云谲，中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大主要力量，主宰着国际共运何去何从命运的铁腕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出现分歧，两党主要领导人物的较量

拉开序幕。一组组珍贵镜头，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原形——

苏共“二十大”闭幕不久，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使各国共产党、

工人党接受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决定邀请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在莫斯科召开一次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 64 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签订《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以此确立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

1957 年 11 月 2 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为团长，以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乘坐“图 104”专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参加上述两个会议。

经过 8 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飞到了莫斯科上空。这一天，天气十分晴朗，从舷窗向下眺望，地面上的田野、河流、树林、公路都尽收眼底。

坐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翻译李越然不失时机地报告说：“主席，到莫斯科了。”

毛泽东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作出准备下飞机的表示，而是扭头吩咐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给我点一支烟吸。”

李银桥点一支烟，递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伸手接过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像是在认真考虑什么问题。

飞机降落在伏努克机场，缓缓停在候机楼前。

候机大厅内，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提前来到莫斯科的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等为迎接毛泽东主席，已等候多时了。当他们听到外面飞机降落的声音，便匆匆走出候机大厅。赫鲁晓夫和胡志明走在最前面，一起迎着飞机走上去。

从候机厅到飞机脚下，铺着鲜红色的地毯。前来迎接毛泽东主席的苏联领导人，按照职位高低依次排列，整齐地站在地毯上。胡志明主席站在赫鲁晓夫的后面。

舱门开处，出现了毛泽东主席高大魁伟的身影。他礼节性地向迎接他的人们招招手，迎接他的是一片热烈的掌声。他已看到，机场上站着很多迎接他的人，不由微微蹙了蹙眉头，觉得这样做太张扬了。

赫鲁晓夫一边鼓掌，一边仰视着毛泽东。见毛泽东只顾低头看着脚下的舷梯，对他没有任何表示，也微微蹙了蹙眉头。

毛泽东走下舷梯，依然保持他固有的走路速度，不紧不慢地向赫鲁晓夫走去。此时，他的脸上堆上一层友好的笑容。赫鲁晓夫早已伸出双手，等着同他握手，而他却只伸出一只手。这次握手，便为后人留下一个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留一手”的谈资。

握手毕，毛泽东不失热情地把一只手搭在赫鲁晓夫的肩上。这一细微的动作，使毛泽东在气势上明显压倒了赫鲁晓夫。入乡随俗是外交工作中遵循的原则。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拥抱吻颊。从拥抱的姿势看，毛泽东俨然像一位兄长。此时此刻，苏联“老大哥”的尊容，无疑被毛泽东所嘲弄。

对此，赫鲁晓夫似乎没有觉察，他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感谢您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因为他事先曾担心毛泽东拒绝来莫斯科参加会议。

毛泽东从容地说：“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您说得很对！”赫鲁晓夫点头说道。然而，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不由心头颤抖一下，已经意识到这是毛泽东给莫斯科会议定了基调，先跟他打招呼。

接着，毛泽东和胡志明拥抱。这两位党的领导人是老朋友，早在延安时

代，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他们的拥抱，自然更亲热一些，而且边拥抱边说开了私情话。

“身体还好吧？”胡志明把嘴贴在毛泽东的耳边低声问。

“好着哩。”毛泽东自信地回答，然后又变换口气问：“你怎么样？”

“比上次会面要好些。”胡志明也自信地说。

毛泽东：“上次是夏天。”

胡志明不无调侃地说：“这次不用脱汗衫了。”

毛泽东解嘲地说：“上次是在家里嘛。”

他们说的上次，是指此前胡志明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在勤政殿接见他那一次。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太热，毛泽东见胡志明汗水淋漓，就让胡志明脱去汗衫，赤裸着上身跟他讨论国际形势。

拥抱结束后，毛泽东坦诚地向赫鲁晓夫解释说：“我们是亲戚。”

赫鲁晓夫微笑着点点头，但他的内心却涌上一股醋意。他嫉妒毛泽东和胡志明的特殊关系，却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与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握手，又检阅了仪仗队。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他走到仪仗队前，脱去头上的礼帽，交给李越然，然后用激越高昂的湖南腔，向仪仗队的队员们高喊：“同志们好！”

仪仗队立刻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乌拉！乌拉！乌拉！”

毛泽东像检阅中国的三军仪仗队那样，没有显出过份的激动，只是点一下头，表示感谢。他伸手从李越然手中接过帽子，重新戴好，就一点也没有停留，大步走向汽车——他讨厌这些不必要的繁文缛节！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赫鲁晓夫留给各国领导人的印象并不良好，大多数人认为他一是狂放，二是粗暴。他说话总是放开嗓门，像跟人吵架；高兴时又喜形于色，手舞足蹈，全不顾场合，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他很少有看得起别人的时候，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为人熟知的典型事例，是他以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大会，在台上演讲中，竟然当着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面，从脚上脱下皮鞋摔桌子。然而就是这个狂骜不羁的赫鲁晓夫，却在毛泽东面前从不敢放肆。他此次接待毛泽东，自然更是装出一副庄重沉稳的样子，诸事都显得彬彬有礼。二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斯”轿车内。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坐在后排，前排是司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局副局长谢尔巴阔夫——他被指派为毛泽东的卫士长。前后两排间的距离较大，可以拉出一排活动椅，李银桥和李越然坐在这一排。

路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一直说着话。赫鲁晓夫扳着指头介绍着已经来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领导人。当他说到陶里亚蒂（意大利）和多列士（法国）时，毛泽东感兴趣地问：“你安排他们住在了哪里？”

赫鲁晓夫说：“安排他们住在了市郊别墅。”说到此，他用讨好的口气补充说：“安排住在克里姆林宫的只有您。住的地方离会场很近，那里有一条走廊可直通乔治大厅，行动方便，便于警卫。住在克里姆林宫的还有胡志明同志……”

毛泽东的眼里掠过一丝疑问的光，随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的这一细微表情还是被赫鲁晓夫看到了。赫鲁晓夫马上意识到，他前面刚刚说了克里姆林宫只安排毛泽东住，而后面又说胡志明同志也住在克里姆林宫，这岂不是矛盾吗？为此，他立刻向毛泽东做出解释：“你们是亲戚嘛！”

毛泽东释然地微微点一下头，身体依然躺在背靠上，岔开话题又说开了别的事。他说：“我们这次来莫斯科参加会议的还有宋庆龄、郭沫若。宋庆龄是副团长。他们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参加我们共产党的会议是有好处的，希望你们在接待中对他们尤其要……”

没等毛泽东把话说下去，赫鲁晓夫就打断说：“这我们知道。宋庆龄也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住，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都安排在克里姆林宫住。我们还为宋庆龄选派了专门的卫士长，有专用餐厅。”说到此，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笑了笑，接着说：“我知道，她很喜欢吃煎甜饼子。”

毛泽东一直紧绷着的脸放松了。他为赫鲁晓夫对中国代表团的看重而感动，态度颇为友好地说：“那好，那好。感谢你们的热情和细心！”

毛泽东在出发前就跟苏联有关部门打过招呼，要他们不要组织大规模的欢迎活动。可是，他一路上发现，每到一转弯处，就有不少人手持红旗和花束在迎接他。他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就对赫鲁晓夫说：“我不是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少来人迎接吗？怎么还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从毛泽东的表情上，想弄清毛泽东说这番话是责备，还是感激，抑或是别的什么意思。他从毛泽东的目光里看出，似乎是抱歉的意思，便立即作出解释说：“是啊，我们收到了尤金的报告，说您有这样的请求。为此，我们作过讨论，认为不行。您想想看，其它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这样迎接——这是我们的惯例——对您这样的客人，怎么能简化欢迎仪式呢！”

“谢谢你们的盛情。”毛泽东微笑着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赫鲁晓夫，停了停又说：“我看共产主义实现了，这一套也就没有用了。”他说毕，吮了吮下唇。

汽车驶入市区，毛泽东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把上身向赫鲁晓夫靠了靠，压低声音问：“你们对于贝利亚……当时能不能留下来呢？”

贝利亚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被赫鲁晓夫为首的政治势力所杀害。

提到贝利亚，赫鲁晓夫颇显激动地说：“不能留，绝不能留他！他个人太危险了，手里掌握着公安部队，他有野心，想当最高领导人。斯大林逝世后，连尸体入棺都等不及，就开始摆进宅酒了……”他滔滔不绝地讲说着贝利亚的罪行，不时夹杂一些诅咒和谩骂贝利亚的话。

毛泽东提及贝利亚的事，原本想跟赫鲁晓夫交换一下他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可是，当他看到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如此深恶痛绝，是不允许有第二种意见出现时，就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再提什么问题，只是听赫鲁晓夫一个人说。

直到汽车驶入闹市区，毛泽东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建筑时，赫鲁晓夫才停止谈贝利亚，把话题转入介绍莫斯科的建筑上来。他说：“这几年我们盖了许多新房。过去是以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为中心，现在已改变原来的建设格局，正向多中心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区。但是，目前仍然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毛泽东一边听赫鲁晓夫介绍，一边向窗外看着，始终没有回头。过了好一会儿才抒发感慨地说：“是啊，比我上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了很大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看，他们生活得都很愉快。人们的穿着都不错。”说到此，毛泽东终于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扭头看一眼赫鲁晓夫，又补充说：“看得出，成就不小啊！”

赫鲁晓夫从上车起，就有点惴惴然，始终正襟危坐，生怕毛泽东对他有傲慢的印象。当他听到毛泽东这番赞美之词后，才暗暗吁一口气，也学着毛泽东仰躺在靠背上，脸上露出一抹天真的笑容。

汽车停在克里姆林宫前，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先后到了，大家先到一个大厅小憩，服务员及时送上香槟酒招待。在简单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分别代表中、苏双方讲话。赫鲁晓夫的欢迎词热情洋溢，令人感动；毛泽东只讲了几句感谢苏联领导人的盛情迎接的话，接着就是频频的碰杯声。碰杯开始，大厅里的气氛开始活跃，大家互道谢意，说着各种各样的客气话。

在此同时，苏联方面的查哈洛夫少将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舍尔巴科夫，陪同中国方面的杨尚昆、叶子龙，把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住处都一一看过。杨尚昆、叶子龙特别留心地看着毛泽东的住处，当他们看到这里特意安放了木板床，卫生间特意安置了蹲式马桶，颇为满意地向苏方人员表示：“你们想得很周到，谢谢！”

舍尔巴科夫和查哈洛夫一直担心他们有什么考虑不周，工作中出什么纰漏，因此心情很紧张。到此，他们放心了，不约而同地吁口气，然后说：“那就请毛主席早点来休息吧。”叶子龙“嗯”一声，又叮嘱说：“开水一定要保证供应。毛主席喜欢喝茶，一刻也离不开开水。”大厅内，毛泽东同伏罗希洛夫正在热烈地交谈。杨尚昆、叶子龙走进来，请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去休息。查哈洛夫和舍尔巴科夫也走到赫鲁晓夫面前，低声汇报说：“一切安排妥当，他们也表示满意。”赫鲁晓夫等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的谈话告一段落，及时开口说：“请毛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休息吧，我们也该告辞了。”苏联领导人听到赫鲁晓夫的话，都纷纷站起，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告别。苏联方面特意安排本国文化部部长福尔采娃陪同宋庆龄副主席。她是一个十分活跃的女人，今天把自己着意打扮了一番，一直不停地跟宋庆龄说话。当她跟宋庆龄告别后，还特意走到毛泽东面前，和毛泽东热情握手，并说了不少欢迎毛泽东的话。赫鲁晓夫对福尔采娃的表现很满意，不由转面对站在他身边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勃烈日涅夫小声说：“她真是一位天才的外交家！”勃烈日涅夫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话。当福尔采娃走向邓小平，赫鲁晓夫才和毛泽东握手告别。到此，赫鲁晓夫才向毛泽东透露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给您安排的寝室，是沙皇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把手立刻抽回来。赫鲁晓夫已觉察到毛泽东并不领他们这番人情，就立刻解释说：“没有别的什么意思，只是考虑到这套房子最好。这是我们苏联同志对您的一番好意，请您别误会……”

赫鲁晓夫带着苏联高层领导们离开后，毛泽东并没有休息。他先到他住的房间巡看一遍，然后到走廊上踱步，像在想什么问题。卫士长李银桥紧跟在后面；苏联方面派来的卫士长谢尔巴阔夫也跟在后面。

翻译李越然、保健医生李志绥，住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不很大，但一应生活设施齐备。他们把带来的物品放置好，正想休息，忽然见毛泽东推门走了进来。两人立刻走上去迎接，李越然问：“主席，有什么事吗？”

毛泽东没有说话，只是摆了一下手。他把这间房子上下左右审视一番，仍未说话，转身又走了出去，向楼上他住的房间慢慢走去。

李越然和李志绥好一阵猜测，各抒己见，正自低声争论着，一个说毛主

席关心工作人员，是来看他们住的房间安排得怎样；一个说毛主席像有什么心事，不便公开宣示。就在这时，李银桥走了进来，对李越然说：“你来一下，主席找你有话说。”

李越然跟着李银桥走上楼，来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只见毛泽东一个人静坐床边，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见李越然来了，毛泽东向李越然招招手，意思是让他走近他。李越然走到毛泽东的身边，毛泽东压低嗓音说：“请你帮我办件事。”

李越然问：“什么事？”

毛泽东说：“你去告诉苏联的同志，就说我住的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我调一下。”

李越然面露难色，反问一句说：“给您调房子？”

“是的。”毛泽东点点头说，“你告诉他们，让我搬到楼下你们住的房间去住，你和李志绥搬到我这里住。”

李越然面露惊愕，慌不迭地摇着头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你看看”，毛泽东说服李越然道，“你这个人阿，还没有去讲，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就不行，主观主义。”

“说也不行。”李越然口气坚定地说，“您住的房间，是人家花了好大劲儿，专门为您准备的……”

“你去说，先去说说看。”毛泽东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催促李越然说，“听话，快去嘛。”

李越然不敢固执己见，只好答应着转身走了。走出房间，他觉得实在没法跟苏联的同志谈这件事，就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他把毛泽东要求换房间的事向杨尚昆汇报后，杨尚昆也觉得不妥。但他又不敢擅自作主，就邀集了几位代表团的领导同志，一起去见毛泽东。

大家来到毛泽东住的房间，你一言我一语地劝说毛泽东不要再提换房间的事，应客随主便，仍住在原来安排的房间里。

毛泽东是很有主见的，一般情况下他提的意见一定要坚持到底，可这次他却作了让步，不再坚持换房。三

毛泽东在莫斯科停留期间，赫鲁晓夫陪他进过四次餐。

第一次共进午餐是在起草《莫斯科宣言》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上，中国代表邓小平率先提出与苏联相左的意见。他在发言中说：“我们不同意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提法，没有这个先例。资产阶级当权者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工作中一贯敢作敢为，在这次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中，也从始至终坚持原则，不屈服于苏联的压力。

对邓小平提出的意见，受到不少国家代表的赞同，会议不得不宣布暂停。苏联的代表苏斯洛夫和彼斯别洛夫向赫鲁晓夫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说：“（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虽不多，但专抓你的要害和漏洞……”赫鲁晓夫明白，邓小平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的背后有毛泽东。因此，他认为要做就做毛泽东的工作，只要毛泽东思想通了，邓小平的工作不做也会通的。于是乎，狡猾的赫鲁晓夫便想出了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办法，想借此机会说服毛泽东。第一次共进午餐，赫鲁晓夫把他的用心藏得很深，只谈一些客气话、废话，尽量跟毛泽东套近乎。毛泽东是讲求实际的人，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客气话不感兴趣，就相机把他的话题导入另一轨道。他问：“社会

主义国家的代表到齐了？”不等赫鲁晓夫回答，他又接着问：“铁托会来吗？”

毛泽东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不主张讲“阵营”，也不准备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他这样问，是有意试探赫鲁晓夫的态度。

赫鲁晓夫把手中的餐具放下，停了停才少气无力地说：“我们给铁托发了邀请，他可能不来……”

“要理解他们。”毛泽东用劝解的口吻说：“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了，人家肚子里能没有气！”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话并不赞同，但又不敢反驳。他知道，得罪了一个铁托，就惹来了不少麻烦，若再得罪了毛泽东，那麻烦就更大了。于是，他绕开铁托这个话题，故意用幽默的口吻说：“要是每个劳动者的碗里都有了土豆烧牛肉，我看就到了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原本对赫鲁晓夫的所谓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论调有看法，现在听他又老调重弹，就揶揄道：“我只吃土豆。”略停片刻，他又笑着补充说：“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我宁愿要红烧肉。”

赫鲁晓夫能听出，毛泽东是借此嘲笑他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提法，心里老大不舒服。他想争辩一番，但只是张了张嘴，倏忽间改变了主意，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毛泽东把赫鲁晓夫岔开的话题又拾起来，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问。

赫鲁晓夫对自己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很不满意，但又没法摆脱毛泽东的制约，只好回答说：“听说卡德尔要来。他是一个笔杆子，文章写得不错，南共的一些重要文件，多数出自他的笔下。”

毛泽东立刻接过话头说：“那好啊！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谈谈好，该谈好。”赫鲁晓夫违心地附和着毛泽东，接下来又谈开了闲话。直到午餐快要吃完时，他才开始谈起他要谈的话。他说：“苏、中两党是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各兄弟党都在等着。”

毛泽东听出，赫鲁晓夫的言外之意是要中国代表团跟苏联配合，不要老提意见，把问题搞得复杂化，使文件起草的进度受到影响。他也不愿跟赫鲁晓夫把关系搞僵，就用超脱的口气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干涉多了，会束缚人家的手脚，影响他们的积极性。”

赫鲁晓夫万万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他仍不情愿，就张了张嘴，想把他的意思再说得明白一点。可没等他把话说出口，毛泽东就又开口了。毛泽东把身子倾向赫鲁晓夫，推心置腹地用关心的口吻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也犯这个毛病，总和人争辩，很讨人嫌。这种做法，看似强硬，而实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赫鲁晓夫听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给他，才听了几句，就皱紧了眉头。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激动地把手一挥，口气不友好地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

毛泽东不便批评苏共“二十大”，只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谈他的看法。他仍平静地说：“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情况不同，说法自然也

会不同。有什么意见，能提出来不是坏事。发文件是一件大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

话谈到这种地步，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两个大国、大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是两个各有个性的政治家，都努力克制着自己，不愿走到谈崩的那一步。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谈话就此暂时打住。

赫鲁晓夫临出门时，才体会到还是毛泽东高明，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谈，比他和毛泽东谈回旋余地大得多。

第二次共进午餐，赫鲁晓夫总结了第一次谈话陷于被动的教训，改变了策略，一开始就采取主动，开门见山地谈实质性问题。他走到餐桌边，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说：“毛泽东同志，兄弟党的同志都很关心文件起草情况呢。”

毛泽东也是早有准备的。他用筷子指着服务员刚刚端到桌子上的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绕着弯子回答说：“今天吃饺子。中国吃饺子，苏联也吃饺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点。”

赫鲁晓夫敏锐地眨眨眼，立刻接过毛泽东的话题加以发挥。他说：“我们的共同点很多。在社会主义阵营里，目标一致，利益一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

“我们要加强联系。”毛泽东把一个饺子拦腰夹成两半，然后用筷子指着夹开的饺子说：“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铁路修通后，加强了我们的联系。我们感谢苏联对我们无私援助。”

赫鲁晓夫为了顽强地表达他的谈话意思，摇着头说：“不，是有私的。这条铁路修通对我们也有好处。”他想以此说明，苏联是不会干对自己没有利的事的。

毛泽东借题发挥，提出他早已酝酿于腹的一个想法。他说：“不过，这条铁路对我们中国来说，作用还不是很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北京向西北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哈萨克的一条铁路。有了这条铁路，对我们双方来说，都会收到更大利益的。”

赫鲁晓夫的思维十分敏捷，他由此立刻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答应毛泽东的这一要求，用以换取中国代表团对苏共“二十大”路线的支持。但是，他很快就自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毛泽东这个人虽然办事灵活，但原则性很强，是不会答应他的要求的。退一步讲，即使他暂时答应了，今后还会有麻烦的。更何况，修一条从北京到哈萨克的铁路，不是说一句话就能办到的事，而是要投入很大财力的。他觉得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便马上改变了主意，委婉地对毛泽东说：“我们原来考虑乌兰巴托这条路对你们来讲比较近……”说到此，他用餐巾擦擦嘴，借此思考着如何回答毛泽东提出的要求。眨眼间，他想好了，满面笑容地接着说：“中国的土地当然您比我更清楚，也许这条路修成更有利。我们也愿意通过哈萨克再开条通到中国的铁路。咱们共同修这条铁路好吗？你们境内的由你们建，我们境内的由我们建，然后在边界接轨。”

毛泽东听到最后两句，便开始吃饺子。等赫鲁晓夫说完，他嘴里塞满了饺子，不能明确表态，只从鼻子里发出不置可否的两声哼哼。

赫鲁晓夫也挟一个饺子塞进嘴里，边吃边等着毛泽东表态。可是，等毛泽东把饺子咽下，说出的已是与修铁路风马牛不相及的另一个问题了。他问赫鲁晓夫：“你对我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口号怎么看？”

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赫鲁晓夫一直是持反对意见的。为此，他曾请伏罗希洛夫捎话到北京，说他对这一口号引起的后果表示担忧。这就是说，毛泽东对他的态度是知道的，是用不着再问的。可毛泽东偏偏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百思不得其解。但他是个直爽的人，还是把他的看法如实说一遍。他说：“毛泽东同志，我想你们提这样的口号，本意可能是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允许不同的倾向发展，允许不同的学术思想争鸣。可是，花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美丽的，也有丑恶的。对于有毒的花就不能让它开！”说到这里，他伸出自己小而胖的双手，作了一个掐掉的动作。

毛泽东微笑着解释说：“我们不掐死它，让它留下来作对比，做反面教育。”

赫鲁晓夫显然不能接受毛泽东的这种解释，但他不便再说什么，只好用沉默表示他的意思。

毛泽东并不想把他的认识强加于赫鲁晓夫，显出一种豁达大度的长者气度，仍然微笑着说：“苏联报刊不发表这个口号，我们是理解的，赞同的。因为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这个口号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也许不适合于苏联的情况。情况不同嘛，都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到此为止，赫鲁晓夫才恍然大悟，明白了毛泽东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目的仍在于告诉他，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自己的观点不能强加于人。由此，他预料到他争取多数兄弟党接受他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企图将要落空。想到此，他的心不由颤抖一下，把他预先准备好的跟毛泽东要谈的话再不敢说出口。

第三次是共进晚餐。赫鲁晓夫特邀了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一起参加。这一次，赫鲁晓夫觉得软磨是不能奏效的，必须采用强硬态度，给毛泽东施加一点压力，也许会发生奇效的。

来到餐厅，赫鲁晓夫走到毛泽东身边，连客套话也没有，就开门见山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初具规模，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想跟你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李越然把赫鲁晓夫的话翻译给毛泽东听。当他翻到赫鲁晓夫要撤回专家时，毛泽东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不由反问一句：“他说什么？”李越然又把撤专家的话重复说一遍。1953年，苏联就提出过撤专家的话。当时，毛泽东听了坚决不同意，还为此发了脾气。可今天，他却显得十分平静，连一点激动的表情也没有。他用很平淡的语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同意。这样好嘛，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是赫鲁晓夫始料未及的。当他听到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完后，不知是何种目的，他笑了。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连用也未用就又放回到口袋里。显然，毛泽东的回答，打乱了他的思维。过了一会儿，他才猛省过来，大吵大嚷地说：“克里门特、尼古拉、还有你——亲爱的米高扬，你们都听到了吧？毛泽东主席同意我们撤专家了，你们给作证！”“我做证。尼基塔一闻到酒就想开玩笑。”伏罗希洛夫担心毛泽东生气，急忙替赫鲁晓夫作解释，并请毛泽东入席。

“穆热克的玩笑。”布尔加宁冷冷地说一声，似乎是对赫鲁晓夫有点不满。

米高扬不愧是外交家，热烈地招呼大家入席，并风趣地说：“还是让我

们为苏中友谊干杯吧。”

在场的人中，数赫鲁晓夫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尴尬，他伸手抓起桌子上的酒杯，接过米高扬的活茬说：“对，让我们为中苏友谊干杯！为国际共运的团结干杯！”

在说“国际共运团结”这句话时，赫鲁晓夫觉得特别别扭。因为他明白，他这次和毛泽东闹翻，必将使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受到损害，也为他国内的政敌打倒他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也举杯在手，跟赫鲁晓夫碰杯，但喝酒时却只喝了很少一点。——他极不善酒，连喝一点葡萄酒也会脸红。但拿起筷子时，他却后发制人，批评开了赫鲁晓夫。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跟伏罗希洛夫讲过，我在报纸上看到苏联的国防部长朱可夫的讲话，说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你们都将迅速回击。这个说法不对。国家都是独立的，没有邀请你们，怎么能出兵！”

“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嘛。”赫鲁晓夫努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友好一点说，“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我自己也这样说过。”

“谁决定也不对！”毛泽东口气坚决地反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阵营，但每个国家又是独立的。”

赫鲁晓夫又不服气地辩解说：“既然是社会主义阵营，那么两军交锋，敌人打你的左翼，中军和右翼难道不该一齐行动吗？”

“这种比喻不确切吧。”毛泽东仍用温和的态度，却又软中带硬地说：“我想，起码对中国不允许这样的。你们照顾好自己就行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自己会打的。把他们打回到他们出发的地方去！”

“可是，你想过军事力量的对比吗？”赫鲁晓夫有针对性地说了。

毛泽东略显激动地提高声音说：“我们曾经遇到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的威胁，我们不吃那一套！我们攻打济南，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们打北平、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有等我们的部队来，就带上国民党军队逃跑了。他们如果在中国的领土上敢打我们，我们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消灭！”

赫鲁晓夫也略显激动地说：“过去的经验现在不适用了。请你别忘记，现在美国有了原子弹！”

毛泽东忍不住用俄语说：“原子弹？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但他的“湖南俄语”赫鲁晓夫听不懂，不由茫然地环顾四周，最后把询问的目光落在李越然的脸上。李越然用标准的俄语重复了一遍毛泽东所说的话。

赫鲁晓夫听了后，不由惊叫一声，然后嚷着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克利姆、米高扬，你们听到了吗？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说到此，他把脸转向毛泽东，不无调侃地接着说：“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量和力量的对比失去了任何意义，谁的军队愈多，他的炮灰也愈多。在原子弹的阴影下，没有军队可言，有的只是一堆烂肉和炮灰！”他说得耸人听闻，似乎在吓唬一群无知的孩子。

毛泽东那淡淡的眉毛逐渐聚拢，他对赫鲁晓夫的这番话也同样感到震惊和愤慨。他真想用强硬的态度驳斥他的论调，但倏忽间改变了主意。他认为他此时此刻发火是最无力的表现，于是他立刻舒展眉头，用一种政治家特有的处惊不变的平静神态说：“照此说来，战争就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了。

如果出了战争狂人，你就只有投降了？赫鲁晓夫同志，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无非是乱扔原子弹，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建我们的家园。”

谈到此，连赫鲁晓夫自己也发现，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已无形中否定了他的“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再谈这个问题就等于自投罗网了。他直到吃饭毕，也没有敢提这个问题。

召开莫斯科会议，一个主要目的是在《莫斯科宣言》上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路线，不达此目的，赫鲁晓夫是不甘心的。因此，他又安排第四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

毛泽东经过与赫鲁晓夫的几个回合的交谈，审时度势，已决定不再和赫鲁晓夫磨下去了。为此，当赫鲁晓夫烦躁地坐到餐桌前时，他就及时给他递来了妥协的讯息：“赫鲁晓夫同志，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个备忘录，算是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只要在《莫斯科宣言》中体现苏共“二十大”观点，不管中间生什么枝节，赫鲁晓夫都不计较。因此，他爽快地答应说：“可以。我看可以。”他说这句话时，早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笑容堆满了他那胖胖的脸盘。

因为高兴，在这次午餐中，赫鲁晓夫完全失去了控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顾忌。他狂妄到公开批评起斯大林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你大概也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全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与他没有关系，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的重大损失。”

毛泽东不想听赫鲁晓夫吹牛，一直低头吃饭。等赫鲁晓夫把话说完，他王顾左右而言他，突然说“我愿意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他的这句话，显然是在讽刺赫鲁晓夫的无知浅薄。

可是，赫鲁晓夫没有体会到，竟答应安排哲学界的人会见毛泽东。

他对斯大林的批评还言犹未尽，继续接着说：“斯大林对西南前线的指挥，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我作出正确决定，就是停止包围哈尔科夫地区的作战行动。但是斯大林蛮横地拒绝了我的正确意见，下令继续进行哈尔科夫包围战。我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上将，请求他拿出地图向斯大林讲明形势。你要知道，斯大林指挥作战是从不看地图的，他是用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的。地球仪上的哈尔科夫还没有针眼大！可是华西列夫斯基在电话里对我说，斯大林已研究了这一问题，对此问题他不能向斯大林说什么了。我知道，他是害怕斯大林，害怕斯大林的粗暴和歇斯底里！还有总参谋部那位胆小如鼠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他一见到斯大林，两腿就打颤。吃败仗就是因为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但我不怕斯大林，还是在另一个地方勇敢地向他打了电话……”

毛泽东一边喝汤，一边向翻译李越然使一个眼色，并报以一抹苦笑。

赫鲁晓夫不顾毛泽东爱听不爱听，依然滔滔不绝地说：“斯大林不接我的电话，却让马林科夫接。我在电话里愤怒地说，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事后我听说，斯大林当时就站在电话机旁，就是不肯接我的电话……”

毛泽东继续喝汤，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响，用以表示他不想听赫鲁晓夫把话再说下去。

赫鲁晓夫仍不知趣，继续他的话题：“在电话里，我重申了我的正确意见，然后由马林科夫转达给斯大林。我想，斯大林当时一定在那里拨弄他的

地球仪呢。这个白痴，他听马林科夫转达了我的意见，给我的答复却是：‘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毛泽东已吃完了饭，用餐巾擦着嘴，不无调侃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打完呢。”

赫鲁晓夫终于发现毛泽东对他的话不感兴趣，只好把话题就此打住。

在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里，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赫鲁晓夫早在半年前就听伏罗希洛夫传给了他这个消息，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他问：“由谁接替呢？”

毛泽东说：“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可以胜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接着，他说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的名字。并对此四人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当他提到刘少奇时说：“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足。”

提到邓小平时他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提到周恩来时他说：“这个人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有个弱点……他是个好人。”

提到朱德时他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啊！”

说到最后，毛泽东说：“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你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老朋友。”

赫鲁晓夫点头答应说：“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告别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同志，关于文件和备忘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再谈？”

毛泽东想了想说：“就安排在明天早上谈吧。”

晚上，毛泽东突然决定他不跟赫鲁晓夫谈了，让邓小平跟他谈。于是，他叫来李越然，让李越然代他给赫鲁晓夫写信。

李越然来到毛泽东的卧室，时间已是午夜了，毛泽东还未睡。毛泽东让李越然坐在床边的一把圆凳上，从床头柜上拿一个长方形中号信封和一支红蓝铅笔递给李越然，便开始口授信中内容：“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你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谈，我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迅速用中文把毛泽东的话记了下来，然后交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说：“哎，哪个叫你写中文，我是让你写俄文的。”

李越然把那一段话又写成俄文，并翻译给毛泽东听。

毛泽东听了说：“好，就这样行了。”

这段话的中文、俄文都是写在信封上的，自然不能就此交到赫鲁晓夫的手中。李越然准备拿着去找杨尚昆，等打印好了再转给赫鲁晓夫。可是，当他正要告辞时，毛泽东却说：“把信封给我，我还没签字哩。”

李越然迟疑一下，还是把手中的红蓝铅笔和信封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封上签了名，便催促说：“你请苏联的同志把信即刻转交给赫鲁晓夫同志。即刻！”

事后，李越然就此事发表感叹说：“主席不拘小节，就那么随随便便把一个写了字的信封交给了赫鲁晓夫。这也许就是伟人的一种风度！”

晨曦微露时，赫鲁晓夫从梦中醒来，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写给他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中。他接到信后，最早的感觉是不高兴，认为毛泽东这样做是对他的轻慢。可是过一会儿，他的感觉就变了，开始怀疑毛泽东这样做可能是以此隐寓什么意思。他费神地猜了好一阵，但始终猜不出来。后来，他见到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竟紧皱眉头，抱怨地说：“毛泽东这个人，谁也拿他捉摸不透。”他把信封拿出来，在手里晃着继续说：“你们看看他写给我的信吧，这就是他写给我的信，他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米高扬接过信封，仔细看过上面写的字，忍俊不禁地笑了。他用手拍着赫鲁晓夫的肩膊宽慰说：“你就放心吧，亲爱的尼基塔，以后的事情会一切顺利的，我们准备在文件上签字吧。”说到此，他把声音压低，极其认真地说：“我了解，毛泽东就是这样，从来不拘小节。”

米高扬早在四十年代就到过西柏坡，后来又来过北京，会见过毛泽东。毛泽东两次访问莫斯科，他都与他接触过，他自信他是了解毛泽东的。

赫鲁晓夫仍半信半疑。然而，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米高扬的判断是对的。

四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 40 周年活动中，毛泽东在列宁山向集会的群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演讲中，他有意回避了斯大林的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盛赞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高度评价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世界革命的发展所作出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高声欢呼中苏友谊牢不可破；高声欢呼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友谊永存！他还满脸热情地颂扬了苏联人民在苏共“二十大”路线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毛泽东那洪亮的声音和磅礴气势在列宁山的上空，在莫斯科上空回荡，地球上凡有无线电的地方，都可以听到他那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讲话，使在场的苏联人民无不受到强烈鼓舞，不时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赫鲁晓夫真想不到毛泽东会发表这样令他激动的演讲。等毛泽东演讲毕，他迫不及待地走上去，紧紧地和毛泽东拥抱。他如此激动，除了刚才毛泽东的演讲有力地支持了他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有关方面获悉，在他和毛泽东争论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在许多兄弟党的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仍然坚持“以苏联为首”的提法。

8月7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并肩站在列宁墓前，共同检阅了苏联的军队，受到广大苏联人民的欢迎。

莫斯科会议终于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聚在一起，按理应该以赫鲁晓夫为中心，可事实上却是以毛泽东为中心。对此，赫鲁晓夫当然有点嫉妒，但又无可奈何。人心所向，是不可强求的。

会议开幕，没有谁作过特别的安排，也没有谁打过招呼，毛泽东自然而然被视为最权威的人物。每当他出现到乔治大厅时，各国共产党领袖便不约而同地起立，甚至一齐鼓掌欢迎。当毛泽东坐下后，大家才坐下。每次散会，毛泽东站起来后，大家才站起来。大家站起来后都不动，等毛泽东先走。有时，毛泽东礼让赫鲁晓夫先走，赫鲁晓夫也不好意思先走，总是礼貌地坚持让毛泽东先走。

随后又召开了 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情况也一样，毛泽东受到

特别的尊重和崇拜。

在前后两个会议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嫉妒毕竟是次要的，而感激却是主要的。他感激毛泽东以他个人崇高的威望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运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持了他，支持了苏联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在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即席讲话，更使他感到激动。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所产生的伟大意义。他竖着大拇指说：“苏联又有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了。了不起啊！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信心十足地问赫鲁晓夫，苏联经过努力，能否用10年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方面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想了想，点头说：“我们努力把力还是可能的。”

毛泽东也表态说：“看到卫星上天，我就一直想这个问题。我们都选择一个目标，你10年赶上美国，我们15年赶上英国！”

毛泽东在会议发言中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俗语：“‘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同志带头鼓掌，使大厅里很快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表示大家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赫鲁晓夫感激地看一眼陶里亚蒂。

毛泽东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颇为重视。他双目注视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友好地笑了笑，然后说：“一个和尚两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起来嘛，有了什么事，还是朋友靠得住。我相信你们迟早是会回来的。”

卡德尔十分感动，向毛泽东频频点头，眼里流泄出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敬和感激的目光。

两天前，毛泽东利用吃饭的机会，曾和多年在美国工作的浦寿昌作过一次谈话。他一边品尝着烤鹌鹑，一边询问了美国的经济状况，浦寿昌回答了不少数字，他以惊人的记忆全部记在了脑海中。发言中，他分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把浦寿昌告诉他的有关美国经济状况的数字和苏联作了对比。从数字对比中看出，美国明显优于苏联。说到此，他话锋一转说：“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一颗卫星上天。而美国呢？别听他吹得神乎其神，可他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天去！”

会场上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杂以喧哗声。显然，各国代表为苏联的成就受到莫大的鼓舞，情绪变得异常激动。

借此机会，毛泽东以他高亢的嗓音说出了现在世界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口号，并把他步入会场时跟赫鲁晓夫交谈的话也搬到桌面上，颇为自信地说：“中国要在10年到15年内超英赶美！”

赫鲁晓夫坐在毛泽东的身边，不时为毛泽东鼓掌。但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并不是全部赞成的，有些内容甚至是他和毛泽东争论过的。不过他已被毛泽东对他的宽容所感动，也不得不投桃报李，对毛泽东给予宽容。

讲到战争问题，毛泽东说：“要警惕出战争狂人，他们有可能到处乱扔原子弹和氢弹。我相信，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不会在战争中充当侵略者。我和外国的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被消灭。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悲观的说法。我说，如果遭到不能再糟，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

平地，全世界将为社会主义所拥有；多少年内又会有 27 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我们中国人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建设，我们希望和平。可是，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下决心在进行我们的建设以前奉陪到底！如果你每天怕战争而战争最后来了，那么你怎么办？……”

讲到此，赫鲁晓夫的脑海里跳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后悔在一个月前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合同，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样品以及生产这种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一边想，一边伸手摸着他那光亮的头顶，表情相当复杂。

莫斯科会议，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这两个文件上签字而宣告圆满结束。赫鲁晓夫作了许多让步，毛泽东作出必要的妥协，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都感到满意。

五 195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来北京参加庆典活动。9 月 30 日，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两个共产党大国的领导人又一次见面了。

当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来到颐年堂，同赫鲁晓夫一起会谈。

赫鲁晓夫这次来北京，也许因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困难，苏联已处于明显的有利地位，因而有一种狂傲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从下飞机到走出颐年堂，不时说一些俏皮话，有时又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说话也吵吵嚷嚷，很不安分，像体内注射了兴奋剂。

会谈的第一项内容，是由赫鲁晓夫向中国领导人介绍刚刚结束的苏美戴维营会议情况。赫鲁晓夫突然变得严肃谨慎起来，因为他毕竟了解毛泽东，在谈及重大国际问题时不得不有所收敛。

介绍完情况后，果然不出赫鲁晓夫的预料，毛泽东那深沉得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赫鲁晓夫。他缓慢而有力地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话，而是避实就虚作了一番表演。他向毛泽东身边挪了挪，脸上露出一神秘的表情，像要报告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似的说：“你们没有接触不会知道，美国人还是很想和我们缓和关系的。他们确实很富，我这次可是亲眼见了的。真的，我亲眼看到美国的工人很富，很富！”他完全是一种赞美的口气。

毛泽东不无嘲讽地淡淡笑了笑说：“去看一看我们还是赞成的，我们不反对。我关心的是你仅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已听出，毛泽东的话里似乎隐寓着对他的批评，立刻不自在地解释说：“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他们的财富是靠侵略和掠夺而得来的。”

他觉得这个问题再谈下去，他又会陷于被动的，就先发制人，眨眼间转移话题，批评中国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使西藏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毛泽东摇摇头，张开双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看得住他呢？”

“你们就该看住他嘛！”赫鲁晓夫固执地说。

“我们看不住，也不能像你看得那样去看他。”毛泽东不想接受这个批评，继续申辩着。

1958 年那次会谈，赫鲁晓夫一直记着，事后他总结那次会谈的教训，认为他当时之所以处于被动，是因为当时苏联在国际、国内所处的形势不利。今天，他决定借当前是中国国内形势不佳之机，在会谈中把主动权紧紧抓在

自己手里。因此，他又在另一个问题上向毛泽东提出批评。他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嘛！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常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还算是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他。你们为了那么一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闹冲突，这是很不值的。”

毛泽东断然回答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林彪插嘴说，“办事总得讲个原则嘛。”

赫鲁晓夫仍坚持他的意见，说：“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不应该和印度闹冲突。”

“我们从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可他们是要侵略我们。”外交部长陈毅激动地站起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在印度资产阶级一边！”他这样质问赫鲁晓夫，是针对苏联发表声明，公开袒护和支持印度的侵华举动的。

“我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做，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赫鲁晓夫毫不退让，大声叫嚷着说。

陈毅早被激怒了，也大声回敬赫鲁晓夫说：“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赫鲁晓夫见陈毅这样咄咄逼人，心里不由发怵。他怔怔地看着陈毅，几秒钟后觉得陈毅这样讲话是对他的蔑视和不恭，不由把一张脸涨成一块猪肝子，像一个无赖之徒似的大叫大嚷起来：“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陈毅仍然态度强硬，并用手指着赫鲁晓夫说，“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说得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

赫鲁晓夫也许因在中印问题上讲不出更有说服力的道理，就又转一个话题，想以此压服中国领导人。他说：“你们对金门打炮，这么大的事情，事先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大声回敬说。

赫鲁晓夫近似吼叫地说：“是我派普罗米柯来的！”

陈毅也大声说：“金门打炮，我们事先通知你们了。再说，这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言外之意是说，这是中国的内政，用不着苏联干涉。

赫鲁晓夫用警告的口气说：“你们不要想通过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固性！”

陈毅不依不饶地说：“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社会主义原则性了？”

赫鲁晓夫发现他这样和陈毅硬顶不会捞到什么便宜，就丢开陈毅转而面对沉静的周恩来质问：“你们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去东欧，处理涉凶事件，回来就给我上课……”

“我不是上课，”周恩来不像陈毅那样激烈，但毫无怯懦，朗声反驳说，“是讲很好处理兄弟党的关系。你当时对某些兄弟国家、兄弟党的领导人，有许多片面看法，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

赫鲁晓夫像被人揭了隐私似的，恼羞成怒，挥舞着拳头，捶打着沙发扶手，嚷叫道：“没有，我没有说！”

“你说了。”周恩来不屑一顾地微笑着，显出一种政治家的沉稳，慢慢地说出这三个字，然后又不慌不忙地点出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并颇有份量地说：“你说他们了，说得很片面，是错误的。”

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李越然为赫鲁晓夫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激得火扑扑

的。他忍不住对毛泽东附耳低声说：“主席，赫鲁晓夫讲得这些话，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

毛泽东轻轻点头说：“可以。”

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李越然立刻站起来，大声说：“当时的翻译是我，我作证，赫鲁晓夫同志是讲了这些话的。”接着，他把赫鲁晓夫当时怎么说这些话，以及说这些话的气氛、环境，甚至连表情都一一讲了一遍。

赫鲁晓夫被震得目瞪口呆，无话可说。为了打破尴尬，找一个机会下台，只好佯装随意的样子说：“我是这么说的吗？记不清了……”

长时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这时把抽剩的烟蒂在烟灰缸里捻灭，不慌不忙地开了口：“赫鲁晓夫同志，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向金门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开口讲话时，心弦就开始颤动起来；听了毛泽东的话，一颗心已提到胸前，脸上的肌肉不由抽搐着，然后憋足了劲喊道：“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

久经世面的李越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争论的场面，不知是太激动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一时翻不出“正统”二字，急得脸都红了。精通俄语的王稼祥见状，急忙提醒说：“正统。”赫鲁晓夫见自己步步处于下风，不由挥手在场内划一个圈说：“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你们多少人？我这儿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不对等的！”事后毛泽东曾私下跟人评价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后来的不少事实，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了台。第二天，我国举行国庆游行活动，赫鲁晓夫应邀登上天安门。在休息室里休息时，他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他说的：“他们”，是指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苏联专家。事实上，早在6月份，苏联已单方面宣布与中国签订的核协议无效，现在提出撤回专家已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因此，毛泽东也以冷对冷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说到此，他觉得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应持审慎态度，便又补充说：“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指苏联专家和制造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在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一行后，就立即南下视察各地。他的专列先到山东，继而到安徽……一路上，他再也看不到“大跃进”出现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了。田野上一派萧条，土地干裂，盐碱白花花地覆盖着地面，当年炼铁的土高炉随处可见，没有丰收的庄稼，只有少数人在地里干活……

他不住地吸烟，手指薰得焦黄，在列车上整日整夜不休息，苦苦思索着什么。他很少说话，更不与外人交谈。据他的随行卫士们说，他们听到他长叹一声，说过一句话：“天灾人祸啊！”这里，他所说的“人祸”，有多少是指苏联、赫鲁晓夫；又有多少是对他本人以及党内别的领导人工作失误的反省与自责呢？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是不得已的。

车到合肥，已是晚上，整座城市断电，黑沉沉一片，不见任何灯火。

地方党政领导汇报，说合肥地区用的水力发电，因长江水源枯竭，已无法发电。毛泽东凝视着漆黑的城市，只顾抽烟，好一阵不说话，空气像凝固了似的。

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给他的卫士们讲起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公元17年，荆州大饥，饥民到野地掘草根……”讲到后来，他略显激动地说：“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个地步。有人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想逼我们屈服。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说到此，他问卫士们：“你们敢顶不敢顶？”

卫士们齐声回答：“敢顶！”

“他越逼我们，我们越要顶！”毛泽东的巨掌有力地拍着桌子说。那气势仿佛要挑起泰山，要把一切反动势力一掌击碎似的……

历史的脚步已走过30多年了，两个大国、大党的领导人的交往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却是很多很多的，评说自然也不尽相同。不过，不管毛泽东有无过失，过失大小，人们还是永远信赖他的，理解他的。

陈嘉庚与蒋介石决裂的前因后果

当年，国民党要员蒋鼎文在美国发表谈话时，将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并称为“中国伟大人物”。蒋介石 50 寿辰之际，陈嘉庚捐得可购 10 架飞机的 130 多万元作为“寿礼”。1940 年春陈嘉庚回国时，蒋仅在重庆一地就准备了 8 万元经费用于大小宴会。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也在延安窑洞前摆了一张漆皮脱落的旧圆桌招待陈嘉庚——

陈嘉庚，作为爱国华侨的领袖，一生热心兴办华侨和家乡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1913——1920 年，先后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1918 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21 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抗战胜利后，创办《南侨日报》，进行爱国民主活动。曾募款资助孙中山，与国共两党领导人关系甚密。国民党要员蒋鼎文曾在美国发表谈话，称蒋介石、毛泽东、陈嘉庚三人均是“中国伟大人物，希望他们推诚合作。”

而作为公众关注人物，陈嘉庚很坦诚地说：“人生大病在不自知，我虽年老向有自知之明，安敢与蒋、毛二人相提并论……二公所能者，我则绝不能；而我所能者，二公均能之。唯肯行与否耳。我自信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其他军事政治则全不谙。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深之最深。若毛主席与蒋委员长，更大不相同。其为人言信行果，经纬才干，我国无出其右者，此亦我之所知也。”

陈嘉庚的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的亲自经历中对蒋介石、毛泽东个人品德、思想的认识及其变化，也反映了他与蒋介石、毛泽东交往的曲折历史关系。从拥护蒋介石并以 130 多万元的国币为“寿礼”为蒋购机，到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从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并让共产党多作让步到应毛泽东邀请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陈嘉庚成为国、共两党“何以在两民心中反差悬殊”的最好见证人。

陈嘉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成为蒋介石所控制的南京政府的拥护者，蒋介石政治上的支持者。陈嘉庚积极拥护蒋介石，真诚希望祖国统一，在抗战中更希望全国民众在蒋委员会领导下团结抗敌。而蒋介石则鉴于陈嘉庚在华侨中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号召力，亦很着重他。

陈嘉庚拥护蒋介石是出于一腔爱国心，而国民党却将他看作是“大财神”。

1936 年秋，蒋介石 50 寿辰，南京政府为了讨得蒋介石的欢心，欲购一架飞机。但财源不足购 10 万元（国币）的飞机颇感困难，于是找到陈嘉庚，请他发动南洋华侨捐款购机祝寿。

陈嘉庚出于增国力、抵御外侮的爱国动机，积极领导华侨“购机祝寿”，竟捐得国币 130 多万元，可购得 10 架飞机。望着如此丰厚的“寿礼”，蒋介石自然笑逐颜开。抗战爆发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即“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从 1937 年至 1940 年间，捐款总数高达二三亿元。另外，还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积极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募捐款项。据统计，1939 年国民政府军费为 18 亿元，而华侨汇款即达 11 亿元，其中捐款约占 10%，仅南洋华侨捐款就占华侨捐款总数的 70% 多。这对于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使将为财源不运而苦恼的蒋介石愁眉舒展。那么蒋介石是怎样开支这些华侨筹款的呢？陈嘉庚得机会得以了解。1940 年早春，陈嘉庚发

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同时，自己亦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亲自回国实地考察国内团结抗战情况，并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3月25日，陈嘉庚及随行四人，乘飞机达重庆，在机场受到蒋介石代表应易安及吴铁成，邵力子等200余个单位上千人的热烈欢迎。

蒋介石非常重视陈嘉庚回国慰劳。仅重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经费用于招待，包括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

这种奢侈的应酬令陈嘉庚十分反感，他认为在全国军民艰苦抗战的时候，这样铺张浪费，各地竞相攀比，是极为有害的。为此，他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敬请政府及社会见谅。

几天后，陈嘉庚去拜访蒋介石夫妇，表达华侨对这位“抗战领袖”及全国军民的慰问，并告之不久将献一件南侨总会赠的“万世永赖”纪念品致敬。蒋介石听了非常高兴，连忙摆手说：“噢！不必送东西了，您老人家来了，比什么都还宝贵。”

为了酬谢陈嘉庚和慰劳团，蒋介石设宴招待陈嘉庚。他听说陈嘉庚平素俭朴，特地只用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同时还下达两道手谕：严禁公务员酬宴；惩治开宴的茶店或酒楼主人。

尽管如此，陈嘉庚在重庆的这些天还是发现了在好听言词及热情招待下掩盖的另一面——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政府要员贪腐化，偷窃外汇；连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开办起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而监察院却并不过问。另外，大街上男着长衫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酒楼菜馆两旁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理乏精神；报纸少版面，箝制甚严密等。陈嘉庚认为，仅举此外表数条，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而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者，与全国处于抗战艰难时期颇不适合。私下感叹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论年龄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至少还要占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也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吧，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但更令陈嘉庚焦灼揪心的事情就是国共两党间矛盾日深，摩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到国内团结抗战的大事，广大侨胞可不愿看到国内分裂再现、内战再起啊！就在那时，陈嘉庚做出了到延安访察，以了解毛泽东对中国团结抗战之态度的决定。

蒋介石得知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颇受震动，明知无由阻止，又力图施加影响，防止他倾向中共。

在一次宴会后，蒋介石试探地问陈嘉庚到成都后是否他往？陈嘉庚回答要到兰州、西安。再问还有别处否？答延安如有车通，亦欲前往。

一提延安，似触动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便借机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寡义无信等。并提醒陈嘉庚：要去可以，但不要受其欺骗。

蒋介石坦率的劝告令陈嘉庚心中十分不快，认为蒋介石简直是拿他当3岁孩童看。也由此“坚定了非去延安会毛泽东的想法。”

二

1940年5月31日下午5点多，陈嘉庚终于抵达革命根据地延安。

那一天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欢迎陈嘉

庚。陈嘉庚走下汽车，深为欢迎人群的热情场面所感动。在即将举行的欢迎会上，陈嘉庚动情地说：“我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现在实现了这一愿望很高兴。广大华侨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共同抗战，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华侨的爱国心，为祖国抗战多作贡献。”

当晚住宿在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月1日朱德及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

当天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得洞内，只见墙上挂一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应多作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的、坦诚的解释；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所以，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以适当还击，这样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民主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同敌人妥协和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统一战线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将葬送。毛泽东诚挚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为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作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之后，毛泽东于门外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之上，因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适值风来，纸被吹走，索性弃之不用。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却吃得舒坦、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还多次到交际处拜访陈嘉庚，或同午饭，或共晚餐。而陈嘉庚亦从同毛泽东的接触中，耳闻目睹了许多事，使他逐渐对毛泽东产生钦佩之情。

如：一次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办公室与陈嘉庚谈论南洋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参加，顷刻间席位告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翁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进去。而毛泽东则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刚抽到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就将烟火熄灭，见客回来后接着抽完。而最令陈嘉庚记忆深刻的却还有两件事。

其一：某天毛泽东单独在家中请陈嘉庚一行九人吃饭，饭桌上仅有白菜、咸饭，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其二：一天晚上，毛泽东问陈嘉庚寿科长住何处，陈嘉庚朝近处一个窑洞拍了拍，毛泽东便去寿家窑洞谈话。陈嘉庚以为毛泽东去去就回，便在窑洞前等待毛泽东，但久等不出，乃回洞内暂歇，半点钟后复出，仍未见毛泽东出来，时近10点钟，因洞外晚风寒冷，遂入洞安眠。第二天早上才知道，

毛泽东竟与国民党的一个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这些事，或见毛泽东平易待人，或见毛泽东勤廉朴实，或见毛泽东虚怀若谷，联想到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一级大员，当门口传令兵长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陪客立刻全体肃立，毕恭毕敬，连大气也不敢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介石方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座，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这两种对比，使陈嘉庚感想颇多。

陈嘉庚为了进一步了解延安，以证明蒋介石所言之虚实，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结果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无关，政府抽很轻很少的税；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男女衣着较好，过往行人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至多抽至7斤半粮，其它捐款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粮种菜，既保证了军粮供应，又减轻了农民负担；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予以严惩；这一切都证明边区政府气氛良好，并不象传言中的什么“共产共妻”、“破坏抗战”、“民众生活惨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真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辩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余观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陈嘉庚结束对延安的访问是在1940年6月8日。

就在前一天晚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出席。在会上，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感到非常满意！……”这足以证明陈嘉庚对国内形势已详细掌握，对一向持怀疑态度的共产党给予充分肯定。延安一行，加强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可以说，他是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延安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的。

三

1940年7月17日，陈嘉庚重新返回重庆，此次回来陈嘉庚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满怀信心地对同行者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陈嘉庚所指的救星无疑是毛泽东，但他对蒋介石仍未彻底失望。

时隔几日，陈嘉庚怀着协调国共团结的心情去见蒋介石。谁知谈话未进行多时，蒋介石便气极败坏、声气俱厉地大骂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说到此处，蒋介石顿顿，又神秘地压低声音对陈嘉庚说：“此番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此。”陈嘉庚见蒋介石如此动怒便不再多言，只说依华侨心理，甚盼望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可待胜利后解决。蒋介石自觉失态，复现笑容，在握别时对陈嘉庚说，你往西南诸省，有事可函告我。

过后，蒋介石对这次不甚融洽的谈话有些后悔，第二天特邀请陈嘉庚至重庆黄山蒋介石别墅吃午饭，何应钦、白崇禧等党政要员陪席。席间，蒋介石非常高兴，把陈嘉庚拉坐在自己身边，频频斟酒加菜。饭后又留陈嘉庚在客室相谈中外事。正谈话中，防空警报骤响。众人下坡急往防空洞躲避，仓促间陈嘉庚忘带手杖。一小时后警报解除，众人复又登坡回返。蒋介石见陈嘉庚未带手杖，便将他的手杖送陈嘉庚。陈嘉庚推辞不过，只好收入助步。

此情此景，当时确令陈嘉庚感动，认为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厚意，当终身不忘。临别时，宋美龄再三向陈嘉庚致意，希望华侨多捐助难童费，陈嘉庚欣然应允。

离开重庆后，陈嘉庚作函一封，航寄蒋介石。信中坦诚地陈述了那日会见的许多看法以及对蒋介石许多行为的不满。但陈说利害，语气委婉，意思还是希望蒋介石陈弊去害，既为国家民主谋利，亦为个人博取良好名誉。

但蒋介石并未被陈嘉庚的一腔真诚所打动。

在陈嘉庚到昆明、桂林及东南诸省察访其间，一路发表回国观感；如实报告到西北考查的所见所闻，公平评说中共所行政策，愤然抨击国民党一些官员的腐败行为。蒋介石听到后十分不悦，决定对陈嘉庚实行三项政策：1、由何应钦电知东南各省，监视陈嘉庚的行动；2、通过新加坡总领事馆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禁止陈嘉庚回新加坡；3、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消除陈嘉庚的影响。

陈嘉庚对这三项措施持一笑置之的态度，他认为蒋介石还不会专横到这个地步。但这一想法在 50 多天之后彻底绝望，对蒋介石不再抱任何希望。

原来，在 10 月前后，陈嘉庚在福建一路考察，了解历时 50 多天，深深体验到家乡民众的凄惨生活。政府官吏的恶行为，非常痛心和愤慨。他认为，这种种弊端之根源，皆在任省主席的陈仪身上。于是，多次致电蒋介石，告陈俯重征田赋、统制运输等情况，但久不见回音。有人要陈嘉庚亲往重庆面见蒋介石，陈嘉庚说：“在重庆已见蒋五六次，已明白为人，虽十次亦绝无效。”12月8日，陈嘉庚启程返新加坡，途中在云南芒市意外地接到蒋介石的回电，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读罢电文，激愤至极，方明白福建苛政之源，尽是在蒋介石那里，难怪陈仪有恃无恐，如此还有何理说？

从此，陈嘉庚毅然与国民党、蒋介石彻底决裂，一心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在新加坡，站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疾呼团结，抗战到底；同时，组织、发动华侨，敦促国民党枪口对外，勿起反共摩擦。1945年在吧城参加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坚持独裁的人民民主运动。同年9月7日，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指出蒋介石执政20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已声名狼籍，而美国政府竟多方摇助这一贪污独裁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而与国民党有天渊之别的中共，则获得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因此务望美国政府“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以终止。”此段电文，义正词严，酣畅淋漓，表现了陈嘉庚的勇敢无畏精神，深得爱国华侨及民主进步人士等的支持和拥护。

四

1949年1月20日，对陈嘉庚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日子。他欣喜地接到毛泽东邀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电话。电文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探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言词恳切，诚挚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陈嘉庚阅后即复电毛泽东，

表示“革命大功将告完成，异常兴奋，严寒后决回国敬贺。”

5月5日，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陈嘉庚乘船离开新加坡，驶向日思梦想的祖国，驶向正在获得新生的祖国。也驶向他十分敬佩的毛泽东身边。

6月7日，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与陈嘉庚终于在西山会面了。毛泽东紧紧握着这位爱国老人的手说：“欢迎您啊陈先生，一别十年过去了！”陈嘉庚激动地说：“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到了。一是告诉蒋介石中共团结抗战无恶意，但他不听；二是宣传延安所见所闻，这可“得罪”了蒋介石。”毛泽东很受感动，对陈嘉庚之公正忠信表示钦敬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红都的“太上皇”李德

李德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是一位有影响的特殊人物。对中国革命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的错误指挥，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至此，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都瑞金郊区的沙洲坝，有一栋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稻田中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称之为“独立房子”，主人就是红都的“太上皇”、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的军事顾问，中文名字叫李德，意即“姓李的德国人”，在华发表文章署名华夫，意即“中国男人”。李德在“独立房子”里指挥了长达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位有着传奇般经历的红都的“太上皇”李德，直到今天仍然是未解之谜。

莫阿比特监狱的政治犯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原名奥托·布劳恩。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因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5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李德6岁时就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1913年李德获得奖学金，得于进入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学习。1918年应征入伍，当了一名列兵，上了奥意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返回师范学院，并于1919年毕业。1919年4月，李德加入了德共的前身斯巴达克联盟，并且参加了巴伐利亚共和国的组织和保卫工作，进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李德率领青年支队在慕尼黑与反革命武装进行街垒战。共和国失败后，李德被捕，由于他更改了姓名未被定罪，3个月后即被释放。1921年李德成了台儿曼领导的德共汉堡组织的成员之一，不久，又到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工作，年底，第2次被捕入狱，5个月后逃出，转到德共中央领导下的出版局工作。

1926年9月26日，李德与一些德共党员在柏林一间咖啡馆相聚时，发现有人盯梢，立即转移，刚走到街上，就被几个警察包围。

“站住！请出示你们的证件，我们是刑事警察，你们被捕了，请跟我们走吧。”

李德再次被捕，被送往柏林警察总局。一起被捕的还有李德的妻子奥尔加·贝纳里奥以及其他6名德共党员。李德被指控为“红色将军”，犯有背叛祖国，从事间谍活动，组织间谍中心的“叛国罪”，被摩托囚车送往莫阿比特监狱，单独囚禁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囚室里。

监狱的生活既单调，又乏味，李德每天都按同一程序打发日子。每天早上7点，监狱就会响起尖利刺耳的起床铃声，李德必须在10分钟内穿好衣服，梳洗完毕，打扫干净囚室，并提着空水罐站在门旁，等候狱卒开门。15分钟后开始用早餐，送来的是一块烤糊了的但还有些温热的面包和一杯代用咖啡。上午11点半以前有半小时的放风时间，犯人35人一组，排成圆圈，互相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在一个呈三角形的院子里散步。第2次铃响是午餐时间到了，午饭千篇一律按程序逐日轮换供给几乎一个味道的土豆汤、胡萝卜汤、白菜汤、豆角汤、青豆汤和豌豆汤，一星期只给一块肉或鱼。下午5点，第3次铃响后，传来大锅的敲打声，开始用晚餐，又是一块硬面包，一碗稀粥，一碗茶或咖啡，一块咸鱼或是奶酪。有时，午饭和晚饭甚至全是土豆，只有复活节或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才能吃上一顿象样的有两道菜的午餐。

李德在监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将小珠子穿在钢丝上。每天要穿 200 至 250 节钢丝，每一节钢丝穿 30 至 50 枚珠子，至少要重复一万次同样的动作。在昏暗的灯光下，要将大小不一的珠子穿到同一节钢丝上，需要精力高度集中才能完成。李德并未努力去做工，而是做到刚好达到必要的生产指标为止，以便不至于受到处罚。

李德逐渐与外界有了联系。3 个月后，李德的妻子奥尔加被释放出狱，两人可以经常通讯，每隔两星期还能从她那儿得到诸如香烟和书籍等物品。1927 年秋，李德的案子预审结束后，在法官的监视下，李德可以经常与妻子见面。李德的妻子也正在设法营救李德出狱。

1928 年 4 月 11 日，李德在刑警的押送下，经过地下室狭长的走廊和一道道铁门，来到审讯法官的房间，与妻子见面。当李德和奥尔加像往常一样开始谈话时，有 6 名衣着整齐的人悄悄来到审讯法官的房间。“举起手来，不准出声！”一支冰冷的手枪伸了进来。

李德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即冲出房间，跳过栅栏，穿过走廊，趁一名警卫在大门摆弄门锁的时候，从边门冲出，跑上了大街，奥尔加与其他 6 个人也紧紧地跟在李德的后面。

“来人啊！来人啊！犯人越狱了。”有个刑警终于反应过来，发出尖利的喊叫声，接着响起了刺耳的警哨及杂乱的跑步声。劫狱的除持枪断后的一人被捕外，其余均安全脱险。

德国最高检察院悬赏 5000 马克捉拿李德和奥尔加，警察在所有边境和哨所张贴印有李德夫妇的照片以及人物特征描写的巨幅通缉令，电影院也放映了悬赏通缉李德夫妇的像片，德国的《前进报》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民主报刊也骂李德是“匪徒”、“间谍”。德国还派出上百名刑事警察和特务搜巡所有可能外逃的道路，德国有数十名与李德同名同姓的人被捕。

李德和奥尔加在柏林市工人区隐蔽了一个多月。德共中央考虑到李德已无法在德国立足，决定秘密送他去苏联。李德偷越国境，来到莫斯科，化名利特罗夫，列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又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苏军总参谋部派驻远东的情报人员

1932 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李德被派遣来华，其原因大体有 3 个：李德有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懂俄语、德语、英语，便于在外国工作；李德是德国人，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对可疑的人动辄屠杀，日本与德国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

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的前两个译音作为他来华时的化名，他身穿西装，坐上一列由莫斯科发出的特别快车，穿过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到达中苏边境上的满洲里后，继续乘车抵哈尔滨。日军侵占东北后，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密探和白俄分子遍布各地，加上东北生活艰苦，李德无法立足，只得于该年秋天离开哈尔滨南下大连，改乘轮船来到上海。

起初，李德住进一家外国人经常出入的具有古老的英国殖民主义建筑风格的礼查饭店。由于李德既不经商，又没有其他足以证明身份的职业，而上海又处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为了不引起怀疑，几星期后，李德又迁到公共租界一幢美国人的公寓。

李德很快就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以前与李德一起在德共党内工作过的德国人阿瑟·尤尔特取得了联系。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都有定期的无线电联系，与其他苏区也有信使往来，消息比较灵通。尤尔特和李德每星期与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洛甫见面一次，他俩定期前往中共中央秘密办事处，看见窗台上放了一盏台灯或房间的窗帘打开半叶表示安全的信号后，才放心地推门进去。博古和洛甫都在苏联学习过，以前在莫斯科就与李德相识，懂俄语，洛甫曾留学美国，也会说英语，因此，不需要翻译，他们也能很随便地交谈一些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

尤尔特还介绍李德与当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时报》驻华特派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相识。史沫特莱正在上海为她的《中国在战斗》一书搜集素材。博古和洛甫安排史沫特莱与从中央苏区来的人秘密见面，使她了解红军斗争的情况。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也有联系，宋庆龄向她提供了许多有关 19 路军及两广军阀等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李德看了史沫特莱撰写的报道，从中又获得了一些军事情报。

李德来华时间不长，对中国的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自然，他获得的只是一些残缺不全的，甚至于自相矛盾的情报。李德将搜集的有关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以及工农红军的军事情报，写成报告，拍摄在微型胶卷上，并附上草图，几次通过信使送往莫斯科。

1933 年初，临时中央准备迁往中央苏区。博古和洛甫考虑到李德是苏联著名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垒战的经验，请求尤尔特将李德派往中央苏区作为军事顾问。

“你是否愿意去瑞金工作？”尤尔特征求李德的意见。

“我愿意。”李德稍作考虑，欣然同意，但又提出一个条件：“此事必须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同意，并发一个相应的指示。”

尤尔特和博古立即发电报请示共产国际。莫斯科很快就发来表示同意的回电，并限定了李德的职权范围：“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军事顾问，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

李德因等待一位从莫斯科来的新的军事顾问，推迟了行期。李德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的参考书，并且开始学习中文，为前往苏区做准备。

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雷德）途经欧洲、美国、日本，直到春末夏初才到达上海。弗雷德因旅途耽误了时间，迟到几个月，几次接头都错过了。幸好李德在莫斯科就与弗雷德相识，彼此都很熟悉，李德在大街上巧遇弗雷德，并引见了尤尔特，才接上关系。弗雷德是李德的上级，要求李德执行他的一切指示。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1933 年秋，李德前往中央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临行前，弗雷德再次叮嘱李德说：“我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在中央苏区严格地执行我的一切指示。”弗雷德给了李德一份两人直接联系的密码。

尤尔特稍作劝阻，提醒说：“一切决议均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后决定。”

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小手提箱，一张国内护照，与博古夫人刘群仙扮成一对假夫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在中共中央特科派出的护

送人员陈泮年的陪同下，来到上海码头，搭上一艘英国海轮。李德与刘群仙在汕头下了船，住进这个华南港口唯一的一家欧洲旅馆，在那儿与一位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姓王的交通员取得联系。

第2天早晨，交通员提着小手提箱，与李德、刘群仙一起乘车朝内地行驶，抵潮安县城，这儿靠近禁区。交通员领着李德和刘群仙步行离开县城，朝韩江河畔走去，途中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拦住，一名国民党军官检查了李德的护照，盘问了很久。

交通员解释说：“他是考古学家，要去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

国民党军官消除了疑虑，挥手放行。

李德抵韩江后，遇见按约定早在那儿等候的名叫潘汉年的大胖子交通员。潘汉年将李德和刘群仙带上一艘藏在倒垂的灌木下的木船上。李德和刘群仙钻进狭窄的船舱，几乎平躺了两天两夜，不敢出声。傍晚，木船才夹在其他许多小船中间，由一艘轮船拖着，缓缓地向上游驶去。沿途有几次停了下来，接受检查，李德在船舱里听见甲板上杂乱的脚步声以及粗鲁的盘问声。直到第3天，李德和刘群仙才走出船舱，上了甲板。李德换上紫红色的风雨衣式的长袍，胸前挂着十字章，一条黑色的围巾遮住半个脸，扮成外国神甫。刘群仙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扮成修女，佯装去汀州天主教堂传教。

天黑以后，李德和刘群仙在大埔附近的一个村庄旁边悄悄地上岸，前往秘密交通站。当三人走进一条杂草和灌木丛生的山路时，约10米远的前方传来低声的问话：“干什么的？”

“去汀州天主教堂。”潘汉年回答。

暗号对上了。原来是从苏区来接应的由卓雄率领的十几个人组成的便衣队，队员都是18岁的年轻小伙子，每人配带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腰上捆着一包盐，当时苏区食盐奇缺，盐比现洋还要贵重。队员们热情地迎上前去，互相握手问好。

卓雄领着李德和刘群仙走了10来里山路，来到一间偏僻的小房子。这儿虽是苏区边界，但仍属国民党统治区。李德在房间里显得焦灼不安，时而耸间皱眉，时而摊开双臂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李德用俄语说：“必须赶快离开这儿，尽早赶到瑞金去。”

刘群仙向卓雄转告了李德的要求。李德和刘群仙休息了一个小时后，又在便衣队的护送下，夜行晓宿，兼程赶路。白天，他们停下来，隐蔽在离村庄三五里有树木和杂草遮蔽的“马架子”下休息。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木棚，上面覆盖着树叶，李德与便衣队员挤在里面睡觉，附近交通站的交通员则用小篮子送来红米红薯南瓜苦菜。天黑后，开始上路，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专门拣羊肠小道走，还不能将杂草踩倒，以免留下走过的痕迹，有时不得不从沟底顺着山沟往陡峭的山上爬。李德不习惯走山路，更不用说爬山了，便衣队员只好用绑带将李德和刘群仙捆着，硬是绳捆索绑地带着他俩往前走。

李德等人赶了七八个夜晚，走了几百里山路，从大埔绕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经永定、上杭，到达才溪乡，与专程前来接应的由福建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率领的战斗团汇合。李德抵闽西苏区后，为了不使他的黄发碧眼、高鼻梁的雅利安人的外貌过于引人注目，他要来一卷白纱布，将头包扎起来，不让脸孔外露，佯装伤员，头上戴一顶大草帽，由战斗团护送，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时而坐担架，经汀州赶到红都瑞金。

“独立房子”的主人

李德是红都的第一位外宾，又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自然受到博古的热情接待，被安排在瑞金郊区的沙洲坝居住。早在临地中央刚迁入苏区时，博古为迎接李德的到来，就下令在沙洲坝大兴土木，在一片开阔平坦的稻田中间，修建了一栋约 100 平方米客家人称之为“四线三间”的典型赣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 3 间，中间的堂屋用作会议室，东间是李德的卧室，西间住着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这所房子离军委总司令部约 2 华里，前门正对着总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仅 200—300 米，离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驻地也不远，有田间小路可通，与党政军机关的联系都方便。由于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间，红都人称之为“独立房子”。

在物质生活上，李德得到特殊的照顾。李德穿的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优质灰色斜纹布料，式样新颖。上身是套头列宁服，胸前 2 个小口袋，两侧还有 2 个暗口袋，下穿马裤。饮食也很讲究，配有 2 个厨师，根据李德的西方饮食习惯安排食谱。李德不喜欢吃大米饭，要吃面包，瑞金不产麦子，专门派人去外地购买面粉。厨师不会做面包，就用面粉肉酱制成烤肉饼。有时买不到面粉，就将糯米用石磨碾成粉，内包蔗糖，制成油烧甜饼。李德吸烟的瘾很大，高级香烟每天至少要 3 包，苏区不产名烟，又必须保证了李德的香烟供应，于是，特意派人通过私商从白区买回来，有时前方打了胜仗，还专门拍发过收缴香烟的电报。这样，李德不仅能经常抽上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一类的高级香烟，而且能喝上从国民党部队那儿缴获来的咖啡。

李德刚 30 出头，年富力强，精力充沛，自然有着强烈的求偶欲望。李德刚到红都时，看上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年轻漂亮的妻子，并向她大献殷勤。博古唯恐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连忙找到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交给她为李德找一位中国妻子的特殊任务。李坚贞硬着头皮，多方寻找，物色了一位在少共中央文书科任文书名叫肖月华的女工。肖月华是广东大埔人，13 岁当童工，16 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大埔县妇女部长、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肖月华文化程度不高，为人忠厚诚朴，虽然身材矮小，但长得清白丰满。起初，肖月华坚决不同意，经过李坚贞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才像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一项政治任务一样，奉命与这位洋顾问结婚。白天，肖月华在原单位工作，与其他人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晚上，她才去“独立房子”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后来，组织上又安排肖月华专门负责照顾李德的生活，肖月华勉强学会了烤面包。

这时，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称之为“中共中央小伙子”的博古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后，自己对军事指挥又一窍不通，正感到束手无策，李德这位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的到来，对他来说，犹如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德刚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独立房子”与李德秉烛长谈，粗略地介绍了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目前严峻的军事形势，并商定由李德主持军事工作。

李德针对蒋介石采取的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新战略，也提出了“短促突击”的反“围剿”的“新战术”。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即敌人修建白色堡垒，红军就修建红色堡垒与之对抗，待敌人离开白色堡垒推进 200—300 米时，红军则实行短促突击，消灭敌人。李德先后以华夫作为笔者在中央军委创办的《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等 8 篇文章，系统地论述了短促突击的战术理论。李德在瑞金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

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4所军事大学宣传他的短促突击战术。李德还在红1军团的师、团以上干部会上讲了一个通宵的短促突击课，并召开了部分指战员座谈会，进一步推销这种错误的战略战术。

李德就在“独立房子”里，以短促突击战术作指导，绕着地图，指挥了这场规模宏大的反“围剿”战争，李德因此又得了个“图上作业的指挥家”的雅号。每当接到前线的电报，不论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独立房子”，先由参谋在堂屋挂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查找电文所指的地点，并根据内容按比例绘成略图，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及其行动方向，附在电文后面，译成俄文，一起呈送给李德。李德接过电报后，就围着墙上的大地图，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苦思冥想，不时地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划去。然后，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让伍修权译成中文电文，转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送给军委的朱德、刘伯承或党中央的博古、洛甫签署后执行。李德制定的作战指挥地图，连一个碉堡应挖的地点，一个哨兵该立的位置，一门迫击炮甚至一挺机关枪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当时使用的十万分之一地图误差很大，根本没有实测过，大都是问测，有的连地名和方向都不准确。李德又不留任何余地，不考虑敌情、气候及自然条件，甚至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时间，仅凭比例尺丈量地图上的距离，计算部队应有的进度，定下到边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加上朝令夕改，来回折腾，弄得前线指挥员手忙脚乱，心中无数，贻误战机。因此，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不断地打败仗，丧师失地。可李德却不认为这是他瞎指挥的结果，反而认为前线指挥员没有认真执行其短促突击战术，经常发脾气骂人，动辄处分前线军官，甚至于要问斩。李德成了红都颐指气使的“太上皇”。

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1934年10月，持续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受到严重挫折，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指挥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准备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汇合。李德是最后一批离开瑞金的人，他骑着一匹马，另一匹马专门为他驮着香烟和咖啡等紧俏物资。李德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的搬家方式，并且携带了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致使部队行动迟缓，红军虽然勉强穿过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人员折损过半的沉重代价，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李德面对这种情况，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是不停地唉声叹气，一副愁眉苦脸像，样子十分狼狈。这时，李德已无法全面指挥部队了，仅根据各部队送来的电报，提出意见，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是周恩来。红军抵通道时，李德仍坚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硬要往蒋介石设置的几十万人的大口袋里钻。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提出改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致使红军免遭全军覆灭之灾。进入贵州后，部队迅速突破乌江，攻下遵义，战局开始出现转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旧城辉章公馆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长凳上。会上，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遭到毛泽东等人的严厉批评。李德处于被告的地位，伍修权坐在边上不停地翻译。李德一边听，一边不停地抽烟。李德的脸色很不好看，一会儿由红变白，一会儿又由白变红。李德对会上的批评异常不满，大发脾气，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站起来辩护说：“我仅是一个军事顾问，提提参考意见而已，是中国同志自己搞糟了，中国同志比我更了解在中

国进行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我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我的批评。”

李德回到住处后，越想越气，他拿出手枪乱放一通，以发泄内心的郁闷。

会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随后，红军主动撤出遵义，李德想起以前在苏区时林彪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吹捧其短促突击战术，因此，他主动要求随一军团行动。可是，今非昔比，李德现在失意了，林彪对李德已不再感兴趣，仅虚与委蛇。李德自讨没趣，3个星期后又返回中央纵队。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随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来到川甘交界的小镇巴西。李德调到刚组建不久的红军大学任教。这时，发生了张国焘的分裂逃跑事件。凌晨，李德与右路军战士正整队准备出发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有几个人骑马奔驰而来，来回地在草地上跑着，为首的原四方面军参谋长，现任红大教育长的李特大声地喊道：“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

李特煽动性的言论，犹如一颗炸弹在部队中爆炸，刹那间，部队闹哄哄的，全乱了。

李德明白怎么回事后，疾步上前，拦住李特的马，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拉了下来。李特曾留学苏联，懂俄语。李德厉声地责备道：“不许胡闹，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队拉走。走，跟我到毛泽东那儿评理去。”

李特强硬地说：“不走，就是不走。”并且骂道：“你是个赤色帝国主义者。”

李德也骂道：“你简直是个流氓！”

正在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时，突然有人喊道：“毛泽东来了！”骚乱的部队顿时安静下来。毛泽东从西边的一个茅棚里走了过来，李德扭着李特，推推搡搡，朝毛泽东走去。

“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这时，响起了毛泽东宏亮的声音。“现在不愿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见面嘛！捆绑不成夫妻，谁愿意走，放他们走。”

李德放了手，李特又暴跳起来，大叫：“这是逃跑主义。”

李德以为李特失去控制，想抽挂在腰间的一支大左轮手枪向毛泽东射击，立即果断地上前将李特拦腰抱住。李德高大的身躯，铁钳般的双臂，使李特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

毛泽东见状，忙对李德说：“放了他。”

李德松开手，李特连忙灰溜溜地爬上马背，带着部分四方面军的战士南下。

天亮后，部队继续北上。

李德随右路军翻过人迹罕至的大雪山，走出荒无人烟的水草地，飞越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终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李德成了唯一走完二万五千里征途的西方人。

抗日军政大学的外国军事教官

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李德应邀讲授战术课。李德一边讲授战术理论，一边与学员一起组织实践演习和沙盘作业。李德结合讲课内容，写了几篇反坦克、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不同斗争中的策略文章，署译者的名先后在《八路

军军政杂志》和《中国青年》等刊物发表。李德还负责完成了培训红军第一个骑兵团的工作。

红军东征前夕，李德以敌强我弱为借口，写信给中共中央，企图阻止红军东征抗日，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批评。东征军回师后，李德应邀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东征胜利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为自己阻止东征一事作自我检讨，承认中央对他的信的批评是正确的。此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政治局及军事委员会召开的高层次的决策会议了，完全失去了在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参与议事的资格。

李德的个人生活也遇到了麻烦。李德与肖月华因国籍不同，性格各异，语言不通，尤其是李德不尊重妻子，动辄辱骂，甚至于拳脚相加，两人终于感情破裂，肖月华主动提出离婚。李德虽然后悔不已，但已无法挽回。李德与肖月华生的一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男孩，归肖月华抚养。李德在华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几乎使他失去生活的勇气。

李德在政治上失意，生活上不顺心的情况下，情绪异常低沉，萌发了回莫斯科的念头。李德几次找到洛甫，请求召回莫斯科，未获同意。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李德又重申返回苏联的要求。王明忠告说：“苏联正在搞肃反运动，等待你的不会是什么好事，你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处决。”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为我自己的工作尽责任。”李德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他不再坚持要回莫斯科了。尽管李德意识到自己不会永远留居中国，可是短时间内离开也不可能，他不得不作长期呆下去的准备。李德找到陈云，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希望将自己转为另共产党正式党员，以便能够过组织生活。二是请求批准他与李丽莲结婚。李德的两项要求全部得到满足。李德的组织关系隶属红军后方司令部，名义上是顾问，实际上是解决衣食住问题。李丽莲是歌唱演员，1937年与江青一起从上海滩来到延安。李丽莲能歌善舞，年青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两人感情上的沟通扫除了语言障碍。每当周末，李丽莲从艺术学院回到家里度假，并且带来一大批艺术界的朋友，给冷落的窑洞带来了欢声笑语，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既谈政治，也谈艺术，有时甚至举办小型舞会，李德的生活又充满了欢乐。

1939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洛甫、博古突然光临李德的窑洞，与李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李德受宠若惊，又感到蹊跷，他自然不知道莫斯科召回他的命令已到延安。

8月27日早晨，通讯员突然送来一张条子。

李德同志：
你速来机场，飞往莫斯科。

洛甫

李德在华已经7年了，突然接到回莫斯科的通知，其心情可想而知，酸甜苦辣都有。李德来不及品味，迅速收拾好行李，匆匆地与妻子李丽莲吻别，立即跳上一匹察哈尔矮马，朝机场飞奔而去。

李德看见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静静地停在延安机场上，周恩来、邓颖超及其养女孙维世也同机飞往莫斯科，机场上集结了100多送行的人。

毛泽东上前握着李德的手说：“李德同志，祝你一路平安！”

这时，李丽莲匆匆赶到机场，要求与李德一起去莫斯科，因签证问题无法解决，李德与李丽莲延安一别，再未见面，竟成永诀。

周恩来、邓颖超、孙维世与李德乘道格拉斯飞机在兰州降落，作了短暂的逗留后，改乘一架苏联飞机，经哈密、抵乌鲁木齐，尔后，又继续飞行，经阿拉木图、塔什干，安抵莫斯科。因秋天天气变化无常，中途不得不作或长或短的逗留，整个旅程花了约3周的时间。

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翻译

李德随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指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师哲负责接待工作。师哲将周恩来、邓颖超、孙维世安排在任弼时家里吃饭。

周恩来见李德没来，忙问：“还有一个人呢？李德怎么没来？”

“我不知道李德也来了。”师哲回答。

周恩来叮嘱说：“你再去安排一下李德。”

师哲将李德带到自己的住处，炒了几个简单的菜招待李德。

这时，正是斯大林肃反运动的高潮时期，李德对自己在中国犯的错误忧心忡忡，唯恐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李德见这么简单的饭菜，很不高兴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竟这样来招待我？”师哲连忙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完全是因为事先没有得到通知，来不及准备，才用家常便饭招待你。”

吃过饭，李德又按自己的习惯要用烟头与师哲对火，师哲则随手给他划了一根火柴，李德疑心很重，又生气地说：“你看，连抽烟都不肯同我对火了，这不是对我有看法吗？”师哲又予以解释。

李德情绪很不好，嘀咕说：“我虽然犯了错误，但决不是反革命，不是有意办坏事。”李德花了几周的时间忙于回答问题，撰写报告，写补充材料。共产国际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和处理李德的问题，并且专门召开了对李德的审查会和批判会，到会的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几位领导以及在莫斯科的一些中国同志。李德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在在中国犯的错误，还为自己作了辩解。李德说：“我在中国犯了错误，但我的错误主要在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是好心办了错事。”与会代表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一位德国同志批评说：“你明明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什么也不懂，偏偏要胡来，搞瞎指挥，你这不是混蛋吗？”

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德的错误：“李德在中国犯的主要错误是福建事变爆发时，不赞成联合19路军反蒋，在反‘围剿’战争中，又采取短促突击战略，与敌人打正规战，拼消耗，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丢失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大家对李德的批评越来越尖锐，语调也越来越激烈。李德越听精神越紧张，唯恐组织上把他当作敌人来处理。李德一再申辩说：“我决不是有意干坏事。”

幸好主持处理李德问题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主席沃洛列是个德国人，有袒护自己的同胞之意。沃洛列代表组织作了结论。

沃洛列最后说：“李德的问题，仍然是革命队伍中我们同志的错误。”

李德听了这话，犹如一块石头落地，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审查结束后，李德被劝告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被禁止过问中国问题。李德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指示。随后，李德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李德与苏联人民一起投入了反法西斯战争。李德到德军政治营中担任政治教官，还到位于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苏联反法西斯中心学校给德军俘虏上课，进行反法西斯宣传，治愈了许多被俘的德军官兵的“纳粹病”。由于李德在1941年至1945年的苏联卫国战争中作出了成绩，荣获一枚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德重新回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翻译了许多政治和文学作品。李德将列宁著作和苏联小说译成德文，其译著在苏联和德国受到读者的喜爱。苏联作家协会吸收李德为会员，并推荐他参加了翻译部执行局的工作。

李德在苏联未受到人身限制，也未受到打击报复，他在莫斯科平静地度过了15年。

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1953年斯大林逝世，翌年，李德获准离开苏联，回到离别近30年的祖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李德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研究院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并任作家协会第一书记。李德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是列宁著作德文版的主编，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表彰李德的功绩，先后授予卡尔·马克思勋章、祖国战争勋章及其他许多最高奖赏。

60年代，中苏论争开始，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李德迎合苏联领导集团反华的需要，接二连三地撰文著书，积极参加反华大合唱。1964年5月27日，李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讲话》的文章，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群众斗争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革命和建设，进行公开的歪曲和攻击。1969年又在东德的《地平线》周刊上，连载了李德撰写的《从上海到延安》的长文，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进行系统地攻击。1973年李德将历年撰写的反华文章进行整理、补充，写成《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公开出版。李德站在反华立场上，背离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恶毒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且为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犯的错误辩护。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东德病逝，终年73岁。

方志敏牺牲的经过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革命志土方志敏被捕之后，有两件事造成了他精神十分痛苦，一是他认为红十军团两千余人主力覆没的原因是自己“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二是敌人以杀害他感情甚笃的爱妻缪敏相威逼，方志敏能够承受得了吗……

方志敏蹲在大石头下，四周都是树林，林子里响起敌人的阵阵吆喝声。从他躲藏的地方可以看见山下有个坝子，打散了的红军战士一个个被从林中搜出，押到坝子中央。

撕心裂肺的痛苦在他的胸膛翻卷着，他举起手枪，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一位哲人说：“如果精神的创伤压倒其他一切苦痛时，自杀变得轻而易举。”

此时的方志敏正是精神的创伤压倒了其他一切苦痛——

1934年10月，他奉中共中央指示，率作为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北上抗日，至皖南，遭国民党重兵堵截，部队受挫。他决定撤回赣东北苏区，途中又被7倍于己之敌围困在怀玉山区。

作战失利本是兵家常事，但他认为责任主要在自己“政治领导上的错误，与军事指挥上的迟疑。”从此，“责任”便千斤重地压在他的心上。

本来，他已和粟裕一起带800人冲出了重围。但主力2000余人还在敌人包围中，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决定留下来。他说：“我是负责人，你们先走，我留在这里！”而留下，就意味着等待死神。

第一天与敌激战，部队没有冲出包围圈，而且还被打散了。第二天，红军被俘去800余人。第三天、第四天……，部队越打越少，2000余人的主力几近全军覆没。

如此惨重的失败，怎不叫他痛不欲生？！

但他没有开枪。他的心底响起一个声音：“方志敏，你这是逃避责任！自杀哪是共产党员的行为？”

他把枪重新插回腰间，竭力抑制住悲痛：“是呵！共产党员，岂能遭了失败就悲观绝望？”

他战胜了自己刹那间的怯弱，也躲过了这次搜捕。他微微一笑：“反动派呀，反动派！这一次，我若能逃出罗网，不打倒你，我是不会罢休的！”

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敌人的魔掌。1935年1月，他在陇首封锁线上被俘。两个国民党兵搜遍他的全身，以为象他这样的大官一个头就值8万元赏洋，身上一定有许多值钱物件。但他们彻底失望了，他是地地道道的“无产者”，身无分文。

一张红纸，写好了34人的名字

1899年，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湖塘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他曾在一篇遗文里说他的家乡是很好看的：村后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树木葱茏；村子掩映在深绿的花果林木中，各种鸟儿在绿叶间上下跳跃，鸣叫着啁啾悦耳的声音；村前是几口养鱼池，水平如镜，每天早晚妇女们便来到池塘边洗衣裳，鱼塘前是大田坂，戴斗笠的农民，三三两两散在田坂上，弯腰低头做工……

就是这样美丽的地方，也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一样，充斥着贫困、饥饿和疾病。压迫与剥削笼罩在农民们的头上，日月无光。

方志敏从青年时代起渴望着能为家乡、为可爱的中国找到光明。192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国共两党合作打北洋军阀。他一身二任，既是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又是共产党的江西省农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中，方志敏回到家乡。他邀集起34个贫苦农民，高声问他们：“欠财主佬的债的有几个？请举手！”34人都同时举起了手。他又问：“自家没田种的有几个？举手！”又是34人举臂如林。他点点头，看着34双期待的眼睛，说：“我准备搞革命暴动，平债分田，大家干吗？”34人齐声响应：“干呵！”

一张红纸上，方志敏写好了34人的名字。34人一个个走拢来，郑重地按他的指点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手印。从前这些农民只知在田里埋头做工，现在他们昂起了头要干那惊天动地的革命大事。

——第一个农民革命团就这样成立了。

1928年1月，响应着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起义风暴，方志敏振臂一呼：“暴动！”发动了有名的弋阳、横峰起义。五万多农民云集在他的周围，他们烧借据、毁契约、废除债务、劈仓分粮，把个革命搞得热火朝天。

方志敏带领起义队伍，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进行游击战争，波浪似地将苏维埃的版图扩展到了横峰、贵溪、万年、余江等8县区域，使苏区纵横500余里，人口达100万众。在这些斗争中，他创造并总结出了一整套革命经验，被毛泽东称赞为“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他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被誉为“苏维埃模范省”，他本人也获得了苏维埃中央颁发的银质“红旗勋章”。

——死谢党的时刻

过些时候，敌人把方志敏移到“优待室”，对他玩起了劝降的把戏，劝他放弃共产主义，写一纸脱党声明，再写一点“文字”，然后高官任做。

方志敏对他们笑笑，表示愿写点“文字”。敌人拿来了纸笔。他伏案疾书，写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狱中遗嘱》等文章。这些文章字里行间都闪烁着“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必胜”的思想和他宁死不屈的信念。

敌人恼羞成怒，想用夫妻之情来威逼他，问：“你是不是愿意看见你夫人？你与她的感情不是很好吗？”方志敏知道敌人已逮捕了自己的妻子缪敏。

方志敏与缪敏感情甚笃。他俩在校读书时相恋，在革命低潮时结为夫妻。他们是革命的患难伴侣。狱中，每当他想起缪敏的音容笑貌，心头就涌起“快慰的情绪”。但在敌人的威逼面前，他坚定地回答：“我到了这个地步，妻子儿女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

劝降不成，威逼无效。无计可施的敌人便把方志敏五花大绑，戴上重镣，拉去“示众”。面对围观的人群，方志敏昂首挺胸，表现出一副凛然难犯的英雄气概，令人们不得不发出“这个共产党真了不起！”“虎有不倒威”的赞叹。

有一次，敌人煞有介事地问方志敏：“方先生，要是上峰下令处决你，你会感觉怎样？”方志敏知道敌人是以死相威胁，他无所畏惧地笑着答：“呼的一枪，或者啪的一刀，那正是我需要的一死谢党的时刻。”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敌人在筹备一个大规模的“‘剿匪’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届时要将方志敏等人绑去杀头，做“追悼大会”的祭品。方志

敏听说后，沉思片刻，泰然自若地点点头：“这样死，也很痛快！”

敌人最后决计下毒手了！1935年8月6日，南昌的清晨，细雨濛濛，马路两旁军警林立。敌人将方志敏反铐双手，口中塞满烂棉絮，嘴上又紧紧缚了一块白布，然后押上刑车，驶往刑场。

刑场上，方志敏神色凛然，向前走几步，然后转过身来，用蔑视的目光打量着刽子手们那一排黑洞洞的枪口。敌人吓得心惊胆颤，立即排枪齐射……

死亡是肉体的毁灭，而肉体只是生存意志的表现形式。方志敏英勇就义了，按他的话说是一死谢党，但他的精神和信念却在肉体的牺牲中得到永生！

李大钊遇难纪实

五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年逾古稀、须发皆白的“了明禅师”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走了。当时，居住在附近的人们怎么也不明白，这位整日里诵经打坐、吃斋念佛的慈祥老人究竟犯了什么法。直到1953年4月上海军管会军法处处长下达命令，真相才大白于世……

1927年初，中国革命进入了最危急的历史时期。北京城里，白色恐怖愈加严重。1927年4月6日上午，张作霖派出宪兵警察和便衣特务数百人，悍然违反国际公例，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之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以及中东铁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进行大搜捕。

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李大钊正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写字，忽然，传来尖锐的枪声，接着，从庚子赔款委员会那边发出一阵纷乱的喊叫，许多人从矮小的围墙上跳进院子里来。

危急中，李大钊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号勃郎宁手枪，与长女星华一起躲进另一间偏僻的小屋。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接着，由一位“干练长官”率领的警察、特务，蜂拥而入，包围了李大钊。一个坏蛋冲到李大钊的面前夺下了他的枪。

李大钊被捕后不几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时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北京司法部一带，岗哨林立，交通断绝。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里，敌人突然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所谓“军法会审”。“会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匆匆结束，然后用6辆汽车将李大钊等人送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张作霖专门派他的宪兵营长高继武当监刑官。

下午2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仍象平日一样，穿着那件灰色棉袍，神色不变，从容镇静。他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他在向祖国和党作最后的告别，他在痛斥卖国军阀的滔天罪行，他在倾吐一个共产主义者的伟大心声。

李大钊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8个春秋过去了。1945年8月的一天傍晚，一个禅师打扮的老人向北京西北角的一座寺庙走来。老人自称是远道而来取经求佛的，法号“了明禅师”。寺内的众僧听了他的来历，纷纷挽留他多住一段日子。“了明禅师”心中一阵欢喜，便安然地在寺庙中住下了。

一天，“了明禅师”突然不辞而别，渺无踪影。

1951年6月10日，北京三里屯地区派出所收到居民赵某递交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讲：“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内露面的‘了明禅师’，实是认贼为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由他带领警探包围了当时俄国大使馆兵营，拿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数十人，使大钊及诸同志惨遭绞刑而殉难。大钊同志被捕时，手持一支蓝色小号勃郎宁手枪，后被其收为自用……望政府迅即寻觅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了明禅师”究竟是什么人？现在何处？一封普通老百姓的检举信，立刻引起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侦破小组迅速查证。

侦破小组顺藤摸瓜追到上海。在上海马立斯新村（现重庆北路 216 号）46 号 2 楼某室，住有一个年逾古稀、银须垂胸的老头。户籍簿上这样登记着他的情况：姓名，赵志安；别名，了明禅师；年龄，69 岁（实际 75 岁）；原籍，河北宛平县。

经过审查，真相逐渐大白。赵志安的真名叫雷恒成，原系清庭远族皇亲，早年被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及日本宪兵司令部附属的教练所学习，学业期满后回国，即被宣统皇帝封为警察兵科举人。军阀时期，历任北京九门提督衙门总教练，张作霖的奉军总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抗战爆发后，雷恒成又背叛祖国，投敌组织“北京维持会”充任日寇所侵占的宛平、清宛、滦县等 3 县的伪县长，不久又被调升管理山东 22 个县的真渤行政公署的署长，效忠日寇。日本投降后，雷恒成自知罪孽深重，便改装化名“了明禅师”逃往北京西北角的一个避静寺庙内，隐居下来。不久他又化名赵志安，逃到上海，以卖卜为生。

1952 年 10 月 20 日，雷恒成在审讯中自我交代：“1927 年左右，我就任京师侦缉队队长时，先是北京邮政局在信件中发现了有一批共产党人，在俄国大使馆的兵营内驻扎。在报告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后，由陈责成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和我具体负责侦察。因地点是在俄国使馆的兵营内，事先必须由外交部与各国公使交涉，设法排除障碍。后经交涉，得到某某等国的公使谅解，认为此乃中国内部之治安问题，使团方面无权过问。于是即开军警入内，逮捕了李大钊数十人。我那时只知道李是共产党员的头子，是有名的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当时是同我带领了四五十个警探去执行搜捕的。李大钊的小号勃郎宁手枪被我留用了……”

1952 年 10 月，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在该案的审结报告中写道：“……查雷恒成为大汉奸，又确为当时逮捕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的主要凶手之一。为给李大钊烈士等同志复仇，拟判处雷犯以死刑，迅速执行，抄获之罪证及违禁物品，应予没收。”12 月 17 日，华东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同志亲笔批示：“同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53 年 4 月 26 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汤镛下达命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六条，比照同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判处反革命分子雷恒成以死刑，立即执行。其财产酌留家庭生活费用外，全部没收。”

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阵亡之谜

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张自忠将军，在与日军的“襄河战役”中，亲自率领部队渡河作战，扭转了不利战局。但因长官部情况不明，判断有误，命令张自忠率部向南截击敌人，结果置于敌人夹攻之下，敌我力量悬殊，张自忠将军直到战死。敌人找到他的尸体，为他全体致哀……

众所周知，张自忠将军是中国的抗日名将，日军听到他的名字无不胆颤心惊。

1932年2月，张自忠任第29军38师师长时，曾在喜峰口率领他的部队给南侵的日军以首次重创，歼灭敌人两个联队的步兵和一个大队的骑兵，使举国震惊，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1938年3月，号称“铁军”的日本第5师团，以飞机大炮配合，向山东南部进犯。张自忠奉命增援，在鲁南战场与日军苦战7个昼夜，取得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鲁南大捷，大大弘扬了中国军队的威风。

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气焰的一次大会战。在这一闻名中外的战役中，张自忠将军担任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其部下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搏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9年4月，张自忠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时，日军集中了3个师团的强大兵力，向随县、枣阳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面对强敌压境，他毫不畏惧，亲自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渡河截击日军，在田家集把日军打得大败。

1940年5月，日军驻豫南的第3师团、驻鄂北和随（县）枣（阳）一带的39师团以及13师团，分头向中国军队驻地发起进攻，与中国军队在襄河两岸形成对峙局面。

战争进行到中途，由于中国军队防线太长，伤亡过重，导致战局恶化，军心浮动，大有溃败之势。对此，总司令张自忠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挽救战局，取得此次战斗的胜利，决定亲自率兵渡河，追击北方之敌，截击南撤之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中国军队的士气。

5月6日，召开总部会议。当张自忠在会上宣布他要渡河亲征时，他的部下多数不同意他这么做。他们劝他说：“总司令是千万不能离开总部的。如果需要有人率兵渡河作战，可请马治安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去。”

“不，”张自忠果断地说，“今日之事，我与弟等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我对弟等敷衍，敌人来到我们亦是敷衍敷衍地布置；敌人既来，我们亦是敷衍敷衍地抗拒一番就走。这样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聪明的做法，其实最笨；似乎容易去做，其实是最难做到的；似乎可以讨得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今天不打，明天还是要打的，在前面不打，遇到另一个地方也还是要打的，完是一样的完，牺牲是一样的牺牲，耍小聪明不过是徒给世人现眼。所以走这条路的结果，一定是身败名裂，不但使国家败于我们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性命亦要为我们自己所断送。这就等于自杀！是死路！是沉沦灭亡之路……另一条路就是拼！——无论如何艰难，我们还拼不了吗？万一不幸而拼死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中国同胞，我们没有辜负他们的养育，我们亦不愧作一世的军人。”

部属们垂首肃立，以极其尊敬的心情聆听总司令的教诲。张自忠说到此，已激动得热泪盈眶，声泪俱下。他接着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马革裹尸，毫无其它办法。我相信，只要我等下定决心，我们的国家是有着五

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寇之手！为国家民族战死之心，海不枯，石不烂，绝不会有半点改变，此话与弟等共勉。”

5月7日午后，张自忠已作好了渡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只等夜里乘黑渡河。

战前的总司令，似乎有什么心事，在总部的办公室里轻轻踱步、沉思……

突然，传令兵走了进来，向张自忠报告：“报告总司令，洪团长要求见您。”

张自忠纠正说：“他不是团长，是罪人！”他说着，冷峻的目光投向门外。——他知道，洪进田现在就站在门外，他的话是故意说给洪进田听的。

传令兵见张自忠点了点头，明白是同意见洪团长，就退了下去。

一会儿，一个双臂被反绑着的大汉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魁伟，结实得像一块铁；一张黝黑方正的大脸上，长着一双浓眉大眼，一股倔强之气从眉心透出。

他畏怯地低声叫一声“司令”，那颗曾经像雄狮一般桀骜不驯的头颅无力地垂了下去。

“洪进田，”张自忠怒目而视，大吼一声说，“你抬起头来看着我！”他吼罢矛盾地在地上踱着步，过了好一阵才问：“你是来找我请罪的？”

“不！”洪进田坚决地摇摇头。

“那么是来伸手要官的？”张自忠猛地站住，用一双锐利的目光盯视着洪进田。

“不。”

“不是请罪，不是要官……”张自忠沉吟一下，突然声震屋瓦般地问，“那么你来找我干什么？你听着，我可以发给你路费，你回山东老家去种地吧！因为……”他说到此，眼眶里已噙满了泪水，声音开始哽咽：“因为你配作一个军人！”

洪进田浑身震动，面部的肌肉急剧地抽动着，像蒙受了天大的屈辱。但他未置一言。

“来人！”张自忠冲门外喊一声。

传令兵应声从门外走了进来。

“把他带走！”张自忠用手指了指洪进田说，“发给他路费，让他滚蛋！我的部队里，容不下这种窝囊废……”

传令兵怔怔地站在那里，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却没敢说出口。

忽然间，洪进田“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眼里放射着乞怜的目光，直冲张自忠呐喊着：“司令，司令，我是来找您的！求您带着我渡河杀敌！”

张自忠的心猛地发抖，但他为了不让洪进田看到他的表情，故意面壁而立，不理睬洪进田的请求。

“司令，我要到战场上将功赎罪！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司令！”洪进田又一次大声请求。

张自忠的眼睛已湿润了。但仍然一句话也不说。他想再等一下，看洪进田还会怎么样。

“司令——”随着一声撕心裂肺般的哭喊，洪进田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到双臂上，发一声吼，竟把捆绑在双臂上的绳索“嘎”地一声，挣断了，碎成了几截。

张自忠猛地转过身子，仍不露声色地看着洪进田，看他将怎样作为。

眨眼间，洪进田冲到墙边，把挂在墙壁上的一把军刀抓在手，用刀尖对准自己的胸口说：“司令，我这就死在你的面前！”

张自忠急了，立刻挥挥手，大声命令说：“放下，你快把刀放下！”

洪进田听话地把刀放下了。

张自忠走到洪进田的面前，用嘲讽的口气说：“我可以同意你渡河作战，但你告诉我，你将用什么保证你不会做一个逃兵？”他故意用此尖酸刻薄的语言刺他。

“司令……”洪进田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

张自忠看着洪进田那难受的面容，脑海里不由连连闪现出洪进田跟随他八年来的种种令人难忘的画面——

被撤职的团长洪进田，是山东临青人，是张自忠的同乡。

1932年2月，在喜峰口战役即将打响的前夕，年仅20岁的洪进田来到第29军30师的师部面见张自忠。他开门见山地对张自忠说，他是来投奔他当兵的。

张自忠不能因他是他的同乡，就把他收留在部队。他害怕因此而引起30师的官兵对他的非议。因此，他执意不肯收留洪进田。他给洪进田解释说：“时下部队任人唯亲的恶习十分严重，我不能开此恶例。你如果想当兵，就到别的部队去当兵吧。”

洪进田说：“别的部队我瞧不上，我就是冲着你这个师长才来30师当兵的。”

张自忠仍不答应，吩咐他的手下人，把他的这个同乡领下去，让他吃饱睡足后，发给路费，让他回家去。他特别吩咐说：“路费从我的军饷里扣除。”

过了3天，张自忠早把这件事忘了，以为他的这个小同乡早走了。想不到有人来报告，说他的那个小同乡坐在营房里3天没吃一口饭。他不由问：“他在干什么？”

报告的人回答说：“他什么也不干，就那么坐着，一动不动。”

“他说什么了没有？”

“他一句话也没说。叫他吃饭，他摇头；叫他喝水，他还是摇头，连眼皮也不眨一眨。”

好一条硬汉子！张自忠心里暗暗称赞一声，便立刻命人带洪进田来见他。

小伙子已饿得走不动了，但他倔强地不用别人扶，咬着牙自己走着来见张自忠。他摇摇晃晃地来到师部，用手扶着墙站在那里。

张自忠走到他的跟前问：“你还能绝食几天？”

洪进田扬扬头说：“直到你收下我当兵为止！”

“要是我不收呢？”张自忠故意问。

“那我就饿死在你的军营里！”洪进田口气坚决地说。

张自忠已动了心，便问：“你为什么要当兵？”

洪进田毫不犹豫地回答：“像你一样，当师长！”

洪进田的行为深深感动了张自忠，就这样答应收下他了。自此，他下定决心苦练杀敌本领，每遇战事，就英勇杀敌，冲锋陷阵，立了不少军功。在枪林弹雨中，他终于锻炼成一名成熟而合格的军人，一步步从班长、连长，一直升到团长。

那么，这样一个英勇善战的团长，怎么会被撤职而被称作“罪人”呢？这要从几天前发生的一次战斗说起。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之中，身为团长的洪进田被担架抬下了战场。令人奇怪的是他浑身没有负一点伤，却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声。他紧闭双眼，神情沮丧，形态狼狈，与往日冲锋陷阵、生死不惧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对此，人们无不猜测，以为他被敌人的炮火吓破了胆，贪生怕死，装病被抬下了战场。

平时，有好多人对他就嫉妒，嫉妒张自忠对他的宠爱，嫉妒他升职太快……因此，值此时刻，无不冷眼嘲讽：瞧啊，他原来是个怕死鬼！

张自忠也不理解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生气地走到担架前，狠狠踹了洪进田一脚，冷冷地问：“为什么临阵退下？你还是个男人吗？像你这样的逃兵，能当师长吗？”他又想起了8年前他对他说过的话。

洪进田有气无力地说：“我……我中毒了……”

张自忠怒气犹盛，扭头命令军医处长给洪进田检查。

军医处长是个瘦弱的矮个子，戴一幅金边眼镜。在众多嫉妒洪进田的人中，他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蹲在担架前检查完毕，一言不发，只是冷笑。

张自忠见状，催问道：“检查结果怎样？”

军医处长胆怯地瞥了一眼躺在担架上的洪进田，然后咬咬牙说：“他并未中毒……司令。”

“关起来！”张自忠怒不可遏地用手指着洪进田命令说，“把他给我关起来！”他气得脸都白了，鼻子一张一翕的，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事情果然如此吗？不，绝不是如此，洪进田确实中了毒气，又遭到了军医处长的诬陷。

原来洪进田率领他的部队，数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后，到下午4点钟左右，旅部的炊事兵送来了饭食。吃罢饭，他见不少官兵呕吐不止，怀疑是炊事兵误用了桐油炒菜，便派他的副官去查问。正在这时，一个卫兵跑到他的面前报告说：“报告团长，敌人放毒瓦斯了，毒瓦斯……”

洪进田一边听卫兵报告，一边看他周围的官兵，果然发现大家都在流泪。他终于恍然大悟，立刻命令大家戴上防毒面具。然而，不等防毒面具拿来，他自己已中了毒。他感到鼻孔和胃里火辣辣地疼痛，接着呕吐不止，泪如雨下。他立刻命令官兵迅速离开低凹的指挥所，向高处转移。因为毒瓦斯的比重比空气大。他还吩咐官兵们在湿毛巾上涂上肥皂，蒙在脸上，用以防毒。此时，正刮着强劲的东风。敌人又利用风力，将毒瓦斯倾射向中国军队的阵地。

阵地上毒气横散，官兵纷纷晕倒。洪进田也晕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洪进田蒙冤受屈，是明摆着的，但他不愿申辩，他知道，那么多人中毒，事情总会大白于天下的。当务之急是能参加渡河作战，多杀几个敌人，让张自忠更了解他、理解他。

5月7日深夜，张自忠亲率3000余众，渡过襄河。与他随行渡河的有总部参谋长李文田、高级参谋张敬、吴光辽以及他的副官马考堂、贾玉彬等人，还有一名苏联顾问。

渡过襄河，总部设在南瓜店的一座普通民房里。

首先踏入这间民房的是洪进田。

他推门走了进去，一眼就看到一块木板上酣睡着一个人，鼾声呼呼，睡

得正香正沉。这是谁？他不由警惕地端起枪来，走到那人身边，仔细端看起来。

这是一个日本兵，看去年龄只在20岁左右，军服有几处被撕破了，面带倦容，唇边刚刚长出一抹细软的茸毛。他嘴里流着唾涎，把枪弃置于一边，根本没有防备人的意思。

毛贼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洪进田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心里骂一声，就伸他那一双蒲扇一般大的有力的手，准备对付这个日本兵。

“住手！”随着一声轻喊，张自忠走进了屋里。

他狠狠盯一眼洪进田，用轻蔑的口气说：“对付一个睡梦中的敌人，你还是行的。你有本事，就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到战场上去干！要卡死他，我请一个90岁的老太婆就足够了，哪里需要你动手！”

“司令……”洪进田悄悄垂下了头，不知说什么好。

其他随行人员也走进了这座民房，把熟睡中的日本兵团团围起来。

日本兵依然酣睡不醒，对他身边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

张自忠盯视着他那无忧无虑的睡态，不由心潮起伏，思绪翩翩。他想到这个日本兵还是做梦的年龄，与情人幽会的年龄，上大学的年龄……可他已被无情的战争巨浪卷了进来，将要变成战争的牺牲品、殉葬品！他不忍心把他叫醒，就叹息一声，悄悄退出了门外。

“怎么处理他呢？”副官马考堂向张自忠问一声。

张自忠挥挥手说：“让他睡个够吧。”

“睡个够？”马考堂不解地反问一句。

张自忠点了点头说：“让他睡个好觉吧！”他的声音似乎有点颤抖。

深夜，那个日本兵终于醒过来了。

当他看到他的面前走动着的中国人，第一个本能的反映是伸手去抓枪。然而，他的枪早被人拿走了，他什么也没有抓到。他眨巴着眼睛，迷惑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终于意识到他已落入敌手，当了俘虏。于是，他浑身一颤，便立刻从木板上跳起来，往墙上撞去。——他要以身殉职！顿时，他碰得头破血流，浑身沾满了血迹。

张自忠的卫兵们立即把那个日本兵抓住，推到了张自忠的面前。

随行的苏联顾问懂日语，使用日语审讯起那个日本兵。谁知审讯数遍，他连一句话也不说，牙关咬得紧紧的，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看着屋里的人。他的脸上流着一道道鲜血，血不停地向下滴答着。

张自忠扭头对一个军医说：“给他先包扎一下。”

军医给那个日本兵包扎时，这个小家伙拼命挣扎，手虽然被捆着，可他用地咬军医的手，还唾了军医一脸唾沫。

张自忠终于被惹恼了，不由狠狠地骂一声：“真是一条野狗！”

日本兵桀骜不驯地怒视着张自忠。

张自忠对一个卫兵说：“把绳子给他解开。”

绳子刚被解开，那个日本兵又一头朝墙上撞去。他几乎用全身的力气去撞，志在必死，如果不是卫兵急忙把他拉住，这一次撞上去，他恐怕要脑浆崩裂而死了。

张自忠又回嗔作喜，竖起大拇指称赞一声“好兵！”然后走到那个日本兵的面前，语气和缓地问：“你认识我吗？我叫张自忠，你们日本人的大冤家。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敢告诉我吗？”

翻译把张自忠的话翻给那个日本兵听。

那个日本兵听完翻译，突然面露惊愕，眼睛瞪大，面色变得惨如白纸。

张自忠，这是一个令日本人听了无不心惊胆颤的名字！那个日本兵是早已听说过“张自忠”这个名字的。难怪他……他再不敢强硬下去了，乖乖地把他的名字告诉了张自忠：“我叫平川良三。”

原来平川良三所在的部队，是从武汉方面出发向中国军队进攻的一支部队，他们已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过了，也没有吃过饭。当大部队向北而去时，平川良三掉队了，因劳累过度，便在此睡着了。

张自忠很欣赏平川良三那股子不怕死的劲头。因此，他用手指着平川良三，对他身边的官兵们说：“我的兵，个个要像他！怕死鬼就不要来当兵！”

站在一边的洪进田听了，像这话是冲他讲的，他的脸不由一阵发烧，心里却说：“等着瞧吧，我会以行动为我洗刷冤屈的！”

5月8日、9日，在宣城东南的亭子山、耗子岗，中国军队与日军鏖战两日，中国军队终于打败了日军，获得了大捷。此次战役，中国军队消灭敌人无数，俘敌百余名，缴获战马一百多匹，毁掉敌人的橡皮船200多只，截断了敌人与后方的联系和给养。

13日，张自忠接到长官部发出的命令：“敌人第13师团企图南逃，该总司令部即率部向南截击。”因此，张自忠的部队回头向南，截击敌人。

14日，部队占领方案集。

15日，战局突变，北犯日军受挫后立即南撤，敌人后卫已变为先头尖兵，全力反扑我追击兵团。

敌人的一万多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南北两路，向张自忠的总部夹击。

张自忠总部的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伤员亦无法送到后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当晚，正心急如焚的张自忠又接到一个不幸的消息：电台丢失。电台是部队的耳目，丢失了电台，就意味着部队变成了盲人瞎马。张自忠得此消息，无异于雪上加霜，心急得快要跳出胸膛了。

电台丢失，通讯处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洪进田把他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提着来见张自忠。

“司令，”洪进田把通讯处长扔在地上，向张自忠报告说，“这小子想自杀，让我撞上了，就抓来见您。”

张自忠向通讯处长看去，只见他满脸血迹，脸上缠着绷带，浑身颤抖，像得了打摆子病一样。

张自忠痛心疾首地责备通讯处长说：“你知道电台对部队的重要性吗？你作为通讯处长，应该用生命去保护它，怎么能把它丢失呢！现在，由于你的罪过，我们与长官部、与左梯队黄维纲军长都已失去联系，与小洪山友军李先念的游击队也无法取得联系。我军眼下置于敌人的南北夹攻之中……”他说到此，再也说不下去了。

通讯处长自知罪责难饶，就哭喊着说：“司令，我有罪，你把我杀了吧！”

“不，我不杀你！”张自忠摇着头说，“杀了你也是没有用的！”说到此，他向前猛跨几步，走到通讯处长的面前，伸手撕下他脸上的绷带激动地说：“你好好看看我！我要你去立功！”

通讯处长永远也无法看到张自忠了，因为他把自己的一双眼珠剜掉了。

洪进田当时提醒张自忠，通讯处长已没有了眼睛。

张自忠定睛看去，果然见通讯处长的眼变成了两个黑洞。他不禁怒火中烧，大骂通讯处长说：“你这个狗娘养的！自杀，自杀……我的部下害怕敌人的枪弹，自己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你是想让我把你当伤员运走吗？不，我要你明早第一个去跟敌人拼刺刀！”骂到此，他觉得气犹未尽，就又补充骂道：“怕死鬼，你为什么不砍掉两只手，砍掉脚，砍掉……却偏偏要挖掉眼睛？你说！”

通讯处长“扑通”一声跪在张自忠的面前，痛苦地哭着说：“司令，我是没脸见你呀！我是没脸见你才自己把自己的眼睛剜掉的！”

张自忠发了怔。

洪进田也发了怔。

总部的屋子里陷入了沉默，沉默得令人窒息……

天空传来日本飞机的嗡嗡声，一场更加残酷的战斗眼看不可避免了。可是，电台丢失，部队失去联系，援军不可能赶到，

岂不是陷入了绝境了吗？张自忠不由仰天叹息，心里默念着：“怎么办，明天怎么办？……”

“叫军医处长马上来见我。”张自忠突然吩咐传令兵。

不一会儿，军医处长赶到，他像有什么心事似的，低垂着头，不敢看张自忠，也不敢看洪进田，带了通讯处长就匆匆忙忙离开了。

张自忠目送军医处长走向远处，扭头问洪进田一声：“你恨他吗？”

洪进田正为眼下的战局担心，忽然听到张自忠这么问他，有点茫然不解，就问：“司令，你指的是谁？”

“我指的是军医……”张自忠说。

“不，我凭什么恨他？”洪进田微微笑了笑说，“他医术高明，为人正派，谁能恨他？”

到此为止，张自忠才发现，洪进田根本不知道军医处长在“毒气”事件中陷害他。他不由感慨万分，心里暗暗说：“真是一个可爱的傻子啊！”

原来，洪进田被张自忠撤了团长职务，关了禁闭，他所在团的许多官兵们，纷纷逐级向上反映他的冤屈，要求为他昭雪平冤。张自忠了解了真实情况后，心里突然产生了提拔他的念头，但又担心自己看人不准，就决定借此事件，对他进行一次考验，不给他平冤，不恢复他的职务，看他能否经得住打击，能否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张自忠认为，一个未曾受过误解、冤屈的人是难以成熟的，就好比芝麻，没有经过挤压是不会变成香喷喷的香油的。这一点，他是有过切身体会的。

1935年，他由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时，正是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签订不久，华北逐渐变成了日本人的“特区”，日本人到处横行霸道，根本不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放在眼里。他协助宋哲元经营华北，整军经武，力图建起一道抵御外侮的军事屏障，支撑危如累卵的局势。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公开与日本人对抗显然是不行的，因而只好采用明里柔顺，暗里与之斗智的策略。然而他的表现不为国人所理解，遭到不少人的辱骂、鄙视和唾弃。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奉命代理冀察政委会委员长之职，并兼任北平市长，更是忍辱负重，巧与日方周旋，维持不破不裂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国人不明真相，不理解他的苦衷，误以为他已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

奸。后来，他化装逃出北平，到了南京，京沪的不少报纸对他大肆攻击，流言纷传，主张对他实行军法会审……

他蒙受的冤屈还少吗？还小吗？可他有冤向谁说？向谁诉？他希望洪进田也有机会尝尝这种蒙冤受屈的滋味，对人生、对社会、对复杂的世道和人际关系有更深刻透彻的了解。他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啊！

5月16日，天刚拂晓，敌人的炮兵便开始向杏儿山轰击。阵地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受惊的战马到处奔跑。远处，不时传来我军与敌人肉搏的呐喊声。无情的一场殊死决斗拉开了战幕。总部人员全部做好了迎接战斗的准备，每个人都带足了弹药，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扔了。为了压住敌人的凌厉攻势，张自忠把特务营全部调到第一线增援。这个营的士兵，多数是来自河南、山东的青壮年，一个个虎臂熊腰，身强力壮，作战十分勇敢。但遗憾的是他们手中没有重武器，每人只有一支20响自来德手枪和一把大刀，根本不适合野战，是压不住敌人的强大火力的，因而牺牲很大。

上午10时，敌人已攻到我军的最后一道防线边，双方只隔着一道深涧。如果敌人越过深涧，总部就会彻底被消灭。值此关键时刻，洪进田再也忍耐不住了，就大声请战：“司令，我带人上吧！”

张自忠已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毫不犹豫地说：“去吧，要当心点！”

洪进田立刻甩掉上衣，赤臂挥刀，向后挥挥手大声吼道：“一排跟我上！”在洪进田的率领下，一个排像一把刀刺向敌人。

一场惊心动魄的格斗，在刀光剑影中激烈地进行着。日本人是善于拼刺刀的，但在洪进田和这一排中国士兵面前，显得力不从心。

洪进田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把寒光闪闪的刀神出鬼没地在敌群中翻飞，把敌人杀得屁滚尿流，非死即伤，抱头鼠蹿。在他的影响下，一排人一个个生龙活虎，英勇杀敌，毫不退缩。

张自忠站在一个小土坡上，看着洪进田的表现，激动得眼睛湿润，鼻子发酸，不由赞叹说：“真是一员虎将啊！如果每个士兵都像洪进田，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场恶战，敌人终于支撑不住，退到了一个小山坡下。然而，洪进田已身负重伤，被战士们抬下了战场。他已被鲜血染红了，他的身上有他自己的血，但更多的是敌人的血。

战局出现了暂时的转机。

洪进田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脸上、身上的刀伤、枪伤无数。他蠕动着干裂的嘴，似乎想说什么。

张自忠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去，蹲在洪进田的面前，用手轻轻抚摸着洪进田的斑斑伤痕，心一阵颤抖……

洪进田睁开眼看一下张自忠，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嘴里断断续续地说：“我——不——是——怕——死——鬼——……”

张自忠立刻站起身，命令集合部队。

号声响过后，部队集中在一起。他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高声地宣布：“我宣布，恢复洪进田团长的职务，并提升为师长！”

我的这位同乡，征战八年多，他唯一的愿望，是当一名英勇善战的师长！”

洪进田听到张自忠宣布提升他为师长后，他终于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从此与世长辞了！

日军最终还是攻破了张自忠的最后一道防线。

那位自己剝掉眼睛的通讯处长真的按照张自忠的话去做了。他腾身跃入敌群，像一只发疯的豹子，与敌人拼搏。但他很快就倒下了。

张自忠的左臂中弹受伤。传令兵见了惊呼一声“总司令”，抢上去扶他。他用手推开传令兵说：“没什么，用不着大惊小怪，军人离开战场无死所！”

苏联顾问神色惊惶，走到张自忠的面前说：“我是国际友人，苏日关系未断，若战场被俘，恐要由此引起国际纠纷。我要离开这里了！”

张自忠表情平静地扭头对他的副官说：“派3位弟兄去送送他。”他知道走哪里安全，就又补充说：“翻过长山，往东北方向走。”

苏联顾问和张自忠握手告别。

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了，张自忠对他身边所有的人说：“你们都可以走，但我不能走！”

大家同仇敌忾，齐声发誓说：“司令，我们一定要跟鬼子拼到底！”“司令，我们要拼到最后一秒钟！”

日军离指挥所只有200米时，张自忠手下的官兵纷纷扑向敌人，与敌人展开肉搏。

军医处长走到张自忠的面前，要给他包扎伤口。他命令说：“不，你要么快走，要去就去杀敌，不用管我！”

军医处长略略犹豫一下，然后鼓足勇气对张自忠说：“司令，我冤枉了洪团长啊……”说罢，他就义无反顾地冲向敌人……

此时，张自忠因流血过多，已无力走动了。王副官不由分说，把他背起来，就往东北方向跑。走出数步，一颗子弹射来，王副官受伤了。另一名副官马孝堂又背起他，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往前跑。

“放下我！”张自忠在马孝堂背上一面挣扎着一面命令道，“我要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不！”马孝堂倔强地说。他继续背着张自忠向前跑。

张自忠发了火：“这是命令，放下我！”

马孝堂知道，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他不得不把张自忠放下。

张自忠躺在地上，大声对马孝堂喊着：“对民族、对国家，我良心不安……”

张自忠就这样以身殉职，死在了抗日的战场上。

午后一点多钟，阵地上的最后一声枪声也停止了，没有了喊声，没有了战马的嘶鸣声……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寂静。

大雨如泣，雨水洗刷着阵地上的血，洗刷着遍野的尸体，苍天垂得快要和地面连在一起了……

一队浑身泥泞的日军，怪叫着扑上山来，像一群疯狗似的，用刺刀乱捅滥扎已经牺牲的中国军人。

突然，从尸体堆里坐起一个人来。他是张自忠的副官马孝堂。他用愤怒的、血一样红的一双眼怒视着敌人，想当面斥责敌人的兽行。可还没等他说什么，他的头已被一个野蛮的日本人挥刀砍了下来。

敌人从马孝堂身上取下一个公文包翻起来。他们从中发现有张自忠等一批将领的照片，便对着照片在尸体堆里寻找他们的尸体。他们终于找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尸体。

日军头目发出命令，让全体官兵立刻集合。等日军列队站好后，日军头目命令他的所有官兵脱帽，向张自忠将军默哀。

胜利者向失败者致意，侵略者向反侵略者垂悼，这意味着什么呢？

日本兵把张自忠将军的尸体抬到附近的一座小庙里。他们给他的遗体消了毒，又用雪白的纱布包裹起来，然后立一块灵牌，上面写着：支那军总司令张自忠之灵位。

午后 2 时，黄维刚军长率部赶到，日军败逃而去。张自忠将军的遗体，被护送到重庆，国民党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死里逃生的王树声将军

红军组成西路军进攻宁夏、新疆，21800 人的部队，仅有 3000 人生还，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就此铸成。身为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将军死里逃生，有幸回到延安。他所经历的苦难是难以言状的……

1937 年 3 月中旬，一支仅有 11 人的小部队，活动在冰天雪地、人烟稀少的祁连山中。天黑下来后，寒风裹挟着雪花刮个不停，这 11 个人躲在一个山凹里，点起一堆篝火，一边取暖，一边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原来，他们是被“马家军”打散的红九军的官兵。在他们中间，有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 9 军军长王树声和师长杜义德。

1936 年 10 月，党中央决定进军西北，占领宁夏、甘肃。这个月的 24 日，徐向前、陈昌浩奉命带领红 5 军、红 9 军和红 30 军约 21800 余人，西渡黄河。不料红军刚刚渡河，便遭到马步青、马步芳、马鸿逵等部的阻击，使两军进入对峙状态。

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改变原来的决策，决定放弃攻占宁夏的计划，命渡河红军组成西路军，向西挺进，从新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西路军的政委由陈昌浩担任，总指挥由徐向前提任，副总指挥由王树声担任。

西路军西进，仍然受到“马家军”的拦截堵挡，一次次战斗都打得相当惨烈。

在古浪、高台、水泉和倪家营子等地，西路军经过血战，虽然使“马家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但自己也牺牲了不少同志。由于红军对敌情和当地复杂的地形缺乏了解，加之又不习惯于跟敌人的骑兵作战，打到后来，两万多人死的死、亡的亡，剩下的连 3000 人都不到。

王树声带领红 9 军，占领梨园口不久，就被数千“马家军”包围。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王树声和红 9 军政委陈海松，指挥红 9 军奋勇杀敌，坚守阵地，等待援军，但因红 5 军和红 30 军也遭到敌人的进攻，无法支援红 9 军，红 9 军只好与敌坚持战斗。血战到最后，红 9 军仅剩 300 多人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王树声决定突围，转战到祁连山，摆脱敌人的进攻。

突围后，于 1937 年 3 月 14 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一个叫石窝的村子里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决定由王树声率领红 9 军的几百人和骑兵师的百余名骑兵，到祁连山打游击，用以牵制和迷惑敌人，掩护红 5 军和红 30 军安全转移。

在祁连山区，王树声所部再次与强敌遭遇。一场恶战打到后来，红军官兵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受伤，有的被打散，有的被敌人俘虏，逃出来的仅有 11 人。

11 人围着篝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却又一时拿不出逃离虎口的最好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副总指挥兼红 9 军军长王树声的身上。

大家把目光全部投向王树声。

王树声认为，眼下祁连山里冰天雪地，又找不到粮食，加之敌人又不时组织搜山，如不尽快离开山里，他们 11 人，随时都有被冻死、饿死和被搜山的敌人打死的危险。鉴于此，他主张首先设法搞到粮食，然后迅速走出祁连山，回到延安。他知道，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使大家受到鼓舞，坚定意志，克服困难。于是，他鼓励他的另外 10 个战友们说：“同志们，现在我们碰到了许多困难，请大家不要灰心丧气。我们受这

点挫折是暂时的，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精神不倒，大家团结一心，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红9军的种子不能灭，我们一定要保存下去！”

大家原计划在篝火边渡过黑夜，等天明后再去找粮食。可是饿了一天一夜，此时每个人都饥肠辘辘，肚皮快要贴到脊梁骨了，说什么也等不下去了。

不知谁低声嘟囔一句：“我实在饿得不行了，等到天明，只怕要去见马克思了……”

王树声自己也饿得很厉害，听到这句话，想了想便说：“是呀，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天明呢！与其挨饿，不如现在就动身，看附近有没有人家，说不定还能搞到一些吃的东西。”

大家都表示赞成王树声的意见，于是立刻站起来，把篝火弄灭，便出发了。

走出二三里路，他们就远远看到几间草房。大家高兴极了，都说这里肯定住着人，不愁搞到吃的东西了。

草房里果然有人，住着一个牧人。草房旁的栅栏里还圈着一群羊。

中年牧人从睡梦中被叫醒，以为是“马家军”的人来抢东西的，早吓昏了头。

他战战兢兢地穿好衣服，开门把王树声等11人放回屋里，果然见人人手执武器，更相信了自己的判断，不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边磕头边惶恐地求饶地说：“老总，我是个穷牧民，家里一无所有。外面圈的那群羊，是我给地主老财家放牧的。你们要，就拉几只去吧！不过，你们可不能多拉，拉得多了我可就赔不起了……”

王树声知道这个牧民误会了他们，就立刻走上去，用双手把这个牧民扶起来，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向他解释：“老乡，你误会了，我们不是马家军，而是红军，是咱们穷人的队伍。红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更不会抢你的羊，你放心好了。”接着，王树声把他们被“马家军”打散，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是来向老百姓买粮食吃的情况，如实告诉这个牧民。

这时，一个红军战士把几块银元塞到牧民的手中说：“老乡，我们是打鬼子、打马匪强盗的。这些钱你收下，无论如何给我们弄点粮食吧。”

牧人早听人说过红军的情况，现在又见王树声他们11人对老百姓这样和蔼，又拿出银元买粮食，就完全相信了他们是红军。于是，他跑到另外的一间屋子里，把躲藏起来的他的同伴叫来。两人低声商量一阵后，就把他们藏在地窖里的粮食挖出来，卖给了红军。

有了粮食，大家高兴得欢呼雀跃，很快借牧民的锅灶打火造饭。

吃饱喝足后，大家立刻精神焕发，决定连夜动身，争取早日回到延安。

王树声带着他的11名部下，不顾山险路窄，一直向东行进。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分来到一个山沟里。这里也有几间草房，住着一个牧民。这个牧民一向同情革命，不久前还给红军带过路。眼下，他见到红军，显得格外高兴，立刻把大家让到屋里，一边生火给红军煮饭，一边向王树声介绍山外“马家军”的防守情况和活动规律。

吃过饭后，这个牧民把王树声等11人领到悬崖峭壁上的两个石洞里，让大家在石洞里休息。他说：“这里很安全，你们放心地在这里好好睡一觉，等养好了精神再走。外面有我给你们放哨，是不会出事的。”

石洞距离地面有三四丈高，王树声等11人是用手抓着吊绳才攀上去的。洞里铺着软绵绵的干草，洞口十分隐蔽。大家进洞后，几天来的疲乏一齐涌

来，就一个个倒在干草上酣然入梦了。

第二天，牧民害怕马匪强盗来搜人，就一早把圈里的羊群赶出来，在石洞附近走一趟，把红军昨晚留下的脚印全部踩掉。

中午，果然不出牧民所料，“马家军”来了一队人，到处搜查红军。牧民赶着一群羊躲到对面山坡的一片树林里，生怕马匪来抢羊。

本来，他可以躲得更远，但又放心不下石洞里的红军。当他听到马匪进了沟，就躲到树林边的一株大树上，监视他们的行动。他看到敌人在他的草房前后搜查一阵，齐集到石洞下面，一颗心陡然提到了喉咙口，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可庆幸的是敌人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只是朝峭崖放了三枪，然后就开走了。

睡在石洞里的红军美美地睡了一觉，如果不是敌人放枪把他们惊醒，只怕还要睡下去。当敌人走了，他们从石洞里出来，又在牧民家里吃了一顿饭，眼看天黑下来，才动身赶路。临行前，王树声把饭钱付给牧民，使牧民深受感动，一直把红军送出一里多路，才恋恋不舍地回去。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第三天上午，王树声等人来到一座大山脚下。这里荒无人烟，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刮个不停，把人冻得浑身打颤。同志们实在走不动了，就找了一处阳坡地，捡了一堆干枯树枝，烧起一堆火取暖。接着又用消雪水煮了一锅稀粥充饥。

饭后，同志们眼皮直打架，刚刚把碗放下，便倒地呼呼入睡了。

王树声困得够呛，但他不敢睡，坚持给大家放哨、烧火。当夜里有人醒来，发现副总指挥为他们放哨，才顶替了他，让他去休息。

早晨醒来，同志们不敢久留，又动身赶路。这里的路全让积雪覆盖着，积雪足有半人深。大家只好手拉着手，踏着积雪艰苦跋涉，一直走到天黑，也没有走出雪区。在雪区走路，要比走一般的路付出的精力多十倍。到此，每个人浑身像要散了架似的，精疲力竭，再连一步也不想走了。于是，只好在此宿营。同志们用手把地上的积雪扒开，又从附近找来一些干柴，铺在地上，就此宿营了。

第五天，天刚透亮，寂静的荒野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把同志们从睡梦中惊醒。

大家立刻惊觉地翻身爬起来，四处张望，很快就发现对面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有20多个藏民。他们身穿羊皮长袍，手持长枪，一边打枪，一边向他们喊话，要他们缴械投降。一位同志被他们打中，负了伤。

为了稳住藏民武装，红军与他们含混答话。当藏民武装误以为红军要缴械投降，停止射击时，王树声趁机带领大家，抬着伤员，连滑带溜地跑出冰溪，终于摆脱藏民武装的袭击。

又走了好长一段路程，忽然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这条连他们也叫不来名字的河，水深浪急，咆哮如雷。本来，河上有一条铁索吊桥，供人们通行，可眼下因非常时期，敌人为了切断红军的退路，早已把铁索解开，把索头搭在旁边的一根石柱上。

对面涛涛大河，大家一筹莫展。王树声也想不出更好的渡河办法，只好派一名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试着从没有固定好的铁索上吊过去。他用手紧紧握住那个战士的手说：“如果你有幸成功，咱们红9军就绝不了路了，如果失败了，大家就都得束手待毙。去吧，祝你成功！”

红军战士冲王树声将军微微笑了笑，表示理解他的意思，然后转身向吊

索走去。他用双手攀住吊索，把身子吊在半空，慢慢地向前移动。他几乎每向前移动一步，心都要颤抖一次。因为他攀吊着的铁索，对岸是没有固定的，随时都有可能把铁索拉脱，把他摔在浪涛汹涌澎湃的大河中。如果真的掉下去，那一切就都完了。

奇迹终于出现了，那红军战士居然攀吊过了对岸。当同志们看到他站在岸上时，高兴得欢呼雀跃，像打了一个胜仗似的。那红军战士也高兴得不得了，在岸边撒起欢来。闹腾一阵后，他把铁索固定好，同志们很快就攀着铁索过了河。

离开河岸2里多路，有一块平坦的地方。这里扎有不少帐篷和草棚，是少数民族人的营地。

当王树声将军带着他们11个人来到这里，少数民族人已经全跑光了，帐篷和草棚里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为了不引起少数民族人的误会，王树声他们没有进棚子，只是捡了柴草，在场地上烧了一堆火，开始做饭。

正在这时，藏在远处一道地坎后面的藏民武装向他们又开火了，不一会儿就向他们冲过来。不得已，王树声只好下令开火还击。于是，11支手枪同时打响，将藏民武装击退了。

考虑到藏民武装还会来骚扰、袭击，王树声将军决定不在这里做饭了，就带领大家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东进。越过祁连山的最后一个山头，走入通往出山口的沟里，沟越走越宽，路越走越平坦。路边溪水潺潺，远处树木依依，气候也变得暖和了，风柔柔地刮着，让人感到轻松。

离出山口大约只有10里左右的路程了，王树声决定在这里休息，吃饭，等天黑后再出山。吃过饭，大家就倒地睡了。

夜幕降临后，王树声将军把大家叫醒，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胜利就在眼前了。从此，我们可以放开步子往回走了。”

到此，11人的队伍只剩下8人了，其余3人已经在半路牺牲。王树声认为，8个人一起行动，目标太大，提出了分组行动的方案。经商量，大家一致认为王树声将军提出的方案是有道理的，便把人分为两组，分头行动。

和王树声将军分在一组的同志，走到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时，不幸与“马家军”的骑兵遭遇了。当时，天色已晚，双方在黑暗中开了火，打了一阵后，小组被打散，王树声将军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服装，孤身一人闯入了茫茫无边的沙海之中。

当地人有一首民谣，是专门讲腾格里大沙漠难以通过的。民谣说：

腾格里、大无边，
太阳晒得冒青烟。
刮风天地转，
下雨江河翻。
飞鸟不敢过，
骆驼打寒颤。
自古无路绝人烟，
神仙进去也难还。

王树声将军只身闯入了腾格里沙漠，迎接他的是什麼，我们是不难想像

到的。他凭着自己多年行军打仗的经验，始终没有迷失方向，一直朝东走着。走了整整一天，天色暗下来时，沙漠里刮起了狂风，天地间飞沙走石，把人也吹得东倒西歪，连眼也睁不开，鼻子、嘴和耳朵里都灌进了沙子，牙齿一咬，嘴里“格格”直响。突然间，一股旋风吹来，把王树声卷到一个沙坡下，几个骨碌翻过，就昏晕过去了。

等到王树声苏醒过来，从天上的月亮位置判断，已是午夜时分了。

他的脸上脱了皮，干裂的嘴唇上起了不少泡，裂缝里渗出了殷红的鲜血。他弄不清自己此时此刻置身于何处，头脑里一片混沌。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身子，才发现自己被埋在沙子里。他想从沙子里翻出来，动动身子，觉得身体内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一点也挪不动。他只好用手把压在身上的沙子慢慢扒开，然后憋足劲滚动，才好不容易滚出沙窝。

王树声将军挣扎着爬起来，想继续赶路，可还没等站起来，就觉得浑身疼痛、疲软，只好再躺下来，把双手垫在脑后，借着月光望着无边无际的沙海，终于明白了他已陷入绝境。他的脑海立刻泛起汹涌的波浪，想着这次西路军失败的惨况，进而又想到牺牲了的众多战友。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牺牲的战友在临死前对他说过的话。他们说：“首长，你一定要为我们报仇，为咱们红9军报仇！”想到此，他受到了鼓舞，似乎觉得身体不怎么疼了，也有了力量。他不由提醒自己：“我不能死在这沙漠里，一定要回到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才能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才能对得起烈士的英灵……”

王树声将军知道，如果这样继续躺下去，很可能就不会再站起来。于是，他咬着牙，以极大的毅力终于站起来，一步一步挪下沙坡。他发现天气很冷，冻得浑身发抖，就使劲勒紧裤腰带，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第二天清晨，借着晨曦，王树声将军发现不远处有一片地方闪光，走过去才看清，原来是一个小湖泊。他像一个溺水者突然抓到一根木头那样高兴，急忙走到湖畔，痛痛快快地喝了一肚子水，觉得浑身有了劲。

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发现湖边长着几棵沙枣树，虽然落尽了叶子，但枝头上还挑着一些沙枣。他走过去，摘了几粒，放到嘴里尝尝，觉得很好吃，就边摘边吃，直到吃饱为止。后来，他发现树下落了好多沙枣，就蹲下身子拣了好多，装在口袋里准备饿了再吃。

王树声将军又在沙漠里走了两天，带在身上的沙枣吃光了，又没有水喝，终于支持不住，昏倒在沙漠里。等他醒来，睁开疲乏的双眼，发现他的身边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白发老人，手里拿一只水壶，正给他喂水。他想坐起来，但挣扎几下，觉得身体像抽去筋似的，软软的，根本无力动弹。

老人家用慈祥的目光看着王树声将军，吩咐说：“小伙子，别动，你饿过头了，我喂你吃一点馍，等肚子里有了东西，再坐起来也不迟。”

王树声将军感激地看一眼老人，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只是轻轻点点头，等他喝干一壶水，吃了两个馍，才在老人家的搀扶下坐起来。

老人家不解地问：“小伙子，这腾格里沙漠连神鬼也不敢到的地方，你跑到这里干什么？”

王树声将军在没弄清老人家的真实身份前是不敢说实话的，只好撒谎说：“老人家，我是贩盐的，半路遇上了强盗，把我的盐和钱都抢去了。为了逃命，我才误入这腾格里沙漠的。”

老人家眯起眼端详着王树声，过了好一阵才摇着头说：“不，我看你不

像是贩盐的，我一辈子不知跟多少盐贩子打过交道，还能认不出盐贩子来？依我看呀，你倒很像是一个红军……”

王树声将军听到“红军”二字，立刻打断老人的话，矢口否认说：“不，老人家，我可不是什么红军，我真的是贩盐的。”

老人生气了，不高兴地说：“是就是，红军是好人，当红军又不丢人，为啥要躲躲闪闪，不敢承认呢！”说到此，他略停片刻，像突然悟彻到什么似的，嘴里“噢”一声，脸上现出一丝歉意，然后接着说：“我明白了，你是弄不清我的身份，不敢说实话。那好吧，我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也好让你放心。”接下来，他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俞学仁，是宁夏中卫县旋窝铺人，一辈子靠做生意养家糊口。他还告诉王树声，说他们那一带的人很穷，受尽了“马家军”的欺压和蹂躏，乡亲们都盼望红军打过来，早日消灭“马家军”，把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这座大山搬掉，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王树声将军看老人直爽、诚实，又见他提到“马家军”时那样愤恨，认为再没有必要瞒下去了，就承认说：“老人家，你好眼力，看得不错。我不再瞒你，就实话实说了：我是红军，是要到延安找党中央的……”

“哈哈……老人家嘴里发出一串爽朗的笑声，接下来说，“我知道，我的眼是不会认错人的。小伙子，我是打心里拥护红军、热爱红军的。——红军都是好人，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把你送到延安去！”

俞学仁老人扶着王树声将军，又在腾格里沙漠走了三四十里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他女儿的家里。女儿、女婿见他领了客人到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像遇到喜事一样高兴，张罗着烧水做饭。他还特意吩咐女儿，给王树声将军炒了一盘鸡蛋。他说：“这位红军在沙漠里饿昏了，你要给他做点好吃的，让他好好补补身子。”

王树声将军见俞学仁老人和他的女儿、女婿都是老实人，待人诚恳，就消除了顾虑，开始和他们拉起了家常。

走了一路，俞学仁老人还没有来得及问王树声将军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家庭情况如何。现在有了时间，便打听起来。

王树声将军是湖北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人，地处大别山的西麓。全家有14口人。他6岁时就死了父亲，9岁时又丧了母亲，从小生活在苦海里。他的大哥叫王宏忠，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入了党，不幸病故身亡。他的二哥叫王宏恕，也是共产党员，曾参加过黄麻起义，当过红军的连指导员，作战很勇敢，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他的弟弟王宏义和妹妹王贵玉，在几个哥哥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参加了红军。令人遗憾的是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所谓肃反运动中，全被误杀了。他的伯父家，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老大王宏文参加革命后，惨遭国民党的杀害。老二王宏学参加了红军，也在“肃反”中被误杀。老三王宏濡在家里种地时就入党，后来又参加了红军，在战斗中英勇献身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因他家的众多弟兄都参加了红军，是附近一带有了名的“赤色户”，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追究，把他家的房屋、财产付之一炬，全部烧光。

王树声将军把以上情况都详细告诉了俞学仁老人。俞学仁老人听着，听着，忍不住老泪纵横，伤心地哭起来。等王树声将军把他一家的情况讲完，俞学仁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的那么多亲人，为了咱穷人过上好日子，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听了太难过了！我虽然人老了，但也要向那些死去

的先烈们学习，多为红军办事情，支持红军打反动派！”

王树声将军在俞学仁老人的女儿家中饱饱地睡了一夜好觉，因赶路心急，天不明就起床了。俞学仁老人见王树声将军的衣服太破了，就把他女婿的一套旧衣服拿来，让他穿了。吃过早饭，他就陪着王树声将军上路了。

两人渡过黄河，不久就来到陕北的同心城。走到城外，突然从一片小树林里涌出七八个红军战士，人人手里端着步枪，“忽啦”一声，把王树声将军和俞学仁老人都包围起来。领头的一个排长，把手里拿着的手枪扬了扬，要他们把手举起来，接着又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呢？”

王树声将军如实回答说：“我叫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的。我军在祁连山一带跟“马家军”作战，不幸遭到惨败。我在回延安的路上，误入腾格里沙漠，迷了路，多亏遇上了这位俞学仁老人，才救了我的命。今天，他老人家是来送我的。”

年轻的排长细细打量着王树声，看了好一阵，然后摇着头说：“我看你的穿戴不像红军。眼下敌情复杂，马鸿逵经常派特务来我们红军驻地活动。在没有弄清你的真实身份前，得委屈你一下，先押你去见我们团长。你说行吗？”

王树声将军很欣赏这个排长的警惕性，就点点头答应说：“好吧，我听你的。”

王树声、俞学仁被红军战士押解进城，来到一户农家。那个排长走进屋里，向他们的团长汇报说，他们抓到两个可疑的人，请团长发落。

团长从屋里走出来，上下打量着王树声将军。原来，他是认识王树声将军的，经此打量，很快就认出来了。他立刻走上去和王树声将军握手，然后扭头对那排长瞪一眼，大声申斥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为啥胡乱抓人？你们认识这位首长吗？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王树声将军啊！”

那个排长和几个战士听到此，吓得不由伸伸舌头，悄悄低下了头。

团长歉意地解释说：“副总指挥，这都是我们的错误，请您原谅吧。”

王树声将军笑着说：“你们有什么错啊？你们做得很对，就得提高警惕性。我是不会怪你们的。”

团长立刻把王树声将军和俞学仁老人让到屋里，派人端来了饭菜，招待他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俞学仁老人在同心城呆了两天，一直惦记着家里的事，决定就此回去。

临行前，王树声将军把他多年来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一枚金戒指送给俞学仁老人，用以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他拉着俞学仁老人的手，感情激动地说：“老人家，你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这个戒指请你收下，就作个纪念吧！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到中卫去看望你老人家！”

俞学仁老人本不愿收下这枚金戒指，可盛情难却，见王树声将军出于一片真诚，就含泪收下了。他恋恋不舍地与王树声将军话别，然后离开了红军，离开了同心城。

此后，王树声将军在红军的一队骑兵的护送下，来到曲子镇住下来，等候党中央对他的安排。

王树声将军回到红军中来的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立即就给王树声打电话。在电话里，毛主席激动地说：“树声同志，你好！杜义德、李国新等同志都回到了延安。你们回来就是胜利啊！”

王树声将军听到毛主席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好一阵连话也说不出。他静下来，正想向毛主席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想毛主席已挂断了电话。过了不几天，毛主席又打来电话，说他要面见王树声。

王树声立即动身，从曲子镇赶到延安的枣园。他见到毛主席后，详细地汇报了西路军战败的情况，最后检讨说：“部队打了败仗，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他说着，眼睛湿润，几乎掉下泪来。

毛主席安慰他说：“树声同志，你吃苦了。你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每一个红军官兵都应该学习的！西路军的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接着，毛主席鼓励王树声将军要放下思想包袱，努力为党工作。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介绍王树声将军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从此，王树声将军进入抗大，开始了他新的学习生活。

陈独秀在金陵狱中

陈独秀被国民政府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刑入狱后，除了蒋夫人宋美龄等人看过他之外，还有一位只比陈独秀女儿大4岁的女性常到牢中，她叫潘兰珍。

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

陈独秀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典狱长告诉他：“住单人房间是优待，但你是政治犯，不准亲友探监。”

陈独秀问：“能否写信？”

典狱长摇头。

“读书看报呢？”

典狱长又摇头。

陈独秀很生气，但不好发作。

5月27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开始准备“上诉状”，用了半个多月，陆陆续续写了5000字。定完“上诉状”，请律师蒋士豪转交章士钊代呈。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江氏叔来南京狱中探望他。

典狱长不同意，说：“上方有命令，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一听，大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

中午陈独秀没有吃饭，狱卒来劝他，他说：“不让我通信，我饿死好了。”

晚上陈独秀又没有吃。

典狱长过来劝他说：“你要想开些，这是规定，不是我能做的了主的。”

陈独秀头晕眼花，垂下眼皮，摇了摇头。

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成菜色，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典狱长慌了，和上面商量，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江原放就来了。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从章士钊处拿到材料，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江原放带了一本，递给陈独秀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江原放不知道，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陈独秀翻了翻小册子，见收进了《起诉书》、《辩诉状》、《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笑着说：“你们费了不少心事。”

江原放说：“只印了1千本，不少人要，听说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陈独秀十分高兴，“报纸上怎么说？”

“国民党以不许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听说天津《益世报》登了。”江原放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嗯”了一声，突然想起什么，连忙翻了翻章士钊“辩护词”，见到“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这几句，皱着眉头说：

“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说着，陈独秀拿笔将这几句划去。

江原放见陈独秀生气，说：“外间报纸评价章律师义务为你辩护，古道可见呢。”

“像这样给我辩护，我再也不要他替我答辩了。”陈独秀依然生气地说。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章律师看看。”江原放说。陈独秀“唉”了一声，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江原放临走时，陈独秀关照他去催问章士钊上诉状的事。江原放问：“回信寄到哪里？”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寄给教育部政务处段锡朋收转。”

6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雋在“答辩书”中说：“被告上诉(意)旨。强为曲解。厥难认为有理，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日，宋美龄也来了，铁道部长顾孟余提着一兜礼品跟在她后面。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新青年》同仁之一。

宋美龄笑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讲了几句闲话后，陈独秀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知道是去年陈独秀托人带信给他的事，忙说：“哪里，确实是外出了，后来要求见你，正赶上不准见人，就没有勉强狱方了。”

宋美龄插言说：“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想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他朝顾孟余望望说：“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坐不住了。顾孟余平白受了挖苦，也不是滋味。他出门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又陆续来了不少人劝降陈独秀，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的心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态度也好了起来，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看陈独秀，讲些闲话。陈独秀见了几次，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点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进来了。”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必须要登记，说清俩人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忙说：“谢谢”。

二

初秋的一天，凉风习习。陈独秀坐在书案前看书，桌上放着《马可波罗游记》、《水浒》、《原富》等书。

这时刘静贞(吴静如)拎着一盒饼干、几斤苹果来看他。陈独秀分外高兴，忙问外面情况。

淞沪战争后，许多人由上海移到江东门外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里是关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从监牢到监狱大门有13道铁门，四周是一层层水泥圈起来的高墙，墙上是铁丝网，四角有岗楼，中间有了望塔，人称“天牢”。长期囚禁在里面的有陶铸、李丰平、顾卓新、潘梓年等大批共产党人，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在这里的临时刑场被杀害。

刘静贞喝了一口水，说：“你托人带来的信收到了，前几次我来看你，监狱不让进。”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又知道许多消息了，那里怎么样？”

“非常不好，”刘静贞说，“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房。”说话功夫，刘静贞解开礼品袋，从饼干盒下面拿出几份材料递给陈独秀，说：“以后叫我吴静如，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要带到外面，下次我来，你事前准备好。”

陈独秀答应了，说：“你也要注意”。

“吴季严也关在里面，你知道么？”刘静贞问。

陈独秀说：“知道。”吴季严是陈独秀外甥，陈松年来到探监，也到陆军监狱看过吴季严。吴季严因散传单被捕，化名周西岑。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又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刘伯庄任书记，几个月后，刘伯庄去大学教书。任曙想任书记，成立托派临委，遭到陈其昌、蒋振东、赵济反对。

刘静贞走后，陈独秀写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提出“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陈独秀给自己取笔名“雪衣”。

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问她和陈独秀什么关系。陈独秀女儿美（喜子）来过，典狱长已经认识了。

“学生。”女士回答说。

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独秀一看是潘兰珍，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来了？”典狱长便知趣地走了。

潘兰珍见了陈独秀，两眼就红了，忍了忍，说：“编派的真相，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会真成了南京人了。”

陈独秀忙赔不是，说：“没有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唉”了一声，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

“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潘兰珍说，但声音已缓和多了。

陈独秀忙给潘兰珍削苹果，见潘兰珍朝书架上的饼干盒子看，陈独秀说：“都是人家送的。”潘兰珍走到床边，摸了摸床上的皮袄，陈独秀笑着说：“这也是人家送的。”

“你倒好，我一走，就把我的羊皮袄和驼绒给当了。”潘兰珍半真半假地怪道。

陈独秀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潘兰珍，问：“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我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的头子，我当是谁呢？一看照片，我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潘兰珍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叫高语罕告诉你，叫你不要来呀！”陈独秀说。

“是我自己要来的。”潘兰珍说。

潘兰珍来了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友失而复得。想到这里，陈独秀笑着说：“我不坐牢，看来我是不回来了？”

“不回来，我的东西不拿走呀？”潘兰珍笑着说。陈独秀女儿比潘兰珍只小4岁，现在该是20岁的大姑娘了。她的衣服，子美都能穿哩。

陈独秀说：“你先回上海去，下次再来。我打算这几年写几本书，等有了稿费，你就来南京，不用去卷烟厂做工了。”

当晚，潘兰珍住到了中华门附近的刘梦符家。

三

年底，刘静贞来探监，说：“老托派了一个国际代表格拉斯，想见你。”格拉斯是美籍加拿大人，曾是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到中国后化名李福仁任上海《达美晚报》编辑。

一提到国际代表，陈独秀就反感：“还是不来的好，我一个囚犯，能做什么？不如多找别的人谈谈。我的意见，都写在文章上了。”说着，陈独秀将《对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交给了刘静贞。“区白”是彭述之化名，陈独秀不同意他以“倒蒋”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口号。

当时，陈其昌、赵济，蒋振东挤走了任曙，成立了托派新临委。格拉斯来了后，和刘仁静搅在一起，从北京调来斯朝生、胡文化等人，陈独秀知道后，说：“看来我不见他是对的。”

狱方对于陈独秀在狱中的托派活动毫无察觉。1934年7月21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为有期徒刑8年。

在这之前，陈独秀读报之余常写些讽刺诗，讽刺蒋介石等头头脑脑，以此消磨时光。减刑令下来后，他将这些诗收好，怕狱方发现，影响减刑。不久，陈独秀兴趣又转到书法上。

一天，江孟邹来看陈独秀。

江孟邹环顾了一下陈独秀的书架，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

“写了一些。”说着，陈独秀从书架中抽出一沓纸来。

江孟邹看题头，是《金粉泪》三个字，忙急急看了起来。

其一云：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云：

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园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江孟邹连看了几首，没有看懂要害，见陈独秀在一些诗后作了简短的注解，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江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

江孟邹不敢看了，忙说：“你给我拿去，让原放看看罢。”

陈独秀说：“拿去吧，不要传出去，”陈独秀知道，这些诗摆在这儿，不是好事。

临走，江孟邹说：“年关过了，书店急待要些钱周转进书。”

陈独秀说：“你试试吧。”隔了一会儿，江孟邹看了看陈独秀说：“你要注意身体。”

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十二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陈独秀说：“我没有东西吃，血压也升高。”陈独秀要求到外面就医，狱方不同意，说要上面同意，结果上面也不同意。狱方干脆叫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俩人轮流照看陈独秀。这样，一旦头疼脑热，陈独秀身边总有个人照应。和濮德治、罗世凡在一起，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常可以放开思想谈话。他们两人被逮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一次，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

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

“听濮德治说，你们是亲戚？”

“是的，我娘家姓查，我母亲和小濮的母亲是堂姐妹。”

“那很近啦，五服以内。”

“我母亲比小濮母亲大20多岁，我比小濮也大20岁。”

“濮德治很尊重你，按辈份，你们是老表，实际上他把你看成长辈。”

“父母不在，长兄为父嘛。”陈独秀说。

罗世凡点点头。

四

天凉后，典狱长就发现潘女士几乎天天探监。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去，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当时江苏第一监狱关了几十名女政治犯，如夏之栩（赵世炎爱人）、钱瑛（《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原形）、帅孟奇（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放之（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都关在这里。几天前，刘少奇爱人何宝珍从这里被押往雨花台枪杀。

一天，典狱长找到濮德治，说：“我们优待陈先生，优待也总有个界线，总不能把监狱当成旅馆吧，这样叫我们为难。”

濮德治一听，知道是讲陈独秀与潘女士的事。忙问：“怎么了？”

典狱长绷着脸说：“你可知道潘女士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但学生不会天天来。陈先生的女儿我们认识。看守报告说，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

濮德治想为陈独秀挽回面子，说：“不会吧，他已五十六七岁了。”

典狱长说：“千真万确，已调查过了。你告诉陈先生，我们不好说，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传出去，我也要砸饭碗。”

濮德治点头说：“我来和陈先生谈谈。”

典狱长余怒未消，说：“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一个政党领袖，这样不爱惜自己，我为他叹息，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典狱长走后，濮德治走到陈独秀房间，见潘兰珍不在，说：“你干了什么事，典狱长有些不高兴。”

陈独秀放下手中看的书问：“什么事？”

濮德治说：“与潘女士的事，他们知道了。”

陈独秀一听，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压抑了人的本能。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潘兰珍这时从上海搬到南京，住到了段锡朋家中。

五

1935年初，刘静贞带来一些材料，其中有刘仁静主持起草的《临委紧要

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材料，陈独秀看了极不高兴。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尹宽、刘伯庄、陈其昌等人建议参加宋庆龄、胡汉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是错误的。

陈独秀对刘静贞说：“你回去就叫陈其昌来一趟，我问问情况。”

1935年1月15日，陈其昌到狱中见陈独秀。陈其昌一来就诉苦，说：“李福仁、刘仁静背着我们开了‘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委，斯朝生任书记，他们要我放弃意见，我坚决不同意。”

陈独秀点头说：“不同意是对的，李福仁刚刚到中国，什么都不懂，是个毛手毛脚的小猴子。”

陈其昌说：“他见你几次不同意见他，骂你是老机会主义。”

陈独秀生气地说：“他是什么？乳臭未干，有什么资格讲我。”

见陈其昌垂头丧气，陈独秀说：“我写封信给你带出去，公开表明我对李福仁的意见。”

陈其昌赶忙起身为陈独秀拿纸递笔，陈独秀写道：“外国同志尚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陈其昌喜笑颜开说：“好，要给他警告。”

陈独秀有意将题头写成《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的信》。几天后，李福仁、刘仁静、斯朝生对陈独秀提出警告，说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假如他们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思想，我们是同志，否则开除。”

到了2月，他们作出决定，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的托派党籍。

濮德治说：“你可以省下心来写书稿。”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出书也难。古人写书，藏之名山，等后人来挖宝，引出一场厮杀，我这样穷光蛋一个，哪能做这样赔本的事。”

提到出书，陈独秀说：“我来给适之写封信。”胡适寄来陈独秀拼音文字手稿，说“商务”已付稿费，请他修改后出版，并约他其它著作。

濮德治说：“上次来，你们好像争了几句？”

胡适来探监时，怪陈独秀没有专心于学术研究，要当政党领袖，结果身陷囹圄。陈独秀也不让他，说：“你跟着蒋介石，当了中国驻美国大使，只作一些研究，也会被人鄙视的。”

“你也讲重了些。”当时濮德也在场。

陈独秀笑着说：“不要紧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这个人，以前还不错，有过勇气，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

濮德治见陈独秀谈兴浓，问：“你对蔡元培印象怎么样？听说他救过你好几次？”

陈独秀说：“他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这一点很像李大钊。在大节上，蔡校长能坚持真理。‘五·四’运动时，他是带头辞职的。”

一个月后，陈其昌神色惶恐地来说：“斯朝生、刘永良、王耀华、扈焕之被捕了。”

陈独秀吃了一惊，问：“怎么回事？”

陈其昌苦着脸说：“一个国民党特务冒充水电工人，混了进去。”

不久，刘仁静在北京车站被捕，押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判刑后关在苏州监狱。

陈独秀还是不愿见他：“摆个国际代表的架势来吓唬人，我最讨厌这种人。”

夏天，美国记者伊罗生从中国到挪威奥斯陆见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认为“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陈独秀听到老托的意见后，又恢复了积极性，几次写信给陈其昌等人，建议陈其昌、赵济、王文元三人成立托派临委。

1936年夏天，陈独秀在狱中听说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去信，寄去一些《斗争》、《火花》刊物，企图做鲁迅工作，十分生气：“怎么对鲁迅发生幻想呢？”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不久鲁迅带病公开作答陈其昌来信，警告他：“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几个月后，鲁迅在上海逝世。

濮德治问陈独秀：“鲁迅为什么骂你是焦大？”

陈独秀摇摇头说：“焦大骂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粪。我不是这样小气的人，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

“你对鲁迅怎么看？”

“他骂了我，我也不能因为他骂我便贬他。我很喜欢读他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家中，鲁迅算是上乘的，但和世界知名作家和中国古典小说作家比，还有一段距离。”

濮德治见陈独秀提到世界知名作家，问：“你对国外那些作家印象好？”

“多啦！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歌德、海涅、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陈独秀边想边说。

濮德治打断了他的话，问：“中国呢？”

“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孔尚任、王实甫。”

“这都是‘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但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战将，不是主将。”陈独秀又扯到先前的话题上来了。

濮德治“嗯”了一声，说：“鲁迅自己也这样说，他说你是司令，他是听将令的。”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他提到我这个朋友，都要用引号。不过，他的小说确实写得好，我要是他，晚年决不放弃文学。从事政治，对他是一个损失。”

夏天，陈独秀在报上看到苏联对托季联盟进行审判，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处死刑的消息，对濮德治说：“苏联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

1936年12月中旬，监狱内气氛十分紧张，狱卒如临大敌，日夜值班。濮德治喜形于色地对陈独秀说：“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扣住了。”

陈独秀听了，像儿童过节一样高兴，他掏出钱，请人去打酒买菜。他对濮德治、罗世凡说：“今天我们好好喝一杯，我生平点酒不沾，今天要喝个一醉方休。”

濮德治说：“还是不喝的好，典狱长会不高兴。”

陈独秀说：“不管他，蒋介石这回是死定了。”

说话功夫，陈独秀将书案捡空，找来两个茶杯作酒杯。喝酒时，他斟了一杯，转身倒在凳子周围，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

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濮德治和罗世凡对望了一眼。

陈独秀又倒一杯，他说：“这一杯是为了延年、乔年儿。”说话时，陈独秀声音有些哽塞，他说：“为父的为你们酌上这一杯。”说完眼泪就流了下来。

接下来，陈独秀与濮德治、罗世凡痛饮了几杯。

12月26日夜里，一阵阵爆竹声将陈独秀从梦中炸醒，监狱外锣鼓喧天，一打听，是蒋介石放回南京了。陈独秀很怅然，再也不能入睡。

第二天，他对濮德治说：“爆竹昨晚炸了一夜，从爆竹声中，可以看出他有群众基础。”

濮德治说：“是政府命令放的，小商小贩不敢不放。”

陈独秀摇头说：“不，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

几天后，陈独秀对来看他的儿子松年说：“到了8年，我还不一定能出去。”他见陈松年低头不语，又说：“我要出去马上就可以出去。”他的意思是办了手续就可以出去。

隔日，陈独秀精神稍好，他用心写了一副对联，“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

1937年4月，《东方杂志》24卷5、6、7号连续刊载陈独秀的《实庵字说》。陈独秀很高兴，坐牢坐出了一片新天地。

当时国内发生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大多数托派分子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认为“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自秦汉以来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陈独秀同意这些观点，并在《实庵字说》中予以论证。

濮德治、罗世凡对此没有兴趣，陈独秀说：“文字学本身有很大的实际用处，从文字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和发展。”

濮德治问陈独秀：“为什么不写大革命史？蔡和森、翟秋白生前都写了。”

陈独秀说：“写大革命史要资料，那一年国际要我去莫斯科，如果去了，很可能就写了。”他不知道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到苏联后，一直处在“检查”状态。

提到大革命史，濮德治问：“南陈北李，你比北李如何？”

陈独秀想了一下说：“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正确如北斗。守常是一个大好人，一个坚贞卓绝的共产主义战士。”

濮德治又问：“现在文字学家争论纷纷，谁也不服谁？”

“不要紧的，大家意见一致了，就要承认，不管你是不是前辈、专家。现在的文字毛病很多，繁体字笔画多，外国人都不愿意学。中国人自己都学不好，怎么叫外国人学呢？”

濮德治见陈独秀情绪好，壮胆说：“郭沫若讲你是行家前辈，又说你在狱中看不到书，孤陋寡闻。”

陈独秀没有生气，很认真地说：“郭沫若有些方面有天分，别人看来神奇和不可理解，正是他有卓见的地方。但郭沫若也有浅薄的地方。他说我在狱中看不到书，也不完全对，有些东西，是研究方法问题。”

濮德治睁大眼睛，等待下文。

陈独秀说：“文字学研究，过去小学家拘泥于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这怎么可以，言前人之所言，就没有进步。但他不能标新立异，你标新立异、

随心所欲，人家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白字连篇，如读天书，那还叫什么学问。”

八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8月中旬，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房屋顶炸塌。穿着背心的陈独秀慌乱中躲到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

事后濮德治跪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身上的灰，忙问：“没有事吧？”

陈独秀恢复了平静说：“没有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第二天，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塌，说：“我去找一下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去。”陈仲凡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

陈独秀将信将疑说：“这样行吗？”

陈仲凡说：“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释放全国政治犯，加上日机轰炸，是个机会，也可能答应保释你。”“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举行了会谈。

几天后，中苏文化协会的黄理文陪周恩来、叶剑英到监狱特地看了陈独秀。他们刚去晓庄首都反省院，作了形势报告，要求释放政治犯。当时夏之栩等已转到晓庄反省院。

陈独秀大喜过望。周恩来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老，你受累了。”

陈独秀见周恩来还称他“仲老”，手足无措，连忙请客人坐。

黄理文说：“经过中共中央驻南京办事处的恩来、剑英同志多次交涉，蒋介石同意我们提出名单分批释放政治犯，我们也想到了你。”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

周恩来说：“主要是党中央和各方民众的共同努力，才争取到了这个局面。”

周恩来看陈独秀明显衰老了，于是转了一个话题，说：“听说仲老这几年在监狱中还写了不少的著作，真是精力过人啦！”

陈独秀忙起身找来《东方杂志》等刊物。

周恩来翻了翻说：“好、好。”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问陈独秀出狱后有什么打算，黄理文见话题涉及机密，连忙退了出来。

这一次，周恩来、叶剑英和陈独秀谈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叶剑英走时，陈独秀坚持往外送，直到黄狱长委婉暗示陈独秀，他才停住了脚步。

周恩来、叶剑英等走后很久，陈独秀才慢慢地走向房间。这一天，陈独秀食欲大开，吃了许多。

又过了一天，陈仲凡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苓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张伯苓是天津南开大学校长。

陈独秀一听气坏了，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谢谢你和适之、伯苓兄，我也不要人保了。”

陈仲凡劝陈独秀说：“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出门时，陈仲凡对送他的罗世凡、濮德治说：“老头子还是那个脾气，你们再劝劝他。”

这时，胡适也喜笑颜开地来了。他说：“仲甫，我找了兆铭，他已同意保释你出来。”说着，他拿出汪精卫的回信。

陈独秀忙接过汪精卫给胡适的信，信上说：“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

陈独秀说：“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找麻烦。”

8月21日，星期六，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林森知道汪精卫、蒋介石已同意释放陈独秀，碍于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面子，也乐得做了顺手人情。他立即从笔筒中抽出毛笔，一笔一画地写道：“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林森令人将“指令”立即送到司法院办理。

隔日，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及司法院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如在雾中听到这个消息，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司法院讲我‘深知悔悟’，我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

罗世凡笑着说：“先不管它，出去再说。”

濮德治压低声音说：“出去再写份声明。”

陈独秀说：“只好如此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丁竹青）去狱中接陈独秀。丁默村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当了中统。陈独秀不想和他多打交道。丁默村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湖南路10号）。

陈独秀心中不悦，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期年来狱中，请陈独秀住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了。丁默村只好作罢。

罗世凡、濮德治两人含着泪与陈独秀告别。陈独秀见他们两人伤感，眼睛也红了，摆了摆手，低头进了车子。

胡志明在中国南方遇险记

身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在中国的土地上坐了一年多的大牢。身戴铁链镣铐，在一个又一个的监狱中备受虐待，这段极富传奇性的经历在会天仍然鲜为人知——

胡志明（1890—1969年）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劳动党创始人，共和国主席。原名阮必成，参加革命后改名阮爱国。早年当过教师、海员和杂役。22岁时以海员身份出国考察，寻找革命道路。1920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成为越南第一位共产党员。1925年，胡志明在中国广州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为组建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同时，在中国黄埔学校举办政治训练班，为越南培养革命干部。1930年2月，胡志明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后改名为越南劳动党。

1938年来天，胡志明从莫斯科来到陕北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又跟随叶剑英南下抵达桂林。此后一段时间里，他化名胡光，以中国八路军军人的身份住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市郊路莫村的机关驻地。胡志明被安排在“八办”

的救亡室工作，是该室的领导成员之一。

1940年2月，胡志明离开桂林前往昆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同在那里的越南印支共产党（“越共”前身）海外部负责人冯志英、武英、黄文欢）取得联系。不久，武元甲、范文同等也从越南来到昆明，同胡志明商讨回国领导武装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硝烟正弥漫着欧洲战场，德国法西斯占领了法国，巴黎沦陷，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的督领们却在东南亚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丧心病狂地镇压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越南正遭受殖民者铁蹄的残酷蹂躏，民族解放斗争受到镇压和遏制。而恰在此时，越共海外部接到了一封来自在李济深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任职的越籍进步人士胡学览的信，信中说在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任职的越籍军官张佩公已经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一项指令，正为中国国民党军队进入越南做准备工作。张佩公正在四处罗致越籍人员，组织入越边区工作队。胡学览在信中建议海外部的同志们马上到广西来商量对策，采取必要行动牵制张佩公，胡志明等人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便决定迅速把海外部移至广西从事活动。

1940年10月，胡志明、黄文欢等先后抵达桂林，并在那里建立了“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办事处，由胡学览任主任。“越盟”早在1935年被已向南京中央政府注册登记，这次成立办事处时胡志明又让黄文欢等人拜会了李济深，并宴请了李的秘书，所以，办事处很快就取得了合法地位，并能从事一些公开的活动。

胡志明等海外部领导人到桂林不久，张佩公受第四战区的派遣，带领中越边区工作队从柳州前往靖西一带活动。在此之前，有一批越南青年在高平举行抗法起义，受到法国殖民者的镇压逃往广西，加入张佩公的队伍。张佩公部下的越籍军人张中奉，写信给桂林“越盟”办事处，请求派人来靖西从张佩公的队伍中争取和分化越南爱国青年。胡志明根据当时情况，于11月份派武英、武元甲等人到靖西，动员张佩公打电话到桂林“越盟”办事处，请他们来商讨工作。胡志明抵靖西后，立即派武英回越南，并让他在高平省靠近越边境地区选择一个地方作为越共的秘密指挥机关。此后，越南国内党组

织也派黄文树、长征、黄国越来靖西，与胡志明取得联系。

鉴于张佩公的边区工作队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又是依据同盟国的一项决议，为华军入越作准备的情况，胡志明便决定继续与张佩公保持联系，以便取得在边境地区公开活动的便利条件。1940年12月底，以越共占主导地位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胡志明的领导下，于靖西成立。“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成立后，胡志明以边区工作队的名义，举办了干部培训班。该培训班能够从国民党那里取得经费，实际上却为越南共产党人所控制。1941年初，训练班结束，毕业的学员被派回越南国内，在各地基层组织开展革命工作。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也于1941年2月8日由靖西返回越南高平省河广县的北坡。

1941年5月10日，胡志明在北坡主持召开了越共历史上有名的“越南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会议决定开展游击战争，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战线”，并为武装起义作准备工作。“八次会议”后，胡志明从北坡再次到靖西。6月6日，胡志明在靖西撰写了“致越南全国同胞号召书”，以“阮爱国”的化名，由越南共产党以“国外来信”的方式向全国公布。

1942年8月下旬，胡志明又一次离开高平省的蓝山前往中国。

胡志明临出国前，为了行动上的方便，准备了名片，将原来的化名“胡光”更改为“胡志明”，在名片中印有“胡志明”三个大字，名片的一边写着“新闻记者”的头衔，另一边印有“越南华桥”的身份。胡志明此次前往中国，先由蓝山出发。蓝山距中越交界处的北坡约有55公里。在这段路程中，胡志明穿着侬族服装，装扮成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由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越南民族委员会主任、人民军少将的黎广波在前面为他带路，黎同时为他兼做联络员的工作。大约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辛旅程后，胡志明、黎广波顺利穿过中越交界的亚热带丛林，抵达广西靖西县。进入中国后，胡志明先后在靖西县的劳荣圩和龙临圩他所熟悉的广西边民家里逗留几天。8月25日，来到巴黎圩，在他的老朋友徐伟三家中住了三天。据后来徐伟三说：“胡志明当年是由黎广波同志陪同从越南过来的，农历7月12日下午4点多钟来到我家。当时胡主席身上背着一个网兜，手里拿着一根拐棍，穿着一件褐色对襟唐装上衣，留有胡子，完全是一副乡村风水先生的打扮。我立即打扫房子，安排歇息的地方。胡主席对我说，这次过来，是想到重庆去会见一个要人。打算由这里走到平巴（今广西田东县城），再由平马坐汽车走。……胡主席还说，只打算在巴黎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就上路。当时，正好有几位朋友来我处，他们都认识胡主席并参加过中越兄弟结拜的。大家说，后天是中元节（农历7月14日），在广西是个大节，同我们过了节再走吧。胡主席只好同意。就这样，胡主席在我家一住就是三天。中元节晚上，我，还有杨涛、王锡机、黄达汉、黄德权等在我家同胡主席一起吃饭。大家一边吃一边商量，明天由谁送胡志明主席上路。杨涛说，我去吧，反正即使不出门，国民党抓兵也少不了我。于是，就决定由杨涛送胡主席上路。那时杨涛还不满20岁。”

1942年8月，胡志明来中国的目的，从徐伟三的谈话中可知仅“是想到重庆去会见一个要人”，这个“要人”是谁，胡志明并没告诉他。事实上，胡志明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表面上是以“越南独立同盟委员会”和“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这两个团体代表的身份去重庆谒见蒋介石；另一个真正的目的却是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交换越中两国共产

党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看法。

没料想刚入境，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这是 1942 年 8 月 27 日的事了。

这天清晨，在中越交界的广州靖西一带，在巴蒙圩的一条小道上，正急匆匆地走着两个人。老者年过半百，长长的胡须晚风的吹拂和刚刚翻起的热浪中微微飘动，他那压得低低的斗笠边缘处隐隐约约露出已经花白了的头发。老人身材不高，一身土布衫洗得发白，却合身得体，显得精瘦干练。一步一步的走势丝毫显不出老态来，他紧紧地跟在那位年轻人的后面。

这位长须老百就是越南共产党的创始人。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胡志明。

领路的年轻人是广州靖西县的壮旅边民杨涛。二人行至德保县足荣乡时，迎面碰上了本地的乡警向福茂。

“站住！拿出你们的通行证来！”何福茂粗暴地晃着手中的警棍。他见二人匆匆行路，想有意刁难一下，显显自己的威风，并没想到会有什么收获。

胡志明从容地掏出早已预备好的“名片”。

向福茂一看是一位越南华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对胡志明进行搜身，很快从胡志明身上搜出了“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证明书、“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以及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等多种证件。只见证明书上写着：“兹特派胡志明晋谒中国政府，希沿途给予帮助，不得留难，此证。”落款是“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

向福茂搜查胡志明本无明确目的，可当他看了胡一人持多种证件后，却起了疑心，一个越南华桥，既持有国民党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又有中国共产党所属宣传机构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的会员证，此人身份过于复杂，显然有间谍嫌疑。他觉得有可能是抓到了一条“大鱼”，遂将胡、杨二人带往乡公所，交给街长马献荣继续审问。

马献荣发现胡志明的“中国青年新闻学会”以及“国际新闻社”的证件、“军用通行证”都是 1940 年签发的，均已过期，况且一个人持有国共两党不同的证明，可见此人非等闲之辈，便打电话请求德保县政府。第二天，县政府派了一名县警和一名职员来足荣乡，把胡志明和杨涛押往县城。

途中，恰遇徐伟三的姐姐由巴蒙圩往都安圩赶街，徐的姐姐认识胡志明，当她看到胡、杨二人被警察押着时，扔下赶街的菜篮子，一口气飞快地跑回家中报信。此时，和胡志明一起来中国的黎广波还未归国，听此消息不禁大惊失色，急忙召集徐伟三等人商量营救措施，一阵子七嘴八舌紧锣密鼓的议论之后，决定让对县城熟悉且有熟人的王锡机第二天先到靖西县县城探听情况，等回来后再从长计议。

次日清早，王锡机从县城打听到胡、杨二人被关押在靖西县城专员公署的拘留所里后，便赶快买菜做饭，装了两只陶罐，以送饭为由，前往拘留所探望。被关押在一间小号子里的胡志明一见王锡机送来了热腾腾的饭菜，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待吃完饭后，王锡机安慰他们两人：“别着急，安心地等，我们在外边正在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这个拘留所里有我的熟人，有什么事情就托他捎个信出来。”胡志明用铅笔写了一封越文信件交给王锡机，让他转给黎广波。

黎广波和王锡机第二天又一同前往拘留所看望了胡志明、杨涛，并给他们留下一些钱。然后，黎广波立即回到越南，把这个不幸的消息传达给了越

共。

胡志明在靖西县专员公署关押数日后，被转到靖西县监狱，在这里他受到了更残酷的待遇，脚上被扣上了铁镣。

靖西县有关当局认为胡志明既然持有第四战区的军用通行证，便决定将其送往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原桂林行营）审查。于是，从靖西县开始，胡志明和杨涛被押着途经田东、隆安、南宁、武鸣、来宾、柳州等大小城镇，于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从桂林折回柳州，交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被关押在战区长官部的监狱中。

黎广波回到越南，报告了胡志明在中国被捕的消息后，越共党中央机关研究决定派“阁同志”前往广西进一步探听消息。

这位“阁同志”在广西向一个地方官员打听胡志明情况时，官员告诉他“是了，是了”，却被他听成“死了，死了”。听到这一噩耗后，“阁同志”也没有进一步证实，就回去报告了越共。越共内部听了这一消息极为震惊，甚至为范文同准备撰写悼词，筹办追悼会。越共对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将信将疑，便再次派人到中国探听消息以及胡志明的墓葬在何处。后来确知“阁同志”的消息是完全错误的，胡志明仍然活在世上。越南共产党中央机关还曾收到胡志明寄自中国境内的一份报纸，报纸边沿上还有胡志明本人亲笔手写的铅笔字，告诉他们：“祝诸兄在家健康，努力工作，我在此平安。”还有几句诗：

云拥重山山拥云，
江心如镜净无尘。
徘徊独步西岭峰，
遥望南天忆旧人。

胡志明被捕后，当时国民党方面一直也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实身份。无从知道胡志明就是“越盟”领袖黄国俊，更不知道阮爱国与黄国俊实际上为同一人——胡志明，只是听消息说阮爱国已经死去，而黄国俊仍在越南境内活动。就连那些接受动员的越南国内人民和在中国云南、广西的越侨们在联名要求中国方面恢复“一位越南反法西斯的老革命家”的自由时，也不知道这位革命家究竟何许人也。可见，越共中央对胡志明的真实身份保持高度的机密。

越共中央在1942年10月下旬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从靖西给重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拍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胡志明。

孙科院长十分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曾于1941年3月23日在重庆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谈话，公开主张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地位。孙科在接到这封电报后，立即将其传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责成他处理此事。吴铁城奉命致电广西省政府，要求“查明释放”。由于胡志明当时正被押解在广西的隆安和同正之间，尚未到达桂林，此案显然未经省政府处理，更无从“查明释放”。11月9日，未见回音的吴铁城再次致电柳州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电文是：

“准孙（科）院长函送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来电，以该会代表胡志明赴重庆向蒋委员长献

旗致敬，抵靖西被扣，伏乞电释等情。查此案前已电广西省政府。特再电转知查明释放，并见复为荷。

此时胡志明尚未被押至柳州，张发奎对吴铁城的电报也无以答复，而是在追查之中。三天后，吴铁城又一次致电张发奎，催促此事。一直到12月9日，胡志明才经过柳州被押送桂林。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事处查出胡志明已被押往桂林。在这里，国民党有关方面对胡志明进行了审讯，胡只承认自己是“越南革命干部”，曾参加过共产党，但是否认与中国共产党有任何瓜葛。桂林办公厅只好把胡志明当作“政治嫌疑犯”。于1943年1月下旬，送交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继续审查。柳州方面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直到1943年7月，也只得出胡志明是“第三国际活动分子”的结论。因此，胡志明在柳州的狱中境遇稍有好转，被囚禁在军人拘留所内，受到“政治管理”，除行动受到限制外，可以读书看报，没有劳役和严刑拷打，还有比较充足的食物可供充饥果腹。有关胡志明在第四战区羁押的情况，当时在政治部任中尉科员的彭德这样回忆：“大约是1943年初的一个阴雨大的早晨，一个特工人员押着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来到政治部。特工人员命令老人蹲在政治部办公厅门口右侧的一棵桉树下，便进入办公厅递交文件，又转身出来看住这位老人。其后老人被交给警卫排收押。这位老人是什么人？大家都不清楚。警卫排将老人拘禁在政治部附近一个四周是砖墙和铁丝网等障碍物的小屋里。小屋朝警卫排那边的门口，有一排木栅栏。老人每天就靠着木栅栏静坐沉思或看书。每天早晨，卫兵打开铁锁，开门放老人出来散步。”越南人陈民先也说了关于胡志明在柳州的情况：“胡志明在军人拘留所内，是作为政治嫌疑犯受到看管的。在那里，不再有像押解途中各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饭够吃，上午和中午在卫兵的监视之下，各有15分钟的时间上厕所。再没有铁链和镣铐了，有时还能够读到报纸和书籍。

胡志明被关押在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时，越南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为营救胡志明出狱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越南共产党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孙科和向重庆苏联塔斯社发出电讯吁请国际援助外，又进一步广泛号召在中国的越南侨民，要求中国当局释放被捕的越南革命领袖。

武英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设法动员国内群众和海外越侨的力量，要求蒋介石集团恢复我国这位反法西斯的老革命家的自由。”

当时曾在昆明从事地下工作的越共党员黄光平也说：“1943年，我们接到黄文欢同志的一封密信，信中要求我们动员当地侨胞写信或写请愿书，要求张发奎立即释放一位从越南出来的老革命家。”

在重庆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得悉胡志明被捕后，立即想方设法同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周恩来这位早年在留学法国巴黎时就认识胡志明的老朋友，亲自找到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半岛军，挚请冯玉祥设法营救落难的胡志明。冯玉祥当即一口应允，为保万无一失，他首先拜会了苏联顾问，向他们请求营救策略和措施。然后冯将军又同李宗仁一起前往谒见蒋介石，当面要求蒋介石马上释放胡志明。

冯玉祥斥责蒋委员长：“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必要有权利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就不把他们也统统逮捕呢？”接着冯玉祥又把这一事件同抗战联系在一起：“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敌的，如果我们把抗战的国际友人以敌

人对待，我们的抗战究竟是真是假的？”李宗仁也毫不客气：“道理冯先生都讲过了，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边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

蒋介石面对两个国民党要人的严辞诘问，表面上虚与委蛇地答应立即下令释放胡志明，实际上在他没有得到广西省地方政府开清楚胡志明的真实身份之前，他一直没有下释放令。

胡志明的最终获释，除了越中两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和极力斡旋外，也有国民党内部的原因。

1942年10月份在广西柳州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由于内部党派的剧烈纷争，其组织已经深深地陷入瘫痪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时任司令长官部中将高级参谋、负责对法越两国事务的第四战区外事室副主任的萧文等人，在了解了胡志明的真实身份后，向张发奎提出建议，释放胡志明回国，利用他在越共中的影响和威信，参加越南同盟会的活动以抗击法国殖民者，减少来自中国南部的威胁。

当时担任政治部的少将高级参谋，越南特别训练班班主任，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的曾天节先生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提到了当时的情景。

“大约是1943年上半年，我昨到训练班中‘越盟，成员武长溪、黄中的反映，说印支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在靖西、德保被蒋介石特务逮捕，押到柳州沿途受到迫害，同时了解到胡志明就是阮爱国、李瑞，大革命时期在广州于革命工作，任鲍罗廷顾问的翻译。我对其不幸遭遇有些同情。即到长官部外事处找萧文处长商量营救。乃决定向张发奎提出建议，为了搞好越南工作，必须把越南革命同盟会加以改建，让‘越盟’的代表特别是胡志明参加进去，共同负责领导工作，才能取得越南的独立。张发奎也有他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越南革命同盟会党派斗争激烈，内部矛盾重重，所有派别在越南国内都没有影响，唯有胡志明所代表的‘越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当时四战区负责对越工作，张发奎企图在将来对日反攻进入越南后，能够利用‘越盟’的影响来控制局势，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因而也倾向于给胡志明恢复自由。”

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政府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让胡志明离开拘留所，改由政治部继续对其“察看感化”。这项决定是在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到重庆开会时作出的，这其中肯定掺进了张发奎的建议，侯志明回柳州后，立即执行了该项命令。

就这样，胡志明终于在多方营救，于1943年9月10日从四战区军人拘留所里被释放出来了。至此，胡志明狱中的1年又12天的日子画上了句号。

1943年9月10日，胡志明被释之后，住进了第四战区政治部的“斌庐”，有了行动上的自由，常到外边去做些诸如爬山、游泳等活动以调节和恢复由于长期被羁押囹圄所折磨病弱的身体。

正如时任四战区上尉科员彭德在其回忆录中所描绘的：“以后，就再也不见这位老人（胡志明）被关了。只见他天天都回政治部的人员在一起吃饭，有时还招呼一些下级人员过来一起吃，彼此有说有笑。大家都称他‘胡伯伯’。胡伯伯生活朴素，总是穿粗布布衣，外出都是步行。”

尽管胡志明被释，但他仍留在柳州的四战区政治部内，与侯志明、张发奎等人在一起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并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侯志明后来回忆称他当时和胡志明及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共同饮食起居，

彼此不分界限。侯对胡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

张发奎对胡志明“印象极佳”，“也很优待”。或许下面这一段由当时在柳州特训班中受训的越盟成员武长溪的回忆，更能说明张、胡之间的关系：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到伯伯（胡志明）的住处去。有人说他到河里洗澡去了。于是我来到河边，果然，胡伯伯已脱了衣服跳到水里去了，好像没有一点冷的感觉。一会儿，我看见穿着华贵冬衣，骑着一匹高大的红马的张发奎走了过来。当他看清在河里洗澡的是胡伯伯时，就停了下来，用惊奇和敬佩的语气向胡伯伯问安。

胡志明在获释出狱后，不仅仅过着游山玩水的潇洒日子，他时刻都在关心着越南国内的革命。有了行动上的自由，他更是想方设法与国内取得联系。他常用粥汤在报纸的边缘空白处写字寄给国内的同志们，他们在收到报纸后用碘酒涂上去，便能看出字来。为了安慰国内的革命志士胡志明每次给他们写信都说他自己的身体很好，并嘱咐他们不要为他的健康和安全而影响工作，鼓励他们要“勇往直前，排除万难，搞好工作。”

胡志明获得自由后不久，即应张发奎的邀请参加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同盟会的副主席。张发奎也于1943年底兼任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指导代表，准备改组同盟，并让胡志明草拟改组计划。1944年3月25日至28日，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柳州大桥第四战区长官部礼堂召开。会议改选了该同盟会的执行委员会，胡志明和黎松山当选为执行委员。

1944年6月，黄文欢由越南来到柳州，会见了胡志明，向他汇报了越南国内革命的形势和“越盟”组织的发展情况，并建议胡志明抓住海外代表会结束的有利时机，争取回国，直接领导越南革命。

胡志明向张发奎提出回国进行活动的设想，一并递交了由他本人起草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张发奎请示重庆中央政府后，同意了胡的返越请求，并允许胡志明从由特别训练班结业学员所组成的“战地工作队”中挑选了18名越南青年，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经南宁、龙州，从水口送返越。

秋瑾殉葬者的自杀之谜

1912年，有人在女革命党人秋瑾墓一侧建起了鉴湖秋侠祠。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座祠堂里居然立着亲自率军搜捕、杀害秋瑾烈士的刽子手的灵位。如果这是因为秋瑾死难时说过：我是一个读书的女子，死后不要扒我的衣服……那么，“刽子手”的悬梁自尽又是因何而起？这一切始终是今人一个未解的谜团——

1907年7月15日，中国近代著名女革命家、同盟会浙江分会领导人秋瑾在绍兴闹市轩亭口刑场从容就义了。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革命进程的人都十分了解的一段历史。但是，有关资料记载了绍兴知府贵福是杀害秋瑾的刽子手，却很少有知道直接指挥搜捕、审讯和杀害秋瑾的是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而李却又在秋瑾牺牲后不久却又为她而自杀，给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始终无法破解的谜团。

李钟岳系山东安丘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十几岁便能诗善文。他早年间考中进士，被清政府分派浙江任职。他在江山县代理知县期间，便以政绩显赫、清正廉明著称。1907年李钟岳调到绍兴府山阴县任知县，在当地声名也还不坏。

那时候，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正在各地进行着推翻满清政府的斗争。秋瑾也以山阴大通学堂为掩护，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作为开明封建官吏的李钟岳对秋瑾的人品和才华十分敬慕，并常常以她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山河故国羞”等激励子女。因此，他对秋瑾的反清活动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想对其进行干预。

1906年秋，秋瑾与徐锡麟等会党领袖在上海聚会，确立了在浙皖两省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思路。第二年春天，她从上海回到了老家山阴，主持大通学堂校务，在师生中进行秘密发动工作。她在学校中增设了体育课，暗中为起义培养军事人才。她想方设法取得官府公文护照，从上海买来了枪支弹药。

没想到起事前夕，秋瑾手下一个名叫聂李唐的人无意中泄露了机密，武义县知县派兵从聂家搜出了会党名册。与此同时，徐锡麟派往上海购买军火的光复会员叶某不幸被两江总督抓获，严刑之下招供。徐只得先发制人，借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击毙了出席典礼的恩铭，仓促举行武装起义。结果，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壮烈牺牲。

安庆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革命党更加警觉，到处搜捕革命志士，一时间血雨腥风，形势异常严峻。在此情况下，有人联名向绍兴知府贵福告发了秋瑾。说秋瑾与徐锡麟是表亲，又是会党首领。

贵福与恩铭同为满人，恩铭的死使他更加仇视革命党。贵福接到密报后当即赶到杭州拜见浙江巡抚张曾扬，说大通学堂女教员秋瑾有大枪600支，纠结人众，密谋在6月10日发动叛乱。

当时，张曾扬早就听说大通学堂有反清迹象，只是因学堂所在的山阴县知县李钟岳极力掩饰，才没有引起更多重视。这次得到报告后，张曾扬马上委派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带兵300人，随同贵福回绍兴，计划一举包围大通学堂，将秋瑾等人“一网打尽”。

清兵即将开赴山阴县的时候，县里的数十名绅士前往县署，要求知县保地方平安。李钟岳见民心所向，立即向县里父老表示：决不鲁莽从事。随后，他当即绍兴府署，向知府贵福据理力争，他说：“平时未见大通学堂有任何

不轨行为，今毫无证据、未加核实就动武，恐对地方不利。请待掌握确凿证据后再行发兵。”

贵福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一时也找不出好的理由，只好暂时作罢。

李钟岳回到山阴，连忙召集诸绅士商讨对策，因苦于没有好的办法，只好尽力施延时间，期望大通学堂师生能够离开险地。

在此形势下，大通学堂师生却要求提前起义，攻占绍兴府。秋瑾觉得绍兴的革命力量目前还很薄弱，冒目行动只能导致不必要的流血。当时正值学校放暑假，她密令校内师生尽快疏散，自己和 30 多名不肯离去的师生继续留在校内。

就在这时候，革命党人王金发秘密来到绍兴，劝秋瑾立刻离开此地。但被秋瑾毅然拒绝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7 月 13 日的午后，贵福派衙役传李知县进署。这一次贵福满脸怒气，厉声斥责：巡抚大人的命令等于王命，汝一施再施不肯执行，是何居心？本府命汝立即带兵前往，将大通学堂的师生全部枪毙，不得有误。否则，本官就向都堂大人告汝与逆党私通之罪，汝考虑着办吧……说罢，贵福把浙江巡抚的两次催促围抄电令狠狠地掷于李钟岳的脚下，拂袖而入屏后。原来，贵福从县城回来后，见李知县故意施延，便密报浙江巡抚，所以在此间又有两次电令。

李钟岳知此事无可挽回，只好返回山阴县衙告诉诸位乡绅说：情势所迫，我已无力阻止，只有尽量少伤民众吧！看来，他唯一能表示心迹的只能是这句话了。

于是，在绍兴知府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被迫会同清兵标统李益智率清兵及三班衙役前往大通学堂捉拿秋瑾等人。路上，因恐军队开枪伤人，李钟岳坐轿走在最前列，当 300 多名清兵逼近学堂时，贵福急忙令士兵开枪射击。清后担心误伤李知县，只得朝天射击。秋瑾闻枪声知道有变，急忙组织师生突围，但为时已晚，清军已包围了学堂。

李钟岳率领清军涌入学堂大门时，秋瑾果断地开枪抵抗，掩护同伴疏散。在双方互相射击之际，李钟岳唯恐伤害秋瑾，大声喝道：不得射击女子，违者斩！此时，秋瑾已跃登学堂前房顶，她因身着长袍分不清男女，便急中生智，将长袍脱去，露出女儿身。清兵见是一个女子，因为有李知县命令在先，不敢违令。在秋瑾等十几个人的掩护下，另外十几个年小体弱的学生从后门泅水突围。秋瑾一手握六轮手枪，一手持短剑，指挥其他人以屋脊墙壁等为掩护，顽强阻击清军，打死打伤清军数十人。本来以秋瑾的武功和敏捷可以脱身逃走，大通学堂的教员、内奸蒋纪故意在她身边纠缠，不幸被敌人捕去。除秋瑾以外，尚有程毅等 7 人被捕，死 2 人，其余皆安全撤离。之后，清兵还从校内搜出秋瑾他们准备起义所用的数百发子弹和数十支枪。贵福等人得手后，立即命令李钟岳和会稽知县李瑞年在绍兴府三堂会审。大堂上，秋瑾身着玄色长袍，蓄着发辮，面白微红，神色自若。贵福连声喝问，秋瑾或不答或问百答一，根本没把贵福在眼里。拷问再三，秋瑾还是那几句话，只承认个人系家庭革命，夫妻革命，绝不承认有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企图。贵福命令动大刑，秋瑾用手擦擦面额上的血，斩钉截铁地说：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贵福从秋瑾嘴里得不到一点口供，苦无证据：只得再命李钟岳火速率岳赴山阴县城外查抄秋瑾母家，希望能够搜出证据。

身为知府的贵福虽是满州人，却是两榜进士出身，乃沽名钓誉之辈。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秋瑾，贵福虽决心杀害秋瑾，但不想冒杀名士之名，便欲借李钟岳之手，以泄其私愤。于是，他将案子推给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要他押回严加审讯。

二

第二天，李知县提秋瑾等人至县署，让秋瑾坐在木凳上，其他人跪在地上。李钟岳略加审问后，便令文案李镇川将程毅等7人带到公堂上继续审讯，自己则坐在木床上，与女侠交谈。秋瑾见李知县态度诚恳，便将自己自幼读书习武，因与丈夫王某感情不和，独自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大通学堂教书的情况向李作了介绍。李钟岳越听越钦佩眼前这位女子，他被女侠那超人的胆略和才华所折服，认定自己从前对秋瑾的欣赏一点没错，这确实是一位罕见的女中豪杰。他心里暗暗决定，一定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帮助秋瑾。

两人聊了一会儿，李钟岳又请秋瑾题字。秋瑾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李钟岳称赞她的书法潇洒劲秀。审讯两个时辰，双方如会客一般，绝不像审问案犯。

晚上，李钟岳赴绍兴府向贵福汇报审讯结果。贵福一听勃然变色，怒斥李钟岳待秋瑾如同座上宾，厉声质问他为何不动大刑？李钟岳分辩说：秋瑾乃一读书女子，证据又不足……贵福决计要处死秋瑾，扔下李钟岳连夜奔赴杭州，找到巡抚张曾扬，谎称秋瑾已承认革命。当时，清政府对恩铭被杀一案极为震怒，下令凡属承认革命者即行正法。于是张曾扬不查贵福所言虚实，立即下达了处死秋瑾的手谕。于是，秋瑾的死案就这样定了。

知府贵福回连夜回到县城，向等候在府中的李钟岳出示巡抚手谕，令李钟岳在天明处死秋瑾。李钟岳见状大惊，对贵福蛮横独断的做法颇为不满，愤然说：案情还未弄清楚就处死犯人，人心不服，会引起舆论的责难的，甚至还会出现地方上骚乱。然而贵福决心已定，对李钟岳的规劝置之不理，且冷冷地说：巡抚大人手令在此，莫非你与秋瑾逆女有什么隐情？李钟岳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倘若假手他人执行，白白让女侠多受凌辱，不如自己执行，以全女侠成仁之志。于是，他急驰回县署准备后事。贵福放心不下，吩咐俩心腹暗中监视李钟岳的行动。

是夜3点多钟，李钟岳坐大堂之上，令衙役押秋瑾到堂内，对她说：我李某本欲救你一命，但上司决意要杀你，我已无能为力，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能办者我一定尽力。李钟岳说完这几句话时，神色十分暗淡。秋瑾愤怒地质问：我究竟犯了何罪，有何口供，尔竟要杀我？李钟岳一脸的无奈，有气无力地说：你的冤屈我深知之，杀你非我姓李的本意。秋瑾已知无生还的希望，不想为难知县，感激地说：公子盛情我深感戴，图报于来世，惟临终前有三件要求，如公能满足，瑾死而无憾。李钟岳请她讲，秋瑾说：我是一个读书的女子，死后不要扒我的衣服；第二，请为我准备棺木一口，瑾不想暴尸于野；第三，我要写家信一封向亲友告别。李钟岳表示一定全部做到。

革命烈士秋瑾就义的日子到了。7月15日凌晨4时，贵福亲自率清兵前来催促行刑。李钟岳被迫押秋瑾赴绍兴闹市轩亭口行场。赴刑场时，秋瑾身穿白汗衫，脚戴铁镣，双手反绑着，从县衙一路走来，前有铁链牵走，后有三四人推送，并有贵福派来的清兵监视。到了轩亭口，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话要说，秋瑾摇了摇头。

这时，贵福催促李知县立即下令刽子手执行。秋瑾用手理了理乱发。从

容就义在铡刀之下。一代女杰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李钟岳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他购买了一口华丽的棺材装殓死者，并请当时另两位奇女子吴芝瑛、徐自华葬女侠于西湖畔。徐自华是著名女诗人，撰墓表千余言；吴芝瑛是著名女书法家，亲自将徐撰的墓表勒碑，树在秋瑾的墓前。

秋瑾牺牲后三天，李就因秋瑾一案而被革职。李知县同情女侠的一切情形，均被贵福探知，尤其秋瑾处决前，李钟岳说的那番话大大触怒了贵福。他当即电告浙江巡抚张曾扬，要求将李钟岳撤职查办。于是，张曾扬以“庇护女犯”的罪名撤销了李钟岳的知县职务。

李钟岳离任那天，绍兴百姓数千人出门相送。有数百人乘船数十只，一直送父母官至几十里外的南柯桥下，仍恋恋不忍离去。李钟岳愤然道：去留之事何足计较，未能保全大局才是我终身的遗憾。山阴县衙方案李镇川目睹贵福独断专行，深为李知县鸣不平，愤而辞职，追随李钟岳而去。

李钟岳解职后寄住杭州，浙江巡抚张曾扬和绍兴知府贵福还不罢休，欲上奏朝廷治罪，幸亏浙江布政使逢恩溥与贵福素恶贵福为人，深知贵福朦胧杀人有李钟岳被屈情形，极力阻止方罢。

然而，身在杭州的李钟岳却并没有因此得以解脱，他终日忧伤叹息，多次对人懊悔地说道：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他因此愤不欲生。李镇川及友人多次安慰劝解，李钟岳乃不能消解心中之痛恨与悲苦。

在那段深深自责的日子里，一生为人正直的李钟岳渐渐萌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拿出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无时不刻地注视、默诵，常常泪流满面。这条字幅他从不示人，别人也不敢索阅。

李钟岳终于采取行动了。有一天，忽然跳井自尽，多亏井口过于狭窄，他身材肥大，短时间难以挤下，被家人救了出来。又过了几天，李钟岳独自走进屋后菜园他来到一棵老柳树下，正欲投麻绳上吊，被跟踪的夫人韩氏及时发现。李钟岳知道不能死成，便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掉头而去。至此，家人非常警惕，不敢远离半步，李镇川更是每日不离左右，深怕一不小心发生意外。

可是，李钟岳已无法走出自责和殉道的怪圈，他心意已决，随时都有自尽的可能。这年9月23日早晨，李钟岳一改平日悲伤欲绝的神情，和颜悦色地与家人共进早餐。早饭后，他还检查了两个儿子的功课，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嘱咐妻子多保重身体，最后与李镇川在厢房喝茶论诗，颇有兴致，和以前判若两人。对李钟岳反常表现，李家的人没有往深处考虑，还以为老爷是忽然大彻大悟了呢，所以李府上下无不欢欣鼓舞。上午9时许，陪同李钟岳喝茶的李镇川去茅厕，仅有一袋烟的功夫，估计老爷今天精神这么好，不会出什么问题。可是等他回来时，不禁大吃一惊，李钟岳已在厢房内悬梁自尽了。

李钟岳终年53岁，距秋瑾女侠被害还不到70天。

浙江士民得知李钟岳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来吊唁的人三日不绝，一时间，社会各界舆论纷纷，遣责张曾扬和贵福。当时的著名大报如《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强烈攻击当权者草菅人命。张、贵二人顿成众矢之的。上海的戏院还将秋瑾案编成新剧《六月雪》演出，剧中辛辣地鞭鞑了张曾扬、贵福的丑恶嘴脸，为秋瑾女侠和李钟岳鸣冤叫屈，声势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攻势，清政府为平息民怒，调张曾扬为江苏巡抚，江苏士民闻讯通电拒绝，又被迫调任陕西。贵福调任安徽宁国府，上任仅三天就被迫辞职。张曾扬出身南皮世家，是大名鼎鼎的张之洞之叔父，早年以名进士入翰林院，巡抚浙江以后颇有政声，白白地以秋瑾案为贵福所牵连。张曾扬入主陕西后一蹶不振，忧郁以终。贵福民国后更名为赵景祺，曾在北洋军阀政府外交部任职多年。1932年伪满州国建立后，他北上投入日本人的怀抱，甘心为他的日本主子卖命，成了一名可耻的汉奸。

李钟岳一生为官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死了都无钱处理丧事，他的妻子还是靠典当衣服、借贷亲友，才得以携子扶柩，返回山东老家。

1912年，老同盟会员褚慧僧与秋瑾女侠之友吴芝瑛、徐自华一起，在西湖秋瑾墓侧建鉴湖秋侠祠，并特将李钟岳的灵位立于其中，以示崇德报恩之意。自此，李钟岳的灵魂便与秋瑾女侠一同长眠杭州鉴湖。

戴笠诱捕陈璧君纪实

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卖国贼。抗日战争胜利后，她的末日到来，却不甘死亡，作垂死挣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奉命诱捕陈璧君。终于将她绳之以法，判处无期徒刑。

建国后她仍刁顽不化，直到把牢底坐穿，死于狱中——

1944年11月10日，伪南京政府主席汪精卫终因久病不治，结束了他罪恶的人生，由陈公博接替了他的职务。

汪伪政权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受到该政权的第一夫人——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的干预。她既是伪政权的中央监察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被列为中枢要人。借着汪精卫的权势，她专横跋扈，颐指气使，什么事也插手，什么人也管。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伪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一手操纵，筹建了伪广东省政府，让她的弟弟陈耀祖出任伪省长。伪省府各部首席长官，均由她指派，让她的“公馆派”亲信所包揽。

汪精卫死了，靠山已失，素来对陈璧君抱有成见的陈公博，以调整机构为借口，把一大批“公馆派”人物排挤出伪政权，对陈璧君亦持冷淡态度，遏止她到处插手，使她的地位较前大大下降。一批善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追随者，也改变态度，倒向陈公博，使往日冠盖如云，门庭若市的汪公馆，一时间变得车马稀稀，门庭冷落。

陈璧君知道，陈公博是容不得她的，再在南京呆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横下一条心，到梅花山在汪精卫的坟前痛哭一场，然后悻悻然离开南京，到她苦心经营的独立王国广东去了。此时，已是1945年3月，伪省长陈耀祖已遇刺身亡。陈璧君来到广州，见她的弟弟被刺，不禁流下两行酸楚的眼泪。她明白，广东是她陈家的天下，绝不能让陈公博插手，于是动员她的侄儿陈春圃接替伪省长之职。

陈春圃是陈耀祖的儿子。他十分明白，乃父被刺，完全是因他当汉奸的缘故。父亲被刺，难道儿子当了伪省长就不会被刺吗？再者，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各地均受到严重挫折，败象已十分明显，谁还愿意往陷井里钻呢！因此，他不管陈璧君如何动员，都毫不动心，说什么也不当这个伪省长。

陈璧君无奈，只好另找人选。她几乎把她陈氏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考虑过了，却没有一个人堪当此任。一天，她忽然想到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这个人就是现在在南京伪政权中任外交部长的褚民谊。他是她的妹夫。

想好了，陈璧君就向伪南京政权提出建议。陈公博当然不会满足她的要求，回电说：“褚民谊现任外交部长，外交部之工作十分重要，选一名称职的外长很难，选一名省长却极易，可另择而任之。”

陈璧君为此大为恼火，认为这是陈公博有意与她过不去。一怒之下，她竟乘飞机飞回南京，找陈公博评理。她闯入伪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缠着陈公博大吵大闹。陈公博有事要走，她走上去拉住说：“你不答应我的要求就不能走！”

陈公博解释说：“这是一件大事，要答应你也得经会议研究才能决定。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

陈璧君不依，不客气地说：“谁不知道中央的大小事你说了算！别人找你，你什么事也可以答应，怎么轮到我就得上会讨论呢？我知道，汪先生不在了，你是有意跟我过不去！”说罢呜呜大哭，惊动了好多公务人员来看热

闹。有人见她闹得太出格了，就上来劝她要自尊自重，不该胡搅蛮缠。她不客气地抢白说：“汪主席在世时，你为什么不敢对我说这样的话，现在汪主席去世了，就巴结上了陈主席，来欺负我了！”她的话把对方噎得不敢说什么了，只好姗姗离去。

一连数日，陈璧君缠着陈公博吵闹不休。陈公博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让褚民谊辞去外长职务，回广东任伪省长。

7月下旬，褚民谊匆匆办理完移交，便南下广东，走马上任。上任后，他奉陈璧君为太上皇，一切听命于陈璧君，自己心甘情愿地作了傀儡。

8月6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致命的打击，使之元气大伤。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抗日武装力量，都向日军发起猛烈进攻，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8月9日，在忧心如焚中，陈璧君获悉，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讨论向盟国停战求和事宜。这一天，她的心情极坏，饭吃不下去，觉睡不着，看到什么也不顺眼。她把所有守卫和侍奉她的人都轰走，一个人孤零零躺在一把藤椅里，双目紧闭，陷入了沉思。她已经预感到，她的日本主子失败的命运再难以挽回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难想像得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南京的伪政权，她一手操纵的广东省伪政权和全国各地的伪政权，将会顷刻土崩瓦解……想到此，她不禁打一个冷颤，像谁把一桶冰冷的水浇到她的头上似的，从头凉到了脚跟。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陈璧君从沉思中回过神来，镇定一下，然后才伸手拿起话筒问：“喂，你是谁？”

电话是褚民谊从伪省府打来的。他说：“夫人，我是民谊，有十分重要的事向您报告。您等着，我立刻就赶到您那里去。”说完，电话就挂断了。有什么重要的事电话里还不能说？陈璧君胡乱猜测着，心不由“噹噹噹”地跳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半小时后，一阵汽车声传来。陈璧君拉开窗帘向外看去，只见一辆防弹汽车风驰电掣般从大门外驶入，嘎然停在楼下的草坪边。借着昏暗惨淡的路灯光，她看到褚民谊从汽车里钻出来，步履慌乱地向她的卧室走来。褚民谊是一个沉稳的人，从来没有这么慌乱过。由此，陈璧君判断，一定是出了非同寻常的大事，否则褚民谊是不会有这种表现的。她不由向门口走去。褚民谊喘着气从楼梯跑上来。陈璧君迎了上去问，慌不迭地问：“民谊，到底出了什么事？”“去屋里谈吧。”褚民谊一边说，一边用手绢擦着汗。他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自顾自地推门走入客厅。陈璧君尾随而入，并把门紧紧关上。“大势已去，大势已去！”褚民谊嘴里这样嚷着，伸手打开电扇，任风猛吹他火烧火燎的身体。等陈璧君走到他的身边，他才压低声音说：“夫人，刚才公博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

“啊，这么快？”陈璧君虽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但她一直认为日本内阁由主战军人操纵，是不会轻言投降的，至少还可以坚持半年，想不到……她像丢了魂似的，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好一阵，嘴里才喃喃自语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褚民谊转过身来说：“公博指令，和平政府的任务业已完成，其职能宣告终结，应行解体。”

陈璧君此时此刻，已顾不上考虑南京伪政权的存亡了，而是考虑自己的

出路。因此，她并不满足褚民谊的回答，把声音略略提高一点说：“我是问你，我们自己该怎么办？”

褚民谊略略思忖后便说：“国琦他们已去了香港，准备转赴外国。依我之见，我们亦应早作准备，一走了之。不知夫人以为如何？”

国琦是陈璧君的侄儿，前不久就伙同一批伪省府的官员逃到了香港。对此，陈璧君十分恼火，认为他们这样做愧对她对他们的栽植和倚重。如果褚民谊不提此事，她也许会认真考虑褚民谊提出的意见的。可褚民谊不但提了，而且要效法，自然引起了她的反感。因此，她沉下脸说道：“不，我们绝不能当逃兵！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工作目的是求和平，而不是当汉奸。如果就此流亡海外，岂不是授人以柄，让人家说我们是畏罪潜逃吗！再说，日本人投降，别说是香港，就是海外好多地方也是盟军的天下，咱们能逃到哪里去呢！所以，我决定不走，看重庆方面其奈我何！”

褚民谊素来没有勇气违逆陈璧君的意志，今天也自然俯首听命。他点了点头，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表态说：“那就按夫人的意思办吧。——民谊决意追随夫人到底！”

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电台广播了《停战诏书》，以此为标志，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之久的战争降下了帷幕。消息传遍神州大地，万民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锣鼓声、爆竹声响成一片。而只有那些汉奸门惶惶不可终日，有的潜逃，有的藏匿财产，有的到处奔走，寻找新的靠山……

从表面看，陈璧君依然那么镇静，那么从容，可内心却翻滚着排空浊浪，心情十分紧张，茫然不知所措。她几次打电话，要褚民谊来陈公馆，与她商讨对策，可褚民谊正忙于处理善后事宜，被缠住了身子，说什么也走不开。他在电话里说：“夫人，有什么事还是另找时间谈吧，我现在根本无法脱身。”她能理解，而且也能想像得到，眼下伪省府一定乱成一锅粥了，褚民谊作为一省之长，怎么可能有时间来陈公馆呢？她尽管这样想，但过一会儿又不由自主地拿起电话叫褚民谊。如此数次，简直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所为，令褚民谊哭笑不得。

好不容易等到深夜，估计褚民谊已回到家里，陈璧君偷偷溜出陈公馆，只身去找褚民谊。

褚公馆与陈公馆中间仅隔一条马路。陈璧君低头穿过马路叫开褚公馆的门，便径直向褚民谊的卧室里走去。见到褚民谊，她第一次显得软弱无力，像溺水者求救似的问褚民谊：“咱们的退路，你到底想好了没有？”

褚民谊刚刚洗过澡，正穿着睡衣准备就寝。他让陈璧君坐下后，尽量装出轻松的样子说：“听说重庆已电令海军部次长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军司令，近日内即可抵达广州。咱们和招桂章毕竟是自家人，是否请他代为疏通？”

招桂章原是汪伪广东省海军司令。早在汪精卫还未去世前，陈璧君以“广东政治指导员”的身份坐镇广州，干预广东一切军政事务。对此，招桂章颇为不满，不仅在背地里说三道四，而且当着陈璧君的也每有微词，顶撞“第一夫人”。陈璧君是有名的刁女悍妇，岂能容招桂章如此所为！于是，她在汪精卫那里吹一通枕边风，汪精卫便下令将招桂章调回京中，委任为海军部次长。从表面看，是提拔了招桂章，而实际是削去了招桂章的军权，被逐出了广东。对此，招桂章对陈璧君一直心存芥蒂，怨恨不已。

既然招桂章也是汉奸，怎么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先遣军司令而带兵进驻广州呢？原来，八年抗战，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把他的部队大部分调到西南

的大后方。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党军队一时来不及进入沦陷区接收。为了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下令，不许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械；一方面任命一批汉奸头目为先遣军司令，就地驻防，维护治安。这样，不少汉奸摇身一变，就成了接收大员。招桂章就属于这类人。

陈璧君听褚民谊说求招桂章帮助疏通，自然想到她和招桂章间的恩怨。于是，她生气地说：“招桂章是什么东西，我不去求他！”

褚民谊自知失言，立刻改口说：“夫人言之有理，我们不去求招桂章。我看，最好是直接向重庆联系为好。”

“是的，我们直接向重庆联系吧。”陈璧君面迎电扇，一边吹风一边说：“大概你也听说了，老蒋已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命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任命丁默邨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广东方面由你出面，也很可能会受到任命的。你要设法尽快与重庆方面联络。联络时，你可言明我愿再作冯妇，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褚民谊说：“不瞒夫人说，昨天我已给老蒋拍发了电报，表示了我们的真诚之意。不过，至今没有消息，结果尚难预料。”

褚民谊深知蒋介石反共最切，为了紧紧抓住蒋介石，他在电报中说：共党军队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民谊自当谨率所属，力保治安，严防共产党乘虚而入，以效忠党国，效忠委员长。

当褚民谊将电报内容复述一遍后，陈璧君似觉不尽意，就吩咐说：“你可再发一份电报给老蒋，言辞要急切，并代我向委员长夫人问好。”她说毕，生怕褚民谊拖延时间，就又口气坚定地说：“事不宜迟，这份电报必须在今晚发出，再迟了怕中途有变。”

一连数日，褚公馆门庭冷落，很少有人光顾。这一天，突然有人敲门。门卫从铁门的方孔看去，只见一衣冠楚楚的人站在门外，便问：“先生要找谁？”

站在门外的人压低声音说：“请你告诉褚先生，就说重庆来人了。”

褚民谊听说重庆派人来了，立刻亲到门口迎接。当他看到重庆来人，一眼就认出是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

两人来到客厅，郑介民向褚民谊出示证件，作了自我介绍后，然后说：“褚先生给委员长的电报已收悉。委员长对先生深为赞赏。兄弟受戴局长（即戴笠）之命，特来转达一份电报。”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电报，递给褚民谊。

褚民谊展示电报，只见上面的电文是：

郑鹤影（郑介民字）兄：奉委座手令开：日本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后，即能移心移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惟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须飭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此令。

戴笠手启。锐未谕。

褚民谊看毕电报，略显激动地冲郑介民说：“感谢委员长宽洪大量，感谢戴局长的关照，感谢郑主任保护我等的安全！”

郑介民告辞后，褚民谊立刻带着电报到对门的陈公馆去见陈璧君报告刚才发生的事情。

陈璧君接过褚民谊奉上的电报，认真看过后，若有所思地说：“不知他们要把我们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唉，事到如今，也只能任人摆布了。”她说毕，又心有不甘，思忖一阵又开口说：“民谊，我看还是以不离开广州为好。你给戴笠再拍一份电告，让他转告委员长，就说咱们留在广州原来住的地方，恭候中央安置。”

褚民谊也认为，还是住在自己的公馆里为好。如果一旦离开，就免不了要吃苦。于是他立刻答应说：“好的，我这就去办。”他说毕就告辞而去。

电报发出去半个多月，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陈璧君愈等愈不安，每日如坐针毡，心急如焚。

一天，已是晚上十点钟了，陈璧君正要就寝，忽然女佣吴妈推门而入，报告说：“夫人，褚先生来了，要见您。”

陈璧君顺手关掉收音机说：“就让他到我卧室里来吧。”

褚民谊走进卧室说：“夫人，郑介民又来找我了，说是老蒋要我们到重庆去，商讨善后事宜。诺，这是委员长打来的电报。”

陈璧君接过电报，见是蒋介石直接拍给褚民谊的。电文是：

重行（褚民谊字）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退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议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

弟蒋中正印。

陈璧君看过电报，心里十分矛盾，弄不清蒋介石邀她去重庆是福是祸。他沉思良久，始终一言不发。

褚民谊又补充说：“夫人，听郑介民说，接我们的飞机后天可到。他要我转告夫人，要提早作好准备。”

陈璧君仍一言不发，只顾端详拿在手里的电报。

褚民谊见陈璧君半晌无言，猜想她并不情愿去重庆，就试探着说：“如果夫人认为现在去重庆不合适的话，那么由我一个人先去，探探风向，然后再作打算。”

陈璧君毕竟老谋深算，似乎觉得手中的电报是假的。可她左看右看，却看不出什么破绽，不由自主地自语道：“电报纸上附有密码，该不会是假的吧？”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褚民谊立即予以否认，并解释说：“郑介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是不敢以委员长的名义骗咱们的。再说，他骗咱们又何苦呢！”略停片刻，他又从旁怂恿说：“委员长真心相邀咱们去，若是不去，岂不是辜负了人家一片诚意吗？再者，我们此次拒绝去渝，就显得没有诚意了，以后会步步被动，只好受致于人。”

陈璧君与蒋介石共事多年，十分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值此人生的关键时刻，他自然比褚民谊想得更多、更复杂，不能不以防万一。可是，她又经不住褚民谊的再三劝说，加之本人又急于想摆脱眼下的厄运和困境，最后还是答应和褚民谊一起去重庆。她说：“去一趟重庆也好。重庆方面，有好多朋友对汪先生的和平运动有误解。我去了，给他们解释一下，让他们明白真相，解除误会，免得让汪先生和我老背黑锅。”话虽这么说，但她仍不放心，过一会儿又补充说：“但愿老蒋此次言而有信，能够捐弃前嫌，诚心待我们，不要做出什么绝事。”

陈璧君所言“前嫌”，是指1931年11月1日，蒋介石暗中指使戴笠，派特务暗杀汪精卫一事。

褚民谊立刻解释说：“蒋委员长与汪先生虽然前些年有一定过结，但都是为了国家，是没有私人成见，眼下夫人失势，想来委员长念及旧情，也是不会落井下石的。”说到这里，他又指指电报进一步解释说：“就从电报上看，委员长仍称您为‘夫人’。这是一种极友好的表示，请夫人放心好了。”

听褚民谊这么说，陈璧君也就不再有什么怀疑了，便决定到重庆去碰一碰运气。于是，她吩咐褚民谊到市场上帮她买两筐洋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宋美龄。

褚民谊不解地问：“夫人，您不是从来不送人礼物的吗？”

陈璧君说：“过去，我是第一夫人，自然是不送人礼物的。现在情况变了，我什么都不是了，怎么能抱着旧皇历不放呢！再说，咱们此次去重庆，是有求于老蒋。老蒋这人啊，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只听夫人的话。这一筐洋桃给宋美龄，搞点感情投资。女人的心软，让美龄在老蒋那里吹吹枕头风，帮咱们美言几句，可以抵得上十万兵呢！”说着，竟“咯咯”地大笑起来。

褚民谊又问：“另一筐送给谁？”

陈璧君说：“送给吴稚雅。他在老蒋那里很红，他的话老蒋还是听了。”

9月12日，郑介民通知褚民谊，说重庆派出的专机已抵达广州，请褚民谊和陈璧君午后到省政府候机，三点钟准时出发。

陈璧君、褚民谊及其随行人员，提前一小时赶到省府候机。将近三点时，郑介民乘车赶到，载着他们一行出发。

陈璧君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汽车走了一段，她从窗外的景物和方向上发现，他们并非是去白云机场。到白云机场，是轻车熟路，她是很熟悉的。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大声说：“等一等！”接着，她扭头问郑介民：“郑先生，我们这是去哪里？怎么不去白云机场？”司机像没有听到陈璧君的话似的，汽车仍然向前急驶。郑介民只是礼节性地欠了欠身子，等一会儿才慢条斯理他说：“噢，上车前忘了告诉夫人，重庆来的是美制水上飞机，须先到船上，然后由船上转登飞机。”陈璧君释然地吁口气，不再有什么怀疑了。她脸上的惊恐顿然消失，放心地仰躺在靠背椅上，再不说话。不一会儿，汽车来到珠江大桥附近，嘎然而停住。远远望去，江岸边果然停着一艘汽船，船上人影晃动，像是武装人员。郑介民让车上的人全部下来，又上了汽船，然后向陈璧君告辞说：“夫人，兄弟还另有公务，需要留在广州，就不能陪同您去重庆了。”说到这里，他指着站在他身边的一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说：“你们去重庆，一切由这位何先生负责安排。”说罢即跳到岸上，乘汽车而去。汽船起舰不久，何中校便提出，要陈璧君、褚民谊把随身携带的武器交出来。他说：“飞机上是不允许带武器的，这也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

陈璧君说：“我们谁也没有带武器。”

通常情况下，有这句话也就罢了，可何中校却不冷不热地说：“对不起，各位应接受例行检查。”

听到何中校的话，一群武装军统特工人员涌上来，对每个人进行搜身。

陈璧君气得面色苍白，心里想，这哪是把我当什么夫人看，简直把我当成了阶下囚！她真想发作，训斥何中校一番。可想了想还是忍住了，觉得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倒不如忍气吞声得好。

搜查结束，何中校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完全摆出一付执行公务的

样子，用严肃的口气宣读电文：“蒋委员长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地带，以待后命。”

“骗局，这完全是一个骗局！”陈璧君到此已完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她气得浑身发抖，再也忍不住了，歇斯底理大发作，毫不客气地说：“既然老蒋去了西安，我们就不去重庆了。至于我们的安全，用不着你们关心，还是很快送我们回家。我什么地方也不去，要回家！听见了吗？我要回家！”

何中校根本不理陈璧君这一套，扳着面孔硬梆梆地说：“去哪里上峰又作了安排，就由不得夫人了！”

陈璧君气急败坏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安排。”

何中校生怕逼出事来，便立刻转变态度，用和缓的口气安慰说：“夫人，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请你原谅。”

“谁的命令我不管，我只是要回家。你们不能强迫我！”陈璧君仍大声嚷嚷着。嚷归嚷，闹归闹，没有何中校的命令，汽船照样往前驶。驶至中桥，早有一艘小汽艇等着。何中校要陈璧君转乘汽艇，陈璧君不肯，用手抱着汽船的栏杆，大声嚷嚷道，“不去，不去，你们除非用枪把我打死！”

随船的武装军统特工人员立刻从腰间拔出手枪，用枪口对准陈璧君，对她进行威胁。她根本不把这些人在眼里，便破口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敢如此对待我！老实告诉你们，连老蒋也知道老娘的脾气，也是不敢得罪我的！你们倒好……”

事情陷入僵局，陈璧君不管别人说什么，就是不肯上汽艇。褚民谊觉得这样僵持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就从旁劝说道：“夫人，何先生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是作不了主的，和他们吵嚷是没有用的。咱们就听天由命吧，他们让咱们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吧。再说，自己家里又有什么安全可言！”说着，他带头上了小汽艇。

自日本宣布投降后，陈璧君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某某汉奸被杀，某某汉奸的家被抄的消息，就连伪复兴军总司令欧大庆也被一伙不知名的人闯入家中击毙。想到这些，她觉得褚民谊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改变主意，也骂骂咧咧地上了小汽艇。

小汽艇开出不久，便靠了岸。陈璧君和褚民谊等人被领到绰号“市桥皇帝”伪师长李辅群的私邸二楼。陈璧君和她的女佣合住在一间房子里，食用等物一应俱全。何中校临走时板着脸说：“你们听着，谁也不许下楼，只能在二楼自由活动！”

言外之意，他们是没有行动自由的。而事实上，他们想自由也不行，李宅内外昼夜有武装特工荷枪实弹放哨、巡逻，谁敢越雷池一步！至此，陈璧君去掉了任何幻想，也不吵不闹了，耐着性子过她的囚犯生活，在极寂寞无聊中，她只能翻看一些书，或者找人陪她下下棋，偶尔听听留声机，用以消磨时光。

其实，以上行动，都是戴笠为诱捕陈璧君而设计的圈套。这是因为戴笠接到蒋介石逮捕陈璧君的密令后，深知陈璧君是个刁悍女人，逼急了会狗急跳墙，以武力抗拒的，甚至还会有潜逃或自杀的可能。为了稳妥起见，他精心制定了一套诱捕方案，就连蒋介石的几封电报，也是伪造的。陈璧君虽然狡猾，但还是上当受骗，入了戴笠的圈套。

后来，陈璧君被押解到南京，与她的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女和褚民谊，一起被监禁于宁海路25号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看守所。再后，她又被押解

苏州，被关在司前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1946年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对陈璧君立案起诉。4月16日，开庭审讯。陈璧君在法庭上拒不认罪，矢口否认汪伪政权的卖国罪行。她手持辩辞，鼓动如簧之舌，滔滔不绝，一方面替自己辩护，一方面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为。

在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为时，她毫不客气地说：“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三省、华北、华东的大片土地早已被日本军队占领，还不都是蒋委员长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汪先生没有断送过一寸土地，相反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回权利。就拿广东来说，日军进攻时，省府高级长官闻风而逃，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4月22日，江苏高级法院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籍没归公。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陈璧君又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7月间，她从江苏第三监狱被移解到上海提蓝桥监狱继续服刑。1959年6月17日，77岁的陈璧君终因诸病并发，医治无效，死在狱中，结束了她罪恶的人生。

揭开张敬尧遇刺的谜纱

大汉奸张敬尧，投降日本人后，偷偷摸摸跑到北平，策划“平津暴动”。乐窗事发，被“专除汉奸救国团”派人暗杀。暗杀事件险相环主，谜中藏谜，各种人物粉墨登场。“爱国”与“卖国”的较量把历史写得千姿百态，引人入胜……

众所周知，张敬尧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过湖南督军，“九·一八”事变后又变节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可他是怎么死的，却鲜为人知。这里，我们不妨揭开历史的谜纱，把张敬尧被刺身亡的始末告诉读者。

1933年4月21日傍晚，北平东交民巷已被朦胧夜色所笼罩，路灯已打开，昏黄的灯光星星点点，照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忽然，一辆黑色的“别克”高级轿车风驰电掣般从远处驶来，嘎然停在六国饭店的门前。

车门打开后，第一个跳下车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身穿藏青色西装的高个儿青年人。他迅疾地打开后面的车门，立刻从车内走出一男一女两个人。那男人身穿银灰色薄花呢西装，约五十多岁年纪。鬓间的头发已发白，看上去颇有风度，像是一个做过大官的人。他手里拿一根淡黄色的檀木手杖，似乎不是用来助步，而是用以显示一种身份。那女人约四十左右年纪，身体微微发胖，皮肤白皙细嫩，一看就是一位养尊处优的贵夫人。她身穿一件浅绿色的闪缎旗袍，脚穿高跟皮鞋，深身珠光宝气，光艳照人。

下车后，在那位青年人的带领下，那一对男女昂首走进六国饭店。司机手提两只沉重的皮箱，紧跟在后面。

茶役引客人来到装修考究的帐房间，热情地递烟、敬茶，并每人送一块热毛巾让擦脸。——这是六国饭店迎接高贵客人的规矩。

招待一番后，茶役客气问：“请问，先生和太太是来访友，还是住宿？”

那青年人回答说：“住宿。”

“谢谢诸位光临惠顾。”茶役说着叫来帐房先生，办理住宿登记。

“怎么？”那位五十多岁的客人面露不悦地说，“住店还要登记？”

茶役立刻陪着笑脸解释说：“东交民巷是保卫界，巡捕局为了确保界内安全，最近作出规定，要求住店的客人一律登记。”说到此，他冲那位五十多岁的客人笑笑，面露无所谓表情接着说：“其实也没啥，只不过记个名字罢了。”

帐房早已打开墨盒，取一支小楷毛笔在手里，准备登记。

那青年人指了指那位五十多岁的客人说：“这位是我们先生，姓常，名世古，五十五岁。”等帐房先生登记毕，他又指着那贵夫人说：“这位是我们太太，就记常马氏吧，四十二岁。”最后报他自己的名字：“我叫黄秀文，三十一岁。”

登记毕，帐房又问：“三位从何处而来？”

黄秀文想了想说：“从天津租界而来。”

帐房搬开住宿登记簿看了看，然后吩咐那位茶役说：“你把常先生和常太太领到楼上30号房间去吧。——那间房子设备好，采光也好。这位黄先生嘛，就住31号房间吧，就在30号旁边，对隔壁的黄先生、黄太太也好有个照应。”

茶役答应着，就领三位客人上了二楼。

六国饭店在当时的北平，是最高级的饭店，所以收费昂贵，一般人是住

不起的。唯其如此，凡出入于六国饭店的客人，不是达官显贵，便是富豪阔佬。这里的茶役见得有钱人多了，习惯成自然，形成一种职业敏感性只要客人来了，看上几眼，交谈数语，即可判断出客人是什么身份。

常世古夫妇的到来，茶役们很快发现，他们绝不是一般的阔佬，而是有一定来头的人物。他们最有力的判断依据，是发现常世古的手上戴着一枚白金钻戒，上面镶嵌着一颗稀世珍宝——祖母绿，估计不低于10克拉。他们知道，像这样的钻戒，在市面上的标价至少有十几万元。就其来历而言，绝不是民间所有之物，很可能是清宫中流失出来的。

由此，茶役们开始海阔天空地猜测开了常世古的真实身份。猜来猜去，认识逐步趋于一致，初步认定他很可能是一个江洋大盗，晚年金盆洗手，做了富公。

几天以后，茶役们开始发现，他们的判断发生了偏差，常世古根本不是什么江洋大盗洗手的富公。因为常世古住入六国饭店后，每天都有一些气度不凡的阔佬来访，而且每次来访者都是五六个人。还有一种令人不解的情况，就是客人来后，总是闭门密谈，连常太太也要回避。

根据上述迹象，精于事故的帐房先生终于肯定地宣布他的判断说：“此人不是秘密党人，就是一位政客！”他宣布这一判断的时间是5月4日。

三天以后，即5月7日，六国饭店发生了起惊人的凶杀案，常世古被刺身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5月6日深夜12点，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六国饭店住宿。值夜茶役照例要求登记，帐房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男青年自称姓周，名作人；女青年叫李慧珠。他们是一对夫妇，刚从天津搭乘第10次快车来到北平的。

茶役领他们住到楼上26号房间。次日上午8时，周作人来到帐房，提出要倒换房间。他说，26号房间的窗户外有一株大树，挡住了外面的阳光，室内光线太暗。

帐房先生打开居住登记簿看了看然后说：“既然周先生嫌26号房间光线太暗，就换一个房间吧。32号房间正好空着，就住32号吧。”

周作人连说数声“谢谢”，当即就移居于32号房间。

上午10点钟，一辆暗红色轿车停在六国饭店的门前，门卫出于职业习惯，记下了这辆“派克”轿车的车牌号：1951。

车内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体魄健壮，穿一件灰色华丝葛夹袍，手里提着两小篓水果，向楼内走去。

茶役迎上来客气地问：“先生是来看朋友的吧？请问，先要找谁？”

年轻人扬了扬手中提的水果篓，回答说：“我来拜访一位叫周作人的先生，是昨晚住到贵店的。你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里吗？”

茶役想了想回答说：“周先生住在楼上32号房间，上楼梯向左拐。”

年轻人说声“谢谢”，不慌不忙地向楼梯走去。

半小时后，年轻人和周作人夫妇说笑着走下楼梯。周作人向茶役关照地说：“我们要到前门大街的泰昌绸缎店去买点东西。如果有人来找我，请你转告客人，我下午不出去，专候大驾！”

三人出门后，一起乘坐着那辆暗红色的“派克”轿车急驶而去。

中午12时左右，暗红色的“派克”轿车又回到六国饭店门前。那个身穿灰色华丝葛夹袍的年轻人下车后，径直朝里走去。他见到那个茶役，只点了

点头，就算打过招呼。那茶役因知道他是周作人先生的朋友，以为他是来代周作人取什么东西的，也没有再盘问。

年轻人上楼后，并没有进 32 号房间，只是在走廊上徘徊。他低垂着头，眉心紧锁，似乎在想什么心事。住在 31 号房间的黄秀文发现他后，警惕地走到走廊问：“先生，你到此有何贵干？”

那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找住在 32 号房间的周先生。听茶役说他们夫妇出去了，我等他们回来。”

黄秀文“嗯”了一声，就又返回到 31 号房间。

其时，常世古刚刚进过午餐，常太太倒一盆热水让他洗脸。他从里间走到外间，站在窗前弯腰洗脸，正在走廊上徘徊的年轻人可好走到窗前。那年轻人停下来，倏忽间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支五吋“勃朗宁”手枪，对准常世古的头部猛开一枪。“啪”的一声响，子弹击中了常世古的下颏。

常世古经验丰富，中弹后立刻转身向里间躲去。就在这眨眼的工夫间，年轻人身手敏捷地又打出第二枪，子弹击中常世古的腰部，常世古应声倒在地上……

常太太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等清醒过来，看到她的丈夫躺在血泊中，才不顾一切地惊呼起来：“来人哪，有刺客！……”

年轻人见常世古被击倒，立刻转身向楼下逃去。在楼梯上，他与闻讯来的 5 名茶役相遇。他立刻收住脚，拔枪在手，枪口对准 5 名茶役，厉声喝道：“下去！”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谁不害怕呢！5 名茶役立即转身逃下楼去，躲入了帐房。

年轻人持枪在手，从容不迫地走出六国饭店，立刻钻入停在门口的那辆 1951 号“派克”轿车，向南急驶而去，眨眼间便不见踪影。

六国饭店经过短暂的沉默后，很快混乱起来，客人们到处乱跑，询问为什么响枪，发生了什么事？茶役们见杀了人，早吓得了失去了主见，都问帐房先生该怎么办。帐房先生也被吓瘫了，过了好一阵才说：“你们还呆着干什么？快去报案呀！……”

东交民巷巡捕房接到六国饭店报案的电话，一面派出巡捕到六国饭店保护现场，缉捕凶手，一面急忙在电话里向巡捕局长赫得麟报告。赫得麟听到报告后，立即通知北平市公安局以及内一区警察署，要求派人会同巡捕局，前往六国饭店勘察现场。

在六国饭店楼上的 30 号房间，被刺人常世古已由两名茶役抬到里间的床上，伤口也临时用白布包扎好。躺在床上的常世古脸色苍白，双目无神，一边喘息着，一边对他的妻子说：“我……我怕是不行了……”

常太太闻言失声痛哭，嘴里不停地叫着：“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房门被推开，茶役引着巡捕局长赫得麟、内一区警察署长祝瑞麟和一批巡捕、警员走进 30 号房间。巡捕、警员们在外间和走廊上拍照、勘察，赫得麟和祝瑞麟来到里间看常世古。常太太止住哭，急忙给赫、祝让坐、递烟。

赫得麟是外国人。他细细打量着常世古的脸，用熟练的中国话问：“常先生，你看见是谁向你开的枪？”

常太太正要代常世古回答，刚张口就被常世古的话打断了。常世古不顾伤痛，抢着说：“我不是遇刺。我的伤是触了电……”

常太太怔一下，立即又附和着说：“是的，这里没什么人开枪，他刚才

是触了电才受伤的。”

祝瑞麟早年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有着极其丰富的破案经验。他听了常世古的话，以为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便立刻走上前去，伸手抓过常世古的手腕，用中、食指扣住脉门，测试常世古的神经是否正常。赫得麟也以为常世古的神经错乱了，伸手摸摸常世古的额头，又用手指翻开他的眼皮，观察他的瞳孔。

经初步验证，常世古虽然身负重伤，但神经是正常的。一个神经正常的人，明明遇刺，却又说谎，肯定其中有什么隐情。赫得麟、祝瑞麟交换一下眼色，然后退到走廊，交换意见。为了及时了解刺杀情况，最后提出一个方案，决定由赫得麟继续询问常世古；由祝瑞麟把常太太叫到走廊上询问。

赫、祝二人均是问案老手，自恃经验丰富，以为隔离讯问必然会成功。岂料询问一番，常氏夫妇口径完全一样，仍不承认遇刺，一口咬定是触电。经过说服、开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毫不见效。询问中，常世古伤口出血，昏厥过去，赫得麟只好指派茶役，将常世古送到一家德国医院挽救。常太太自然到医院护理丈夫，讯问不得不中止。

考虑到案情重大，害怕有人到医院继续杀害常世古，祝瑞麟特派出两名警察到医院去值班，不许任何外人接近常氏夫妇。

六国饭店是作案现场，巡捕、警察便在此展开了紧张的调查，一部分人在楼上 30 号房间继续勘察，一部分人则找帐房先生和茶役们谈话，了解情况。茶役们谈情况时，自然会提到黄秀文和与刺客有关的周作人夫妇。祝瑞麟派人分头去找这些人，谁知黄秀文在案发后就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周作人夫妇自上午 10 点钟出去后再没有回到饭店。打开周作人带来的皮箱，里面除了一堆旧报纸外，还有四块碎砖头，此外别无它物。

祝瑞麟认为此案扑朔迷离，内幕相当复杂，便打电话向北平军警当局报告，并发出命令，全城搜捕刺客黄秀文和周作人夫妇。

由于案件发生突然，情节复杂、奇特，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街谈巷议，各界人士都拭目以待，急切想知道凶手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在大白天杀人？因此，国民党北平市军警当局的首脑人物责令办案人员加速查究，随时汇报情况。

谁知祝瑞麟使尽浑身解数，所查案件却毫无进展。遇刺人始终不承认有人刺杀他，常太太也不提供任何的情况，只是推说，她是一个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要问什么就去问她的丈夫吧。一筹莫展之际，祝瑞麟突然于 5 月 8 日中午收到一份从报馆拍来的电报，揭开了这件刺杀案的内幕。电报全文如下

各报馆转全国同胞钧鉴：

汉奸张敬尧出身微贱，军阀残余。近更包藏祸心，阴谋建立华北伪国，受敌人 700 万元之接济，企图在平津暴动，作卖国之先驱，为虎作伥，数典忘宗。似此败类不除，实国家心之祸患，民族之玷污。故本团爰于本月七日手诛该贼于北平六国饭店，马到成功。今后更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扑灭一切无耻汉奸，进而与敌人作殊死战，还我河山，直指顾事耳。

专锄汉奸救国团敬启

五月八日

祝瑞麟看电报毕，直惊得目瞪口呆，不由自己问自己：“难道这个遇刺

的常世古真的就是 15 年前已臭名昭著的湖南大军阀张敬尧？”他思忖良久，觉得事关重大，必须和巡捕局长赫得麟商量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于是，他打电话给赫得麟。

赫得麟听到此消息，也大为震惊，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识别那个常世古是否真的是张敬尧，然后才能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两人在电话里商量着该怎样识别，想了好多的办法，但均欠妥，不宜采用。后来，祝瑞麟突然想到国民党北平军政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早年跟张敬尧打过交道，觉得请何应钦去见常世古，一定可以认出他到底是不是张敬尧。他把他的想法告诉赫得麟。赫得麟认为此办法最好，就同意了。于是，他对祝瑞麟说：“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何应钦那里就偏劳你去通融通融吧。”

祝瑞麟知道，像何应钦这样身份的人，请他去认人，显然有失身份，靠他这个小小的内一区警察署长出面，是非碰钉子不可的。因此，他立刻推辞说：“不，不，这个任务我无论如何完不成。要出面得劳您大驾。你们外国人面子大，还是由您出面为好。”

赫得麟想了想，觉得祝瑞麟所言有理，就答应说：“那好吧，我就去试试看。不行的话，咱们再另想办法。”

何应钦果然碍于外国人的面子，不好拒绝，勉强答应可以到医院看一下常世古。

这天中午 12 时 15 分，何应钦乘一辆黑色奥斯汀轿车，在十几辆摩托车的护卫下，来到那座德国医院。这里，由内一区警察署派出大批警察，设了道道岗哨，显得气氛相当紧张。

何应钦在赫得麟、祝瑞麟的陪同下，径直走进常世古所住的病房。来到床前，常世古正昏迷不醒，仰面躺在被窝里。何应钦仔细观察一阵后，便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朝病房外走去。赫、祝二人紧追其后，一直走到医院门口，也不敢问认得如何。当何应钦已经坐到车里，才用肯定的语气对赫、祝二人说：“没错，他就是张敬尧！”

有何应钦这句话，祝瑞麟心里有了底。他认为张敬尧既是日本汉奸，化名潜入北平搞暴动，就不能当一般的受害者去对待。因此，他立即下命封锁病房，不许任何人出入，并在病房内逮捕了张敬尧的夫人“常太太”，转交市公安局收押。在此同时，祝瑞麟又下令所有内一区的警察全部出动，捉拿汉奸黄秀文。

赫得麟对祝瑞麟的做法表示支持，也向所有巡捕下令，捉拿黄秀文。

黄秀文在张敬尧遇刺后，已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了，于是立即潜出六国饭店，藏在北平台基厂附近一家茶水店的楼上。晚上六时左右，他为自己面临的处境深感不安，正自一个人自斟自饮、借酒浇愁，突然发现几名巡捕推门而入。仓促间，他机警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枪，正要抵抗，不想一个巡捕快步抢上去，一举将他手中的枪打落。眨眼间，又有三名巡捕蜂拥而上，将他逮捕。

巡捕押了黄秀文，走出茶馆，叫来一人力车。黄秀文被推到车上，车夫拉着在前面走，四名巡捕紧紧跟在后面，直奔东交民巷巡捕房。黄秀文坐在车上，已经预感到，他被押到巡捕房，再没有好果子吃了，轻则要坐牢，重则还会有生命的危险。他十分清楚，他跟着张敬尧干了许多坏事，特别是此次来北平策划“平津暴动”，完全是一种卖国的行为，难怪“专除汉奸救国团”一连 7 次写信警告张敬尧。如果他和张敬尧的罪行一旦公布，就是国人

的唾沫也会把他们淹死。他越想越害怕，不由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四肢也开始颤抖。一种求生的欲望，迫使他想着如何逃脱眼前的厄运，能够化险为夷。正在这时人力车行到御河桥边。因此处是上坡路，车夫不得不减慢速度，缓慢地爬坡。黄秀文扭头看一眼跟在车后的四名巡捕，发现他们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话。倏忽间，他决定铤而走险，跳车逃走。这种想法刚刚在脑里闪现，他的身子已随之跃下人力车，向前急奔。

四名巡捕发现黄秀文跳车逃走，立刻奋力追赶，并鸣枪示警，要黄秀文立刻站住。此时的黄秀文什么也不顾了，一心想着逃命。他知道，只要逃过御河桥，就是日本军驻北平的营房，巡捕是不能冲进日本兵营抓人的。因此，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跳过御河桥，越过岗哨，闯入兵营。

四名巡捕眼睁睁看着黄秀文逃入了日本兵营，却无可奈何，只好悻悻然回到巡捕房，向赫得麟报告情况。

就在黄秀文逃入日本兵营的同时，张敬尧在德国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被暗刺的民国首任总理

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在国民党统治时用，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愤而辞职，寓居于上海法租界。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想尽千方百计对他拉拢利诱，让他投降日本，成立伪政权。为阻止他降日，戴笠组织军统特务几经周折，在情况尚未弄明，就把他暗杀了……

1938年9月30日上午9点钟，一辆“福特”牌轿车，悄无声息地从远处驶入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然后停在18号的门前。

18号是一座建筑高大雄伟，装饰十分豪华的公馆。这里，曾是贵客盈门，车马不绝的热闹去处。可是，随着上海的沦陷，这里突然变得异常冷落，往日的繁华已一去不复返了。

车门开处，四个店员打扮的人从容不迫地从车内出来，其中两人手里各捧一只看去年代久远的大花瓶，像是给这家公馆的主人送货来的。

一个白俄籍的门卫听到门铃敲响，打开大门，迎了出来。他们似乎是熟人，见面后亲热异常，有说有笑，毫不拘禁。

四个店员打扮的人带了花瓶，径直向公馆内走去。当他们快要走入门口，不约而同地回身巡视一周，好像是在看身后有没有可疑的人盯着他们。

四人进入公馆，门卫回身把大门紧紧关上。

公馆的建筑颇有气势，飞檐斗拱，碧瓦红墙，绝非一般富翁宅院可比。公馆的陈设布置也相当考究，院子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珍贵树木，令人耳目一新。客厅高大宽敞，布置高雅，墙上挂着不少名人字画，百宝柜里摆着各种奇珍异宝和高贵瓷器，散溢着浓浓的珠光宝气。由此，可以看出，这家公馆的主人不仅富有，而且有极高的文化素养。

在门卫的通报下，保镖入内去请主人。

很快，从后面走来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由两名佣人搀扶着。他老则老矣，但仍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气度不凡，一副达官贵人的气势。

四个店员打扮的人见主人出来，急忙施礼，殷勤地连连称主人为“老太爷”，并把他们带来的大花瓶呈送到“老太爷”的面前，请他鉴看。

“老太爷”见到花瓶，立刻笑逐颜开，伸手接过一只古花瓶，饶有兴致地鉴赏起来。

可以看出，他对他手里捧着古花瓶十分欣赏，爱不释手，以致连向客人让座都忘了。

站在一旁的保镖，见主客间气氛融洽，就放心地离开客厅，到外面去了。

这位“老太爷”是谁呢？原来他就是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绍仪原是清末和北洋政府的官员。1874年，他曾受大清政府的派遣，赴美国留学，回国后于1885年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后来又朝朝鲜办理税务。由于他工作能力很强，又是办理外交公务的能吏，因此深受手握朝廷大权的袁世凯的赏识和器重。在袁世凯的举荐下，他历任天津海关道台、外交部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大总统袁世凯便任命他出任首任内阁总理，并加入同盟会。

他虽然受到袁世凯的提携和重用，但他与袁世凯也是有矛盾的。特别是对袁世凯的内阁副署权不满，以致到后来愤而离职，寓居上海。此后，他又复出，出任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1919年，他代表南方军政府，北上与北京政府代表谈判议和。“九·一八”事变后，他二次复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但他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觉得很难合作下去，就又离职到上海闲居。唐绍仪一生最大的嗜好是喜欢收藏古玩。离职寓居后，他无官一身轻，手中又不缺钱，便经常光顾上海的一些古董商店，每遇他喜欢的古玩，就了无吝色地买了，拿回家中赏玩。上海沦陷，不少富翁和达官显贵在逃离上海时，为了行动方便，就不惜把家中收藏的很值钱的古玩统统廉价出售，从而使古董玩物的价格暴跌。趁此机会，唐绍仪便大量购进古玩，收获颇丰。前不久，他到一家古玩店中闲逛，忽然发现这家古玩店陈放着一对古花瓶，顿生爱惜之情，便想购买。因当时古玩价格还没有下跌，店主要价太高，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只好空手而归。可是，过了不几天，这家古玩店老板竟忽然派两名店员，抱着他看中的那两只古花瓶送上门来，求他把这一对古花瓶买下。提到价钱，店员说老板吩咐过，不必再争，就按唐绍仪原来说的价钱办。在此情况下，唐绍仪没有往深里想，研究为什么古玩店老板仅过几天，就一切依他，把一对十分珍贵的花瓶卖给他。他想到的只是觉得混乱期间，没有什么人愿意花钱买古董，店里业务萧条，店主才不得不降低价格把古花瓶卖给他。一切讲好后，唐绍仪便要把古花瓶留下，可送货的店员不肯。其中一个说：“我们老板吩咐过，等老太爷把货款准备好了，他会再派从把货送到府上的。”

唐绍仪觉得店主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对，就答应说：“那好吧，你们先把货带回去吧。”稍停片刻，他又问：“那么，什么时候再把货送来呢？”

一个店员回答说：“9月30日如何？”

唐绍仪点点头，表示同意。

今天坐“福特”牌轿车来唐公馆的四名店员打扮的人，就是按约定时间来给唐绍仪送货的。

唐绍仪听到报告，心里自然高兴，暗暗称赞店主是守信用的人。然而，他连一点也没有觉察到，这一举动包涵着一个罪恶的阴谋，有人故意设下圈套，引诱他上勾，将在几分钟后置他于死地。

唐绍仪由佣人搀扶着，向客厅走来。

在他还没有进门前，客厅里的一位客人手疾眼快地从桌子上的烟盘里，把两盒火柴悄悄拿走，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并向他的三个同伴挤挤眼。3个同伴立刻明白了他偷走火柴的用心，不约而同地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唐绍仪走入客厅，让佣人给客人们点烟。他扭头见烟盘里没有火柴，就吩咐佣人快去取火柴来。

佣人答应着转身走了。此时，客厅里除了四位送货的客人外，只剩下唐绍仪一个人了。他专心致志地欣赏着放在几案上的刚刚给他送来的古花瓶。他看得那样专注，那样认真，在他的心目中，此时此刻除了那对色泽鲜艳、造型美观、质地精良的古花瓶外，什么也没有了。

就在这眨眼的工夫内，四个彬彬有礼的送货客人，突然面露凶色。其中一个人左右环顾一周，见客厅里没有任何动静，便闪身走到另一个古花瓶前，用闪电般的速度，伸手从瓶内抽出一把利斧。他的动作轻快敏捷，连一点响声也没有弄出来。

唐绍仪仍沉溺于欣赏古花瓶之中。

手持利斧的人倏忽间又闪身转到唐绍仪的背后，毫不犹豫地用双手举起利斧，猛地冲唐绍仪的后颈砍去。只见寒光一闪，随之传来“噗”的一声响，从唐绍仪的后颈立刻喷出一股鲜血。

唐绍仪连喊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倒在脚下的地毯上……

四个刺客见唐绍仪不行了，就立刻撤退，离开现场。当他们走出客厅，取火柴的佣人正好赶到，离客厅只有十几步了。其中3人扬长而去，留下一个人煞有介事地冲着客厅深深鞠一躬，并十分客气地说：“老太爷留步，不必相送了……”说毕，又轻轻把客厅的门带上。

这时，取火柴的佣人已走到这人跟前。这人用十分友好的态度迎了上去，微笑着对佣人说：“老太爷请我们再去取几个花瓶。他老人家一定要亲自对比一下，然后再定买哪个。我们去去就来，你就别送我了……”

他说“别送我了”，正是有意提醒佣人应该送送他才不失礼貌。

佣人在唐公馆当差多年，每天都干着迎来送往的事，自然一听就明白对方的意思，于是立刻说：“你们是贵客，岂有不送之礼！”

这人张开手作出阻拦的样子说：“千万别客气，我们一会儿还会来的。”

佣人也不再坚持，就原地站着不动，目送这四个人离去，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公馆门口，他才向客厅走去。

唐公馆的门外，停着一辆小汽车，马达一直突突地响着，没有熄火。当四个刺客走出大门，快速钻入车内，这辆小汽车便像飞一样向远方驰去……

佣人推门走入客厅，一眼看到唐绍仪倒在血泊中。他大吃一惊，便不顾一切地冲门外呼喊：“有刺客，快抓刺客呀！一直站在客厅外的白俄保镖，听到佣人的惊呼声，才如梦方醒，意识到刺客就是刚刚走出唐公馆的那四个人。他立刻从腰间拔出枪来，飞快地追出大门。可是，当他来到大门外，那辆小汽车已走出一大截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对准那辆小汽车开了枪。连连几枪，但因距离太远，一枪也没有打中，小汽车终于跑掉了。但他经验丰富，忙中不乱，记下了这辆小汽车的车牌号。

回到公馆内，保镖立即向法租界巡捕房报了案。巡捕房接到报案电话后，随即派出几辆装甲车，分几路去追捕那辆小汽车。最后，在一个路口找到了那辆小汽车，遗憾的是车内空空，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四名刺客早逃之夭夭。在佣人刚入客厅时，唐绍仪还没有昏死过去，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公馆里的人听到佣人的呼喊声，都涌向客厅，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当他们进门后，看到唐绍仪倒在血泊中，便一切都明白了，也不再问情况，救人要紧，就手忙脚乱地把唐绍仪抬上汽车，送到附近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

医院全力以赴投入抢救工作，可是唐绍仪的伤太重了，怎么也抢救不过来，他终于在下午4点气绝身亡。

唐绍仪被刺，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各界人士无不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唐绍仪是为什么被刺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点一滴露出的有关消息得以联辍，才使这个疑团消解。

事情还得从抗战初期谈起。

1937年，震惊中外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中国军队在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支持下，以自己低劣的装备和血肉之躯，英勇抗击了日本军队的入侵，打死打伤日军4万多人。日本人曾狂妄地宣称，要在一个月内占领上海，3个月内占领中国。可是，“八·一三”淞沪一战就打了三个月。战争进行到11月初，日本军队乘金山卫一带中国军队防守薄弱之隙，突然偷袭登陆。这样，使中国军队立刻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由主动变为被动。为了保存抗战力量，中国军队遂于11月8日撤出上海，退往南京。日军占领上海

后，贪得无厌，又挥师进攻南京。南京也相继失守，沦于敌手。

日本毕竟是弹丸小国，当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后，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统治大片中国地盘的。为此他们开始考虑在南京建立傀儡政权，利用中国人的败类为他们效力，作他们的帮凶。

当时，华北已建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但这一临时政府因成立匆忙，而且是地方性质的伪政权，加之这个伪政权中的成员都声名狼籍，不得人心，靠他们很难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靠他们更不能在全国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日本方面早在淞沪抗战发生前，就开始密谋、策划，决定很快物色一个既能为他们所用，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定威望的人站出来，在南京建立一个伪中央政府，以便达到他们长久统治中国之目的。

经过长时间的选择，他们在众多的人选中，瞄准了两个人：一个是北方的吴佩孚，一个是南方的唐绍仪。

有了人选后，日本方面就着手做拉拢这两个人的工作。

他们首先派人找到吴佩孚，进行了试探。不料吴佩孚不买日本人的帐，根本无意与日本人合作。吴佩孚不干，日本方面就又去找唐绍仪。

在日本人看来，唐绍仪当年备受重用，是显赫一时的人物，而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同，有过某些不愉快，不得不到上海法租界寓居。似此境遇，唐绍仪一定有怀才不遇和不甘寂寞之感，日本方面扶他出来当伪南京政府总统，他很可能不会拒绝。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就把拉拢工作的重点放在唐绍仪的身上。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前，留居上海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和许多地方上有钱的人，已预料到上海不保，就提前纷纷离开上海，跑到香港去定居。

因当时日本尚未与盟国宣战，香港是英国人统治的地方，相对比内地要安全得多。

当时，唐绍仪的一些亲戚朋友，也劝他及早离开上海，免受战争之苦。唐绍仪口头上也答应要离开上海，但却迟迟不动。不动也罢，可他偏偏又出人意料地，趁大部分有钱人离开上海之机，在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购进了法租界内一套相当豪华的花园洋房。他的这一举动，在早已瞄上他的日本人看来，他是不准备离开上海的，而是另有想法的。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唐公馆进行试探。

唐绍仪是政坛老手，几起几落，经见的事太多太多了，因而变得深沉、老练、城府极深。日本人上门找他，他一眼就看出了日本人的意图，因而当日本人以言相探时，他佯装听不懂，不是顾而言他，就是哼哼哈哈，把自己的内心想法包得严严实实，不露一丝半毫，让日本人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他的意向。

一直拖到 1938 年的 3 月底，日本政府急于稳定沦陷区的人，仓促间又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一帮汉奸，成立了新的傀儡政权——南京维新政府。

5 月 19 日，徐州失陷，日本人一方面积极策划，准备集结强大的兵力，打通津浦线，斩断陇海线，在夺取郑州后，进而一举攻克武汉；另一方面，则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收买和拉拢。

一向门可罗雀的福开森路 18 号唐公馆的门前，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会儿拙井专使来访，一会儿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楠本登门，一会儿日本特务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等也来面谈机宜。而唐绍仪在日本人面前持什么态度，有何承诺，外界人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人加紧收买、拉拢唐绍仪的情报，很快就传到了迁居陪都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那里去了。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唐绍仪经不住日本人的利诱和威胁，变节投降，投入日本人的怀抱，于是也采取紧急措施，派人做唐绍仪的工作，千方百计地劝说他不可一时糊涂，误上贼船，铸成千古大错。

国民党政府首先派遣唐绍仪的女婿诸昌年和唐绍仪的旧友罗家衡等人专程赴沪，负责劝说唐绍仪。在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通过已经从上海逃到香港定居的青帮头目杜月笙，写信给唐绍仪，劝唐绍仪下决心离开上海，赴香港居住。

唐绍仪有一个亲戚叫谢志磐，是军统上海特区的情报员，他的哥哥是军统特务。因他与唐绍仪是亲戚关系，去过几次唐绍仪的家里，所以对唐绍仪家里的情况比别人要了解得多。

军统局长戴笠对上海沦陷后的一些遗老遗少和知名人士的动向十分关注，当然也关注唐绍仪。他多次把谢志磐叫去询问唐绍仪的情况。谢志磐不敢隐瞒，如实把日本人加紧收买、拉拢唐绍仪的情况汇报给戴笠。他还告诉戴笠，说日本人是想让唐绍仪出任伪国民党政府的最高职务。

戴笠了解情况后，为了阻止唐绍仪投敌变节，就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对唐绍仪的活动进行严密监视，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周伟龙为了讨好戴笠，便责成谢志磐负责监视唐绍仪的行动，并三天两头找谢志磐索要有关唐绍仪的情报。

本来，唐绍仪家里并没有多少新情况出现，所以谢志磐也不可能有多少情报向周伟龙报告。可是周伟龙逼得很紧，谢志磐为了交账，只好瞎编一些情报以作搪塞。

周伟龙立功心切，不仅对谢志磐胡编滥制的假情况不作分析研究，全部信以为真，而且连他自己也添油加醋，把假情报报给了他的主子戴笠。

戴笠听了周伟龙的汇报，误以为唐绍仪在日本人拉拢下，已经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即将出面组织伪政府。他和他的下属周伟龙的心态完全一样，也急于在蒋介石那里显示一下他的能力，就把他所接受的汇报情况又夸大其辞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到此，情况越说越玄，问题越编越严重，已经完全不符合实际了。

向蒋介石汇报后，戴笠便开始密谋策划，准备暗杀唐绍仪。他最初策划的暗杀方案是，趁唐绍仪有事外出时，派特务在街上用枪把唐绍仪击毙。后来考虑到上海沦陷后，法租界街头的难民很多，在街上公然开枪，有可能会伤及难民，因而这一暗杀方案被推翻。此后又几经密谋，戴笠还是认为利用谢志磐与唐绍仪的亲戚关系，打入唐公馆，将唐绍仪杀死为好。

在这一暗杀计划还未付诸行动前，特务们又得到可靠情报，得知唐绍仪为人十分谨慎，一般情况不轻易出门。就是在他的公馆里，除了法租界巡捕房派去的门卫外，他在家还雇了几个膀宽腰圆的白俄保镖。这一情报的获得，又动摇了他们派谢志磐在唐公馆刺杀唐绍仪的决心，他们认为谢志磐是很难接近唐绍仪的，暗杀计划很可能流产。

后来，特务们又得到情报，知道唐绍仪很喜欢收藏古玩。上海区区长周伟龙终于由此想出一个刺杀唐绍仪的办法，决定派特务们化装成古董店的伙计，将古董带进唐绍仪的公馆，趁唐绍仪赏看古董之机将唐杀死。不过周伟龙又考虑到，他的这个暗杀计划执行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他考虑到唐公馆地处戒备森严的法租界，在那里是不能开枪杀死唐绍仪的，只能用利器杀死他。

如果是开枪，立刻就会招来法租界的巡捕，将他们的暗杀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军统局就得承受舆论的谴责。如果用利器暗杀，可以避免暴露，但所派刺客必须要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难度虽大，但周伟龙别无他法，还是决定如期行事。于是，他精心选拔杀手，最后终于选定上海行动组长赵理君。

赵理君是黄浦第四届毕业生，他不仅效忠于蒋介石、戴笠，而行动敏捷，心狠手毒，曾执行好多暗杀任务，甚至还执行过几起高难度的暗杀任务，是从事暗杀的老手。爱国人士杨杏佛和史量才的暗杀行动，都有他参与过，故颇受蒋介石和戴笠的赏识，在军统里也是备受重用的人物。

赵理君接受任务后，首先详细考察了唐绍仪家里的情况，然后与周伟龙商量，由他和一名叫陈阿大的特务扮作古董店的伙计，各持一只古花瓶，在其中一只古花瓶中放置一把利斧，在谢志磐和一个同他常去唐公馆的特务带领下，一起到唐公馆执行任务。于是乎，便发生了如前所述的暗杀唐绍仪的事件。

唐绍仪被刺，不仅使日本人感到震惊，就是连国民党政府中的好多人也感到震惊。蒋介石获悉唐绍仪被刺，也甚觉不妥，责怪戴笠作事太鲁莽了，不该在手中还没有拿到唐绍仪确实已经同日本人合作的铁凿证据，就把唐绍仪杀死了。

唐绍仪之死，一些国民党元老忿忿不平，对蒋介石不依不饶。特别是和唐绍仪关系甚密的于右任、张继等人，已猜出此事很可能是军统的人干的，就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迫蒋介石对唐绍仪之死有个“说法”，并缉查刺杀唐绍仪的凶手。

在此情况下，戴笠不得不作出一种姿态，明里下了一道通缉令，而暗中并不认真去追查凶手，赵理君等人已逃到重庆，逍遥法外。此案就此不了了之。

蒋介石为了安抚那些国民党元老，便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唐绍仪的家里人发去一份虚情假意的唁电，对唐绍仪的死表示“沉痛哀悼”。此外，他还通过国民党政府，发给唐家 5000 元的治丧费。

宋子文和日本公使被暗杀的幕后细节

国民党内的“南京派”和“广州派”翻脸，“广州派”责成“铁血除奸团”暗杀宋子文。日本军欲在中国挑起事端，创造侵华借口，决定暗刺日本驻华公使。两件事巧合于一体，上演了一场错位暗杀事件。事件内情直到抗战结束后才暴露……

1931年7月24日，上海《申报》在显著位置登出一则骇人听闻的消息：

财政部长宋子文偕机要秘书唐腴及卫士六人，昨晨7时由京乘快车抵沪。宋等下车后步出月台，方入该大厅，过问讯处，在候车室门前，突有暴徒多名抽出手榴弹、盒子枪、手枪向宋猛射。宋之卫士亦拔枪还击，一时子弹横飞，烟雾弥漫，北站大厅变成战场。当时正值旅客出站，闻声后四散惊走，秩序大乱。结果宋氏以身幸免，秘书唐腴则身中三弹于昨日11时30分因伤重殒命。

这则消息发表后，朝野震惊，人们都急于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起谋杀事件？凶手到底是谁？可在当时，除了局内知情者外，局外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弄清这些问题的。就是时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件事的缘由亦仍鲜为人知。

在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的“中原大战”，决定了中国的政权归于蒋氏之手的趋势。蒋介石战败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联军后，便踌躇满志，急不可待地张罗着召开“国民会议”，制订“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以此集中央大权于一身，进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

国民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是从未停止过的，只是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大敌当前，不得不把窝里的矛盾掩盖起来，实行暂时的联合。

一场大战结束，长期积累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重新暴露出来。这些矛盾，尽管多种多样，但集中的表现是以南京为中心的一派与以广州为中心的一派的权力之争。这种斗争，随着筹备“国民会议”和制订“训政时期约法”的进行，便以“约法之争”的形式激烈地爆发了。

1930年11月12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召开“国民会议”案。在这次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参会者都慑于蒋氏的威势，不敢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惟独属于粤派的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却愤而挺身，言辞激烈地抨击蒋介石控制约法，实行独裁的险恶用心。由此，蒋、胡间矛盾公开化、激烈化。

蒋介石视胡汉民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31年2月28日，他以“宴请议事”为借口，把胡汉民骗到他的官邸，乘机派人将胡汉民扣押，软禁于汤山。

这一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而是进一步激化了两派间的矛盾，导致国民党内发生了一次大分裂，进而掀起了反蒋的浪潮。

孙科是粤派的最活跃的人物，在这场斗争中，他左右出击，四处串联，动员胡汉民的“再造派”，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唐生智、唐绍仪、李烈钧、陈友仁等人到了广州，成立了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唱开了对台戏。

蒋介石为了威胁广州政府，扬言要杀胡汉民。这一消息传来，可把胡汉民的亲家林焕庭急坏了，便急忙想办法营救胡汉民。

如何才能救胡汉民不死呢？林焕庭苦思冥想，觉得唯一可救胡汉民的办

法，是派人把蒋介石暗杀掉。于是他邀了李少川，帮他暗中疏通王亚樵，动员王亚樵去南京干掉“草头先生（蒋介石）”。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政敌，早在北伐时两人就闹翻了脸，险乎遭到蒋介石的暗算。他曾扬言，刺杀蒋介石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不杀掉蒋介石死不瞑目。这就是林焕庭选中他去刺杀蒋介石的原因。在李少川与王亚樵暗中谋划刺杀蒋介石的时候，孙科获此消息，感到此举正合他的心意，如果真能置蒋氏于死地，南京政府“断梁”，广州政府即可取而代之。于是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暗中馈赠王亚樵 20 万元，作为执行此项任务的经费和酬谢。在此情况下，王亚樵二话没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立即制订暗杀计划，并付诸行动。蒋介石的活动轨迹，无非是从南京到庐山，从庐山到南京。因此，王亚樵在南京和庐山两地都派出侦探，侦察蒋介石的行踪。他派往南京执行任务的“铁血锄奸团”的核心人物南京行动组组长郑抱真；派往庐山执行任务的是华克之。此二人均是王亚樵手下的得力干将。郑抱真到南京后，很快就探知，蒋介石已乘军舰去了庐山，下榻于太工峰别墅。于是，他立刻赶到上海，向王亚樵把蒋介石的行踪作了汇报。

王亚樵听毕郑抱真的汇报，立刻将此情况转告已上庐山的华克之。接着，他买来一只火腿，将火腿内部挖空，塞入两支“三号花口”手枪及 12 粒子弹，再把口子封好，派他的妻子王亚瑛、表弟媳妇刘小莲，以上庐山旅游为名，把夹有手枪、子弹的火腿送到华克之手中。

王亚瑛、刘小莲到庐山后，从火腿中把手枪和子弹取出来，以极其慎密的行动，埋在太工峰前的竹林中。但她们在埋完手枪、子弹后，却乐而忘忧，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把火腿丢在了附近，没有处理掉。

蒋介石侍从室的侦探在巡逻中，偶尔发现了火腿，引起了惊觉。他们认真研究了这只火腿，初步判定，有人带武器上了山。因而，侍从们加倍警惕，以防有人暗杀蒋介石。

一天，蒋介石到竹林中散步。

这时，华克之已派出杀手陈成埋伏在附近。陈成看到蒋介石出现在竹林中，便迅速从土里扒出埋着的手枪，并准备把子弹射向蒋介石。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侍从们发现远处有人举枪，就突然把蒋介石围起来，并簇拥着转身逃走。

陈成觉得机会难得，不愿就此罢休，就急忙扣动扳机，连连向蒋介石开了两枪。也许蒋介石命不该死，这两枪都打偏了，连蒋介石的一点皮肉都没有伤。倒是侍从们返身一齐开枪，把陈成击毙了。

暗杀败露，华克之只好收兵下山，回到了上海。从此，蒋介石百倍警惕，加强了戒备，再要行刺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此举只好就此打住。

在执行刺杀蒋介石的同时，两广的反蒋势力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分袭湘、赣，占领柳州、衡阳，还以 50 万元巨款收买了石友三，在北方进攻张学良，阻止张学良援蒋。以孙科为首的反蒋派都翘首以待，盼望着刺蒋的好消息传来。可是，等了好久，却什么消息也没有等到，孙科只好派与王亚樵私交较深的中监委萧佛成、马超俊前往上海联系。萧、马出发前，孙科又送上四万元，带给王亚樵。

萧佛成、马超俊到了上海，了解情况后，心有不甘，便又商讨对策，最后决定改刺蒋为刺宋子文，来个杀鸡儆猴。

宋子文不仅与蒋氏有裙带关系，而且任南京政府行政院财政部长兼外交

委员，掌握着蒋氏政权的财政命脉。如果刺宋得手，即可断绝蒋介石的财源，逼他下台。王亚樵等人认为，刺宋要比刺蒋容易得多。宋子文经常来往于沪宁，警卫也不严，可乘之机是很多的。

王亚樵接受新的任务后，很快就上海大华公寓召开了骨干会议，制订了刺宋计划，并作了秘密布置。郑抱真理所当然是执行这一任务的急先锋。他首先指挥南京行动组，住进了仙鹤街余立奎的家。余立奎是广州政府委任的第17军的军长。上海行动组则由王亚樵亲自指挥，租下了上海北站附近，天月路的一幢三层楼房，作为侦探据点。

宋子文的家住在上海西摩路141号。他每逢星期五，即自宁返沪，在家里一直住到下周一，才去宁办公。对他的这一行动规律，郑抱真已探听得一清二楚。所以，把行刺他的地点选在上海北站。至于行刺时机，郑抱真认为最佳时机，莫过于旅客上下车时。“因为此时人多且杂，秩序很乱，如浑水摸鱼。但行动时必须施放烟雾弹，才能保证刺宋的杀手安全撤退，不留下任何后遗症。于是，郑抱真着手解决烟雾弹一事。

郑抱真是“和平米店”的经理。这座米店座落在上海八仙桥一带，是王亚樵花一万八千元经费买的，专营淮北船帮贩运到上海的大米，赚了钱作“铁血除奸团”的活动经费。

郑抱真手下有几名伙计，其中有一个绰号叫“小泥鳅”的，很是机敏能干，他已打入虹口清安帮中，还结交了日本浪人。郑抱真就把购买烟雾弹的任务交给他。

“小泥鳅”为此去找安洁帮大首领常玉清帮忙。常玉清委托他的一个徒弟帮他去找日本浪人，结果用800元买到一枚秘制的烟雾弹。

“小泥鳅”购买烟雾弹时，发现还有两枚。

他用话相套，得这两枚烟雾弹是日本“魔法军人”田中隆吉定做的，是在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时用的。所雇杀手就是安洁帮大首领常玉清。

田中隆吉为什么要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呢？这里牵涉到一个庞大的罪恶阴谋。

1931年春，日本军国主义长久炮制的侵占“满蒙”的计划业已确定，进军侵略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和《1931年度形势判断》已下达，发动事变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但日本军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顾虑无法排除，使这一行动无法立即进行。其顾虑是：在东北、华北的中国军队，数量远远超过了日本的军队，偌大的“满洲”在短期内如果吃不掉，那么中国其它的军队很可能驰援。这样，日本军队就会陷于被消灭的绝境。

为此，日本军方几经讨论，认为最好在实施侵占“满蒙”计划前，能在中国的关内挑起一场事端，使中国军队不能拔足北上。因此，军方派号称“魔法军人”的田中隆吉由华北到上海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军方给他的任务是挑起一场“假战争”，策应日军部在满洲的行动。在此同时，军方派土肥原贤二去华北，拉军阀石友三以武力反对张学良，绊住张学良的双腿，使之不能回防东北。

田中隆吉来到上海，通过军中反华好战派军官骨干组织“樱会”，要来了军中青年军官暗杀组织“天剑党”的宪兵大尉重蔚千春作助手，带领反华帮会“太平洋军团”和“在华青年同志会”秘密策划，拟在上海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栽赃于中国，从而挑起军事冲突。

田中吉隆把暗杀对象选为重光葵，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

杀死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份量太轻，不足以引起大的震动，难以在日本朝野激起反华、仇华的怒潮；二是重光葵一直坚持执行“中原外交”路线，主张以经济渗透为主要方式，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利益，反对使用武力侵略中国，反对田中隆吉策划阴谋，在中国关内挑起事端，因而成为田中隆吉推行侵占“满蒙”计划的严重障碍。

重光葵的前往佐分利员量亦是因执行“印原外交”路线，而被日本军部派人暗杀的。现在又轮到了重光葵，作佐分利员量第二了。

郑抱真搞到烟雾弹后，很快就转给了王亚樵，他本人就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在南京，他收买了国民政府财政部的一名主办会计。因为这个主办会计每天都要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宋子文凡是出门都要跟他打招呼，他可以及时准确地提供情报，掌握宋子文的行踪。

7月22日，宋子文对这个主办会计说：“我接到青岛打来的电报，说我母亲病得厉害。我准备今晚回上海打点一下，然后就到青岛看我母亲。”

这一情况，主办会计很快就报告给了郑抱真。

郑抱真得到报告，认为这是暗杀宋子文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就立刻密电王亚樵：“康叔准于22日晚乘快车去沪，23日到北站，望迎接勿误。”

郑抱真刚刚拍完密电，突然有人报告，说“小泥鳅”从上海赶来，有急事汇报。

他立刻约见“小泥鳅”问有什么急事汇报。

“小泥鳅”说：“我在购买烟雾弹时，探听到田中吉隆已收买了安洁帮的大首领常玉清，准备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于‘铁血除奸团’，以便由此在上海挑起一场战争。”他还告诉郑抱真，他已了解到常玉清也获得了宋子文23日到上海的准确情报，准备届时趁宋子文和重光葵同时走出贵宾门时动手行刺。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向读者讲清：一是日本人为什么选常玉清充当杀手；二是为什么宋子文和重光葵同时到达上海北站。常玉清是大连人，早年只是南满铁路上的一个理发匠，靠给工人们理发度日。1927年，他开始闯入大上海，投靠了上海青帮龙头杜月笙，在杜公馆当了一名走卒。后来，他因经营“大观园”浴室起家，不仅当了老板，而且组织了“安洁帮”，并作了帮首。再后来，他暗中投靠了日本人，凭着日本人的势力，权势增加，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完全可以和他的故主杜月笙分庭抗礼了。既然他卖身投靠了日本人，而且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效命，田中隆吉当然有理由选中他去暗杀日本公使重光葵。

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基地是上海总领事馆。他也和宋子文一样，每周五就回到上海，下周一才返回南京办公，来往于沪宁的时间基本和宋子文一样。他和宋子文的私交很不错，来往也很频繁，所以来往于沪宁时，常常同乘一列挂在尾部的花车。这就是说宋子文和重光葵同时到达上海北站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性的，有规律的。

田中隆吉刺杀重光葵的整体计划是：行刺得手后，立即施放烟雾弹，掩护常玉清撤退。撤退时，把写有“斧头党”（铁血锄奸团的前身）字样的未响炸弹及武器丢弃在现场，作为栽赃王亚樵的罪证，中国必须承担制造事端的责任。这样，日本军部即可效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萨拉热窝事件，名正言顺地向中国兴师问罪了。

郑抱真听过“小泥鳅”的汇报，深感事态严重。他认为，明天王亚樵刺杀宋子文，常玉清刺杀重光葵，到时此二人必死无疑。可以预见，王亚樵正

好为常玉清作掩护，到头来，日本即可轻而易举地把一切责任推到“铁血锄奸团”的身上。其结果，必然引起中日冲突，王亚樵和“铁血锄奸团”就成了永远洗刷不清的罪魁祸首和民族罪人了。

华克之也为此着急，主张立刻向上海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有变，要王亚樵立即停止刺宋行动。可是仔细研究，又觉得这样做已为时太晚。再说，这么复杂的情况，电文很难说清，话说得太白，又要冒泄密的风险。于是，他的主张被否定。

实在无计可施了，郑抱真毅然做出决定：由他和华克之一起搭乘当晚宋子文、重光葵到上海的快车，赶到上海，抢在宋子文、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发出警报，用以制止宋子文、重光葵走出车厢，破坏常玉清刺杀重光葵的计划。至于王亚樵，他们预料，情况突变，为了慎重起见，也会相应作出反映，停止刺杀宋子文的行动的。

郑抱真想出的这一招，无疑是一个勇敢而有效的紧急措施，华克之只好同意，并配合行动。

23日凌晨，王亚樵暗杀宋子文的行动已全部布署就绪。他将手下的人分作三个小组：第一组由孙凤鸣带领7人守月台；第二组由龚春蒲率领守在候车室；第三组由谢文达率领，把守车站外的天月路一带。王亚樵将届时亲临现场指挥。所有人员均以旅客打扮，设成三道狙击线，等待行动。

在此同时，常玉清也亲率他的门徒来北站部署。他把他的主要力量布置在贵宾室门前和出口处。他还安排两名小喽罗以擦皮鞋为幌子，监视列车到站情况；安排另外两名小喽罗化装成旅店侍者的样子，混在旅客中间，按信号行事。此外，他还在马路边沿铁栅栏处藏匿两个人专施栽赃活计。他吩咐他们，一旦暗杀得手，便把准备好的包丢到现场。在这个包里，包了一颗手榴弹和一张写着“斧头党专炸日本人”的纸条。

双方都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布置人马。常玉清根本不知道王亚樵此时也在北站布置人马，更不知郑抱真采取的“紧急措施”。于是乎，一场密谋策划的刺杀混战，在不知不觉的错位中加紧活动，等着开场。

重光葵和宋子文乘坐的车厢，是一节挂在列车尾部的“花车”。重光葵带着两名使馆的书记官；宋子文带着6名贴身卫士和他的机要秘书唐腴庐。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走到半路也许累了，就都睡觉了。

重光葵每次回沪，都是睡到过了真如站后，才由列车员唤醒，准备下车。可是今天，列车员鬼使神差地看错了站，提前就把他叫醒了。他醒来后就睡不着了，气得大发脾气，骂列车员搅了他的好梦。

每次车到北站，重光葵都是与宋子文相偕下车的。可今天，他因列车员惊了他的觉，装着一肚子气，火车刚刚停稳，连向宋子文招呼也没有打一声，就气呼呼地下了火车，随着人群走出车站，上了汽车。

宋子文见重光葵火气这么大，觉得人家是客人，心里很是过意不去，没有等旅客走完，就匆匆下车，追了出去。他的贴身卫士和秘书也尾随而行。

这时，守在车厢里的郑抱真、华克之看到宋子文已走出站口，眼看就要进入常玉清设下的埋伏圈，心急如焚，便不顾一切地跳出车厢，然后对空连鸣数枪，以示报警。

宋子文的卫士听见有人开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拔枪还击。王亚樵的人看到郑抱真鸣枪，以为是发出信号，让他们支援他，便不问青红皂白，就向卫士们开枪。一时间，上海北站内外枪声大作，子弹

横飞，把旅客们惊得抱头乱跑，纷纷逃命。

这时，重光葵的汽车仍停在站上，一颗子弹射来，从车顶掠了过去，留下一声尖厉的响声。他为了逃命，立刻命令司机开车，飞也似的跑了。

宋子文和他的秘书唐腴胥早被眼前的局面吓呆了，站在贵宾室门口不知该进，还是该退。

常玉清一伙也给弄懵了，不知该怎么下手。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宋子文就站在出口处。他们错把站在宋子文身边的唐腴胥认作重光葵，就立刻发出“目标已到达”的信号。

常门刺客们见到信号，就立即集中向与宋子文并肩站着的身穿夏布长衫、手提黑色大公文包的目标射击。

唐腴胥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

常玉清见“目标”被击中，任务已经完成，便招呼他的一伙人迅速撤退了。

王亚樵手下的孙凤鸣，误以为宋子文被击中了，便甩出烟雾弹，人马也迅速撤退了。

一场混战过后，常玉清想不到这次暗杀行动会如此圆满地结束，心里不由暗暗高兴。

王亚樵等人也认为宋子文肯定被打死了，感到十分满足。郑抱真以为重光葵已死，后悔不迭，认定日本人将以此为借口，必定要发动一场战争，他和他的同伙都会成为民族罪人的。

一场错位暗杀，把每一个暗杀者都置于错觉之中！

事后，常玉清踌躇满志地到虹口东华纱厂内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去领赏。当他见到田中隆吉，才知道在北站击毙的并不是日本公使重光葵，而是宋子文的秘书唐腴胥。田中隆吉不但不给他事先答应的2万元的赏金，而且找他的麻烦，跟他过不去。他也自知理亏，连连向田中隆吉陪不是，答应再寻机会谋划。后来，他领着他的三个门徒，化装成“三友”实业社工人，刺杀了日本莲宗和尚，引发了“一·二八”事变。

唐腴胥是宋子文极其信任的秘书，被击毙时才32岁。他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国还不到10年，遇刺前不久才结婚。当时，北站枪声大作，他被惊得手足无措，傻乎乎地站在宋子文身边东张西望，想找一个安全去处，想不到子弹眨眼间聚向了他。到他死时，他也糊里糊涂，没有弄清他是为什么死的。宋子文毕竟有经验，见唐腴胥倒在了血泊中，腿脚一软，在大理石地面上软软躺倒，就再没有起来，而是就地翻滚着，先滚到一名贴身卫士的身后，接着又滚到旁边的站长室，连一点皮肉也没有受伤。王亚樵得知全部内情后，直埋怨郑抱真、华克之下事先通知他事情的变故，以致出此重大纰漏。他一直以为唐腴胥是他的手下人误伤的，对此深感不安，后来托人暗中给唐腴胥家送去银洋1200元，以释内疚。宋子文对这一事件的内情一直不清楚，以为是国民党广州派跟他过不去而派人干的。他对唐腴胥英年早逝深感痛惜。

日本公使重光葵事后很快就从有关方面知道了那天刺杀的对象是他。他怀着极其不安的心情，亲自到宋子文、唐腴胥家里进行了慰问。这段历史公案的全部内幕，直到战后回国，田中隆吉去拜访重光葵时才和盘托出。

阎锡山北逃南归纪实

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都督，清廷派兵镇压，娘子关失守，他狼狈向北逃窜，冰天雪地中吃尽苦头。轻取包头，入城又遇刺客。实行共和，当局三请阎锡山回晋主败。阎氏踌躇满志，率部回到忻州，却不料袁世凯来电，不承认太原起义。急切中只好派人南北活动，施尽各种伎俩……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起义成功，阎锡山就任都督。山西军政府成立，并于十月底分别派出东、北、南三路大军，意欲夺取整个三晋。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象想象的那样顺利，使阎锡山如坐针毡，心急火燎。

这都督还真不好当啊！

大同是晋北的军事重镇。

太原起义后，大同总兵王得胜为了防止革命军北上，不断地向雁门关增兵。

11月10日，王得胜派四人押解步枪80支送往雁门关。

大同同盟会员李德懋获此消息，即派高宝英等25人赴山阴县岱岳镇相机夺取这批枪枝。

高宝英等人顺利夺得枪枝，逃往应州。

王得胜接到步枪被劫的报告，立即派出两哨兵马追赶。结果高宝英等人被清军包围，19人殉难，3人被俘，被杀害于大同西门外。

11月30日，同盟会大同支部获悉，驻扎于大同的清兵将大批调往雁门关，堵截革命军北上。大同支部决定趁此机会举事，于是一面秘密联络大同拳师宋士杰和王得胜部下的孔宪林、孙占标作内应；一面通过许寿山、傅拐子等人联络大同清军中的官佐28人，于当晚行动。

晚8时许，一切准备就绪，所有人员齐集于城内大教场西街的傅拐子家中。事先议定，晚12时行动，规定口号是“取城”，以宋士杰放铁炮为行动信号。起义者仅仅有步枪两枝，为了制造声势，购买了一万个鞭炮，准备在举事时燃放。

预定时间一到，宋士杰放起号炮，带人直攻总兵衙门。

孔宪林、孙占标听到号炮，一起率本部人马内应。

一时间，大同城内炮声不绝，真假难辨，全城大乱，到处呼喊声不断。

王得胜从睡梦中被惊醒，情况不明，只听外面声势不小，不敢应战，只好仓皇弃城逃走，赴宣化求救。

大同顺利光复，革命党人于12月1日召集会议，决定成立大同分政府，并推举李德懋为都督，李国华为副都督，宋士杰为统领，常珍为参谋长，孔宪林、孙占彪为帮统，彭继先为财政部长。会议还对城防作了部署。

大同是军事要地，又且距京都很近，大同光复，理所当然会引起朝廷重视。因此，清廷从热河调军二十营，由陈希文带领；从淮军调兵十营，由周永泰带领，以郭殿帮为总司令，另调后方第一镇骑兵随后跟进，于12月5日发兵，企图收复大同。大同形势十分危急！

驻扎于崞县的“忻代宁公团”团长续桐溪，听到太原起义的消息后，感到革命形势十分有利，在此情况下应该不失时机地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他一方面命弓富魁集结自己的人马待命，一面派贺炳煌到太原晋谒都督阎锡山，建议趁机出动奇兵，从间道直捣北京，攻占京都。

阎锡山认为续桐溪的建议太天真，近乎于荒诞。他说：“只怕连山西也保不住，还妄想攻占北京！续公真是痴人说梦话！”因此，他一笑置之，不予采纳。

会见中，贺炳煌又转达续桐溪的意思，请求阎锡山发给“忻代宁公团”步枪千支，然后开赴大同。

阎锡山尚不了解续桐溪，不敢发给步枪，却又不好拒绝，只答应拨给老毛瑟、来复枪数百枝，以作搪塞。

贺炳煌归告阎锡山的态度，续桐溪认为自己的建议很值得一试，便又亲自到太原与阎锡山交谈。但阎锡山仍不接受，只是劝他立即返回崞县，配合张瑜攻取雁门关。

续桐溪返回驻地，立即整饬军务，任命弓富魁为统带，刑斌丞、赵丕廉、续模等人分掌内事。又任命贺炳煌、任涌、史宗法等人任队长，加强军事训练。

此时，在北京陆军中学学习的赵承绶、郭云、张会诏等，听说太原起义成功，便从间道回晋，要求参加革命。他们与续桐溪接头后，被留在公团任职。

与此同时，太原陆军小学的李达生、王靖国、张得枢、宫保衡、李荣、李世杰、续范亭、续廷梅等十几名学生，一起来投续桐溪，均被收纳，并分配他们担任了排长、队副等职。

一时间，“忻代宁公团”军威大振，计有士兵三千余众。

十一月二十八日，“忻代宁公团”从崞县誓师出发，向代州进发。

此时，北路军司令、第四标统带张瑜已攻取代州，正组织兵力进攻雁门关。

续桐溪率部到代州后，一面帮助张瑜策划攻取雁门关，一面考虑自己的行动方略。他认为只要张瑜猛攻雁门，紧紧拖住大同的清军，他率部出奇兵，即可轻取大同，建立赫赫战功。

于是，续桐溪只在代州歇兵一夜，第二天即率部出敌不意，赶到繁峙县。入城后，他大肆宣扬，要东出平型关。可是第二天率部刚刚离开繁峙城，他就命令部队转变进军方向，北向茹越口前进。

官兵们都不解其意，纷纷询问。

续桐溪煞有介事地撒谎道：“速走，吾之前锋已入大同，但力薄不能守，稍迟即将复失！”

官兵们深信不疑，一时间军心大振，不顾山路崎岖难走，踩着没膝的积雪，昼夜兼程，向北挺进。

续桐溪率部 12 月 3 日攻取了应州，4 日又攻占怀仁。

兵入怀仁城，续桐溪已得知大同光复，不由长叹一声说：“原是我之功，不意为他人所得，此天命也！”

12 月 5 日下午 8 时，续桐溪率部从西门进入大同，受到大同革命军的热烈欢迎。入城后，他立即配合当地革命军守城。官兵们经此一事，佩服得续桐溪五体投地，他们私下里纷纷议论说：“西峰（续桐溪字）星夜驱策于我们冰天雪地中，多怨他不近人情。今日方知西峰料敌明确，用兵神速，真是人莫能及！”“忻代宁公团”前脚入城，朝廷调集的兵马后脚就到了城下。城中百姓尚不知援军已到，清朝在籍郎中刘应昭、大同知府葛尚德听说朝廷派兵来到东门，便邀集城内商界名人和士绅 13 人潜出城外迎接。

刘、葛二人对清军将领说城内空虚，武器弹药不足，人心不稳，毫不费力即可将革命军击溃。统军统领陈希义听后高兴异常，便命令部队入城。

岂料此时续桐溪部右游击队队长史宗法和赵承绥等早率部在城头严阵以待。清军刚刚接近城门，便遭到痛击。城上枪声大作，子弹横飞，清军眨眼间被打死数十人。陈希义见势不妙，立即下令撤退。

清军总司令郭殿邦赶到后，加紧部署兵力，把大同城团团围住，每日以重炮攻城。

续桐溪与城内革命军同心协力，冒着炮火顽强防守，毫不动摇。

由此，两军处于相持中，长达40天。

晋南方面。

太原起义后，同情革命的侯少白，见平阳城内空虚，即产生了组织起义的想法。他各处奔走，与当地驻军中的进步人士频频接触，努力作着起义的准备。

岂料清廷为了保住晋南，下令调来不少防军，几日内相继到达。好在当时诸军无人统驭，各行其事，加之谣言四起，搞得人心大乱，军心浮动。知府耆昌已成惊弓之鸟，不仅把家属提前送到了北京，而且本人也时时准备弃城而逃。衙门里的差役、职员等，纷纷逃走，所留无几，留下的人也不管事。知县武树善，亦因有兵无饷，害怕军队催饷，躲起来不敢见人。

清军因缺饷，温饱不保，竟肆无忌惮地到街上抢劫，搞得社会秩序乱如麻团。

侯少白此时已联络步兵管带李家有、骑兵管带申钦斋、骑兵左哨官陈子标等。他们认为，眼下是起义的最好时机，应该下决心举行起义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都督阎锡山派出的南路司令刘汉卿、副司令李大魁已率部南下。

知县武树善、巡防队统领陈政诗获此消息，调兵到韩侯岭阻击革命军，致使起义计划流产，侯少白本人也被派往介休县执行任务。

各路官军都不听陈政诗指挥。陈政诗先驻霍州，后退赵城，再后退回到平阳，最后不得已逃到降州。因此革命军一路进攻，顺利进入平阳城。

刘汉卿建功心切，以为平阳到手，再不会有什么反复了，便把平阳交给新任平阳司令王家骏防守，自己分兵去攻运城。

刘汉卿离开平阳才几天，因平阳城内兵力单薄，被清军所乘，平阳又为清将谢有功所据。

谢有功得平阳后，又派兵追袭刘汉卿，刘汉卿不幸阵亡。

南、北两路均陷入困境，那么东路如何呢？

从东路传来的消息更使阎锡山震惊：11月4日，朝廷任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任山西巡抚。

吴禄贞已屯兵石家庄，不日将举兵入晋。

阎锡山知道，吴禄贞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军事上很能干，是大清军的显赫人物。此次入晋一定会统驭重兵，与他决一死战的。可是，他眼下手中并无多少可调之兵，就是驻守于固关、娘子关的东路军，也充其量不过二三标人马，是根本阻挡不住吴禄贞的。为此，他急得寝食难安，一筹莫展。

事实上，阎锡山的担心是多余的。原来吴禄贞也是革命党人，并不愿意干同室操戈之事，而是另有打算的。

吴禄贞在太原起义时，正奉命赴滦州检阅秋操。当他听到太原爆发起义

的消息，激动得彻夜未眠，与主持滦州秋操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秘密商议，决议举行滦州起义。他们已讲好，如果滦州起义成功，就策应各省同志，而后形成遍及大江南北的宏大势力，直捣京师，完成光复大业，建立中华民国。

然而事不凑巧，他突然接到清政府的命令：率一镇一协及六镇十二协之兵，南下湖北“靖难”。他明白，这是调他去镇压武汉的起义军。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便率部驻扎于石家庄，拖延时间，等候张绍曾与他联系起义事宜。

也许朝廷对他与张绍曾联合起义之事有所觉察，突然改变主意，任命他为山西巡抚，催促他立刻带兵入晋。

吴禄贞经过反复思考，觉得张绍曾优柔寡断，难成大事，当此奉命入晋之机，应与山西革命军取得联系，实现燕晋联合。

想好了，他立刻派参谋何遂到山西联系。

何遂到娘子关与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见面，转达了吴禄贞的意思，并与姚进行了商洽。双方认为，此事有必要让吴禄贞与阎锡山见面，由他们亲自作出决定。

于是，姚以价用电话征求阎锡山的意见。

阎锡山正自忧心如焚，突然接到姚以价的电话，心里不禁暗叫一声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可是，细细一想，又觉其中可能有什么阴谋，心头又罩上一层厚厚的阴云。

他有点犹豫不决，只好在电话里说：“这么大的事，容我考虑一下，再与有关人员商量后再说吧。”

放下电话，他立刻通知温寿泉、黄国梁、南桂馨等人会商。

会商中，因有些情况需弄清，又数次打电话向姚以价询问。会商结果，决定吴、阎在娘子关正太路车站会晤，并打电话告知姚以价。

何遂接到通知，连夜返回石家庄，向吴禄贞报告。

吴禄贞听说阎锡山约他在娘子关正太铁路车站会晤，笑着说：“阎百川真痛快人也！好吧，就这么办吧。”

1911年11月5日，吴禄贞、阎锡山同时到达娘子关。

吴禄贞的随员有张世清、何遂、孔庚。

阎锡山的随员有温寿泉、黄国梁、赵戴文、姚以价、马天崧。

会晤正在太铁路车站举行。

吴禄贞坦诚地在会晤中说：“清军授我山西巡抚，是一种笼络手段，我是决不就任的。我们站在一个革命立场上，我亟愿与山西携手。我们眼前的事，山西很要紧，山西兵变，中国就兵变，重要的是选择好起义的时机，能使清廷震动。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毒东西，他现在在湖北孝感指挥作战。袁如回到北京，掌握大权，革命就有很大危险。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山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还有，山西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堡垒，也要好好布置……”

会晤达数小时之久，结果令人满意。双方一致同意，成立“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张绍曾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会议决定，山西出兵两营，驻石家庄，听吴指挥，共同作战。

一切议定后，吴禄贞激动地说：“我已与滦州的张绍曾，山东的靳云鹏

约定日期，会师北京。入京后，我们一定扫除清室，使革命早日成功！”他还说：“闻袁世凯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等他回师途经石家庄时一定杀之，以除大害！”

阎锡山回到太原，对此次娘子关之行的收获颇为满意，以为东路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作梦也没有想到，竟然在他与吴禄贞会晤后的第三天凌晨，就接到了姚以价打来的电话，说吴禄贞于昨晚 12 时遇刺身亡。他听完电话，直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无言，以为自己在梦中。

吴禄贞为什么会遇刺？是谁刺杀的呢？

原来吴禄贞在与阎锡山会晤前三天（11 月 2 日）在石家庄截留了从北京运往武汉的一列军车，把火车上装载的一批德国造枪炮弹子全部留为己用，同时电奏朝廷，招抚山西革命军一协，并弹劾荫昌治军无状。

自吴禄贞公然在石家庄截军火、劾荫昌，扼制京汉铁路后，清廷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担心吴禄贞在他返京时发难，便一直留在武汉前线，不敢回京。

袁世凯急于回京，急电在京的心腹良弼设法除掉吴禄贞。

良弼知道周符麟与吴禄贞有怨，用三万银洋买通周符麟去石家庄暗杀吴禄贞。

周符麟原是吴禄贞部六镇十二协统领，因犯军纪被撤职，因此他在六镇中熟人很多。

11 月 5 日，他悄悄来到石家庄，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出面暗杀吴禄贞有诸多不便，决定委托别人代他去办这件事。

那么委托谁合适呢？他反复思忖，觉得马惠田是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因为马惠田原是他的部下，两人过从甚密，意气相投；又且马惠田是袁世凯派的人，对吴禄贞心存忌意。于是他偷偷来到马惠田家中，与马惠田计议。

马惠田听说刺杀吴禄贞是袁世凯吩咐办的，便答应下来。

周符麟临行前送了马惠田一万银洋，就立刻返回北京去了。

11 月 6 日晚 12 时，天上彤云密布，雪花在寒风中飘洒着，天地间一片漆黑。

吴禄贞正与参谋长张志膺、文书周维祯议事，忽听卫兵报告，说马惠田求见。

马惠田现任骑兵协统，深受吴禄贞信任。因此吴禄贞并不怀疑，答应让他进来。

同马惠田同来的还有参谋夏文荣、副官吴荣章等四人。

吴禄贞的办公室设在石家庄车站的一个小院内。

马惠田走进办公室，单腿跪地，向吴行大礼，嘴里说着“来向大帅贺喜”，手中已掏出枪，向吴禄贞射击。

吴禄贞惊觉，急忙绕着桌子躲避，子弹打在了墙上。

吴禄贞边躲边说：“马协统，我平日待你不薄，信任有加，几次为你升职，你怎么恩将仇报？”

马惠田说：“我奉袁中堂之命取你首级，休得多言！”说着又开枪射击。

吴禄贞急于逃命，便一脚揣开窗户，跳到院中，想翻越院墙。他刚刚爬到墙头，马惠田和同行的四人追到院中，一齐向他开枪。

他腿部中弹，从墙上跌到院中，坚持用手枪还击，并伺机逃到院外。

不想马惠田事先已在院墙外设有伏兵，吴禄贞逃到院外，被伏兵击毙，

并将吴禄贞的头割去，向袁世凯请功。

张志膺、周维桢同时遇害。

吴禄贞遇害，部队失去统帅，立刻就发生了分化。第一镇一协本来是客军，害怕遭到第六镇的暗算，将枪械弹药丢弃，纷纷散去。第六镇同情革命的十几名军官，跑到了山西参加了革命。山西已驻石家庄的两营人马，因兵力单薄，无险可守，将吴禄贞部遗弃之枪械弹药全部携带，返回到娘子关。

袁世凯得到吴禄贞遇刺的消息，顾虑顿消，立刻从湖北乘坐火车出发，于11月13日回到北京。

他回京后，操纵朝廷，组织力量镇压各省革命军。

11月15日，在袁世凯的推荐下，朝廷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令第三镇统副曹锟率所部进攻山西。

曹锟于12月8日，亲率协统卢永祥部由石家庄出发，开往井陘。

部队是坐火车来的，车到井陘，已是晚上11点多。他们刚刚下车，就遭受到四五百革命军的偷袭。双方激战二三小时，互有伤亡，但革命军与清军众寡悬殊，只好退守乏驴岭。

第二天，清军从井陘出发至蔡庄，安置炮位，挖掘战壕，欲攻打乏驴岭。革命军在岭上见清军正忙于安炮挖壕，便有数十人奔下去想乘敌不备，夺取大炮。

两军逼近，相距十几丈，打了起来，战场上弹如雨下，打得相当惨烈。

娘子关防线绵延数十里，地处丛山峻岭，形势非常险要。沿线有井陘、乏驴岭、固关、雪花山等数处要塞关隘，确是一处易守难攻的雄关。

当时，山西革命军东路充其量不过一千多人，而曹锟所部有五千之众，革命军装备陈旧，弹药不足，火炮都是旧式炮，杀伤力有限，而曹锟所部装备精良，清一色洋枪，洋药十分充足，又配备有重力火炮。山西革命军虽占地利，但双方兵力悬殊实在太太大，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也不可相比，若要革命军取胜，也真有点强人所难！

为了抗击已经逼近井陘的卢永祥部，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对有限的兵力作了重新部署。

驻守乏驴岭的革命军士气旺盛，弹药有限，就用石头为武器，与敌作战。从早到晚，清军发动数次冲锋，均被击退。

卢永祥觉得这样打下去，乏驴岭不会很快攻下，于是在12月10日由乏驴岭绕道西进，攻打雪花山。

阎锡山深知坚守娘子关的重要性，便乘火车连夜赶来督战。他巡视过战场，了解兵力部署后，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认为清军很可能从雪花山突破，故提出加强雪花山的兵力。

姚以价却不以为然，争辩说：“敌人正以全部兵力攻打乏驴岭，雪花山并无战事。兵力有限，怎么能再调兵给雪花山呢！”

因此两人争执起来，言辞自然激烈一些。

阎锡山见说服不了姚以价，便强白道：“我是都督，你是司令，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姚以价是个性格刚直的人，听了阎锡山的话，觉得面子上下不来，便叹口气说：“好好好，你是都督，当然是你说了算。不过，姚某才疏学浅，难以胜任东路军总司令之重任，请都督大人另请高明吧！”说罢，将武装带解下，“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就要离开。

阎锡山吃惊地看着姚以价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两人是日本留学时的同

学，回国后又一直在一起供职，按说关系不错，在此关键时刻是不能撂挑子的。可是……

为了顾全大局，阎锡山只好向姚以价不是，好言挽留。岂料姚以价不买阎锡山的帐，最终还是辞职走了。

卢永祥部攻打雪花山，阎锡山亲自指挥革命军奋力抵抗，自凌晨 5 时到中午 1 时，双方激战 8 小时。因革命军火力有限，火炮射程又不远，压不住对方的炮火，结果大败，死伤约五百余人，雪花山失守。

雪花山失守，阎锡山觉得败局已定，娘子关是守不住了，便急忙乘专车撤回太原。

12 月 11 日，平定州和娘子关绅士共推三名代表，到清军营请求停战议和，结果被曹锟杀害。

同日，段芝贵奉袁世凯之命，到井陘宣布停战，以利南北议和。

曹锟急于入晋，推说两军正在酣战，胜败未定，是绝不能停战的。段芝贵亦无可奈何，只能任曹锟作为。第二天，清军夺取了娘子关，战斗才告停止。

卢永祥部入晋后，在晋中各县及晋南洪洞、赵城一带大肆抢劫、烧杀，民怨沸腾，无不恨之入骨。

阎锡山撤回太原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讨应变之策。

会议室里，军政人员列坐于桌边，阎锡山、温寿泉坐在主席台上。

会议开始，先由阎锡山介绍了山西面临的局势。他告诉大家，南、北两路革命军连连失利，大同总兵王德胜率兵从雁门关南下；太原总兵谢有功从河东发兵，来攻太原；娘子关失守，卢永祥部长驱直入，不日即可抵达太原。太原危如垒卵，已成众矢之的。他接着说：

“自十月二十九日夜太原起义，我革命同志同仇敌忾，一举夺得抚署，攻克满洲城，拥立军政府以来，迄今已有 43 天了。其间，承蒙诸君竭力尽心，奔走呼号，为安定晋阳局势，苦心孤诣，力尽绵薄，至晋阳有今日之局面。然朝廷不容于大义，吴禄贞司令遇害，又任命锡奎为晋抚并纵卢永祥部入晋，大兵压境，欲置我同志于死地。我东路军官兵浴血奋战，无奈寡不敌众，终使娘子关失守。今山西势如垒卵，太原危在旦夕。百川不才，虽为都督，却一筹莫展，故而招集诸君，捧献良谋善策，以解倒悬。百川祈望诸君畅所欲言……”

副都督温泉首先发言，提出了坚守太原，军政府不可轻动的意见。他说：“起义成功，来之不易，军政府既立，理应维系既得之权威。当务之急，乃策动全省父老兄弟奋起御敌。以寿泉愚见，我三晋资富甲众，若广招猛勇，殊死战斗，定可重振军威，稳定局势。”

接着，他分析了全国的形势，认为摄政王载涛已宣布辞职，清廷亡在旦夕，民国中央政府已在武汉成立，黎元洪已宣布就任大都督，对革命军十分有利；南北议和酝酿已久，并初见成效，休战共和已成定势，种种迹象表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温泉的意见，受到不少人的赞同，纷纷发表意见，主张坚守太原，保卫起义成果。

那么作为都督的阎锡山是何主张呢？

阎锡山的主张与温泉恰恰相反，他主张军政府应放弃太原，北上内蒙，保存革命实力，求得发展，然后再夺回失地，重整三晋。会上，他也一边分

析形势，一边驳斥温寿泉的意见。他说：

“刚才温副都督所言，似乎有理，然百川却不敢苟同。百川认为，时局变化，如同风云，一日三变，断难料定。载涛虽已辞职，而皇族尚有权威，况且袁世凯已就任内阁总理大臣，此乃大局尤关者也。袁公乃当今华夏朝野至尊者，今后决定中国前途命运者，以百川愚见，非此君莫属。而今攻陷娘子关的卢永祥部，名为清廷第三镇，而实为袁氏嫡系，我等切不可等闲视之。黎元洪今虽就任民国政府大都督，但不过是临时执政。我同盟会以孙中山先生为首，今孙先生已回国，民国成立，必当取黎而代之。再说南北议和成功与否，尚难逆料。百川审时度势，窃以为太原离娘子关不过半日路程，关之失，城何得守？为保存革命之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百川以为军政府应当机立断，弃城向北，暂避锋芒……”

赵戴文是极力支持阎锡山的主张的。他说：“都督府是死的，而都督是活的。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该守则守，该退则退，军政府北撤，不失为上策。”

争论多时，意见很难统一。阎锡山不好强求众人，便决定由温寿泉坐镇太原，督同杨彭龄等人率敢死队防守；阎锡山本人与赵戴文相偕北走。

于是阎锡山于12月12日离开太原。

事实上，温寿泉也未能坚守太原，阎锡山走后不几天，便带李鸣凤、景定成、杨彭龄南下，准备到河东联合陕西革命军，先光复河东，然后出兵河南，以图大举。

阎、温离开太原，清政府的官吏死灰复燃，又活动起来。梁善济、李世锋同谋为清军内应，并乘机在省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新任巡抚张锡銮未到任前，山西政事由原布政使王应平主持，城内秩序由李盛铎负责。12月20日，王庆平调离，李盛铎接任布政使，主持省政府事，由审判厅厅长许世英递补提法使。

1912年1月5日，卢永祥率部到太原，驻于政法学堂。

10日早晨，巡抚张锡銮乘火车，由石家庄抵达太原。

不久，张锡銮调任东北，山西巡抚事由李盛铎摄行。

阎锡山、赵戴文离开太原，化装成百姓，骑着两头小毛驴，取道静乐、宁武。途中获悉谷慎思率部驻扎于神池县，便派人通知谷慎思即日率部到五寨会合。

阎锡山带张树帜、张培梅、李成林、谢廉、傅存怀等到五寨后，孔庚率领数百名士兵赶到；接着谷慎思也率部赶到，人马聚集有千余名。

五寨歇兵一日，然后取道岢岚，抵达保德（一说取道五寨的三岔镇抵保德）。

孔庚原是吴禄贞的部下。吴禄贞遇刺后，他就投奔了阎锡山。阎锡山知他有勇有谋，是难得人才，就任他为朔方招讨使，统辖北路各军。

孔庚见到阎锡山后，觉得阎从太原走出欠妥，会留下好多后遗症。为弥补此错，他建议阎锡山通电全国，声明他此次离开太原，是进军北路，为攻打雁门关，夺取大同，在山西北部发展革命。

阎锡山觉得他的意见提得很对，所献主意也好，便欣然接受，照此办理。

阎锡山原想带孔庚到包头，但向全国发出通电后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让孔庚留下来指挥北路各军作战。于是命孔庚带原部火速开往代县阳明堡，坐镇指挥。

阎锡山仍不放心太原，又派周玘连夜返回太原探听消息，让周玘随时派人跟他取得联系，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

到保德后，吴信芳、杨沛霖分别带领雁门、怀仁两部革命军来会，阎锡山身边的人又增加到一千多名。

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军需粮秣匮乏，士兵们还穿着夹衣，又冻又饿，大有不解自散之势。阎锡山遂命张树帜带几十人到河曲县筹饷。

河曲知县是清廷官员，根本不承认军政府。

张树帜找到河曲知县，让他立即捐银两万两。

知县不屑一顾地说：“嘿，阎锡山又不是我儿子，我为什么要给他银子呢！”

张树帜晓以大义，劝知县支持革命。

知县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指使城内商人罢市，不给张树帜所带人员食宿，企图逼张树帜离开河曲。

张树帜气愤至极，便命手下士兵把这位知县大人捆了，吊在梁上拷打。

谁知知县大人骨头挺硬，不仅不屈服，还破口大骂：“你们是强盗，响马！无故捆打朝廷命官，犯下了十恶不赦之罪！”

士兵们更被激怒，更用劲鞭打，一日鞭打六七次，将知县大人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晚上，士兵们又把他圈在柴草房内，打开门窗，让他挨冻。

知县大人实在挨不下去了，只好求饶。

张树帜说：“放你不难，只要你下令开市，交出银子，马上就放你。”

知县大人为保全性命，只好如数交出银子。

张树帜有了银子，立刻购买了粮食、布匹，发给士兵，解救了燃眉之急。

阎锡山在保德歇马数日，又移驻河曲县古城镇，小住四五天。其间，有包头革命党人杨瑞鹏、王青堂因起义失败来投。

杨、王告知阎锡山，绥远清兵无备，率军急往攻之，可成功。

阎锡山此时已成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根本不可能有攻绥远的想法，便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接着李德懋因在丰镇组织起义失利，率骑兵数十人也来投奔。

孔庚到阳明堡后，很不放心，生怕阎锡山半路出事，便又带兵赶到，决定与阎一道北进。

阎锡山率领革命军到抵达距包头十五里的大茅庵村时，包头守城官员樊思庆、谢有梓、王芝寿等人欲设计擒拿阎锡山，便派人到大茅庵面见阎锡山，说愿举行和谈，献出包头，并把和谈地点定在南海村（包头附近）。

阎锡山欣然答应。

来人走后，阎锡山发现其中可能有诈，所以决定他自己不去参加和谈，让孔庚、李颀、吴信芳为代表参加。

孔庚等人走到南海村边，即为清军包围。

吴信芳原是谢有梓的朋友，交谊甚厚。吴信芳见到谢有梓，责其背信弃义，不该设此圈套害人。

谢有梓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又不是要捉你，是想捉阎锡山……”

吴信芳说：“那么你怎么处置我们三个人？”

谢有梓挠着头想了想说：“抓不住鱼，要你们这些蛤蟆、蝌蚪有什么用！”

你别担心，我这就放你走！”

于是，孔庚等三人被释放。

革命军对樊、谢的诱编行为十分气愤，决定兵分三路攻打包头。

樊恩庆、谢有梓因其阴谋未遂，深知阎锡山会实行报复的，惶恐万分，便率领所部五百余人，欲逃往归绥。正要出逃，不期遇上革命军攻城，所部被张树帜、李德懋率兵击散。1912年10月20日，阎锡山占领了包头。

革命军进驻包头时，受到包头各界的欢迎，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

入城时，阎锡山考虑到城内奸人尚未清除，恐趁机报复，提出他本人以不露面为好。

众人以为阎锡山之顾虑不无道理，但又考虑到城内组织欢迎，都督不露面不太合适，一时议而不决。后来，赵戴文自告奋勇，提出由他假扮都督入城，倘有不测，也不会祸及阎锡山。

阎锡山急忙反对说：“这怎么能行！难道我能让你去替我送死？”

赵戴文说：“革命军没有阎都督不行，而没有戴文却无伤大局。我假扮都督，也不过是预防歹人暗算，有没有人这么做还不一定。你别说了，就让我当两小时都督，风光风光吧！”他说着风趣地大笑起来。

阎锡山尚有疑惑，说：“假如有人认出你是假阎锡山怎么办？”

赵戴文说：“包头城的人谁也没见过阎都督，怎么会认出我是假的呢！”

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既然如此，阎锡山答应了。

革命军入城时，果然有人潜伏于大街旁的屋背后，向赵戴文开了一枪，所幸没有打中。这时，一队卫兵举起长枪一齐打响，对面房屋顿时火起，烈焰腾空。但入城队伍依然井然有序，毫不惊慌。

入城后，阎锡山一边派兵维持地方秩序，一边收编流散队伍，共招得马队二营，步兵三营、炮队一营、警队一队、探访队一队、工程队一队。

阎锡山攻克包头后的第四天，因南北议和故，山西巡抚张锡奎、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派代表孔繁蔚、马瑞图，到包头迎接阎锡山返省。

当阎锡山听到此消息，摇头大笑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话，张锡奎怎么会派人来迎接我呢！你们莫非在骗我？”直到他见到孔繁蔚、马瑞图，才相信这是真的。

阎锡山看过张锡奎、杜上化写给他的信，尽管信中言辞恳切，请他返省主持山西政事，而且从信中得知，张锡奎已不再任山西巡抚，将奉命到东北另就他职，但他终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送上门来。他怀疑张锡奎是否想诱他回太原，而后擒拿他向朝廷邀功，于是推说革命军刚刚攻占包头，要办的事很多，一时脱不开身，便打发孔、马二人去了。

正在这时，清军统领谭永福率两千人马由归绥出发，来攻包头。

谭永福驻扎于距包头九十里的萨拉齐厅。

阎锡山得到报告，遂派统带王家驹率步兵二营、马队一营、炮兵、游击队各一队开入鄂尔格逊迎战。

10月16日，两军于鄂尔格逊以东地区相遇，从上午9时激战到下午6时，战斗打得十分惨烈。

清军死伤惨重，不得不退入萨城。

革命军王家驹、张培梅部在城下叫骂，谭永福不敢出战。革命军士气正旺，便在城外列炮轰击萨城，火力十分猛烈，炮弹打入城内，到处起火，烈焰腾空。

谭永福见势不妙，不敢再守此危城，便率部溃退于刀石村。以石堡为掩护，居高临下，占尽地利。

王家驹以为清军已退远，催促军队加紧追赶，不料走到刀石村边，猝然遭击。

清军三面扫射，火力很猛。

革命军仓促接战，又且全部暴露在村前平川上，没有任何遮拦；又且大雪盖地，虽然是晚上天昏地暗，但在白雪的映衬下，每个目标都历历可见，战况明显不利。但革命军毫不退缩，英勇奋战，从拂晓前打到中午，尽管死伤很重，但士气不衰，愈打愈勇。不幸王家驹中弹阵亡，军中失去主帅，部队不得不撤出战斗。

革命军退至托斯和村，清军亦已疲惫不堪，亦退守托克托城。

谭永福东走蔡素旗，留王芝寿守城。王芝寿在城内连连派人到归绥请求援兵。可等了几天也不见一兵一卒增援，遂于10月30日未明前弃城潜逃。革命军占领了托克托城。

2月1日，李盛铎和咨议局再次派赵熙成持信到包头，催请阎锡山速返山西。

此时，南北议和已见端倪，且已获准信，张锡奎确已离晋，阎锡山意欲返回山西。可是商议此事时，朔方招讨使孔庚坚决反对。他因王家驹之死，心中的恶气未出，觉得不报此仇死不瞑目。加之他认为挥兵西进，绥远指日可下，然后再回山西不迟。因此他几次进谏，拒理力争。可是，阎锡山认为不管怎么样，还得以山西为重，山西毕竟是他未来事业的大本营，更何况攻打绥远，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回晋主意已定，不管孔庚怎么说也不肯听。

于是，阎锡山2月8日上午10时从托克托城动身回晋，仍依旧沿黄河南下。进入山西后，经河曲、神池、宁武、辗转于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抵达忻州城。

阎锡山从托克托城出发时，就向太原发出专函，通知周玘为他作好返晋的准备工作。专函中说：“吾不日由包头动身，先往忻州，你速设法与忻州州官联系，为我筹备一切。”

周玘接函后，马上动身从太原来到忻州城，与州官朱善元接头。

朱善元听说都督阎锡山要来忻州小住，感到是莫大的荣幸，便尽心竭力为阎锡山筹划食宿，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迎接阎锡山，他甚至连过年也没有让衙里的役职人员回家。

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忻州城的各条街道上，都插了五色旗，彩旗在风中猎猎飘响。知州朱善元已接到报马的报告，说阎都督很快就要到忻州，便立刻通知忻州城内的所有队伍，吃过早饭后就整队到城北的五里堆等候迎接阎锡山。谁知一直等到太阳快要落山时，阎锡山才带着一百多人的队伍来到忻州。

队伍没有穿军装，只是每个人的胸前佩戴一枚圆形白布胸章，一个个身穿皮袄、皮裤，头戴皮帽，脚蹬皮鞋，有的骑马，有的步行，有的背着手枪，有的挎着马刀，有的赤手空拳、既无枪也无刀，欢迎的人都说：“这真是地道的蒙古军。”

阎锡山穿着便装，骑一匹马，风尘仆仆，走在队伍的前头。

朱善元和军官们看到阎锡山走来，便指挥前来欢迎的队伍向阎锡山敬

礼。

阎锡山满面春风，微笑着向欢迎他的队伍还礼，并频频招手。

此时阎锡山太激动了。因为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感到格外亲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心里说：“还是家乡的人亲啊！”

贡院是忻州城内比州衙更神圣的地方。知州朱善元为了表示对阎锡山的尊重，特安排阎锡山在此下榻。

当晚，朱善元大摆宴席，为阎锡山接风，并献上白银二十万两，供阎发兵饷和其它开支用。

因为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按照当地的风俗，朱善元带领忻州的文武官员，集体到贡院给阎锡山拜年。

朱善元还送给阎一副对联，上联是“龙凤呈祥机运转”，下联是“旗鼓重张震军威”，横批是“不老松”。

当时阎锡山才19岁，当他看到“不老松”三个字时，似觉朱善元巴结他太过份了。不过，他还是高兴地收下对联，夸奖朱善元是个好人。

后来，阎锡山回到太原，感其恩德，特提拔他当了山西财政厅长。

阎锡山回到忻州后，附近的五台县、崞县、定襄县也送来大批的银两、粮食相助。桑梓官民的这份情谊，使他深受感动。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听到儿子住在忻州城的消息，尚不敢相信，便派人连夜到忻州探听。得到确报后，他本想到忻州探望儿子，又恐去了有诸多不便，就打消了去忻州的念头。

河边村的人们听到阎锡山要回太原仍当都督，都上门向阎书堂庆贺。

阎书堂满脸不高兴地说：“这人情太不值钱了！”

阎书堂为什么说这样令人扫兴的话呢？原来阎锡山被推选为都督时，河边村的人们议论纷纷，有人羡慕，但更多的人则是害怕。他们说阎锡山吃了豹子胆，竟敢造反杀巡抚，不仅阎家跟上阎锡山会落个“满门抄斩”，而且河边村的人也会受到株连的。后来，阎锡山北逃的消息传到河边村后，谣言四起，村里的多数人家不敢跟阎家来往，生怕受到牵连。连阎书堂本人也吓得坐卧不宁，随着阎书康到宏道镇避难，后来又逃到西社村，东躲西藏，不敢回家，比当年躲债更焦心。

阎锡山的继母陈秀卿也吓得坐了铁轱辘车，把家里的值钱的东西都拉了，跑到陈家营娘家去躲灾，害怕清军来真的满门抄斩。

阎锡山的叔父阎书典，见他哥嫂到处逃难，幸灾乐祸地包饺子吃，还故意他哥嫂说：“我也快跟上你们去见阎王了，吃了饺子再死吧……”

亏得清军打到忻州，再没有往北打，河边村未受一点损伤，阎家的人才稍稍安定下来。

阎锡山回到忻州后，五台县知事牛葆忱专门从五台赶到忻州拜谒。阎锡山吩咐了他好多话，他连连点头，说他记下了，回去后一定照阎锡山的话去做。定襄县知事丁怀启，因在任其内勾结粮房经理樊成龙贪赃枉法，横征暴敛，还暗中将全县同盟会员的名单开列出来，准备一起逮捕。阎锡山到忻州后，他预感到将要出事，便收拾行李，企图逃走。本县同盟会员贺炳煌、齐宝玺发现丁怀启要逃，便将他胁迫到忻州，向阎锡山讲说了他的种种罪行。阎锡山命忻州知州朱善元将其看押。原来朱、丁是好朋友，朱善元不忍心让丁怀启坐牢，便以“看守疏忽”为理由，暗中指使人把他放了。贺炳煌知道朱、丁的关系，事先有所防备，故丁启怀逃出不远，就又被贺炳煌和齐宝玺

抓获，交给阎锡山。

阎锡山被激怒，当即命手下人将丁启怀推出城外枪决，并将其头悬挂在定襄城南门上，以平民愤。定襄百姓为此称赞阎锡山是“阎青天”。

阎锡山本来想在忻州城稍事停留数日，然后就回太原任都督。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即将动身赴并时，忽然接到刚刚上任三天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电报，命令他“就地待命，不准前进”。这真是晴天霹雳，惊得他魂不附体，不知该如何是好。

没有比这件事使他更着急了，他怎么也猜不出这封电报的背后藏有什么意思。于是，他立刻派人到北京了解情况，并打电报向正在南京的南桂馨询问情况。

南桂馨是什么时候去南京的呢？

原来太原起义，山西军政府成立后，阎锡山就派他到西安、武汉去联络革命军，争取对山西的革命军有所援助。

南桂馨于1911年11月11日中旬由太原动身，先到潼关与张伯英晤面。他从张伯英嘴里得知，陕西情况很混乱，根本无暇支援太原。于是，他取道汉水，直达武昌，去见黎元洪大都督。

时值汉口失守，武汉革命军重陷清军之包围中，形势十分紧张。当南桂馨谈了山西响应武昌起义的经过，提出支援太原的要求后，黎元洪摊开双手说：“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眼下很难接济山西，你最好到南京想办法去吧。”

就在这时，山西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娘子关失守，阎锡山、温寿泉放弃太原各奔南北，消息隔断，弄不清阎锡山到了哪里。但南桂馨并不泄气，便由武昌乘船顺着长江到了南京。

南桂馨到南京后，设法见到了民国政府军政部长黄兴，报告了山西的情况，要求民国政府在军械和经费上对山西给予支持。

可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只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没有什么经费和军械因此黄兴也爱莫能助，他也和黎元洪一样摊着手说：“你的要求我没法解决，等以后情况好转再说吧。”

此后不久，孙中山先生归国，到了上海。南桂馨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先生的身上，便到了上海。南桂馨是认识孙中山先生的，而且在上海有不少熟人，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见到了孙中山先生。他把山西的情况又向孙先生汇报一番。孙中山听汇报毕，因急于有事回南京，便说：“你跟我一同回南京再说。”返回南京，南京正在召开参议会。

南桂馨发现会场里已坐有山西派来的代表，共3个人，他们是由山西咨议局和李盛铎（护理巡抚）派出的刘劝功、李素和刚从日本东京赶回国的景耀同。

这次会议，各省代表一致拥护孙中山，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就任大总统职。

在这期间，会北议和声浪日高，孙中山的主张是大总统职位可以让给袁世凯，但必须定都南京，并坚持起义的省份，仍由原起义的革命军人担任都督，不得更换。此主张经往返协商，最后得到袁世凯的同意。

在此同时，李盛铎急于当山西都督，就派刘盩训，叶左虹到南京活动。

南京军政部有一名司长叫仇亮，原在山西工作，阎锡山由太原撤退时他

才离开太原到南京的，他对阎锡山很有看法，认为阎锡山能力有限，不足以领导一个省。他的这种看法，在南京军政部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一些不认识阎锡山的人都认为阎锡山真的是一个平庸之辈。

为了使南京民国政府的要员们了解山西的革命情况，了解阎锡山本人的情况，南桂馨发挥了一个外交家的特长，不辞劳苦，到处奔走、宣传。他与胡汉民、黄兴等人多次洽谈，做他们的工作。

就是在这个时候，阎锡山从忻州给南桂馨打电报的。

南桂馨接到电报后，把他在南京活动的情况电告阎锡山，并说“南京终将无碍，孙先生态度很坚决，关键在袁，应立即派人进京疏通之。”

派到北京了解情况的人回来说，袁世凯在京公开的说法是“太原起义后，阎锡山北逃，山西局势混乱”，不承认山西是起义成功的省份；而实际是因山西近在京畿，袁世凯想窃据山西。阎锡山知道，他很难在短时间内回到太原了，便在忻州住下来，策划派人进京疏通袁之大事。事关紧要，不敢拖延，他几天后便派董崇仁出发了。

董崇仁是何许人也？

董崇仁，字子安，定襄县官庄村人，在弟兄辈中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叫他董三。早年其父一直在北京包揽皇家工程，他自幼就跟着父亲出入于宫廷，与宫中一些内侍很熟，特别是跟慈禧太后的的心腹李莲英相交甚密，到他长大成人后，曾通过李莲英纳捐做过四品道台。后来在李莲英的引荐下，他与袁世凯认识。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京汉铁路筹建时，袁世凯推荐董崇仁为京石段（北京到石家庄）购买路基的委员。因他办事认真、卖力，很受袁世凯的赏识。那时，袁世凯官瘾很大，为讨好慈禧太后，极力想拉拢与宫廷有来往的人作耳目，便认董崇仁为门生。光绪二十六年，袁世凯晋升为直隶总督，董崇仁追随其后，登上了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他回到定襄老家闲居。

阎锡山与董崇仁素不相识，但听人介绍了董崇仁与袁世凯的关系后，觉得这条关系很有用，可以帮助自己摆脱厄运。于是便准备了礼品，派张瑞生到定襄官庄拜会董崇仁。

张瑞生是阎锡山的一个远房亲戚，当年曾在阎父开的钱铺里当过小伙计，与阎锡山自幼相处，关系甚密。阎锡山发迹后，他便做了他的副官。

张瑞生奉命到了官庄村，送上礼品，随即邀请董崇仁到忻州与阎锡山会见。

董崇仁推说他与阎锡山素昧平生，不便会见。

张瑞生劝说道：“我们阎都督对董大人仰慕之已，是诚心派我来请董大人的。过去不认识不要紧，现在认识了不也有好处吗？”

董崇仁也有结识阎锡山的想法，便与张瑞生一起骑马来到了忻州。

阎锡山很隆重地接见了董崇仁，对董崇仁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尊重，口口声声称董崇仁为“老前辈”，招待也尤其热情。他的这些作为，深深感动了董崇仁，所以当他提出请他到京代其向袁大总统致敬，借以疏通他和袁的关系时，董崇仁慨然答应下来。

在孔庚的陪同下，董崇仁星夜进京晋谒袁世凯，帮阎锡山说了不少好话。

当袁世凯问到阎锡山对他的态度时，董崇仁说：“阎百川一向对袁公推崇备至，听说袁公就任民国大总统，高兴得不得了。他是衷心拥护袁公的，袁公可依为干城，大可不必怀疑他。”

在京期间，孔庚听说他的同乡陈崖，汤芑铭是袁世凯的心腹，可以随便出入袁府。因此，他特备了礼去拜会陈、汤二人，请他们在袁世凯面前为阎锡山说情，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陈、汤二人答应一定帮忙。

在此同时，南桂馨在南京的活动已见成效。孙中山先生为山西起义力争，给袁世凯打电报达二十三次之多，并在电报中说：“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分，即使南北义和破裂，也在所不惜。”态度十分坚决。

此时，袁世凯指使曹錕发动兵变，借口不能南下就职，为缓和南北关系，加之又有董崇仁、孔庚的活动，袁世凯便作出让步，于 1912 年 4 月间，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刘后同先生

古都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件近代史上的大事。促成这一事件成功的人可以数出成千上万，但除了傅作义将军外，还有一个发挥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老人，就是刘后同老先生。他高瞻远瞩，与共产党密切配合，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被誉为“和平老人”……

北平和平解放，其根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强大无比，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但促成傅作义将军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决定率部起义中，有一个人是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和平老人”的刘后同先生。

刘后同先生是山西解州人，1882年生。他从小聪明好学，不仅学习五经四书，还喜读兵书，练习剑术。光绪29年（即1903年），甘肃创设武备学堂。他立志报国，考入该学堂学习军事。因他学业甚优，备受学堂各长官器重，毕业后由陕甘总督出面，保送他到湖北武师范学堂深造。在湖北武师范学堂，他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的兴中会，立志献身民主革命，推翻清廷的封建统治。

辛亥革命中，刘后同先生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甘肃省的秦州反清起义，出任独立甘肃省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来，他返回山西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时期，他出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黎元洪大总统的一等待从武官。直奉战争时期，他出任曹锟部西北路军中总指挥。北洋政府垮台后，他改任绥远省稽查处总办。抗日战争爆发，天津沦陷，日本人请他担任热河省主席，他避而拒之，隐名埋姓，闭门不出，以卖字为生，保持了自己的名节。抗战初期，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提出“攘外便可安内”的主张，建议蒋介石跟日本人打“持久消耗战”，并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整套建议。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了傅作义将军的上将级顾问，却未到职，仍在家乡居住，闭门著书立说。

刘后同博学多才，不仅通晓文韬武略，而且善书画，被称作一代奇才。他一生的论著有《互爱主义》、《草书定法》、《孙子译证》。蒋介石曾拜读过他的《孙子译证》，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曾邀他到南京就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他婉转谢绝，未去就职。

1948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到处打败仗，蒋介石不得不改变战略，由全面向解放区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国共两党、两军的战略决战即将开始。华北地区的决战，主要是和傅作义将军决战。

当时傅作义坐镇北平，身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之职，控制着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等五省和平、津二市的60万军队。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经反复研究，认为如果能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则华北的决战将会以一种和平的方式结束，为解放全国树立一个榜样。为此，城工部的同志认真分析研究了傅作义将军的情况，认为争取他起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傅作义将军原是晋绥军中的一名将领，他为人正直，作战英勇而受到晋绥军官兵的敬仰。可是，晋绥军的最高统帅阎锡山对他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使两人的关系一直处于一种微妙之中。两人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傅作义将军对阎锡山有什么隐匿或不恭，而是产生于一种历史的根源。

早在辛亥革命时，姚以价率第 85 标官兵在太原起义，拥戴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却又因起义军与清军在娘子关作战，姚、阎两人意见分歧，甚至反目，致使娘子关兵败。由此，阎锡山恨死了姚以价。

因姚以价是晋南河津人，阎锡山恨屋及乌，所以莫名其妙地对晋南人心怀芥蒂，并常对人说：“晋南人心怀叵测，不可轻信。”而傅作义将军偏偏又是姚以价的同乡，也是河津人，这就决定了阎锡山对他的不信任。基于这一原因，尽管傅作义屡立战功，表现出对阎锡山忠诚不二，可阎锡山却不以为然，打内心歧视、排斥他。如果说傅作义仅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庸者，阎锡山对他也仅是歧视、排斥而已，那么问题也没有什么复杂可言。可偏偏傅作义不仅英勇善战，而且很有作为，更使阎锡山对他疑上加忌，生怕他的威信超过自己，因而处处限制他。蒋介石为了削弱阎锡山的力量，趁机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傅作义。1928 年 6 月，傅作义在天津任警备司令时，蒋介石多次派人动员傅作义背离阎锡山，并派人送给傅作义一笔巨款。为了表示对阎锡山的忠诚，傅作义把这笔钱款如数上缴给阎锡山。

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通电下野，张学良统管华北各省，在整编晋绥军时，任命傅作义为第 35 军军长，兼绥远省主席。“9·18”事变后，阎锡山回到山西，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认为让傅作义统领绥远总不能放心，就动了撤换傅作义，让王靖国接任绥远省主席的念头。为此，他派人调查傅作义的情况，企图找到口实。但因傅作义无劣迹可寻，只好罢此念头。

1936 年，阎锡山整编晋绥军，趁机撤销了傅作义第 35 军 73 师师长的兼职，派他的亲信刘奉宾出任该职。

为了削弱傅作义的力量，阎锡山把第 35 军 72 师留在山西，不接受傅作义的指挥。

傅作义名为军长，而实际指挥的仅有 211 旅和 218 旅。而这两个旅，在建制上又分属 72 师和 73 师，如果阎锡山一声令下，这两个旅就得归还建制，留给傅作义的仅仅是一个军长的空头衔，手中却无一兵一将。

后来，阎锡山还认为傅作义手中的兵权太大，又从 211 旅和 218 旅各抽调一个团回山西，留给傅作义的仅有四个团。

1936 年，绥东抗战开始，傅作义积极抗战，取得了绥东抗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

忻口战役中，傅作义和卫立煌指挥十余万中央军和晋绥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一直坚持了 20 多天才撤军。接着，他又受命保卫太原。

可是因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惹怒了阎锡山。为此阎锡山电请南京政府将傅作义撤职查办。好在蒋介石另有用心，保了傅作义的驾，才使傅作义免去一场灾难。

傅作义因倾向革命，经常与共产党人交往。他的 35 军中，就有不少共产党员任职。他驻军晋西北，和当地的共产党、八路军频频交往，过从甚密。鉴于此，阎锡山不仅经常在蒋介石那里告傅作义的状，还派人到重庆、西安散步流言蜚语，说傅作义的 35 军已经是“七路半”，快成“八路”了。

1938 年冬天，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特召傅作义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玩弄权术，也不跟阎锡山打招呼，就把第 35 军划归第八战区序列，并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兼任绥远省主席，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发展成为华北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不得不任命他

为华北总司令。但是蒋介石一贯奉行排斥异己的政策，傅作义因不是蒋的嫡系，故常常受到蒋介石的掣肘和限制，傅、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在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际，争取傅作义应该说是大有可能的。

因此，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决定利用各种关系，对傅作义及其周围的人发动一次思想攻势，力争达到预期的目的。

那么派谁去作此工作呢？

城工部的同志认为，如果能动员曾延毅先生出马去说服傅作义将军，可能效果会更好些。

曾延毅先生曾和傅作义将军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是同学，两人关系非比寻常。后来，傅作义当第35军军长时，他曾出任过他的副军长，两人又在一起共事多年，彼此十分了解。人选确定后，城工部长刘仁找来曾延毅的儿子、天津南开大学哲学系学生、共产党员曾常宁和北平地下党员、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质，把这一任务交由他们两人去负责完成。

曾常宁带着王质，专程到天津找曾延毅先生。

当他们把意图说明，同情共产党、关心北平和平的曾延毅先生十分赞成北平城工部的主张。但说到由他出面作傅作义将军的思想工作时，他却摇着头说：“我和宜生（傅作义的字）的私人关系是不错，但我在他面前的份量不足，恐怕不会收到满意效果的。”

王质问：“那么，以曾先生的意思，由谁去见傅将军才够份量呢？”

曾延毅先生想了想说：“我以为让刘后同先生出面，再好不过了。刘先生德高望重，和傅先生的关系更深。他的话，傅宜生是绝对会听的。”

王质认为曾延毅先生的话有道理，就立即向党组织请示。不几日，党组织就答复了此要求。

1948年10月，曾延毅在曾常宁、王质的陪同下，由北平取道天津去见刘老先生。

他们见到刘后同先生，便开门见山地把来意说明，请刘老先生北行。

当时，68岁的刘后同先生，虽然年事已很高，但头脑十分清楚，思维仍很敏捷。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密友，在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骤变化的关键时刻，他又何偿不关心傅作义的出路呢！早在这年的2月，傅作义将军就亲自到天津拜访他。见面后，两人就政局曾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

刘后同先生说：“政治是军事之本，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的。今南京政府政无不弊、官无不贪，我以为其政权恐怕不会有一年半的寿命了。任何主义、任何政权，违背人民利益，违反历史规律，必败无疑！”

当时，傅作义将军的胞弟傅作仁也在场。他向刘后同请教：“为什么国军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呢？”

刘后同先生回答说：“国民党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领导者毁弃中山先生制订的‘三大政策’，尤其是民国35年，国民党益趋极端，掀起长期内战，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国民党今天已演变到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的腐败境地，本身既不能适应历史，别开生面，再不与中共停战言和，其政权必然土崩瓦解。”

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他听了曾延毅、王质等的话，一股爱国之情、爱古都文化之情炽烈地燃烧起来。因此，他欣然答应亲到北平去见傅作义将军，劝说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路子。

恰巧，傅作义将军来信，邀请刘后同先生到北平商谈应付眼前局势的对

策。于是刘后同先生冒着浓重的秋霜和料峭的西北风，扶杖抱袱，赶赴北平。

正为局势焦虑不安的傅作义将军，见他的老友刘后同应邀来北平与他共商应付危难局势之大计，心里既高兴又感动。他特意把他安排在“剿总”招待贵宾的联谊社下榻，以便随时请教。

二

刘后同先生因此次赴平，身负秘密使命，所以华北学院教授共产党员杜任之（曾在山西工作多年，作过阎锡山的秘书主任）、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等人，很快就与他取得了联系。

早在10月中旬，因解放军在东北发起辽沈战役，大军直逼锦州，迫使蒋介石飞抵北平，催令傅作义调动华北主力部队出关援锦。

傅作义深知东北战场凶多吉少，不愿让自己的部队去送死，就婉言推辞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大计，余资浅能鲜，不堪重任，只有总座亲自指挥才能奏效。”

蒋介石无奈，只好命他的嫡系部队救援锦州。但他临行前交给傅作义将军又一项任务：派兵偷袭西柏坡和石家庄。

傅作义将军只好奉命行事，立刻抽调三个军、两个骑兵师和一部分坦克，打着“援晋兵团”的幌子，秘密向西柏坡和石家庄进发。

其时，负责保卫西柏坡、石家庄的我华北野战军主力正在平绥一线作战，后方兵力空虚，情况异常紧急。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获此情报后，不得已急令华北第二兵团回援西、石，并调东北野战军一部入关威胁北平，逼迫已出发的国民党军队返回北平。

杜任之的胞弟杜敬之在惠民医院任院长又兼任傅作义的总司令参议。当他从内部听到傅作义奉命调兵遣将，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的消息后，就把此消息悄悄告诉了杜任之。

杜任之听了暗吃一惊，一方面通过组织，将此情况汇报党中央；一方面去找刘后同先生，想通过刘老先生说服傅作义停止这一军事行动。见到刘后同先生后，他说：“宜生此举甚为愚蠢，一则不可能成功，纵然能取得某些胜利，但可以预见，他的部队一定会在中途遭到共军的歼灭。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加深与中共方面的恶感，由此断了与中共和谈的路子。请你无论如何说服宜生，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撤回来。”

应杜任之的要求，刘后同先生回到联谊社，就立即动手给傅作义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希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

第二天，傅作义的女儿傅冬（共产党员、地下党派她来做傅作义的工作）来联谊社拜会刘后同先生。

当刘后同从傅冬的口中得知，傅作义收到他的信后，所袭西柏坡、石家庄的部队并未停止前进，而且已过了清风店，到达了定县时，就又愤笔疾书，再给傅作义写信。他在信中说：“沈阳不守，平津且很危，当可分兵援晋乎。闻贵军仍前进，传言已过清风店。远袭无后继，窃谓愈深入，其险愈巨。现前锋无论进到何地，敢希严令迅予撤回。否则，终必后悔。千万千万，即颂恬和。”

傅作义收到刘后同先生的第二封信后，陷入了沉思。他清楚地记得，在他的一生中，每至关键时刻，刘后同先生都帮他出过很好的主意。1928年奉军退回东北，他出任天津警备司令；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逃到大连，他出任绥远省主席；1938年他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采纳了刘后同

先生的建议而决定的。今天，刘后同先生以如此强硬的言辞劝他撤军，可见是有道理的。他的想法开始有了动摇。

就在此时，从前方传来消息，他的偷袭部队已被解放军阻击，其中一部被歼灭。接着，又有消息自东北传来：蒋介石所谓援锦“王牌师”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歼，锦州失守；廖耀湘兵团面临覆灭之灾。可是，宋美龄、孔令侃却因囤积物资、扰乱国家金融而和蒋经国发生了冲突。蒋介石在前方军事十分吃紧的情况下，收到宋美龄给他发来的电报，竟不顾即将兵败，乘飞机回到上海调停他的夫人和儿子的矛盾。在此情况下，他终于悟彻到刘后同先生劝他撤军是有道理的。他长叹一声说：“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我又何苦替他卖命！”于是下令撤回偷袭西柏坡、石家庄的部队。

三

刘后同先生来到北平，为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真是不辞劳苦，尽心竭力。他无数次地同傅作义面谈、写信，陈说其中的利害。他看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或听到什么消息，都想干预。一天，他看到国民党军为修筑工事，竟拆毁了故宫城墙，还滥砍滥伐公园中的林木，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写信给傅作义，要求制止这种行为。他在信中说：“古都文化是十分宝贵的，说什么也不能毁在你宜生的手中。”

北平解放前，特务横行，到处制造白色恐怖。市长何思源对和平解放北平十分热心，到处奔走，说服人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因此，“蓝衣社”的特务竟制造了一起暗杀事件，用炸弹炸毁他的公馆，他的一个指头被炸掉，他的一个女儿被炸死。

这一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傅冬来看望刘后同先生。她把事件发生的详情说了一遍，然后劝刘后同先生说：“伯伯身系北平和平大事，今后行动一定要谨慎。”

刘后同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哈哈笑着说：“请你放心，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还用得着怕死吗？”

刘后同先生很喜欢跟那些大智大勇的年轻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什么时候去找他，他就什么时候热情接待他们。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只要能办到，他就爽快答应，从不推辞。他到北平后，介绍了不少国民党军队中的要人跟共产党员认识，以便做好这些人起义的思想工作。

为了北平和平解放，刘后同先生日夜操劳，终因劳累过度而致使右目失明。他在《北京古城和平纪略》中写道：“今少一目，使北平果得和平、无恙，又何可惜！”

辽沈战役终于以国民党全军覆灭、解放军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消息传来，傅作义经过一番深沉思考，终于认清了眼下局势的趋向。他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今后的中国必将以共产党为中心了。这时，蒋介石竭力拉拢他，数次来电，要他出任“东南军政长官”，并率部撤到长江以南。美国政府也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想全力扶植一个地方实力派扭转眼下的败局，以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傅作义就是他们选定的人选之一。

在此情况下，北平城工部担心傅作义一时糊涂，误上贼船，犯下大错，就派杜任之和崔月犁设法把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讲给傅作义将军听。

崔月犁、杜本任之二同志自然选择了刘后同。

见到刘后同先生后，崔月犁说：“您要对傅将军讲明，蒋介石败局已定，跟他走是没有出路的。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希望傅将军认清蒋介石的为人，

千万别上他的当。美国政府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也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希望傅将军珍惜自己爱国抗日的历史，别受美国人的利用，做出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来。北平如能和平解放，不仅少死人、少破坏，而且可以保护古都文化，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傅将军真能接受共产党的建议，那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人民是会感谢他的。”

刘后同先生说：“我看傅作义是杀头将军，他宁肯杀头也是不会投降的。”

杜任之说：“就国共对峙的局面来说，也可说是起义。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与中共和谈，和平解放北平，宜生本人也不失为一个英雄嘛！”

怎样才能做到不动刀兵，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刘后同先生首先发表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认为按照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可用辛亥革命方式，由宜生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同时率先在华北实行，进而促成全国和平，重新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成联合政府。”

杜任之、崔月犁考虑，刘后同先生的这一建议，从出发点看是好的，但企图用成立联合政府结束国共两党的对峙，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共产党就不会同意这样做的。不过，他们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促成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因而对刘后同先生的意见未置可否，更没有评论，只是提出首先和平解放北平，从而影响全国，希望刘后同先生的工作以此为目标。

1948年秋天，刘后同先生的女儿刘杭生，到解放区投奔革命。刘仁同志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之目的，就派她也到北平，帮她父亲加紧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一天，刘后同先生来到华北剿共总司令部，声言有重要的事跟傅作义谈。

傅作义将军将他迎入密室，让卫士退下，不等刘后同先生开口，他就抢先问：“刘先生，东北国军遭到惨败，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刘后同先生说：“今年春天，我曾经说过，现政权恐无一年半的寿命了。现在东北已失，中原岌岌可危，天下将为谁所有，岂不是不言自明吗！你领华北五省，值此民命倒悬之时，似应早有决策，以慰民众颀颀之望。”

傅作义烦躁不安地绕室而动，听了刘后同的话，点头说：“先生所言极是。我正为此事焦虑啊！”接着，他征求刘后同先生的意见，希望刘老先生帮他再次拿个主意。

刘后同先生便说：“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眼下局势而言，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提倡和平。以我愚见，今后国是只宜政治解决，不应妄想依靠战争。今介石南归，如其不主和，从国家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考虑，你应当主动顺应潮流，迎合民心，提倡和平，揭起和平大旗，号召全国，我看全国会争相响应的。”

傅作义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脸上露出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刘后同先生的意见是赞同的。分手时，傅作义还一再叮嘱刘后同先生说：“这方面的问题，请先生多替我考虑考虑。”

那么，傅作义本人对眼前局势是何看法呢？他认为，东北与华北，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齿寒，东北不保，华北即很难独存。单就华北而言，解放军有40多万人，而他拥有60万人，解放军对他并不能构成威胁。可是，辽沈战役后，东北的80万解放军乘胜入关，而且东北、华北连成一片，解放区的人民都支持解放军，那么华北就危险了。他深感形势严峻，所以不仅重视刘后同的意见，而且颇为赞同，觉得舍去和谈一策，别无生路可选择。

刘、傅谈话后不久的一天深夜，傅作义把他司令部的政工处长王克俊叫到他的卧室密商未来行止大计。他们谈了好久，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是：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集团，走自己的路。

密商结束后，傅作义要王克俊找刘后同先生共同商量，起草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为了绝对保密，这份电报是由北平地下党的电台发出的。电报的内容也是由傅作义口授给傅冬的，没有底稿。在这封电报中，傅作义为了表示其诚意，如实向中共中央转告了他所属部队的数量，要求中共派人到北平谈判。

傅作义将军决定和共产党和谈，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他知道，他几十年与共产党兵戎相见，与共产党结怨甚深；他作为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天天讲“剿共”、讲“勘乱”，现在又要主张和共产党和谈，他的部下能转过个弯子来吗；如果蒋介石知道他与共产党和谈，一怒之下派出飞机轰炸北平，该如何是好；如果有人说他与共产党和谈是叛逆，损伤他的人格，将如何处置……一连串的问题压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却又不便与人交谈，只好找到他的密友刘后同先生倾诉一番。

刘后同先生对此作了深切的开导。他对傅作义说：“商汤与武王，原来均为桀纣之臣，可是后来他们发动了讨伐桀纣的战争，后人不但把他们看作是叛逆，相反称赞他们是圣贤。为官主要讲求一个‘忠’字，但所谓忠，是要忠于人民的事业，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提倡民主，人民有权罢免国家元首。国家官吏言忠，自当以人民公意为标准。现在国事败坏至此，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期盼和平，政权需要改造，你能顺应历史潮流，迎合民众之心，起而提倡和平，可以预见，人民一定会提壶送酒欢迎你，谁还会说你叛逆呢？”杜任之、崔月犁听说傅作义有思想顾虑，也通过刘后同先生捎话，明确告诉傅作义，只要他让共产党和平接管北平，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共产党是不会亏待他的，请他放心。北京和谈，按说是水到渠成，用不了多少时间即可达成协议的。而事实上，从傅作义派代表第一次出城谈判，到最后达成协议，竟然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傅作义坚持想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所占的地盘，提出要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把他的统治区改称“和平区”，把他的军队改称“人民和平军”。但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却不同意傅作义的这种意见。毛泽东起草的以军委名义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领导人的电报中指出：“与傅方谈判必须以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给予宽大待遇。”电报中还指出：“不解决傅的军队，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巩固的。”双方的认识差距这么大，要谈通自然需要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平津地区蒋系军队比傅系军队多几倍，不到一定的火候，傅作义是很难命令这些军队放下武器，转向人民的。为此，我党中央决定在军事上增加压力，促进蒋系军队放下武器的火候早日形成。

1948年11月28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华北解放军毅然放弃原定攻打归绥的计划，突然挥师包围了张家口，发起平津战役。

张家口是平绥路的咽喉要地，包围张家口即切断了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西退之路。

傅作义为解张家口之围，立即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35军，火速驰援张家口被围的部队。结果，第35军被包围于新保安。傅作义闻讯，又命蒋系的第16军、傅系的第104军援救第35军。正当傅作义忙于西线战事时，我解放

军东北野战军奉毛泽东之命，连夜向关内疾进，于12月上旬兵临平津城下。这样，傅作义集团的部队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几个孤立据点，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之中。

12月15日，傅作义派代表出北平城，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要求停止战斗，双方组成联合政府。而解放军方面的代表却要求傅作义把蒋系军、师一级的长官全部抓起来，立即宣布起义。话不投机，故谈判陷入僵局。

12月22日，解放军对围在新保安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双方激战10小时，全歼敌人16000人。

12月23日，张家口守敌仓皇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强大打击，除司令官带少数随从逃走外，其余54000人尽被歼灭。

傅作义获此败讯，受到严重打击，竟摔倒在门边，被卫士扶起。他痛哭流涕，自己一连打了自己几个耳光。

杜任之同志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去找刘后同先生，请他劝傅作义与共产党重新谈判，不要丧失大好机会。

刘后同也替傅作义着急，等杜任之告辞走了，便立刻赶到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傅作义见刘后同先生来见他，就垂头丧气地说，“这一下我的政治生命算是全完了！”

刘后同先生关切地说：“你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决心继续跟共产党和谈。蒋介石已是日暮途穷，连他自己也顾不了自己了，才要你率部南下帮他挽救失败的命运。你如果南下，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葬送那些北方子弟的。再说，平津被包围，四面楚歌，南下、西进都是不可能的。事到如今，你再不能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必须抓紧时间与共产党恢复和谈。现在，咱们的和谈资本虽然远不及过去，但和议一成，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城内居民财产受到保护，还是深得人心的。和谈这条路，不是你想不想走，而是必须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时不待我，你还是尽快下决心吧！”

惆怅满腹的傅作义将军，听了刘后同先生的这一番话，立刻转忧为喜，当天他就给毛泽东主席拍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准备再派代表跟共产党谈判。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亲笔起草一份电报稿，拍发给林彪。这封电报要林彪作好傅作义的工作，把电报中的几点指示派人进城告诉傅作义。其指示的意思是：你们应该做好傅的工作，只有在这时傅才有可能接受我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傅氏反共甚久，我们不能不将他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他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会立即加强；只要傅让我们和平接管北平，他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的战犯罪。电报说，我们希望傅派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1月7日，傅作义将军再次派代表出城和谈。此次和谈，形成一份《会谈纪要》的重要文件。《纪要》中提出和平改编平津守军的意见，并商定了妥善安排各类人员的优厚政策。傅作义看到这个文件，情绪沉闷，仍犹豫不决，说他的部队情况复杂，不能按期执行《纪要》。解放军敦促天津守军按时出城接受改编，也遭到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拒绝。在此情况下，为了向傅作义背上猛击一掌，按期执行《纪要》，我党中央军委和平津前线领导人决定对天津发起进攻。

1月14日，解放军以强大火力向天津发起攻击，仅用29个小时，便攻

入天津。

1月16日，双方举行第三次会谈，傅作义将军终于与共产党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他按照协议精神，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不久便率一个总部、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及所属25个师约25万余人，按时开到北平城外指定的地点，接受了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派首批警卫部队入城，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刘后同先生感到非常高兴，地下党的同志握着他的手，赞扬他是“和平老人”，为保卫北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解放，刘后同先生不敢居功，心满意足地返回到天津。全国解放后，他被选举为天津市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市政府又任命他为房管局局长，直到1961年才病逝，享年79岁。

绝不与蒋介石合作的将军

于学忠将军一生以“忠勇”著称，逐步由一名战士升任为将军。他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得到直系大帅吴佩孚的赏识。吴佩孚兵败，蒋介石数次派人拉他投靠北伐军，他不为所动，仍效忠于吴佩孚。后来又投靠张作霖，又效忠张氏父子。他任北平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一直坚持与日本人斗争，受到日本人的诬陷、暗杀，解放后站到人民一边……

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涌现出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的传奇故事久传不衰，受到后人的推崇和赞誉。于学忠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被称作忠勇将军。“忠勇”者，为人忠厚诚实，不朝秦暮楚，作战勇敢，敢打敢胜，永立不败之地也。

于学忠，山东蓬莱人，1911年毕业于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步兵科。毕业后，他投到热河林西镇守使米振标的麾下，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短短的三年中，他以自己优长的军事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受到米振标的器重，破格被提拔为中校副官长。

1917年，陆军第18混成旅在湖北成立。旅长赵荣华素知于学忠带兵有方，便向米振标提出，要调于学忠到18混成旅任职。优秀的人才谁也喜爱，米振标自然不愿放于学忠离开自己，于是婉言拒绝了赵荣华的要求。

赵荣华对于学忠志在必得。遭到米振标的拒绝后，他并不罢手，就去找当时的军统帅姜桂题，要姜大帅帮他于学忠调到18混成旅。

姜桂题不解地问：“天下人才济济，用谁不行，而你却偏偏要调于学忠？”

赵荣华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我素知于学忠机警能干，是难得的人才。18混成旅有我无我不要紧，却不能没有于学忠……”

“有这么严重吗？”姜桂题插嘴问道。

赵荣华肯定地说：“确实如此。有于学忠，18混成旅可以带出一批可用的中下级军官；而没有于学忠，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姜桂题终于被赵荣华说服，为此特向陆军部打报告，陈述了调于学忠到18混成旅任职的重要性，请求采用组织手段促成此事。

陆军部批准了姜桂题的报告，米振标不好再阻止，于学忠便被调到18混成旅，任炮兵营营长。

于学忠到18混成旅任职不久，就遇上了驻守在宜昌的第21混成旅哗变。

哗变之际，宜昌城内炮火连天，乱成一团，变军到处烧杀抢掠，所有商店、钱庄被抢窃一空，百姓被杀被害者不计其数。同样驻守于宜昌城内的于学忠部，在于学忠的管理约束下，全营官兵处变不惊，没有一兵一卒参与骚乱。事后，各方面人士都褒奖于学忠治军有方，军纪严格，不扰害百姓。由此，赵荣华对他更加器重和信赖。

1921年秋，宜昌处在川军熊克武和刘湘的围攻之下。兵临城下，城内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一日数惊，都说驻军将不日弃城东撤，川军很快就要进城了。

驻守宜昌的部队，就是第18混成旅。

旅长赵荣华开始对来犯的川军并不放在眼里，认为川军装备差，又缺乏训练，是经不起打的。因此，当川军开到鄂西时，他觉得宜昌还是后方，用不着作什么准备。可是，等到鄂西几处军事要地相继失守，大军直逼宜昌时，他才大起惶恐，发现他的判断是错误的，如不采取非常措施，后果将会不堪

设想。

一天，赵荣华带着几名随从到前沿阵地巡查，发现川军不仅声势浩大，而且战斗力很强，攻城的火力很猛，十分担心他的部队难以守住宜昌。

他心事重重地回到指挥部，思考着下一步应如何行动。他认为，如果他的部队弃城而去，不仅影响到他的声誉，而且会影响到他未来的前程。如果死守宜昌，一旦城被攻破，他的第 18 混成旅势必被川军歼灭，铸成千古大错。值此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之际，事关重大，他觉得还是找一位有高远见识的心腹之人征求一下意见进而妥善作出进退决策为好。有了这种想法，他首先想到的人选就是于学忠。

于学忠对眼下的局势是十分关心的，而且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但他自认为自己人微言轻，论年龄才二十大几岁，属于乳臭未干之辈；论职位仅是一个小小的营长，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没有过问决策的权利，团长是绝不会征求他的意见的。因此，当赵荣华把他叫到自己的官邸，说明召他来见他的原因时，他受宠若惊，激动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赵荣华开门见山地说：“眼下，军中有几种意见，有的主张撤，有的主张守。学忠，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什么也不需顾虑，有什么说什么，说错了也不要紧。”

于学忠略略想了想便说：“川军人多势众，入鄂以来连战连捷，士气正旺；而咱们的部队数量有限，且伤亡很大，形势确实严峻。可是，我们应该看到，川军虽然人多势大，但熊克武和刘湘同床异梦，各怀私心，互相猜疑，很难长期协调合作，统一行动。特别是川军连连打胜仗，必然在战利品的占有上出现矛盾，加大摩擦。再者，川军入鄂日久，军火弹药消耗很大，大有不可维继之势。据卑职估计，川军近日即会出现弹药匮乏的问题。还有一点，川军长途跋涉，士卒疲惫不堪；而我军以逸待劳，仍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如果旅座向全军官兵讲清敌我双方的形势，我 18 旅的军心一定会得到巩固。这样，我军不仅可以坚守宜昌，而且及时捕捉战机，破敌也是不难的。至于有人言退，卑职以为这是一种短见，是绝对不可听的。试想，川军几面合围，我军突围，必然遭到分割、追击；我军官兵一心突围，无心与敌交手，又且立足不稳，争相逃命，岂不要全军覆灭吗！”

于学忠对敌我双方的精辟分析，令赵荣华心悦诚服，于是决定坚守宜昌。

打定主意后，他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军官会议，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会上，赵荣华破例邀于学忠参加会议，要于学忠向全体军官陈述守城与弃城的利害得失。听了于学忠的分析，有效地打消了军官们的疑虑，一致表示坚决守住宜昌城，与川军决一死战！

川、鄂两军又相持十余日。

午夜时分，直系大帅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此时，于学忠正在阵地上，有幸见到吴佩孚。

吴佩孚向他询问城里的防守情况，于学忠一一作了回答，他什么都清楚，像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一样，把各方面的情况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毫无含糊其辞之处。

吴佩孚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年轻军官非同凡响，便问：“你叫什么名字？任何职？”

于学忠如实相告。

吴佩孚高兴地拍着于学忠的肩膊说：“你还很年轻，但我发现你的才能

早超过了你的年龄。你是我见到过的年轻人中最出色的一个，将来必然会成大器的。你要好好干，有机会我会重用你的……”

就在这一天的拂晓，战场局势发生了变化，鄂军由防守转入反攻，川军节节败退。

将川军彻底赶出湖北，吴佩孚在停泊于长江的兵舰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宜昌守军总司令卢金山向吴大帅汇报战况。他原本就不善谈吐，加之对整个战场的情况了解很不全面，因而汇报时吞吞吐吐，罗里罗嗦，东拉西扯，很不得要领，让人越听越糊涂。卢金山自己对自己也不满意，说到后来，心情愿来愈紧张，竟窘得满头冒汗，更加言不达意。

吴佩孚实在听不下去了，便打断卢金山的话说：“你部有一个炮兵营长叫于学忠，你就叫他来代你汇报吧。”

卢金山如遇大赦，立刻擦掉脸上的冷汗，退了出去。上岸后，他便派人把于学忠叫来。于学忠赶来后，他说：“吴大帅让你汇报宜昌战况……”

于学忠不解地问：“卢司令，我是一个小小的营长，怎么让我汇报宜昌战况呢？你不是弄错了吧？”

卢金山说：“是吴大帅亲自要你去的。你要小心汇报，千万别给我捅出漏子来。”

于学忠答应一声“是”，然后向军舰走去。

吴佩孚正伏案挥毫写字，等于学忠来了，他边写边问战场的情况和战争的进展。

于学忠有问必答，把他所知道的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最后又陈述了自己考虑已久的反攻计划。

吴佩孚越听越高兴，当于学忠谈毕他的反攻计划时，他激动得把手中的毛笔扔掉，竖起大拇指，朗声大笑着夸奖于学忠说：“于真将材也！”

于学忠也很激动，便大胆走上去，从桌子上捡起毛笔，在纸上画了一幅简单的作战地图，标出双方进军形势和鄂军追击川军应选择的路线。吴佩孚看过地图，略加思考便肯定地说：“就照你的意见办！”于是，他当即命人据此制订了作战方案，然后付诸行动。

经过五个昼夜的激烈战斗，鄂军终于击败川军，川军大规模溃退，鄂军乘胜追击，将失去的地盘全部收复。

吴佩孚回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川、鄂两军战斗的经验教训。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问诸将领：“此次两湖之行，诸位以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大家小声议论一番，然后有人发言说，最大的收获是在吴佩孚的亲自指挥下，川军溃逃，把湖北所有失地收复了，也有人说，最大的收获是鄂军打出了军威，在全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今后直系军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谁知吴佩孚听了都不以为然，不住地摇头，连说不对。在大家陷入茫然之际，吴佩孚突然哈哈大笑一阵，然后神采飞扬地说：“你们所说的那些收获都算不了什么，川军本来就是一伙乌合之众，被我们打败是必然的。我以为最大的收获，是我此次赴鄂，发现了一名难得的将材，他就是赵荣华旅的炮兵营长于学忠。此人能力不凡，可作大用！”

他说毕稍停片刻，即宣布：“第三师有一位团长出缺，就调于学忠递补

吧。”

赵荣华一向倚重于学忠，当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米振标那里要来，岂可轻易放走？当他听到吴佩孚拟调于学忠到第三师任团长的消息时，就当机立断，任命于学忠为第 18 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接着，他向吴佩孚复电，说于学忠已升任团长，驻守宜昌。他为了打消吴佩孚硬调于学忠的念头，在电报中强调说，宜昌是鄂西南的军事重镇，是兵家必争之地，非于学忠这样的人把守不可。

吴佩孚接到电报，完全理解了赵荣华的用心，微微一笑，不再提此事了。

1922 年年底，川军中发生内乱，分为两派，互相攻杀，把四川搅得像一团乱麻。

吴佩孚觊觎四川多日，今见有机可乘，便决定派兵入川。为此，他组织了以卢金山为总司令、以赵荣华为前敌总指挥的援川军，下令向四川进军。

此时，于学忠所统带的步兵第二团，已改编为混成支队，被编入援川军中，而且被指派为前锋主力。他率兵入川后，很快攻克了万县，接着乘胜进兵，相继占领梁山、热江、重庆等地。1923 年夏天，他指挥的混成支队已到达离成都仅有 60 华里的龙泉祥，即将对成都发动全面进攻。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前敌总指挥赵荣华贻误战机，未能使进攻成都的部队按时投入战斗。后来，他在指挥作战时又指挥不当，使川军的反攻得手，置援川军于被动地位，不仅攻成都的计划落空，而且连已经到手的重庆也被夺去。

这一严重失误大大触怒了吴佩孚，电令赵荣华听候纠勘，由于学忠接任第 18 混成旅旅长之职。

于学忠接任旅长后，重新部署兵力，激励士气，亲自率兵发起反击，经过数场恶战，终于把失去的重庆又夺了回来，为援川军挽回了面子。

1924 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又拉开战幕。

就在直、奉两军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冯玉祥突然发动了“北京兵变”，从内部瓦解了直系的兵力，致使直系军全线崩溃。兵败后，吴佩孚仓惶出逃，先到黄州，后又到岳州。

于学忠获悉吴佩孚居岳州，决定亲到岳州探望。这时，有不少人劝他还是以不去为好。他们认为，吴佩孚眼下大势已去，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为了劝于学忠应该审时度势，与冯玉祥取得联系，以图大的发展。

于学忠不仅不接受这些人的劝说，而且理直气壮地驳斥说：“玉帅对我有知遇之恩，他虽然兵败，但我决不背弃他，一定要一如既往忠于他，支持他！”于是，他赶赴岳州，面见吴佩孚，商讨今后如何竿振军威，以图发展。

见到吴佩孚后，于学忠执礼甚恭，一再表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也不会变心，一定听从吴佩孚调遣。他的这一态度，使吴佩孚深受感动。吴佩孚拉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我没有看错，你真是一个忠勇将军！”

就在这次会见中，吴佩孚和于学忠认真分析了眼前国内军阀混战的局势，决定在适当时间重新组织兵力，对冯玉祥实行报复。

第二年 10 月，吴佩孚东山再起，出任“十四省讨贼总司令”，不少直系将领重新投到他的麾下，于学忠被任命为陆军第 26 师师长。

陆军第 26 师的师长，原是大总统曹錕之弟。该师在前一年的直奉战争中已全师覆灭，没有一兵一卒了。吴佩孚委任于学忠出任该师师长，意在让于学忠白手起家，创建一支属于于学忠自己的队伍，进而干一番大事业。

对吴佩孚的良苦用心，于学忠心领神会。于是，他以他的第 18 混成旅为基础，扩编为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一个个炮兵营，完成了他对第 26 师的重新组建。该师最早驻扎于湘南，后来又移驻宜昌。

1926 年夏天，北伐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发动猛烈进攻。吴佩孚为抵御北伐军，任命卢金山为总司令，于学忠为副总司令，负责长江上游的防务。

卢金山是一昏庸之辈，部队临出发前，吴佩孚把实际责任交由于学忠负责。

武汉告急，于学忠深感自己兵力不足，屡请卢金山派兵增援。但卢金山犹豫不决，迟迟不发援兵，致使武昌失守。

卢金山预感到直系军终久不会战胜北伐军，便滋生了与北伐军议和的想法。但他知道，此举没有于学忠参与不会成功，即使侥幸成功，将来也无法掌握部队。在进退两难之际，他不得已作出一个连他自己也接受不了的决定：弃军入川，去投奔他的旧友刘湘去了。

北伐军以锐不可挡之势，很快进入湖北，进而占领了全省。于学忠虽率部死战，但形势不可逆转，只好率军北撤，驻守于鄂豫交界的谷城，等待时机再战。

此时，直系各部均遭北伐军重挫，死伤惨重，溃不成军，只有于学忠的第 26 师还算完整，尚有一定的战斗力。

吴佩孚把收拾残局的希望寄托在于学忠的身上，任命于学忠为鄂北、豫南联军第 9 军总司令兼荆襄总司令，统辖四个师的兵力，驻守傅家寨。

因谷城、傅家寨一带地面不大，连军需都难以筹措，于是于学忠毅然决定避开北伐军的锋芒，向北发展，率部入豫。

于学忠在河南很快就站稳了脚跟。

北伐军认为，于学忠是阻碍北伐顺利进军的最大障碍，如果能说服于学忠归附，即可打通北伐的通道，加快北伐的进度，于是决定派人与于学忠联系。

第一次，由唐生智派姚荐楠入豫，游说于学忠。

姚荐楠是于学忠的同学，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当他来到河南，于学忠热情接待，促膝交谈。开始，两人交谈离情别绪，交谈往日的友情和上不了时的旧事，谈得十分投机，不时报以欢快的笑声。后来，姚荐楠见时机成熟，就动员于学忠归附北伐军，籍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

于学忠听到此，立刻勃然变色，神情严肃地说：“我若肯附南早在宜昌时就决定了，何必要等到今天呢，我今移师河南，就说明我没有归附北伐军的意思，别人说什么我也不会改变初衷的……”

姚荐楠见于学忠态度坚决，毫无商量的余地，不便再说什么，只好快快告辞，离开河南。

第二次，是蒋介石亲自派陈干说项。

陈干与于学忠系同乡，也是山东人，他早年就与于学忠相识，交情甚厚，他见到于学忠后，反复讲蒋介石如何爱慕于学忠，希望于学忠不负蒋介石的一片爱心，与蒋介石一起完成北伐大业。谈话中，他还出示蒋介石托他给于学忠将军带来的委任状，以高官厚禄引诱于学忠。于学忠不为所动，委婉地说：“蒋先生的厚意我领了。但我是玉帅的部下，做人应讲请求道义，不能见利忘义，不顾人格，背主求荣。我有我的难处，请你把我的意思转达蒋先生，请他能体谅我的苦衷，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下决心

不附南的……”

陈干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离去。

1927年，形势发展愈来愈对直系军不利，吴佩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连直系的不少将领也背弃了他，到后来连安身之地也没有了。于是，他带着他的一帮随从，来到于学忠的军中，求得保护。

于学忠自然表示欢迎，作了妥善安置，礼待有加。

因吴佩孚来到第9军，所以反对吴佩孚的各方政治力量和派系，都把目光投注在于学忠的身上，第9军亦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军阀甚至调兵遣将，以驱吴为借口，要对于学忠部发动进攻。就是第9军内部，也意见分歧，议论纷纷，主张把吴佩孚驱赶出第9军去。

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大家正自讨论全国战争局势时，自然又提到驱吴的意见。

第七师师长阎得胜说：“吴佩孚的目标太大了，有他在我们9军，第9军就不会脱离险区。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卸掉捆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炸药包，以礼相待，把吴大帅送出第9军防区……”

不等阎得胜说完，于学忠就拍案而起，打断阎得胜的话说：“玉帅正在患难之际，我等岂可落井下石！若诸君皆有礼送玉帅之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和诸君！”

将领们素来敬重于学忠，现在见于学忠如此重义，深受感动，便不再提“礼送”的话了。

其实，阎得胜所言，并非他一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思。所谓“礼送”也是看在于学忠的面子上提出来的，而按照第七师师长阎得胜和第八师师长秦建斌的本意，是要干脆赶吴佩孚出门的。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吴佩孚的耳朵里。

吴佩孚能体谅于学忠的难处，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可能长期留在第9军不走，便召来于学忠说：“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着你的！但我不准备长期留在这里，决定近日就到四川去。四川偏远，便于安身，我想无论杨森，还是刘湘，都会收留我的。”

“玉帅，你敢是听到什么话了吗？”于学忠诚惶诚恐地问。

吴佩孚微微笑了笑说：“听到怎样，没听到又怎样？离豫入川，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至于你的部下说什么，我是不会计较的，你就别问了。”

于学忠实在有点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愧对吴佩孚。再者，觉得连吴佩孚都失去信心，要到四川隐居，自己又能有什么大作为呢？于是，他向吴佩孚表示说：“学忠无能，不能助玉帅重整大业，愧对玉帅素来对我的倚重。我意已决，玉帅入川后，学忠也无心留在军中，当卸职归乡，作一个平头百姓好了！”

吴佩孚不以为然，劝说道：“你还年轻，连四十岁都不到，正是年富力强、建功立业的时候，怎么能萌生这种想法呢！”

于学忠仍坚定地说：“我意已决，玉帅就别再劝我了！”

吴佩孚离豫入川后的第二天，于学中便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即宣布下野。他沉痛地对他的部属说：“学忠无能，已无法挽回眼下颓势；大军久驻邓县，骚扰当地百姓，却不能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军中粮饷不继，让大家跟着我忍饥受冻，于心不忍。我反复思忖，觉得自己再不宜留在军中，决定很快回山东老家去，再不过问军中之事了。”

部属们听了于学忠的话，深感意外，像晴天听到一声惊雷似的，被震得呆若木鸡。过了半晌，等回过神来，大家便纷纷劝阻，恳辞挽留，说什么也不让于学忠下野。

于学忠去意坚决，谁劝也没用。会后，他把军中的事略作交待，委托阎得胜等人管理军务，然后便带了几名亲随，毅然离开第9军，回山东蓬莱去了。

于学忠下野不久，阎得胜等人的能力、资历和声望都不足以服众，各部自行其事，开会时主张各异，吵架成为常事。因此军心涣散，号令不行，部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一些正直的人不愿看到于学忠辛辛苦苦带出的这支队伍就此毁掉，便主动邀集在一起，赶赴蓬莱，请于学忠重新出山，主持局面。

于学忠听几个部属讲了眼下军中的混乱局面，感到十分痛心。想到他再度出山时，他显得颇为矛盾。他知道，他拒绝出山，他的部队就会彻底完蛋；答应出山，虽然部队暂时可以保持存在，但从长远考虑却是很难支撑下去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当时全国局势险恶，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环境复杂，没有一个事实上的靠山是不行的。可是，该找谁作靠山呢？他陷入了长长的思考之中……

当时，全国最有力量的政治军事集团，当数国民政府、冯玉祥和张作霖。国民政府数次派人联络，都遭到于学忠的拒绝，于学忠自然不会考虑依附国民政府。冯玉祥自发动“北京政变”，从直系中分化出去后，于学忠从感情上始终不能接受，因而也不可能去投奔他。斟酌再三，于学忠觉得要投靠也只能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了。

于学忠选择了张作霖，是有一定原因的。早在于学忠率部从湖北退到河南时，奉系即开始了对于学忠的拉拢。东北军某师长应振复，曾在鄂军第八师任过参谋长，与于学忠是老相识。他对于学忠的才干和人品都是很崇尚的，所以到东北军后，常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面前称赞于学忠，说于学忠的部队是直系中最精良、最有纪律的部队，并建议张氏父子设法将于学忠拉到奉系中来。

张作霖年轻时曾在毅军中当过骑兵小头目，于学忠的父亲也曾在毅军中当过兵，两人本是老相识。张作霖听应振复介绍了于学忠的情况后，由父及子，立刻对于学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派范江浦、宋学礼两人去见于学忠。

范、宋临行前，张作霖特意吩咐说：“你们见了于学忠要告诉他，我和他父亲是老相好，看在父辈的交情上，我会随时关照他的，他有什么困难，尽可提出来，我一定帮他解决。如果他处境不好，尽可来投奔我，我是不会亏待他的。”

考虑到两次直奉大战，结怨交恶甚多，张作霖又让范浦江、宋学礼捎话给于学忠。他说：“你们告诉于学忠，过去直奉交战，是我和吴佩孚间的事，与他无关，让他别以此为虑。”

范浦江、宋学礼接受任务后，就到了于学忠的军中，作于学忠的工作。到于学忠下野后，他们两人又送于学忠到蓬莱，待于学忠把一切都安顿好，才回到北京复命。

就在于学忠决定复出，率部投奔张作霖之际，张学良派周光烈到蓬莱邀请于学忠赴北京面商大计。

于学忠觉得这是他试探张氏父子对他的态度，进而决定他是否率部投靠奉系的极好机会，于是他爽快答应，不日即率领他的随从人员，启程赴京。

到北京后，于学忠在大元帅府晋谒了张作霖。

张作霖见到于学忠非常高兴。他拉于学忠坐在他的身边，毫不做作，与于学忠敞开心扉交谈。

于学忠见张作霖心直口快，态度友好，不禁对张作霖产生了好感，觉得跟这种人共事痛快。

提到鄂军投奔奉系对，张作霖诚意地说：“我与令尊系少年朋友，曾在宋老师部下共事5年，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不是我以长辈自居，而是事实确实如此。从这一点讲，我们是世交，你我都不是外人，我怎么能亏待你呢？”

于学忠原计划等跟他的部属们商量后再决定是否投奔奉系，今见张作霖一片诚挚，便改变主意，决定借今日晤面，就把态度表明。于是，他坦率地说：“自湖北战败后，我的部属走投无路才迫使我来见大帅的。我找大帅，别无他意，只是想安置好我的部属，让他们有一碗饭吃；至于我个人的进退，是没什么考虑的。”

张作霖乐呵呵地笑着说：“我们又不是外人，不重用你又能重用谁？”停了停，他又说：“我对你没什么要求。你对吴子玉（即吴佩孚）的忠诚我都听说了，我只希望你像对待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够了。”

交谈毕，张作霖留于学忠在大元帅府共进午餐。席间，张作霖又询问了于学忠不少事情，于学忠一一如实回答。

饭后，于学忠又去见张学良，两人谈话十分投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二天，张作霖便发布命令，任命于学忠为镇威军第20军军长。从此后，于部归奉系节制。

于学忠回到自己的军中，召见各级军官，将他会见张作霖的情况告诉大家。众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支持于学忠的决定，并接受于学忠的安排，立即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将四个师合编为三个师，然后开赴山东济宁驻扎，后来又移驻河北东光、任邱和廊坊。

蒋介石组织二次北伐，奉军战败，张作霖不得不率部退到关外。谁知火车行到皇姑屯，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回奉天主持大局，命令于学忠部移驻山海关。

山海关是关内通往关外的咽喉要地，在此非常时期，张学良委任于学忠为临绥驻军司令，把守山海关，可见张学良对于学忠是何等信任和倚重。

1930年，中原大战开始，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派代表到奉天游说张学良，争取对自己给予支持。

同年6月，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商讨是否再次入关作战。于学忠参加了会议，和大部分东北将领的主张一样，不同意急于出兵关内。张学良采纳了这一意见，没有出兵。

蒋介石急于要张学良入关助战，便竭力拉拢张学良。7月2日，他委任张学良为海陆军副总司令，并委任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

蒋介石到此为止，还未打消拉拢于学忠的念头。于学忠的参谋长陈贯群和蒋介石是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关系相当密切。为此，蒋介石委托陈贯群从中疏通，说服于学忠向他靠拢。陈贯群答应了蒋介石的委托，将蒋介石写给于学忠的信转交给于学忠。在信中，蒋介石要于学忠从山海关率兵西进，攻

打阎锡山的晋军。他还许愿，事成之后，在华北地盘上，于学忠想要什么地位他都答应。

于学忠看过信后，只是淡然一笑，在陈贯群面前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后来，他把信直接交给张学良，又复信给蒋介石。在信中，他说：“我是张学良将军的部属，只能听命于张学良。只要张学良将军下令，学忠才能挥师西进。”

蒋介石见于学忠不为利诱所动，就转移目标，从他的部属中下手。第23旅旅长马廷福是一个见利忘义之徒，在蒋介石高官厚禄的诱惑下，答应率部投靠国民政府。为了立功，他利令智昏，竟然产生了拉于学忠与他一起投靠蒋的想法。

一天，马廷福见左右无人，就用言语试探于学忠。他说：“纵观中国局势，将来能统一全国者非蒋介石莫属。你我应提前作出明智的抉择。”

于学忠问：“何为明智抉择？”

马廷福说：“眼下中原鏖兵，蒋介石力量尚显不足，如果你我趁此机会助蒋介石一臂之力，待中原大战结束，我们就是功臣，自然会获得优厚待遇的。”

于学忠此时并不知道马廷福已经答应投蒋，因而仍晓之以理，尽力开导马廷福别生他念，他说：“东北军待我们不薄，我们应以信义为重，千万不可朝秦暮楚，让天下人耻笑。你刚才说的话，到此为止再别跟任何人说，以免引起军中混乱。”

马廷福当面答应得好，说他再也不敢胡言乱语了，可背后却频繁活动，拉拢了好几个军官，准备去投蒋。

于学忠是一个十分心细的人，很快从种种迹象中看出，马廷福要挺而走险，在他的第20军中发动兵变。于是他当机立断，把情况向张学良作了报告。

张学良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第20军团长以上军官召集到沈阳，出其不意将马廷福及其同伙当场扣押，顺利地平息了这次兵变。

张学良从整个民族利益出发，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易帜，归附国民政府。这年的9月18日，他宣布易帜后，立刻将东北军编为两个军，分由于学忠和王树常率领，决定进兵关内。

发兵前，张学良在沈阳召见了于学忠、王树常等主要将领。召见中，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是我们东北军第四次入关作战了。前三次入关，我们东北军都形象不佳，尤其以张景惠入关那次最坏，至今遭到国人的唾骂。此次入关，为的是倡导和平，促成国家统一。希望你们理解我的苦心，勿忘出兵之目的，把我交给你们的事情办好。你们说说看，入关以后将如何行事？”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怎么说为好，都把目光投向于学忠，希望于学忠代大家发言。

于学忠略略思忖后，便起立回答说：“我个人的想法是，东北军入关作战，第一做到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惊扰，不遭糜烂，国家不遭损失，我们东北军也不作出任何牺牲，努力与晋军保持友谊。我们如果只到河北、察哈尔两省，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第二，如果实在不打不行的话，那么我以为首先在娘子关派兵作出佯攻，然后派出一支劲旅直趋大同，则山西的问题即可解决，用不着耗费大的兵力。当然，我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占领山西，但这样做必然会引起蒋介石的嫉妒。这就与我们入关的初衷不相符了。”

张学良完全同意于学忠的意见，并强调说：“我们最好采取于军长所说的第一点，争取做到不是一枪解决问题。要让老百姓说我们东北军是仁义之师，就得严格军纪，做到秋毫无犯。做得怎样，就看你们的了！”

当日下午3时，于学忠率部誓师，由沈阳入关。

入关后，于部进展神速，到9月12日即顺利抵达天津，26日又进入北平。原占据平、津的晋军，见东北军入关，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立即就龟缩回山西去了。整个华北（除山西外）为东北军所据有。

随着东北军入关，中原大战很快胜负分晓。10月9日，张学良赴南京就职，把华北划归张学良管辖。

1931年4月，张学良因患伤寒病住院，将东北军交由于学忠指挥。

石友三早与日本人有勾结，他见张学良患病住院，便在日本人特务长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趁机策动叛乱。

对此，于学忠早有觉察。为了遏止石友三的叛乱进程，他以平津卫戍令的名义，亲自到石部驻地视察。

石友三不得不装出一副恭敬的样子，热情接待他，但他还是在视察中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果然如于学忠所预料的那样，石友三不久便打出反叛的旗帜。

面对石友三的反叛行径，7月19日，于学忠召集入关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

会上，以王树常军长为首的一部分人认为，石友三是一个狡悍之徒，又拥兵6万，所部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是一股很难制服的顽敌。再者，石友三部盘据华北日久，地形熟悉，背后又有日本人在撑腰，如果采取硬打的办法，很可能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入关的东北军应避开石友三部的锋芒，暂时退回到东北去。

而于学忠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东北军在国内是一支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武装力量，如果被石友三逼出关外，则东北军从此威风扫地，别说今后在华北立足，就是保守东北也有了问题。为此，他主张不管怎样，东北军也要与石友三部决一死战。两种意见各据其理，难以统一，只好由张学良定夺。张学良同意于学忠的意见，决定与石友三兵戎相见。于是，他任命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负责指挥平汉路一线的作战。

7月21日，于学忠赴保定督师，制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计划。他首先命白凤翔率本部官兵引诱石友三部进入东北军防区。当石友三部追击到石家庄，东北军稍作抵抗，以怯战为假象，立刻弃城而去。石友三部完全被东北军的假象所迷惑，真的认为东北军不敢与他们迎战，便大胆地越过滹沱河，追到保定、望都一线，企图把东北军一举击败。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于学忠在此布下了重兵，以逸待劳，正准备与敌决战。因此，双方在保定、望城一线展开激战。到此石友三才发现入了于学忠设置的圈套，立即传令撤退，一时间，军心大乱，各部狼奔豕突，四散奔逃，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趁此机会，东北军发起总攻，全力追击石友三部。溃兵逃到滹沱河边，一时找不到渡河的舟船，只好涉水逃命。其时正值河水暴涨，石友三部被冲走、淹死者不计其数。此役中，石友三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投降。石部6万余众，被消灭殆尽，逃逸者仅有包括石友三在内的三千余人。一场来势凶猛的叛乱，前后不到半月即被平息。“九·一八”事变的恶讯传来，正在北平的张学良惊怒不已，立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于学忠慷慨陈

词，主张对日本关东军实行军事报复。他说：“日本人如此横行，完全不把我东北军放在眼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豁出牺牲三个团，给日本关东军以严重打击，挫其锐气，用以取得国人的谅解！”

张学良完全同意于学忠的意见，怎奈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他只好报以沉默。会后，于学忠以为自己作为张学良信任的部属，有责任向张学良陈说利弊。于是，他再次面见张学良，感情颇显激动地说：“我们完全执行蒋委员长的不抵抗命令是不对的。一旦出现不测，蒋某人会把一切责任推到你的身上的；到那时，你浑身是口也说不清了。民族的罪人不能当啊！如果东北全部沦陷，三千万东北同胞将会全部变成亡国奴，几十万东北军还有何颜面存在下去！”

然而张学良和于学忠的爱国热情被蒋介石扼杀，不仅东三省沦陷，接着连华北也眼看要失守。

于学忠作为平津卫戍司令，不能进军东北，却有权在他的防区加强对日军的防范。日本人为了尽快占领华北，便频频试探，诱逼于学忠投降。于学忠软硬不吃，使日本人的花招一次又一次宣告败。

日本人恼羞成怒，屡屡向南京政府发难，提出必须撤销于学忠平津卫戍司令的职务，否则将采取必要措施。日本人还用威胁的口气警告南京政府，如不撤销于学忠的职务，日中两国间则有可能再次出现战端。

被日本人吓破了胆的南京政府，被日本人的威胁搞得惊慌失措。蒋介石本拟照日本人的话办，解除于学忠的职务，却又找不到理由，更找不到于学忠的什么错误。进退维谷之际，他为了讨好日本人，只好请张学良出面，说服于学忠主动提出辞职。

张学良虽然答应了蒋介石，却不同意让于学忠辞职，便想了一个自认为两全俱美的办法，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付诸实施。因此，他找到于学忠说河北省的问题很复杂，王树常能力有限，很难驾驭局势，拟让于学忠和王树常换职，让于学忠出任河北省主席。

于学忠不好说什么，只好答应。

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后，便集中精力首先整顿秩序最乱的保定的社会秩序。

保定市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混乱不堪，主要是日本人经常挑起事端，还收买了一批汉奸和地痞、流氓，有意闹事，祸害百姓，而城内的保安队又人数有限，很难应付这种局面。

根据中日双方协定，保定城内不许派驻中国的正规部队。于学忠作为省主席，是不会让这种混乱局面继续下去的。因此，他把113师的两个团，改穿了保安队服装，进驻保定城维持秩序，对那些汉奸和祸害百姓的地痞、流氓严加惩处，很快使城内的社会秩序得到整顿。

1933年3月，在蒋介石的威逼下，张学良不得不宣布下野，并出国考察。

张学良出国前，在选择由谁掌握东北军的问题上，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其中9万人分别由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掌握；另外的17万人统统交由于学忠掌握。于学忠真正成了东北军中权力最大的核心人物了。

日本人借此机会，又对于学忠实行策反，派亲日分子张志谭执行这一任务。

张志谭见到于学忠，并不隐蔽他来见于学忠的真实企图，开门见山地劝于学忠与日本人配合，夺取华北。他说：“日本人并不要求将军改旗易帜，

也不要要求将军发表什么声明，或者调兵遣将，只希望将军效法阎锡山、韩复榘等人，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如果将军能如此，则日本人可以帮助将军取代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地位！”

于学忠听了，冷笑一声，不客气地对张志谭说：“先生就不能谈点别的什么话吗？刚才的话我不爱听，也不想听，请你别再说下去！”

张志谭吃了闭门羹，只得灰溜溜回去复命。

拉不动大梁就改拉檩柱。日本人煞费苦心，用 200 万日元收买了于学忠的一名部下——114 师团长张冠英。

张冠英利令智昏，不顾丧失民族气节，纠集了几个人在葛沽开会密谋，准备与日本人勾结颠覆东北军。

于学忠很快发现了此事，立即派人去逮捕张冠英。

张冠英知东窗事发，仓惶逃走。日本人的阴谋又一次破产。

日本人不愿就此罢休，经过密谋策划，决定采取卑劣的暗杀手段，置于学忠于死地。于是，他们收买了以王玉珍为首的 30 多名暴徒，执行他们的暗杀计划。

于学忠的家在天津河北二马路。他每天早上 8 点钟准时坐车从家里出发，到省府办公。暴徒们得知于学忠的这一活动规律，经过周密策划，决定暗暗埋伏在半路，乘机下手，把于学忠暗杀。执行暗杀计划的这一天，于学忠可巧有急事要办，提前半小时出发，打乱了暴徒的暗杀计划，在暴徒们还没有准备时，他已安全抵达省府。暗杀计划就这样流产。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日本人又用重金收买了于学忠的随从副官巫献廷和 51 军司号官傅鉴堂，要他们伺机刺杀于学忠。

一天傍晚，巫献廷请于学忠到浴室洗澡。

于学忠换了浴装便走进浴室，准备沐浴。但他敏感地发现，今天的巫献廷似乎有点反常，神色恍惚，言语支吾，不由脑海里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非常时期，千万不可大意！于学忠这样想着，便推说忘了拿洗具，立刻退出了浴室。

晚上 10 点钟，傅鉴堂来找巫献廷，被于学忠的卫兵发现。卫兵认为傅鉴堂行动诡密，神色紧张，很可能找巫献廷密谋什么，就向于学忠报告。

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考虑，于学忠认为其中定有蹊跷，为了防患于未然，便命卫兵将巫献廷逮捕，然后进行审问。

巫献廷胆小、软弱，逮捕后以为于学忠已经全部掌握了他的罪证，因而审问一开始，便把接受日本人的收买暗杀于学忠的情况全部招供。

原来，他收了日本人的 8 万元款，身边私藏了两支手枪。他的暗杀计划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由他趁于学忠洗澡时行刺；万一刺杀不成，第二步再由傅鉴堂动手。傅鉴堂晚上 10 点来找他，就是执行第二步刺杀计划的。

于学忠听了巫献廷的招供，大吃一惊，十分庆幸他又一次躲过了日本人策划的暗杀阴谋。

日本人对于学忠的深恶痛绝，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经历了两次暗杀失败后，又策划了第三次暗杀活动。他们又收买了于学忠的一个叫曲子才的旧部，让他找准机会，在食物中下毒，毒死于学忠。

曲子才自己不敢去下毒，就买通 51 军副官处的一名叫袁启明的勤务兵去办这件事。他把两包毒药交给袁启明，答应事成之后给他 3 万元钱。

袁启明接受任务后，心里十分矛盾，想到于学忠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的

好人，怎么也不忍心把他毒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他还是拿着毒药自首了。

暗杀不成，日本人想以武力压服于学忠。可是使用武力，必须找到借口才行，否则师出无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为此，日本人支使石友三、刘桂堂滋生事端，扰乱华北的社会秩序，以便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出兵华北。他们还借口组织军事演习，在省府门前架枪示威，威胁于学忠。

于学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为了表示他不屈服于日本人的淫威，在天津调了三个师的兵力，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用以回答日本人的威胁。他的这一举动，有效地遏止了日本人出兵华北的进程。

日本人的惯用伎俩是先造事端，然后借题发挥，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恐日的弱点，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为了对付于学忠，他们故伎重演，于1934年5月，制造了一起日本人失踪的事件，进而提出无理要求，要河北省政府向日方陪礼道歉。

于学忠根本不买日本人的帐，义正词严地反驳日方的无理要求。

他不客气对日方官员说：“根据中日双方协议，日本人来华首先应通知中方。我并没有接到贵方的通知，说有一个日本人要来我们河北。你们自己违反了协议，却又无理取闹，我不知我该向贵方赔什么情，道什么歉！”

日本人深知靠他们是压服不了于学忠的，就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外交部长黄郛是一个亲日分子，以不引起中日争端为由，强迫于学忠向日本人道歉。

压力愈大，反抗力愈强。一次次的压迫，使于学忠对日本人更加憎恨，因而不断使颜色给日本人看。日本人觉得于学忠坐镇天津，终久是一个心腹大患，就动了赶于学忠离开天津的心思。于是，他们又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提出将河北省府由天津迁到保定的要求。

1935年春天，外长黄郛和军政部长何应钦来到天津，软硬兼施，逼迫于学忠将河北省府迁往保定。于学忠拒理力争，质问黄、何说：“天津是中国的国土，为什么要听命于日本人，不许我们在此设立省府呢？如果照此下去，日本人又不许我们在保定设立省府，我们又该怎样呢？”

黄郛、何应钦深知讲道理是讲不过于学忠的，就干脆不讲理，以蛮横的态度说：“我们也是奉命行事，你总不能不听中央的命令吧？”

于学忠无奈，只好把河北省府迁到了保定。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因此，他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日本人。日本人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就又提出要南京政府撤销于学忠的省主席职务。对此，南京政府深感为难，觉得于学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本人又没什么过失，无论如何是不能撤销他的职务的。然而亲日分子何应钦却不顾后果，为了讨好日本人，竟打电话让于学忠自己提出辞职。

他在电话里对于学忠说：“孝候兄，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该委屈的地方也得委屈一下了。你一心为公忠国，为人称道，难道在国家有困难时，就不能多替国家想想吗？”

于学忠知道这又是日本人在玩花招，便气愤地质问何应钦：“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辞职？辞了职想达到什么目的！”说毕，他生气地把电话挂了，不想再说一句话。

可何应钦不依，又第二次打电话给于学忠，催促于学忠辞职。于学忠义愤填膺，很坚决地在电话里拒绝了何应钦的要求。他说：“敬之兄，你不必

多费口舌了。要我辞职，除非我于某人死了，只要不死，还有一口气在，就决不辞职！”

何应钦碰了钉子，将情况回告蒋介石。

蒋介石知道，于学忠只听张学良的话，于是给正在外国考察的张学良发了密电。电称：“接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因对日外交关系，拟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务，吾兄有何高见，速即电示。”

他以为张学良会顺着他的意见，同意免去于学忠省主席职务的。如果这样，南京政府用张学良的回电作挡箭牌，事情就好办多了。岂料张学良偏偏没有顺着他的意见办，而是批评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张学良在电报中说：“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则国将不国矣！此事所关孝侯（即于学忠）事小，所关国家主权攸关事大。”

至此，黔驴拙技的蒋介石，一方面撒谎，说他没有接到张学良的回电，另一方面指使汪精卫签发了免职命令，强行免去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的职务。免职后，又派于学忠率部到甘肃与红军作战；委任于学忠为陕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半年后，又委任于学忠为甘肃省主席。

“西安事变”，于学忠是张学良最有力的支持者。当此次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决定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写下手谕，又一次把东北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于学忠。由此足见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忠诚和张学良对于学忠的无比信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于学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率部参加了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和重挫。

抗战胜利前夕，一直为蒋介石所疑忌的于学忠，被夺去了兵权，调离部队，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闲职，再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要于学忠跟他一起到台湾。此时的于学忠，已完全认识了蒋介石的嘴脸，对时局也有了明确的看法。他不愿到台湾作蒋家王朝的殉葬品，便毅然远避四川，决定留在大陆，与共产党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商讨国家大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不少工作。1964年，他因病逝世于北京，走完了他的全部人生历程。

潘国定驾机起义后的风风雨雨

在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中，潘国定驾机起义，飞回北京机场。他的飞行技术堪称世界一流，一生开辟数条险难航道，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立下不朽功绩。“文革”中受到诬陷，他和77名同志被无辜关入大牢。他度过4年零7个月的牢狱生活，却爱国之心不变，平反昭雪后仍留在国内，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在香港宣布起义，从6点30分起飞，到中午12点15分，全部安全降落到北京的西郊机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

这次起义，除12架飞机投入人民的怀抱外，还有4000名“两航”工作人员，也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

这次起义，切断了蒋介石对西南的空中运输，对解放军解放西南起了重要作用，为新中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材、物的基础。

在这次起义中，担任领队长机“空中行宫”610号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潘国定。——这一年，他还年轻，才34岁。他一生翱翔蓝天，做出了惊人的成绩，被誉为“天之骄子”。

潘国定于1915年出生在一个商人之家。按照他父亲的意愿，是要他长大后在香港经商，继承父志，在商界干一番大事业。可他对经商没有兴趣，而是喜欢上了航空事业。

1935年5月，年仅20岁的潘国定克服了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干扰，只身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东部的西雅图市，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他在美国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先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后入美国寇蒂斯礼特航空工程学院和圣特玛丽亚飞行学校，以工读自费生的身份，学习航空机械工程和飞行技术。

留学期间，潘国定一面听课，一面到饭店、餐馆、工厂、码头去打零工，给人家洗碗涮碟子、拉运材料，搬取行李，挣几个钱维持生活。

打零工，经常受到美国人的非难和歧视，使他的民族自尊心严重伤害。压力就是动力。种族歧视激发了他发愤学习的劲头，因而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十分优异的。面对这些优异的成绩，美国教师不由忘掉了种族偏见，常常在大庭广众中惊呼：“这个小伙子简直是一匹脱僵的马，任何沟壑在他脚下都变成了平坦的草原！”

在一次航空博览会上，潘国定被一架DC—3型飞机深深吸引了。这是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制造的最新产品，机体漂亮，性能优良，太让人羡慕了！

潘国定无限神往地钻入这架飞机，坐在机长的位置上，向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的广告业务人员打过招呼，便想请教这架飞机的有关知识和性能。可是，他无端地遭到了美国人的歧视和恶语讽刺。

一个金发碧眼的胖子斜睨一眼潘国定，不无调侃地说：“啊，支那人！你的的是买，是仿造，还是飞？”

潘国定压住胸中的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他的蓝色证件说：“我是华盛顿大学航空系三年级的学生，飞行俱乐部成员，希望获得这架飞机的有关知识。”

“什么，你们也想飞？”傲慢的美国胖子，把证件甩给潘国定，然后毫

不客气地说，“你们黄种人要是能驾飞机上天，那么那些黑鬼们也可以上天了！”

潘国定像有人把尿盆子倒在自己头上一样，气得满脸涨红，狠狠地瞪一眼那个美国胖子，并尖酸地说：“先生，请你别把话说得这样绝，总有一天我们黄种人会超过你们白种人的！”说罢拂袖愤然而去。

这件事对潘国定的刺激太大了。他从此下定决心，勤奋学习，发誓要当一名一流的飞机驾驶员，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从寇斯礼特航空工程学院和圣特玛利亚飞行学校毕业后，正值特技公司招收福特V—8发动机飞行广告员。

在众多的应聘人选中，潘国定以其扎实的航空专业知识和出色的飞行技术，被该公司的老板一眼就看中了。他决定聘他做飞行广告。

潘国定正想借此机会显示一下中国人的才智，让美国人见识一下中国人的能力，就答应下来。

一张醒目的海报贴在街上，上面写着“特技飞行表演——福特公司生产的马力强大的引擎，中国人潘国定表演惊险的死亡游戏！”

素来喜欢寻找刺激的美国人，对福特公司制造的大马力引擎并没有多大兴趣，而感兴趣的是潘国定的“死亡游戏”。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人的勇敢精神和高超的飞行技术，预料到这次表演将会出现机毁人亡的结局。这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啊！因此前来观看的美国人趋之若鹜，像潮水一般接踵联袂而来，把看台挤得水泄不通。

在众目睽睽下，一架色彩鲜艳的轻型飞机，轻松地跃上蓝天。在校期间，潘国定常常受到美国学生的奚落和讽刺，当他镇静地坐在驾驶台上，轻松地操纵着驾驶舵时，心里说：“这次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潘国定是何许人也？”

飞机在长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突然间，飞机以极快的速度翻一个身，继而直向地面俯冲。俯冲到适当位置，又昂首向上，中途翻了一个极漂亮的跟头。下滑倒转、慢横滚，一整套表演动作都完成得很好。飞机故意降到离地面只有30米的超低空位置，显示出一种疯颠状态，做着“疯狂飞行”的惊险动作，给观众以强度刺激。当他再次把飞机垂直拉起时，飞机进入“死螺旋”状态急速下坠。在看似危急异常的情况下，而潘国定却左手抓一把红粉，右手抓一把黑粉，以处变不惊的神态，伸出驾驶舱外，在空中撒出两条“彩带”，而驾驶舵只是用双脚操纵。

高超的特技动作，把观众的心紧紧揪住不放，把观众的胃口吊得足足的。

在眼花缭乱的表演中，美国人无不为潘国定的驾驶技术叹为观止，赞不绝口，忘记了飞机驾驶员是一个中国人。

在表演结束时，潘国定精心设计了一个漂亮的三点着陆动作，把飞机轻巧地落在跑道上。这时，场内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他走下飞机，昂首挺胸站在万人敬仰的目光下，陶醉在一片民族自豪感之中。

1939年底，潘国定结束了4年零7个月的留学生活，毅然回到祖国。

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处于民族危亡之际。他回国后就直接到中国航空公司上班，先后担任了C—46、C—47、DC—3、DC—4型飞机的正副驾驶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盟国宣战，打响了太平洋战争。

翌年2月15日，日本侵占了新加坡，接着又侵占了马来西亚和缅甸的腊戍、曼德勒等地。至此，中国通往国外的全部海陆空通道全部被日本人切断。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紧张、最激烈的阶段。美国、英国把主要精力用于欧洲战场，他们急切希望中国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担负起亚洲战场抗击日军主力的作用。

当时，日本投入二战的总兵力达 100 万之众，对盟国的威胁是很大的。为此，1942 年 5 月，美国总理罗斯福指示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开通到中国的路线，是最紧急不过的非常任务。”同一月，他在中国的政府的要求下，又宣布：“不计任何困难，必须开通到中国的路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空军第十航空队一起开辟了“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由中国的重庆、叙府、泸州、昆明等地起飞，通过中、缅、印边界，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及加尔各答。这条航线，途中要飞越高黎贡山脉、喜马拉雅山脉。这些山脉的高度约在 4000—6000 米以上。由于山峰连绵起伏，故把这条航线命名为“驼峰”航线。

当时使用的一般性飞机，飞行高度只能达到 5000 米左右，因此在“驼峰”航线飞行，有时不得不在山峰间的峰谷穿越。由于山高谷深，这里的气候又瞬息万变，遇到雷暴或飞机空中结冰，既不能爬升到云顶，又不能绕行或低飞，只能挺而走险，硬着头皮往前飞。途中无备降机场，每每遇到机械失灵、发动机停车等情况，飞机上的人除了跳伞别无他法。可是，下面都是深山老林，渺无人烟，即使跳伞能安全着陆，但跳下去后也凶多吉少。途中所设的导航台，只有一座，设在丁高萨甘。由于电波受大山的阻隔，飞机与导航之间的距离稍大一些，就很难收到导航信号。因此，飞机往往处在盲目飞行状态下，很容易导致迷航。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经常在途中拦截，运输机上除了装有敌我识别器外，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一旦遇到敌机，除了低飞躲避外，没有任何办法。

“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最难飞的三条航线之一。除“驼峰”航线外，还有大西洋航线和阿拉斯加航线。而“驼峰”航线又是这三条航线中最难飞的一条。在这条航线上，飞机驾驶员的年死亡率高达 20%。据美国《时代》杂志 1946 年第一期披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亚洲战场上共损失飞机 400 多架。这家杂志还报道说：“至战争结束，在长 520 英里、宽 50 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而被人们称之为‘钻谷’。在晴朗的天气，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堆作为航行的地标。”

就是在这样一条航线上，从“驼峰”行动开始到结束，潘国定驾机飞行了 500 个来回，每次都安然无恙。他的驾机技术如何，由此足可得到证明。

有人把“驼峰”航线称作“中国的空中生命线”。因为当时国内所需的好多战略物资和生活用品，从国外运进，主要是通过这条航线空运的。但随着战争的升级，日军继续北进，它的地面部队已日渐逼近“驼峰”航线。日本人还扬言，要向西夺取印度的加尔各答。

加尔各答是印度的重要港口，既是“驼峰”航线运输物资的集散地，又是执行“驼峰”空运任务的飞机的维修基地。

眼看“驼峰”不保，迫于形势，中国政府只好决定再开辟一条航线。这条航线即是从重庆经大西北，沿着古丝绸之路故道，飞越葱岭、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西部到印度新德里及巴基斯坦卡拉奇的航线。这是一条比“驼峰”更险峻的航线。

1945年7月，这一决定作出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责成中国航空公司以最快的速度，挑选最优秀的飞行员去开辟这条新航线。经严格挑选，反复研究，最后选定的是潘国定、陈文宽和通讯工程师华视。

7月18日，被挑选出来的三名开辟新航线的飞行员，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做完起飞前的最后检查，等待着两个政府当局的重要人物的到来。

这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空军司令、航空委员会总指挥毛邦初将军；一个是航空委员会指挥部总参谋长罗机。他们要亲自参加试航。

不一会儿，这两个人乘坐一辆小汽车，来到机场。五个人一起登上飞机后，飞机就迅速起飞了。

飞机由潘国定和陈文宽驾驶，两人分坐在主、副驾驶台上。毛邦初不时走进驾驶舱，坐在潘国定和陈文宽的中间，认真地观察着下面的地形和飞行员的操作。这位年仅40岁的全国军事航空指挥部的头号人物亲自参加试航，又这样认真，使负责开辟新航线的潘国定等三人深深感到了战争局势的严重性和开辟新航道的紧迫性。

飞机先向北飞行，到兰州后即沿着古丝绸之路向西飞去。从飞机向下望去，地面是一片茫茫戈壁，连一点绿色也看不到。太阳升起后，戈壁滩上的气温很快就升高了，影响到气流的流动，使空中的飞机受到气流的干扰，不禁上下左右严重地颠簸起来。

随之大块大块的云出现，给飞机的飞行带来了很大困难。在此情况下，潘国定、陈文宽及时调整了飞机高度，尽量避开云块。

飞机飞到伊犁，几个人碰头又研究了飞行路线。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从这里飞往过印度，对前面的地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但他们根据有关资料分析，提出几套方案选择，最后决定以莎东作为出境点，飞越喀喇昆仑山脉，飞向白沙瓦。

这一方案如果付诸实施，那么飞越喀喇昆仑山便成为这次试航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崇山峻岭里飞行，地面又没有导航站，也没有可以依恃的地标，要安全飞行，就必须有目视飞行的好天气。可当时根本谈不到气象保证，既没有气象预报，又没有气象实况，唯一可选择的是利用清晨山区气流较平稳的特点，一早就从莎东起飞。

飞机一早从莎东起飞，就沿着蜿蜒曲折的叶尔河，以4000至5000米的高度穿行在山峰中。此时，两旁的峰顶，比飞机要高出1000至2000米。喀喇昆仑的冰川雪景，就从他们眼前闪过，可他们根本顾不得去欣赏。

飞机飞进铁盖山口，突然有一块巨大的云块挡住了视线。在峡谷中飞行，又飞入云层中。那是十分危险的，要想避开险境，唯一的办法是循原路退回去。

然而眼下山谷狭窄，飞机掉头，飞行半径稍大，就会撞到山上。值此性命攸关之际，潘国定与陈文宽沉着镇定，灵活操纵着机舵，利用飞机减速，尽量缩小转弯半径，很快就飞出了山口，一直等到能见到飞行时才让飞机上升到6000米的高度。

这时，他们发现飞机已置身于上下两层云层的中间，夹缝中尚可看到前面的山峰。潘国定和陈文宽果断地操纵飞机在云层的夹缝中向前飞去，终于顺利越过喀喇昆仑山，然后顺着洪扎河和印度河飞到印度的新德里。

在新德里，他们停留了两天，后来又继续向西飞行，最后胜利到达终点卡拉奇，完成了试航的艰巨任务。

中国的飞行员驾机出现在卡拉奇，驻在这里的美国空运总队即中联队的飞行人员深感震惊，觉得中国的飞行员就是了不起，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

他们告诉中国的飞行员，3个星期前，美军曾派了一架装有4个发动机的B—24轰炸机，从卡拉奇向东北飞行，企图越过喀喇昆仑山飞行到中国的新疆，但终因山口云层阻挡，无法通过而返航。他们用赞叹的口气说，他们对中国飞行员驾驶着仅有两个发动机的C—35型飞机，竟能克服一切艰险，完成了这次开辟新航线的试航任务，不得不打心眼里佩服。一位美国空军军官伸出大拇指对潘国定等人说：“你们中国人的飞行技术堪称进步第一流，你们中国人真不简单！”

1950年7月20日，在北京西郊机场为“北京”号飞机举行命名典礼。这架飞机，就是潘国定在“两航”起义中从香港驾驶着飞回北京的“空中行宫”610号飞机。该机飞回北京后，就被命名为“北京”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了“北京”二字，印在飞机的头部上。

命名典礼上，潘国定高兴地坐在飞机上，把头从驾驶舱的窗口探出来，让摄影师摄下这一庄严时刻。

8月1日，中国民航正式开航。潘国定驾驶着“北京”号飞机，又一次开辟了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的航线。

1956年5月25日，潘国定接受了试飞北京——成都——拉萨的任务。

拉萨机场是临时修建的，海拔在4300米，地形复杂，空中条件也很差。沿线山险水恶，气候变化无常。这条航线比之当年潘国定飞了500个来回的“驼峰”航线更难飞。机场飞机降落到西藏首府拉萨已有了先例。此前，空军的一位叫韩林的副师长曾驾机到过一次拉萨。但那是从青海的玉树飞进去的，而且是战斗机轻便得多。至于民航飞机从成都飞往拉萨，还是亘古第一次。

这条航线究竟有多难飞，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美国、英国政府曾多次用巨额美金、英镑作悬赏，诱惑飞行军在这条线上闯天险。西方人把钱看的比命还重要，冒险者还是大有人在的。然而他们驾机飞进西藏，不是撞在山上而葬身谷底，就是遇到云层而无可奈何地返了回来，没有一个人飞进拉萨这块神秘莫测的地方。因此，这段航线被国际上称作“空中禁区”。

潘国定闯这一“空中禁区”，仍用他熟悉的“北京”号。作为机长，他飞行前领着他的机组人员认真细致地研究了这段航线的资料，估计到飞行中一定会遇到通讯导航受干扰剧烈颠簸、结冰和强大的逆风等情况，因而事前都进行了复杂的技术试验，以备试航中遇到不测。

5月28日，“北京”号飞到四川西部的一个机场。潘国定将从这里起飞，去征服“世界屋脊”。

第二天，“北京”号的机舱里，坐了十几个人，除了机组的6个人外，还有两名电影摄影师，几名林业部派出的森林勘察员和一名记者。

飞机就要起飞了，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期待着这次征服“世界屋脊”的壮丽飞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恐惧情绪，因为他们相信潘国定，对他报以绝对的相信。

潘国定一生中开辟过数条艰难的航线，但都不能使他满足。他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在“世界屋脊”上一显身手，检验一下他的飞行技术。这一机会终于在他41岁时等到了，因此，他比飞机上的任何人更兴奋、更激动。

飞机平稳起飞了，10分钟后，邛峡山的绝壁已耸立在面前。潘国定亲自

驾机，把飞机拉到 60000 米的高度。俯瞰下面，是一望无际的大山，像狂风下的海浪，奔涌起伏。层层山峦高耸入云，有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耀人眼目。空中逆风呼啸，机身下云团滚滚，飞机以 160 公里的时速缓缓飞行。为了避开那些直入云海的雪峰，潘国定把飞机再一次提高。

飞行员都知道，飞机在高空飞行时，最怕遇到云层阻碍。可是，眼下高空中的积云愈积愈浓，飞机升到 7000 米时，仍在云团的包围之中，潘定国像盲人瞎马一样了，只能靠飞机上的仪表指示飞行。

空中的气温在急骤下降，已经到了零下 17 度，突然间听到右发动机发出轰鸣声。潘国定敏感地发现，螺旋桨的转速在急剧下降，进气压力也骤然下降。驾驶舱内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他判断此时一定是汽化器结了冰。他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遇到这一特殊的情况，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即打开汽化器加温。他的判断准确无误，20 秒钟后，故障果然排除，飞机恢复了正常的飞行状态。

云层开始消散，从机窗向下望去，蜿蜒曲折的康藏公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依稀可见了，甚至可以看到公路上的一列车队在向前蠕动。潘国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他知道，有这条公路导航，他们可以准确地飞向拉萨。

飞机再往西飞，潘定国看到了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它像一条浅绿色的飘带，在群山中舞动。河的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绿色的林海，像一片片硕大无比的荷叶，飘落在青藏高原上。

飞过金沙江，就是准备中途降落的临时机场。潘国定正准备让飞机降落，倏忽间从耳机中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快速前进，暴风雨即将来临！”

几分钟后，一阵雷电交加的暴雨就过去了。潘国定接到地面允许飞机降落的通知，他长长吁一口气，沉着地把飞机降在了临时机场上。

这里的海拔是 4000 米。潘国定走下飞机，一阵头晕、恶心、呼吸困难，他问他的机组人员，大家都说和他的感觉一样。这是高山反映，他和他的伙伴们带足了氧气，就又立刻返回了机舱。

飞机再次起飞，向西南方向飞行。不一会儿，唐古拉山出现了。这是一条纵贯南北的连绵不断的大山脉，海拔 6000 米以上，是此次试航中的险区之一。

领航员紧张地计算着航速、风向、风速。这里从未有人勘察过，地图上的情况无疑是不准确的。为此，机组人员一路对照地面情况，修改着地图。

潘国定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北京”号，终于飞过唐古拉山口，进入了西藏地区。

离拉萨不远了。潘国定让副驾驶员和报务员打开无线电导

航台。因为此时空气流动形成的很大，飞机随时都有可能被吹离航线。在此情况下，必须保持和地面导航台的密切联系，否则就无法找到航线了。

飞机飞过整个航程中的最后一个障碍——唐古拉山，进入了开阔、富饶的山谷地带，拉萨机场清楚地扑入了潘国定的眼帘。他太激动了，但他懂得，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在这海拔 4300 米机场降落，因空气稀薄，飞机速度加快，拉萨又置于群山环绕中，降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因此，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敢有一丝的疏忽。

“北京”号终于稳稳地停在了拉萨机场。

潘国定飞越“世界屋脊”的梦实现了！他走下飞机，显得比已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冲着蓝天高吼一声，陶醉在成功的喜悦和自豪之中！

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潘国定也未能幸免劫难。1967年7月13日，中国民航局的造反派和各地的造反派一样，无中生有，指鹿为马。他们制造了“7·13”冤假错案。民航局的一些人上报中央立案，诬陷潘国定、陈达礼为首的77名成员阴谋借“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外逃投敌叛国。

在那个不讲道理，不问事实真假信口雌黄，混淆是非的年代，这77名同志或被无辜关入监狱，或被非法监禁，或被送到农村监督劳动，无一不遭迫害。

潘国定作为“首犯”，受折磨就更甭说了。为了逼迫他交待“罪行”，审问他的人四五天不让他吃一点东西，也不让他睡觉，搞逼供讯。

他们骂他，打他，在人格上侮辱他，用打疲劳战的方法，逼迫他承认挽救叛国的罪行。他的身体可以被整垮，但他的意志不垮，不管专案组的人采用什么惨无人道的做法，都无法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行。

潘国定一直被关了4年零7个月，出狱时连背都驼了，胃也萎缩了一大半，人几乎瘦得皮包骨头了。

一些当年和他一起起义回来的老朋友，等他出狱后，劝他和他们一起到海外去，因为他的亲属、儿女大都在美国、香港和加拿大。但他毫不动摇地留了下来。他说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是爱国的，是永远不会离开他的祖国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潘国定被选为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他虽然人老了，身体不行了，不能重返蓝天了，但他利用早年在海外航空界的老朋友、老关系，积极为中国和外国贸易往来牵线搭桥。大陆向台湾提出实行“三通”的建议后，他又奔走呼号，促成了台湾亚洲航空公司与大陆的贸易关系。

潘国定，不愧是“天之骄子”，他的一个个传奇故事，向后人昭示：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真正的飞行家！

要蒋介石引咎辞职的教育家

教育家白鹏飞疾恶如仇，刚正不阿。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当他发现“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歪曲后，怒不可遏，不顾生命危险，上书蒋介石，要蒋介石引咎辞职。蒋介石被触怒，欲杀白鹏飞，却被陈布雷劝转，反而任命白鹏飞为上将军风纪巡察团委员，既管政又管军。

官场斗争的玄妙在此得以淋漓尽致的揭露……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过“包青天”、“海青天”。他们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为民请命的故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这里，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位被人民群众誉为“白青天”的人物，他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令人惊叹不已。

“白青天”，名叫白鹏飞，系广西桂林人。他生于1889年，死于1948年。

他于1911年，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济世救民的真谛。1924年学成归国，因其学识造诣高深，先后到江苏国学专科学校、上海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北京朝阳大学、民国大学、法政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后来，又出任暨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广西大学校长、广西政府顾问、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员等职。

白鹏飞原本是一个教育家，可他怎么会弃教从政，由一名大学校长而改任广西省政府顾问和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呢？

原来，在1939年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时，为了改造这所守旧的高等学府，决定从全国各地聘请一批进步学者来任教。经多方联系，李达、马寅初、马叙伦、许德衍、陈豹隐等30多人已表示愿意到广西大学任教。消息传开，引起了广西当局的惊恐，认为白鹏飞这样做会引来一群惹辣生非的祸根，把整个广西搅成一锅粥的，弄得不好还会出大乱子的。

广西当局知道，如果政府出面制止，白鹏飞是不会买帐的。当然，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免去他的校长职务，但考虑到他名望太高，一旦这样做了，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引出好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为此，他们苦思冥想，想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他们专门派人到南京，串通中央教育部，将省立的广西大学改为国立，由中央教育部下文免去白鹏飞的校长职务，另派他人出任校长。白鹏飞是名人，无端免去校长职务不好向社会交待，才安排他担任了省政府顾问。

后来，国民党中央也不愿担什么罪名，为了欺世盗名，又委任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

1941年皖南事变，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

国民党当局为了推卸责任，免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名，有意造谣，说这次事变是新四军“叛变”，国民党军队不得已才出兵镇压。

对于皖南事变的内情，白鹏飞是很清楚的。事情发生以后，他忧心忡忡，深深感到抗日统一战线迟早要被国民党破坏。不安中，他产生了面见蒋介石陈说利害的想法。

第二天，白鹏飞吃过午饭，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的一张半旧的藤椅上，开始看当日的报纸。看着看着，一条重要新闻扑入眼帘。

这条新闻是报道皖南事变经过的。当他看到这条新闻的标题是“新四军图谋叛变”、副标题是“叶挺就擒！项英在逃！”就感到震惊和不安。接着，他认真地读起这条新闻来。还没等全读完，他激动的感情已难以遏止，像有

人把尿盆子倒到自己的头上一样愤怒，不由大喊一声“无耻”，并用手猛拍一下他面前的桌子。由于用力过大，竟把放在桌边的茶杯震落地上。茶杯被摔得粉碎，茶水溅了满地。

白鹏飞的太太沈兰宾听到白鹏飞的怒吼声和茶杯摔碎的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立刻从隔壁赶到客厅。她掀开门帘，放眼看去，只见白鹏飞面色苍白地坐在那里，鼻子里喘着粗气，胸脯急剧起伏着，脸色很不好看。她不无担心地快步走上去，用手轻轻推了一下白鹏飞，然后小心问道：“鹏飞，出了什么事惹你生这么大的气？”

白鹏飞“唬”的一声从藤椅上站起来，晃动着拿在手里的《扫荡报》生气地说：“你看，这不是在造谣吗！我实在不能理解，党国的报纸竟然会颠倒黑白，谎言连篇……”他说着把报纸递给沈兰宾。

沈兰宾接过报纸，在白鹏飞的指点下，认真读起那篇“新四军图谋叛变”的新闻来。读完后，白鹏飞又指着另一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的标题，仍生气地说：“兰宾，你看，他们还要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割去叶挺军长的职务，交军事法庭审判，还要通缉副军长项英……”

在沈兰宾看《通令》时，白鹏飞气得双手发抖，把夹在指缝间的香烟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揷灭，用手指着南京的方向气愤地说：“依我看，该审判的不是叶挺，倒是他们自己！……”他所说的“他们”，自然是指国民党当局。

沈兰宾十分了解丈夫的秉性，知道白鹏飞生性耿直，眼里揉不得半粒砂子，嫉恶如仇，从不与坏人坏事妥协，每每为恶人办了恶事而生气时，谁劝说也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不去理会他。于是，她倒一杯茶放在白鹏飞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手摇一把蒲扇，坐在一边，等候白鹏飞消气。

此时此刻的白鹏飞，思绪如潮，一幕幕往事在他的脑海中晃动。

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原是坚持“教育救国”思想的，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兴办教育之中。岂料“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教育救国”的美梦，迫使他从北平回到桂林，屈就广西大学校长之职。

回到家乡后，他依然不灰心，要造福桑梓，为广西培养更多的精英人才，却不料又无端被免职，给他以非常沉重的打击。自从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后，他终于认识到靠兴办教育是不能救国的，便十足地准备在政界大干一场，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做一些有益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可面对他的现实是，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了日寇。他从各方面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便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这两支部队上。可是，不久前在蒋介石的暗中指使下，不惜同室操戈，发动了“皖南事变”。

他愈想愈气愤，却不知自己如何作为，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他猛抬头，看到贴在对面墙上那幅“还我河山”的条幅，耳边突然响起了岳飞的《满江红》。倏忽间，他浑身热血沸腾，受到鼓舞，便决定向蒋介石上书，陈说自己的政见。于是，他吩咐他的太太沈兰宾为他准备纸墨。

沈兰宾不解地问：“要纸墨干啥？莫非又要写诗？”

白鹏飞苦笑着说：“都什么时候了，我还有雅兴写诗！——我要上书。”

“上书？”沈兰宾颇为吃惊地问，“你要给谁上书？”

白鹏飞说：“给最高当局，给蒋介石！”

沈兰宾一贯对白鹏飞的主张持支持态度，可今天却不敢苟同他的意见，急忙劝说道：“别的事我都依你，只是上书的事，我劝你还是听我一回，别

去冒这个险了。——咱们这个家可离不开你呀！”

白鹏飞不以为然，轻蔑地笑了笑说：“他蒋介石难道因上书的事，能把我杀了不成！”

沈兰宾说：“你惹恼了他，就算不敢杀你，也会把你投入大牢的。难道这种例子还少吗！”

白鹏飞仍固执地说：“我连死都不怕，还怕坐牢吗！”

沈兰宾说：“明知蒋介石不会听你的话，你却要拼死去上书，值得吗？”

白鹏飞见妻子眼含热泪，有点心疼，就尽量把声音放和缓一点，晓之以理道：“蒋介石这个独夫民贼，如果不及时揭露他假抗日、真反共的本来面目，还不知今后会干出什么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我身为中央监察委员，就负有对下澄清吏治，对上进谏忠言之责。如果他能听我的话，改弦易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我会为此高兴的。如果他要治我的罪，或者把我杀掉，能用我的鲜血惊醒国人，难道还不值得吗！”

沈兰宾见丈夫的意志如此坚定，深知再劝也是白费唾沫，就默默地去准备纸墨去了。

沈兰宾慢慢研墨。

白鹏飞闭上双目，开始购思他的《上蒋介石书》。等墨研好了，他的购思也完成了，于是，一篇脍炙人口、流传到今的好文章在白鹏飞的笔下诞生了。

次日，沈兰宾提议把《上蒋介石书》寄出去，白鹏飞却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沈兰宾以为白鹏飞睡了一夜，头脑冷静下来，改变了主意，心中不由暗喜，便说：“不寄也好。这种冒风险的事，能不冒就不应去冒。”

白鹏飞听出妻子误会了他的意思，就忙解释说：“我有个想法，先把我的《上蒋介石书》在“广西省建设研究会”上宣读，然后再寄出去。”

沈兰宾觉得这样做不妥，就又劝阻道：“这又何必呢！你把漏子捅到上面就够玄了，又要捅到下面，岂不是祸越闯越大？”

白鹏飞说：“我就是要把祸闯大，让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不这样，我把《上蒋介石书》悄悄寄出去，蒋介石收到后置之不理，岂不是白写了吗？今日，‘广西省建设研究会’正好开时事座谈会，我正好在会上宣读。”

“广西省建设研究会”是怎样一个组织呢？

原来这是桂系军阀成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参政议政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燃烧，广西是大后方，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便提出“建设新广西”的口号，于是决定成立“广西省建设研究会”，邀请来到桂林的省内外各界知名人士入会，共同研究、探讨建设新广西的问题。白鹏飞作为全国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又是中央监察委员，理所当然被邀入会。

“广西省建设研究会”设在八桂厅。

白鹏飞怀揣《上蒋介石书》步入会场，已有不少会员到会。往日开会，白鹏飞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而今天却有意坐在会议主持席的旁边。

会场上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前不久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白鹏飞曾毫不留情地斥骂过白崇禧，他那铿锵有力的说话声，至今依然回响在人们的耳边。今天，大家见他神情严肃，感情激动，都私下揣度：此公今日不知又要向谁开炮了！

会议刚刚开始不久，大家正在议论着当前抗战的形势，白鹏飞突然站起来说道：“诸位先生，刚才大家所言极是，‘皖南事变’令人痛心！值此民族危亡、全国民众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惨杀和蹂躏之际，有人竟不顾外侮当前，国难深重，大搞分裂，同室操戈，怎不令国人担忧呢！鹏飞以为，这大搞分裂，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坐镇南京的蒋介石！”

白鹏飞有意把“蒋介石”三个字说的又响又亮。

在会场像投入一枚炸弹，震得与会者目瞪口呆。沉默好一会儿，大家才开始议论，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摇头咋舌，认为白鹏飞这样指责党国领袖，失之过份，必将会招致杀身之祸；与白鹏飞关系好、观点又一致的人，一方面为白鹏飞如此仗义执言而称快，对白鹏飞顿生敬佩之感，另一方面又替白鹏飞担心，生怕他因此获罪，受到处置。

等大家的议论告一段落，白鹏飞又从怀中掏出他的《上蒋介石书》，在空中扬了扬说：“诸位，这是鹏飞写给蒋介石的上书，要他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作检讨的。现在，借此场合，不妨将我的《上蒋介石书》宣读一遍，然后即刻付邮！”

此举比此前指名道姓指责蒋介石更令人吃惊。大家不由把目光齐集白鹏飞的身上，屏声敛息，静听白鹏飞在《上蒋介石书》中说些什么。

白鹏飞清清嗓子，高声念道：

介公委座麾下：

今者日寇深侵，全国军民大团结，巩固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乃争取最后胜利之根本。当权诸公，拂违民意，不作此图，而竟大肆分裂，背正道而行，破坏抗日团结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举国震惊！长沙则敌未至，而先自纵火焚城，四民愤恨！凡具爱国精神之人，孰不痛心！且目下仅存数省，军官特权横行，政员欲财肥己，而百姓则受祸惨痛，凄凉万状。主国者亟需施仁政，以图复兴。自古明君，每遇困难深重，丧国辱权之秋，即引咎自罪下诏，以振乾坤，以纲大正。主帅英明，则将士用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奋战疆场，必能取胜；从事后勤，财物必丰；严惩贪官，漏洞必塞。如此，实为去难兴邦之道。

公为国家领袖，当须有此善图，敬愿效先王之道，通电全国，真诚引咎罪己而退位，则军民必举雄师，力战弩末之敌，焉有不胜之理！鹏飞满腔热忱，敢上耿耿忠言，敬望垂察，立即下令施行！如感逆耳，甘愿斩首。此敬颂。

崇安！

监察委员

白鹏飞谨上

白鹏飞念毕，鸦雀无声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议论这封“上蒋书”寄出去将会引起的后果。

白鹏飞的好友陈劭先忧心忡忡地对白鹏飞说：“经天（白鹏飞的字）兄，你的这种精神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可你想过没有，蒋介石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是很难听进别人的忠告的。可以断言，你的谏言，他是绝不会接受的，相反会引发杀机，将你置之死地的。我真替你担心啊！”

白鹏飞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嘛！”我既敢写‘上蒋书’，就作了以身殉国的准备。我觉得，这样的死光明磊落，总比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好得多！劭先弟，谢谢你对我的关心……”他说毕，义无反顾地把《上蒋介石书》寄出去了。

不久，蒋介石就收到了白鹏飞寄给他的上书。他读后气得简直要发疯，

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嘴里一个劲地骂着“娘西屁！娘西屁！”他一气之下，竟提笔写了一纸手谕，要杀掉白鹏飞。他在手谕中写道：“白鹏飞亲共由来已久，迩来更为嚣张，公开反对勘乱救国，着即秘密处决！”

写毕，他把手谕交给他的秘书陈布雷，要陈布雷转交军统局特务处去执行。

陈布雷接过手谕看过后，劝说道：“委座，白鹏飞不可处决。”

“为何不可？”蒋介石气犹未息，激动地说：“此人不杀，我的威信何在！国人心目中还会有我蒋某人吗？”他说毕，固执地昂首挺胸，以示决不对白鹏飞作出让步。

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多年，是知道蒋介石的性格的。他见蒋介石正在盛怒之际，就再没有说什么。一直等到蒋介石气消了，冷静下来，才进言道：“委座要杀白鹏飞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白鹏飞的名望很大，一旦杀了就会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事关人心向背，因此而失掉人心，岂得不偿失！”接着，他讲了《三国演义》中弥衡击鼓骂操的故事，然后进一步劝说道：“曹操被弥衡当众辱骂，尚且不敢杀弥衡，其中道理我想委座是十分清楚的。”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的劝说，陷入了沉思。他自己也清楚，自抗战以来，举国上下骂他的人很多，人心快要失尽了，如果杀了白鹏飞，不啻火上浇油，会更加激怒民众的。他也懂得，“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不敢过份强逼民意。想到此，他征求陈布雷的意见道：“畏垒（陈布雷字）兄，

依你之见，如何处置白鹏飞呢？”

陈布雷胸有成竹地说：“依布雷愚见，与其杀之，不如利用之。”

“利用？”蒋介石没有领会陈布雷的意思，追问道，“怎么个利用法？”

陈布雷解释说：“目前官场腐败，民怨沸腾，军纪败坏，祸害百姓，却无人敢认真纠劾。白鹏飞名望很高，在广大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本人又素来忠于职守，办事认真。委座应重视他的这些长处，让他在整饬吏治、整顿军纪方面发挥作用，岂不比杀掉他更有利！”

蒋介石听陈布雷说完，不由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赞成陈布雷的意见。他想，如果真的杀了白鹏飞，岂不显得我老蒋心胸太狭隘了吗！我现在身居领袖地位，口口声声说要团结全民抗战，行动上却容不得一个白鹏飞，还在民众中有什么号召力呢！还是布雷的意见对，杀之不如利用之。

想到此，他征求陈布雷的意见道：“依你之见，该给白鹏飞个什么职务？”

陈布雷说：“委座正在筹组‘军风纪巡察团’，白鹏飞现在又是中央监察委员，如果以上将衔加委他为军风纪巡察团委员，让他既管政又管军，整顿军纪政风。这样，广大民众不仅会盛赞委座胸襟开阔，肚里能撑船，而且会大力传颂委座慧眼识才，知人善任。”

“嗯！”蒋介石重重地点了点头，脸上慢慢浮现出笑容。接着他开口说道：“畏垒兄，就按你的意见办，第四军风纪巡察团常驻桂林，就让他到这个团就职吧。”

话刚说毕，他忽然想到，倘若白鹏飞不买帐，仍跟我唱对台戏又该怎么办？忧虑间，他把他的想法又说出来，跟陈布雷交换意见。

陈布雷想了想说：“委座说的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不过，他敬酒不吃饭要吃罚酒，那就另当别论了……”

蒋介石问：“怎么个另当别论法？”

陈布雷诡谲地笑一下说：“生杀予夺，全在委座，又何必问焉？”

蒋介石心神领会，忍不住“哈哈”地大笑起来。

自寄出《上蒋介石书》后，白鹏飞再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把自己关在家里，连客人也不会见，只等蒋介石下令来抓他。不久，因忧愤而患病，整日躺在床上养病。一日，他刚刚服下一剂草药，昏昏地躺在床上，大热天蒙着被子发汗。忽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登门拜访。

正在洗衣服的沈兰宾见是省主席登门，不便挡驾，便迎进门来，引入客厅待茶。

黄旭初边喝茶边问：“白夫人，经天兄可在府中？”

沈兰宾说：“在。他身体有病，刚刚服了药，正躺在床上发汗。黄主席稍等片刻，我去把他叫来。”

白鹏飞来到客厅，黄旭初立刻迎上去，满面春风地说：“经天兄，恭喜你了！”

“恭喜？”白鹏飞惊诧地反问一声，然后摇着头说，“黄主席，你真会开玩笑，我这个人总是和灾难同行的，我是不会有什么喜事临门的。”

两人落座后，黄旭初大发感慨道：“我听说你上书委座后，一直替你提心，以为你闯下了塌天大祸。想不到事情的结果大出意料，委座不仅没有责怪你，还加委你为上将军风纪巡察团委员。你真是因祸得福啊！”

他说着从公文包里取出委任状和蒋介石的手谕，双手递给白鹏飞。

白鹏飞看过委任状，又看蒋介石的手谕，只见上面写着：

凡有违犯军纪的军官、贪赃枉法的官员，除军长及省主席以上者，均可先行处决，再行报案。

白鹏飞正看手谕，黄旭初讨好地凑上来，用手指着委任状说：“这一下你身兼两职，既管政又管军，权力大，地位也更高了，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白鹏飞并不激动。他认为这样做绝不是出自蒋介石的本意，其中一定另有原因，也许其中隐藏着什么阴谋，是福是祸还一时说不清。

黄旭初见白鹏飞默不作声，就从旁开导说：“委座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唯才是用，不愧是党国的领袖！古人云：‘宰相肚里能撑船。’事实证明，委座肚里岂止能撑船，只怕装火车也绰绰有余……”

白鹏飞没有心思听黄旭初吹捧蒋介石，而是在思考着买不买老蒋这个帐。

他知道，蒋介石是在利用他，有心拒绝接受其委任，可转念一想，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来个反利用，借蒋介石给他的“御史”兼“监军”和“委座手谕”这三把“尚方剑”去为民除害呢？想到此，他欣然接受了委任，并客气地对黄旭初说：“谢谢委座和黄主席的栽植！”

黄旭初还一直担心白鹏飞会像上次委任他当监委时那样再三拒绝，不想白鹏飞竟出人意料地痛快接受了委任，不由长长出一口气，鼓励白鹏飞好好干下去，为党国立功。

白鹏飞正色说道：“是啊，一朝权在手，我可要对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官员大开杀戒的！黄主席，今后还仰仗您多多支持、鼎力相助啊！”

黄旭初听了不禁心里发怵，像有一把刀正放在他的脖子上。但他仍不露声色地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说毕就告辞而去了。

白鹏飞被委任为上将军风纪巡察团委员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传遍了桂林各军政单位。那些一直为白鹏飞捏着一把汗的亲友、朋友们到此才放心

来，纷纷登门道贺。他的挚友、篆刻家林丰觉先生特地选用了上等材料，为他刻了一枚方形大印，上面刻着“御史监军”四个字。

刘海粟为徐志摩串演“红娘”

大画家刘海粟是著名作家徐志摩的挚友。才女陆小曼早已许配王赓，却又与徐志摩相爱，一场复杂的婚姻纠葛上演。刘海粟为朋友不惜串演“红娘”，几经周折，才促成徐志摩与陆小曼成婚。谁知此事又为徐老太爷所不容，将一对新婚夫妇关在硃石，陷于饥寒交迫之中……

刘海粟是大名鼎鼎的画家，徐志摩是鼎鼎大名的诗人，陆小曼又是曾被郁达夫称之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由刘海粟为徐志摩、陆小曼充当“红娘”，玉成其良缘，当是顺理成章之事，并没有什么稀奇。而令人感兴趣的是，徐志摩是有妇之夫，陆小曼是有夫之妇，刘海粟为他们充当“红娘”，情况就大不一般了。

刘海粟和徐志摩相识是在1924年4月12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下榻于上海沧州饭店。刘海粟慕名去拜会泰戈尔。泰戈尔只会说印地语，就请徐志摩当翻译。

徐志摩是浙江硃石人，翻译时虽然说普通话，但浙江口音很浓。不过，他翻译时字音相当清晰，修辞很美，给刘海粟的印象是极其良好的。从此，刘海粟和徐志摩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相处中，两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休戚相关，达到了亲如手足、无密可守的程度。

徐志摩无疑是中国文坛上的一颗明星，他对诗歌、散文、评论、绘画和音乐无不精通。他的散文写得极好，他的散文读者，远远超过了他的诗歌读者。他的文艺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犀利、生动。郭沫若曾说过：“他的评论比诗还好看。”

不管怎么说，徐志摩还是诗人，是以诗著称于世的。他的诗热烈如火，情浓如酒，以满腔热情赞颂美，讴歌爱。尤其是他的爱情诗，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更大。茅盾曾对他的爱情诗给予高度的评价。茅盾说：“对于徐志摩的爱情诗，是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着他对人生的单纯的信仰。”朱自清曾说：“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

徐志摩在20年代留学于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英国留学，就读于剑桥大学，从此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他的新月派唯美诗，由于20年代到30年代开始盛行一股左的文艺上的关门主义，不可避免地受到批评，有的甚至是恶意的攻击。

徐志摩由于事业上遇到了种种干扰，又不能见容于进步文艺界人士，心情很不愉快，情绪极其消沉。20年代后期，刘海粟逃亡海外，他多次给他写信，描述国内被黑暗势力笼罩下的种种怪诞现象，愤慨之情，力透纸背。刘海粟在回信中，总是劝他振奋起来，要他对一些社会现象要看得开，想得通，豁达大度一点。

刘海粟认识陆小曼，是在20年代初期。当时，他住在北京，常和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徐志摩前妻的哥哥）等人来往。

有一天，胡适之来看望刘海粟。

交谈中，胡适之说：“海粟，你到北京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

刘海粟问：“是哪一个？”

胡适之满脸严肃地说：“北京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京，不见王太太，等于没有到过北京。”

“哦？有这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她！”刘海粟饶有兴致地说。——那时刘海粟、胡适之都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刘海粟还不知这位王太太是何许人也，他为了见她，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时髦的衣服。胡适之也经过一番修饰，便在张歆海的引导下出了门。

三个人分别雇一辆黄包车，走了一段路后，便在一家深宅大院的门前停下。这家深宅大院的围墙和大门都是朱红色的，远远看去相当气派。当他们进入客厅，坐了一小会儿，下人便来报告说：“小姐就来。”

刘海粟原以为他们要见的王太太是一个贵妇人，所以听到“小姐”二字，如坠五里云雾，深感纳闷。他不由心里暗说：“一位太太，就算年轻，也不该称小姐呀！”

眨眼间，客厅里出现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女，不仅风姿绰约，楚楚动人，而且气度不凡，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原来，她就是蜚声北京各界的陆小曼。

胡适之和张歆海是这里的常客，陆小曼自然是认得的。可她这是第一次见到刘海粟，不知此君为何人，就以目询问胡适之。

胡适之会意，立刻介绍说：“这位是刘海粟先生，是有名的画家，特来拜访你的。”

“刘先生，您请坐。”陆小曼热情地招呼刘海粟坐下，然后说，“我也学过绘画，只是未遇名师指点，所画作品不堪入目，还请刘先生今后能帮助我。”

胡适之笑着插言道：“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

刘海粟显出惊奇的样子说：“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

陆小曼微微皱了皱眉，显然对刘海粟称她“王太太”有点不悦。但她很快舒展眉头，浅浅笑了笑说：“什么应该会，我只是初学，瞎涂抹罢了！”

张歆海大惑不解地问：“海粟，你怎么说王太太应该会作画？”

刘海粟未曾开口，先自笑了。他说：“因为我心里认为，像王太太这样漂亮、这样有才气的女子，应该懂得一点丹青。我是心有所想，口有所言啊！”他的话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使客厅里的气氛立刻变得活跃起来。

笑罢，胡适之认真地说：“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不等刘海粟开口，陆小曼就抢着说，而且伴以银铃般的笑声，使刘海粟颇为不安。

过了一会儿，徐志摩也来了。

徐志摩来到客厅，见到陆小曼并没有说话，只是以微笑向她打招呼，使刘海粟感到奇怪，看样子他们是熟人，那么熟人见面又为什么不说话？于是，刘海粟多一个心眼，暗中观察他们的表情。他终于发现，徐志摩与陆小曼交流感情，只用眼睛，而不用嘴巴。不过，他最后得出的结论还不是两人暧昧，而是认为健谈的徐志摩之所以拙于言辞，很可能是被陆小曼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

陆小曼的父母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就来到客厅相见。在交谈中，刘海粟才知道，原来他和陆家是常州老乡，论辈份，陆老先生还是他的父辈。因有此关系陆老先生夫妇对刘海粟更刮目相看，他们间的情谊理所当然更深一层。

此次会见，刘海粟不仅认识了陆小曼，而且对陆小曼的情况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陆家原是常州名门望族，世代书香门第。陆老先生既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又是赫赫有名的外交官。因出身于这样的家庭，陆小曼从小就

受到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时随父来到北京，小学毕业后就考入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了中学课程。她的法文基础很好，但她不以此为满足，15岁时又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学英语。经过3年学习，她的英语水平已很高，可以流利地说英语了。

陆小曼长到18岁，北京社交界已开始知道一位姓陆的外交官家里，有一个掌上明珠，不仅能诗善画，而且能写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当然，更使人们产生好感的原因是她长得太漂亮了。她那明艳的容光，轻盈的体态，柔和的嗓音，大方的气度……无不令人倾倒。因此，当她跻身社交界，很快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陆小曼的古文基础很好，她写的旧体诗绝句，清新俏丽，颇有明清诗的特色。她写的文章，蕴籍婉转，自然天成，毫无雕凿之嫌。在绘画方面，她擅长于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有宋人的韵味。她喜欢写新体小说，语言直率、诙谐、寓意深刻、别具匠心。她爱读书，读得最多的是英文、法文原版小说。因她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北京的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们，都想接近她，登门求亲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陆小曼19岁时，由父母作主，与无锡的王赓订了亲。

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到美国留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中途又转学于一年军校，攻学军事。他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同学。他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他出任武官，随顾维钧赴巴黎参会。

其实，王赓跟陆小曼的这桩婚事是有缺陷的。首先从年龄上不般配，订婚时，陆小曼还是一个19岁的姑娘，而王赓却已30多岁了。由于年龄上的过大差别，在他们两人的感觉上好像不是夫妻，而是兄妹。王赓很爱陆小曼，但总像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情不足；小曼对王赓也是敬多而爱少。他们间的这些空白，后来因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到北疆去赴任，而陆小曼仍留在北京，就愈拉愈大，以至再到后来竟使原有的那一丁点可怜的感情也淡漠无多了。这一点，双方都有感知，却又为信条而保持着一种名存实亡的表面关系。

徐志摩也原与王赓是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每当星期日，他常与王赓、陆小曼相偕到西山看红叶，或者到“来今雨轩”喝茶，或者到舞厅跳舞。陆小曼本身爱好文艺，徐志摩又偏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才子，她自然打心眼里敬仰他、崇拜他。因此，她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创作上的问题，两人总是谈得既融洽又投机。

王赓在北京时，工作比较忙，常因公务在身而不能陪陆小曼出游。每至此时，王赓总说：“我没时间，就请志摩代我陪你去吧。”陆小曼当然高兴，从不拒绝。

开始，徐志摩碍于王赓与他的友情，又且他对陆小曼也很喜欢，有邀必应，乐于代王赓陪伴陆小曼。但是，人毕竟是一种感情动物，相处时间长了，又且爱好相同，志趣相投，特别是一对美男靓女，能不产生爱慕之情吗？

如果说王赓在京时，徐志摩和陆小曼间的来往还有障碍，感情基础还停留在朋友的界限内，那么到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她们的来往更多，更无所顾忌了，感情也似乎在升华，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当时，北京的社交虽然已经公开，但是浓厚的封建意识依然存在于北京市民的头脑中。人们本来对才子和才女的交往就猜测颇多，徐志摩和陆小曼

又频繁交际，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于是乎流言鹊起，蜚语日盛，竟传出不少离奇的说法。说来也奇怪，越是有人说三道四，他们的想法也越多，原本是纯洁的感情便不知不觉地渗入了爱的成分，友情不可遏止地变成了爱情。

徐志摩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知道他已是有了妻室的人了，他的妻子张幼仪与他曾经是很相爱的。她曾留学德国，出身名门，现在任教于北京大学，而且为他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深得他父母的欢心。鉴于此，他怎么能再跟陆小曼恋爱呢？再者，当时的社会舆论给他施加的压力也确实够大的，就连当时颇受文化界人士敬重的梁启超先生也对他不满，曾写信劝他悬崖勒马。梁启超先生在信中说：……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写自己之快乐，弟此举，其于弟之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朴风。然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痛苦；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不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鹤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

为了不致掉入爱情的漩涡，招致社会舆论的更大谴责，徐志摩终于下定决心忍痛割爱，离开陆小曼。于是，他于1925年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欧洲。在柏林，他突然接到家里给他拍来的电报，说他心爱的儿子不幸夭折。他的精神上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打击，痛不欲生，不由失声痛哭。悲痛之余，他更感到飘零异国他乡的孤独和凄凉。正在此时，他又接到一封陆小曼拍给他的电报，说她病重，十分思念他。接到电报，他再也在柏林呆不住了，便又不顾一切地回到了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解难分了。不久，他就和他的妻子张幼仪离了婚。

一天晚上，徐志摩去找刘海粟。

刘海粟觉察到徐志摩找他似乎有什么重要事情要谈，就问：“你有什么心事？”

徐志摩反问：“怎么，你看出来了？”

刘海粟试探着问：“你和小曼相爱了？”

徐志摩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刘海粟笑着说：“是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接下来，刘海粟询问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关系。徐志摩如实告诉他，他与张幼仪不过是强撮合在一起的夫妻，没什么爱情可言。他还告诉他，张幼仪的哥哥张歆海对他和张幼仪感情不合的情况最清楚，因而对他和陆小曼的恋爱能够体谅和理解。他说，在这一点上，他很感激张歆海。

在这次谈话中，徐志摩如实地向刘海粟介绍了他和陆小曼相爱的过程，恳切地提出要刘海粟帮他想想办法。他在说到他与陆小曼相爱的情况时，激动地说：“我看到过我出国时小曼写的日记。她的这些文字，是很有感情的散文诗，充满着对我的感情。我曾几次想忘掉她，但已经忘不掉了。”

刘海粟明白，徐志摩求他帮他想想办法，实际是求他帮他。开始，他感到很为难，因为恋爱的三角，都是很有影响的名人，想推托不管。可是，徐志摩反复求他，并说：“这样下去，小曼是会悲观的。她太苦了，身体又有病，弄不好会……”

对徐志摩的这种挚着感情，刘海粟是完全理解的。因为他自己也有过逃婚的经历，并公开声明他是坚决反对封建传统，主张婚姻自由的。25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他一时激动，便答应下来。

刘海粟首先去找陆小曼的母亲谈这件事。

陆老夫人听罢，长长叹一口气说：“小曼的心事我们又何尝不知道！可是，小曼和王赓的亲事是我们夫妻决定下来的，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我们对

志摩也是很喜欢的，可是人言可畏，舌头能压死人啊！”

为了说服陆老夫人，刘海粟例举了不少因婚姻不自由而酿成悲剧的事例，希望老一辈人要多替晚辈人着想，不要固执己见，一切应从权达变。

陆老夫人是有文化、有修养的人，在刘海粟的开导下，终于答应由她去说服王赓，同意和陆小曼解除婚约。

可是，采用怎样的方法去说服王赓更好呢？两人为此想了许多办法，最后商定：由刘海粟陪同陆家母女去上海——有消息说，此时王赓因公在上海小住。

当刘海粟把他跟陆老夫人的谈话结果告诉徐志摩后，徐志摩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欢呼雀跃。临行前，刘海粟对徐志摩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并不简单，你得有思想准备。”

徐志摩却很有信心地说：“只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动身时，胡适之、陶孟和陪徐志摩一起到车站为刘海粟送行。为陆小曼母女送行的人更多，有不少学者、教授、闺阁名媛、社会名流……

刘海粟见有这么多知名人士来给一位倩倩少女送行，羡慕极了，便忍不住悄悄戏徐志摩：“你能得到这样一位情人，真是福份不浅！”

徐志摩严肃地说：“我在与命运之神搏斗之中！”

送刘海粟和陆家母女上车后，徐志摩很不放心，觉得他一个人留在北京，会急得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的。于是，他便乘下一趟车，也赶到了上海。当他见到刘海粟和陆家母女，觉得很不好意思，便撒谎说他是来找刘海粟讨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的。

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刘海粟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功德林”是上海有名的素食菜馆。这里专卖素食，很可能当初与佛教有什么渊源。可是，后来的经营者却在所卖食品上有所扩展，并不仅仅限于素食上。这里的环境布置得很幽雅，与那些喧嚣热闹、飞肉淌酒的一般饭馆形成显明的对比。当时，文化界、知识界的人士请客、聚会，多喜欢到这里来。

所谓的客人，除了陆家母女和王赓外，还有张歆海、唐瑛、杨杏佛、李祖德、唐腴庐（唐瑛的哥哥）。徐志摩也到场了，但刘海粟不许他太突出，以免引起王赓的不快，反而坏了事。徐志摩理解刘海粟的心情，谨遵吩咐，只以一个帮忙者的身份出现，少说话多做事。

在酒席宴上，最紧张的是徐志摩。他生性忠厚，虽然狂热地恋着陆小曼，但总觉得自己从王赓手里把小曼夺走有点理亏，心里一直惴惴不安。

陆小曼是一个最难在这种场合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的人。入席前，他就给自己规定了任务：既不使王赓尴尬，又不让志摩有得意举止。可她毕竟是社交家，又聪颖绝顶，所以一言一行都那么得体、妥贴，使刘海粟看了暗暗赞不绝口。

刘海粟正为自己难以找到合适的话题而沉默时，张歆海突然开口了。他问：“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歆海的话使刘海粟受到了启发，于是在祝酒中，刘海粟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接下来又谈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感情融洽、志趣相投的基础之上。

王赓是极聪明的人，听着听着，已悟彻到了刘海粟举行这宴会的真正意

图。他豁达大度，没有生气，想了好多后，终于拿起酒杯，向刘海粟、徐志摩、陆小曼，还有其他人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的幸福干杯！”

一杯酒下肚，徐志摩、陆小曼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们匆匆互看一眼，忍不住脸上都掠过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笑容。

宴会结束后，王赓借口有事，要陆小曼跟随陆老夫人回去，他一个人走了。

当然，具体向王赓谈陆小曼与王赓解除婚约的事，别人不便出面，必须由陆老夫人出面。

好多人都预料，王赓也很爱陆小曼，是不会轻易答应解除婚约的。可事实否定了人们的预料，他尽管从感情上不愿与陆小曼解除婚约，但理智战胜了他，他终于答应了。事后，他曾对刘海粟说：“我并非不爱小曼，更舍不得失去小曼，但我希望她幸福。她和志摩都是艺术型人物，一定能志趣相投。今后作为好朋友，我还是要关心他们的。”他的这种正直、善良和能推己及人的高尚情操，真使刘海粟感动不已。

王赓说到做到，后来一直关心着陆小曼和徐志摩，直到他病逝于开罗为止。

得到王赓的同意，陆老夫人从上海返回北京，才向陆老先生讲明她上海之行所干的事。

陆老先生是有名望的人，认为这样做有辱家声，起初是不赞成陆小曼与王赓解除婚约再与徐志摩结婚的。但后来也想开了：连王赓都同意了，我反对又有什么用！更何况他对徐志摩也是很喜欢的。于是，他终于吐口说：“这件事我不再管了，你们自己闯的祸，就自己收场吧！”这就意味着他屈服、让步了。

陆小曼高兴极了，立刻找到刘海粟，眼里噙着兴奋的泪花，把她父亲说的话告诉刘海粟，并对刘海粟的鼎力帮助表示感谢。她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

陆家的道道关口都打通了，却想不到徐家这边又有了问题，首先是徐志摩的父亲坚决反对志摩和小曼的婚事。老人家认为这样做有辱徐家门第，口口声声骂徐志摩是“不孝子孙”。为了打通这道关口，包括刘海粟在内的一帮朋友们都出面与徐老太爷见面，替徐志摩说情。磨来磨去，徐老太爷还是经不住文化人的磨咕，勉强收回成命，同意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

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结为伉俪，可等待他们的不是绚丽多彩的鲜花，而是一场严酷的风雪。婚后，徐老太爷把一双新婚夫妇关禁在老家硖石，不许他们出门，供给的生活费用也是极其微薄的。冥顽不化的徐老太爷始终不见他新婚的儿媳，给陆小曼施加精神压力。自负而自尊的陆小曼，是在养尊处优中长大的，经此打击，自然难以接受。她终于积忧成疾，患了肺病。

在硖石被关禁期间，徐志摩一直给他的好友刘海粟写信，诉说他 and 陆小曼的苦处。他在信中说道：“小曼身世可怜，此后重新作人，似亦不无希望，天无绝人之路，于此验爽。”还说：“猥处乡陋，报亦不看。曼亦安居甚旷适，惟近日病眼，不能书写，甚盼兄能贲临，相与共数晨夕，围炉煮茗，并抒衷曲……”他还在一封信中说：“曼日来不爽健，早晚常病，以此生愁。天时又寒，令人不欢。足下所谓‘热度’固矣，可以救寒，未能阻病奈何！”

刘海粟看了这些信后，对徐志摩和陆小曼寄予深深的同情，自己虽然没

有更多的钱，但还是尽量在生活上节俭一点，把节余的钱寄给志摩夫妇，以为周济。

徐志摩夫妇再三邀请刘海粟到硖石小住，但刘海粟知道他们生活困难，饮食难备，只去过硖石一次。相反，刘海粟多次约徐志摩到上海，每次回硖石，就让他带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去安慰陆小曼。1927年2月15日，徐志摩带了不少东西返回硖石，特来信对刘海粟表示感谢。信中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食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4.12”“清党”后，国内大批进步文化人也横遭搜捕、攀附，并给予严重打击。刘海粟是进步画家，又有好朋友信仰马列主义，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查对象。于是，他就会同几个朋友出国，到了法国的巴黎。在异国，他仍然惦念着被关禁在乡间的徐志摩和陆小曼。

这时，徐志摩夫妇的生活更困难了。陆小曼在北京时，名噪京华，挥金如土，如今穷困潦倒，连化妆品和基本生活用品都不能满足，太难为她了。1930年7月8日，徐志摩代陆小曼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中说：“前托梁君买廉价小绸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PonMarehe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连买小手帕的钱都拿不出，而要别人垫付，可见生活拮据到何种程度！

刘海粟遵嘱，买了一些小手帕寄给陆小曼。12月10日，他收到徐志摩的回信，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言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徐志摩在文学创作里是佼佼者，可是他的性格却是懦弱的，因此他始终未能帮陆小曼和他自己冲破封建的樊篱和封建卫道士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终于在1931年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

刘海粟为他写了悼文。悼文中说：

他三十六年的生涯只是一个短暂的恶梦，他的生命，也就是一首绝妙好诗。他有时雄浑倜傥，飘然物外；有时几乎无路可走，苦闷万分……我没有一支妙笔可以描写他那真的姿态……他又像是崇高的山峰，狂风暴雨要吹击他，乌烟瘴气笼罩他，侵蚀他的心灵，阻碍他的发展，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徐志摩早逝后，陆小曼就离开了徐家，后来又结婚了，一直在上海教书、卖字画为生。

60年代初，她因没有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贫病交加。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视察工作，问起陆小曼的情况。听说她患病无力求医，就对上海有关方面说：“陆小曼也是文化界老人了嘛！20年代是颇有名的，要适当安置。”于是，上海市政府就安排她到文史馆当馆员。有了这个头衔，她就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到华东医院就医了。

就在这一年，刘海粟也因病住在了华东医院，竟意外地碰到了陆小曼。故人见面，不胜感慨，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不料在第二年，这位一代才女、旷世美人，终因抑郁不快而死。死

杨虎成身边的地下共产党员

——杨虎城将军的特使武志平

地下共产党员武志平，全力促成国民党陕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和平共处。武志平出任杨虎城将军的特使，历尽千辛万苦，来往于蒋管区和红区，作了大量工作。有人将此事密报蒋介石，武志平受到通缉，陕军不用他，使他陷于进退维谷之际，后来终于到了延安……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蒋介石责令四川的各路军阀停止混战，共同“剿匪”。为此，他特委任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1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很快形成。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将军的17路军防区。蒋介石预料，红四军进入巴山后，必然西进甘肃天水，以图发展。一贯以“保护嫡系、排斥异己”为政策的蒋介石，这次也不例外，早已将杨虎城将军的38军主力调往甘肃，放在战争的风口上，而把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派往陕南防区敲边鼓。

可是，红四军进入巴山后，并没有西进，蒋介石只好改变作战计划，决定在巴山夹击红军。按理，胡宗南的第一军正驻于陕南防区，应该承担夹击巴山红军的任务，然而蒋介石却下令让杨虎城将军的38军和第一军调防，把夹击巴山红军的任务放到38军的身上。

蒋介石的这种露骨的调军做法，当然瞒不过精明的杨虎城将军。是否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呢？杨虎城将军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计，无异于把38军置于火山口上；如果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就会受到军法处置。

进退维谷之际，第38军少校参谋武志平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找到杨虎城的高级谋士杜斌丞，斗胆进言说：“何不向杨总指挥进谏，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侵犯呢？”

杜斌丞忠贞爱国，为人正直诚实，深受杨虎城的信任。他听了武志平的进言，沉思片刻，突然用手拍着武志平的肩膀，兴奋地说：“想不到你的肚子里还有这么好的主意！我一定会把你的想法转告杨总指挥。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5月初，38军由甘肃开到陕南汉中。武志平离开西安，也随军到了汉中。不久，他就接到杜斌丞写给他的信，信中暗示：“所议有成，日内便见分晓。”

过了几天，他果然接到杨虎城给他的一封密信，信的全文如下：

志平参谋弟：

别来日久，殊深驰念。余于上月25日平安抵省，祈勿念。值兹日寇凭陵，国势岌危，凡我同志，务需深自警惕，力图奋发。吾弟才华卓著，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是为至要。

此询近佳！

杨虎城手启

5·4

武志平知道，这封信是杨虎城给他的手谕，说明他的意见得到了杨虎城的采纳。信中提到的孙军长，就是38军军长孙蔚如。从信中的话推断，孙军长在未来跟红军的联络中，必然担任重要角色。他想到这里，不由兴奋地笑

了。

果然不出武志平所料，隔一天孙军长就派人把他叫到军部的作战室里。孙军长坦诚地提出，准备派他进山跟红军取得联系。武志平毫不推辞，爽快地答应下来。

原来，武志平是由中共军委特科直接发展和领导的地下党员。他接受任务后，便与军部秘书主任、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相商，如何才能取得红军对他的信任，不辱使命，顺利完成任务。

徐梦周说：“重复失败而不接受教训的人，才是世界上真正的蠢人！”接着，他举例说：“不久前，吉鸿昌派了个排长与红军和谈，结果被红军杀了。20多天前，张汉民团长（亦系地下党员）委派张含辉营长再度跟红军联系，至今有去无归……”

武志平认为徐梦周的话很有道理，就去找孙蔚如军长。他建议说：“我们跟红军联络，总得拿出一点诚意作为表示才好。”

孙蔚如听了笑着摇摇头说：“有我这封绢书足矣！”

原来孙蔚如军长在与武志平谈话时，已在绢上写好了一封给红四军负责人的信，表示了38军愿意与红四军各驻防地，互不侵犯的意思。这封绢信已交给了武志平。

武志平觉得自己是一个地下党员，应该比别人对红军更忠诚，于是，利用自己是军部参谋的工作之便，已在军用地图和绝密情报方面作了手脚。油灯下，他把他的勤务兵支走，将一套川、陕、甘军用地图以及国民党红军所使用的密电码、口令等捆绑在一起，又在外面封了蜡，连夜送过汉江，放在南岸一家茶馆代为保管。他这样做，是害怕临分手时他带着这包东西被孙军长发现，引出意想不到的事来。

1933年5月13日凌晨，武志平化了装向孙蔚如军长告辞

后，到茶馆里取了那包东西，由花钱雇来的一个叫杨才的当地人作向导，便进了巴山。

武志平在杨才的引导下，走了两天，顺利通过了陕军前哨天池寺，就进入了红军的防区。

谁知这里几天前激战一场，红军南撤，空出的地盘已被土匪头子徐耀明的人马占据了。

杨才因常在这一带理发谋生，在土匪中有不少熟人。他领着武志平跟一些相识的土匪交谈，一时不慎，竟称呼武志平为“参谋官”。这样，引起了土匪们的怀疑，就详细盘查起来。

武志平出发前就预料到路上会遇到麻烦的，就伪造了一个红十字会的身份证揣在上衣口袋里。现在这个身份证派上了用场。他把身份证掏出来让土匪们看，并声言他是来此“调查灾情，以便赈济”的。

土匪们听说武志平是政府派出的赈灾人员，都想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就殷勤地款待他。在酒桌边，几杯酒灌下肚，土匪们无话不谈。武志平趁机问这问那，早把红军在什么地方打听清楚了。于是，他以“调查灾情”为借口，与土匪们分手而去。

土匪头子徐耀明有意和武志平这个“赈灾官员”结交，临行前便雇来滑杆，还赠送了名片，还给必经之地的一个甲长写了一封信，吩咐这个甲长对武志平多多关照。

走出虎穴，杨才深感后怕，说什么也不给武志平带路了，闹着要返回汉

中去。武志平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没有向导不行，武志平只好到一个村寨，找到地方头人，亮出调查灾情的牌子，要地方头人给他派一个向导。地方头人不敢惹他，就胁迫一个独臂老人给他带路。

这一天，天正下雨。他在独臂老人的引导下，冒雨朝深山老林走去。

山路陡峭，路滑难行。两人跌跌撞撞走了整整一天，到天快黑时，来到一个叫塔子坪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仅有几户人家，两人在甲长家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吃过早饭，那个独臂老人也不愿再给武志平带路了。甲长害怕武志平抓他的差，就急忙推辞说：“前边的树林里常有虎狼出没，是没有人敢去背时的。”

武志平正在为难之际，突然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长得蛮漂亮的姑娘从外面走进来，朗声说：“怕什么？别人不敢去带路，我去！”她说得斩钉截铁，毫不犹豫。

这个姑娘叫梁秀红，是甲长老婆的堂妹。她从小死了父母，无依无靠，只好给人家当童养媳。因在婆家吃不饱，又常遭受婆婆的毒打，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逃到这深山老林来投奔她的堂姐。

甲长也不好阻止，就同意了梁秀红的请求。梁秀红便领着武志平上路了。

走在路上，两人在交谈中，武志平才揭开了梁秀红为什么给他当向导这个谜。

原来，昨晚睡觉前，给武志平带路的独臂老人跟甲长说，再朝南走就是高压河，过了高压河就是红军的天下。他说他怀疑武志平跟红军有瓜葛，不敢带武志平过河去。他还说，武志平身上虽然有徐耀明的名片，但徐团总跟武志平也是初交，谁也不了解谁。

当梁秀红把此情况说完，武志平试探着问：“姑娘，你怎么看呢？”

梁秀红说：“跟红军有瓜葛怕什么？听人家说，红军是好人，杀富济贫，我正想见见他们哩！人家还说，好多童养媳都当女兵了。我出来送你，就是想跟你过河去当红军……”

为了不让土匪们看出什么破绽，武志平没有带梁秀红过河，由他一个人过河去了。只是临别时，他留给她几两鸦片烟，让她换了钱糊口。后来，武志平才介绍她当了红军。

过了高压河，地形更为复杂，更有大树参天，雾瘴如魔，搞得武志平晕头转向，终于迷路了。

晚上，他一个人陷入茫茫森林，滂沱大雨一个劲地下着，各种凶恶野兽叫着东奔西窜，害怕极了。为了安全，他只好爬到一株大树上，把一块雨布像荷叶一样顶在头上，又用一根细绳子将自己的身子和行李全绑在树干上，防止打盹时从树上掉下去。惊恐中，他好不容易度过了漫长的一夜，想不到天明时遭到了一群土匪的突然袭击。

一个匪徒见到武志平后，二话没说，举枪就要打他。另一个匪徒急忙劝阻说：“别打。我晚上作了一个梦，梦中有一老人对我说，今天有一贵人来到，要我保护。说不准这人就是老人所说的贵人。”

第一个匪徒不听，早已扣动扳机。第二个匪徒随手推一下枪口，子弹打偏了，从武志平的头顶飞了过去。

武志平幸免于死，却不由分说，被匪徒捆绑了，押解到一个山洞里去见

匪首。

在山洞里，匪徒们正要拷打武志平，却因从他的行李里翻出了匪首徐耀明的名片而又一次免去一场皮肉之苦。翻出名片的匪徒惊奇地喊叫一声：“营长，瞧，徐团总的荷包！”

把名片称作“荷包”，是红帮“林子里”的黑话。武志平素来对红帮组织有研究，加之此前又跟徐耀明一帮土匪厮混过几天，有足够的经验判断，盘据在这个山洞里的土匪，很可能是徐耀明匪团中的二营。——他记得徐耀明曾说过，他的二营住在黑风洞，营长叫袁玉成，大号叫袁刚营长。于是，他试探地问一声匪首：“你就是袁刚营长？”

匪首吃惊地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袁刚营长？”

武志平微微笑了笑说：“徐团总曾在我面前提起过你。”

袁刚又问：“你是干什么的？”

武志平说：“是红十字会的，奉命来此调查灾情……”

袁刚见武志平谈吐不凡，猜想一定是有来头的，就亲自动手为他松了绑。

袁刚有心结交武志平，就提出要与武志平结为异姓兄弟。武志平见袁刚豪爽、刚直，是条汉子，就答应了。当即排了香案，按当地习俗，两人跪拜行礼，就算结成了兄弟。

结拜礼毕，武志平以红帮礼数，似唱似说地赠给袁刚一首颂辞：

燕山游子过川来，
久闻大哥是贤才，
礼貌慌疏休见怪，
当面颂评礼应该。

袁刚听了十分满意，立刻吩咐匪徒们设了酒宴，招待武志平。

酒席宴上，袁刚乘着酒兴，直言不讳地告诉武志平，说他在争夺山大王中与徐耀明结了仇怨。他说，川军委任徐耀明为四川通江县民团团总，他不甘心屈居其下，早想摆脱“挑炭（土匪）”的臭名，也弄一个西介县民团团总的职位，与徐耀明平起平坐。

武志平说：“兄弟我虽然是红十字会的人，但在陕军和红军里都有不少好朋友，两头官场都能走得通，如果大哥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兄弟一定尽力帮助！”

“你与陕军的孙蔚如孙军长关系怎样？”袁刚突然问。

武志平离开38军业已一周时间，他估计孙军长一定为他操心。当袁刚提到孙军长时，他的脑海里立刻跳出一个想法：何不借匪徒之手，给孙军长送一封回信呢！于是，他自信地笑笑说：“兄弟我和孙军长是很要好的朋友。”

袁刚眼睛一亮，试探性地问：“贤弟能否帮大哥我在孙军长那里……”

武志平拍着胸脯说：“有道是‘为朋友两肋插刀’，大哥想办什么尽可开口，小弟一定帮忙！”

袁刚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事，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件事，请孙军长出面跟我们西介县的县长说一声，让我当县里南区的民团团总。”说毕，他停了停又补充说：“大哥眼下弹药不足，孙军长如能给一点，就太感谢了！”

武志平觉得袁刚所提要求不算什么，完全可以办到，就满口答应下来。酒宴散后，他就给孙蔚如军长写了一封信，由袁刚派一名土匪到汉中去送。

武志平的信全文如下：

孙军长：

昨日到了八海坪，我被袁刚仁兄等人接至黑风洞给予款待。此地乃川陕咽喉要冲，地势十分险要。这里的许多弟兄都愿听从您的命令，供作驱遣。他们别无所求，仅希望能补充些弹药；另袁刚兄坐镇黑风洞，愿为西介县政府尽力安民，只觉得名不正、言不顺，望指示杜县长与之接洽，委以西介县南区民团团总之名义。此事关系朋友情谊和川陕边界秩序之安定，深望鼎力玉成，恳请卓裁！

武志平

五月二十日

孙蔚如接到此信，当即拨给袁刚 500 发子弹，并通知西介县县长杜礼丞（杜斌丞之弟）给袁刚填写委任状。一切准备齐备，他即让军部副官长刘宗光派人去黑风洞料理。此时，武志平已离开了黑风洞。

武志平背着包袱，又赶了两天路程，就来到了川北通江县两河口。在此，他找到了红军。

在一座普通的民房里，红四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接见了。他把孙蔚如军长写的绢书呈送给了傅钟同志。

傅钟展视绢书，只见上面写着：

徐向前总指挥

陈昌浩总政委：

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而蒋介石却奢谈“攘外必先安内”，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言念及此，实切隐忧。蔚如与杨虎城窃谓，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特不揣冒昧，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深感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以纾困难。贵军如表同意，请迅即派员前来，共商大计。迫切陈词，无任翘盼之至。

敬祝

胜利

孙蔚如谨启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

傅钟读罢绢书，十分高兴，连声说好，并向武志平表示说：“我个人认为很好，来书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很可贵！”说罢，他问武志平是怎么想到走这一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在一月宣言上说，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武装民众）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我们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我们力量有限，还不能公开站出来和当局对抗，只能和你们红军秘密地建立一种联系，一种友好的联系。”

说到此，他从包袱里把带来的那包东西拿出来，一件一件放到桌子上，接着说：“为了表示我们对红军友好的诚意，我这次来给贵军带来了国民党总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口令、军用密电码、各兵种所用的旗语、灯语、地对空联络标志，还有一套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

所有这些，对于红军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武志平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些

东西带给红军，如果他如实讲明情况，对他个人来说，无疑会得到红军对他的重视和感激。但他一心想着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觉得把这份功劳记在38军头上，要比记在他个人头上，对今后两军建立友好关系更有利。因此，他绝口不谈他自己干了什么，甚至连他是地下党员的身份也没有暴露。

交谈中，傅钟提到黑风洞的土匪对红军的存在带来很多不利。他说：“这股土匪很讨厌，卡着要道，白区商人不敢来红区经商，边界市场也经常被他们抢掠，连红军的军需物资他们也抢。调大部队进剿吧，拳头打跳蚤，不值得；不管不问吧，他们又总是作恶，真叫人没有办法！”

武志平说：“我跟这股土匪的头目还是有一点交情的，需要的话，我可以帮贵军从中疏通一下。”

傅钟说：“那就太好了！请你给匪首袁刚写一封信，劝劝他不要跟我们红军老作对。”

武志平真的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晓之以理，说明利害，劝袁刚尽力约束他的人少作恶，少跟红军过不去。从此，袁刚看在武志平的面子上，劣迹大为收敛，在红、白二军中暂时保持中立，并保护商旅过境。

傅钟见武志平满身泥水，满身臭气，就让勤务兵小裴给烧了水，请他洗澡，并送一套藏青毕叽学士服，让他换了。从此，傅钟和武志平成了一对十分要好的朋友。

此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之战。当他在电话里听到杨虎城派密使给红军送来了军用地图时，高兴异常，在电话里大声对傅钟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你马上派骑兵班，把地图给我送来。我正急着用地图。”

傅钟遵命派骑兵班把武志平献上的军用地图立刻送给徐向前。当天夜里，徐向前又给傅钟打来电话，再次对武志平给红军送来军用地图表示感谢。

这份军用地图，是红四军唯一的一份军用地图，徐向前一直视为珍宝，用它指挥作战，后来由叶剑英送给了毛泽东主席。

武志平送来的密电码，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据此，红军截译了不少蒋军的重要情报。负责电台工作的宋侃夫在他撰写的一篇题为《祁连山的电波》一文中说，这份密电码对破译马家军的电报起了很大作用，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及时提供了可靠情报。

听说杨虎城派密使来到红四军中，中共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提出，他要直接过问两军的和谈事宜。

当时，他住在四川通江县苦草坝，距两河口约有一百多里的山路。他亲自派出骑兵来迎接武志平，傅钟也派人护送。

在由两河口到苦草坝的途中，武志平又会见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另一位负责人张琴秋。

张国焘对杨虎城密使来与红军建立联系一事十分看重。当他把武志平迎接到苦草坝，表现出少有的热情，特设宴为武志平接风洗尘，并约了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长郑以斋、卫生部长苏井观等一部分红军高级干部作陪。在宴席上，他和武志平谈了好多话，交谈了不少情况。

武志平早听说张国焘这个人“左”得很，担心他会向杨虎城提出一些难以接受的条件，就在个别交谈时提前给他打招呼说：“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极为复杂。高级将领中，有不少人迷恋自己的财产，不愿离开陕西。陕军中还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无孔不入。杨虎城将军出身贫寒，

且有爱国思想，和蒋介石有一定的矛盾，但在目前情况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否则，那些跟不上步子的部下就会反对他，孤立他，那些特务也会从中破坏，挑动闹事的。因此，希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有过高要求，也不要公开张扬。”

张国焘在此问题上却没有“左”，他能理解武志平的话，也能体谅到杨虎城将军的难处，所以一边听武志平说，一边频频点头，表示同意武志平的意见和看法。

不日红四方面军经研究，决定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为特使，随武志平一起到汉中谈判。

1933年6月1日上午，在汉中城内军部参议王宗山的家中，陕军和红军的秘密会谈正在举行。陕军方面参加会谈的有38军军长孙蔚如、军部参议王宗山和武志平。四人围坐在一张桌子边，桌子上摊一副麻将，作出打牌的样子，以妨不测。

会议由孙军长主持。他首先向徐以新询问了红军刚刚和川军在空山坝打了一仗而取得胜利的战斗经过，在气氛变得比较融洽时才把谈话内容转向正题。他问徐以新：“你们和川军大战，一定会考虑到我们陕军的动向吧？”

当时，徐以新还很年轻，仅20出头。但他聪明机智，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在由四川赴汉中的路上，他一直向武志平了解有关陕军和陕军主要将领的情况。他听武志平介绍，孙蔚如军长是一个正直的军人，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很不满，有爱国之心，是积极主张与红军修好的。

根据这些情况，徐以新借此很是发表了一番令人信服的议论。他从容不迫地说：“蒋介石杀人惯用两面刀。谁也可以预见，他会调陕军和川军夹击巴山的红军的。但我们红军将领认为，杨虎城、孙蔚如将军以及身边的一些谋士，是不会像川军中的田颂尧、刘湘、杨森那样轻易上当受骗的。果然不出所料，这次空山坝战斗陕军不但没有越过省界在我们背后捅一刀，还诚心诚意派武志平密使联络议和。这实在是一种远见卓识呀！我们红军的首长们听了武特使的陈述，看了孙军长的绢书，深表赞同，故派在下偕同武特使前来修好，并就日后互不侵犯问题，与孙军长、王参议和武特使交换一下具体的意见。”

孙军长说：“今日举行的是一次秘密谈判，本来我们杨总指挥打算由他亲自主持的，但考虑到由他出面目标太大，容易引出麻烦，就委托我全权代表他主持这次谈判。徐特使也明白，在当前民族矛盾处于危急存亡之关头，我们报国心切，不但不愿反共，而且对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十分拥护。蒋介石三番五次逼我们对红军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联共反蒋、共赴国难的道路。基于我们内部成份复杂，且仅有数万之众，目前尚不能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帜。这一点，还望贵军体谅。我们和红军以巴山为界，秘密来往，互不侵犯。这样，我们不仅能与红军和平相处，而且还可以骗得蒋介石的枪械补充。我们的防区，自然也就成了贵军的保护墙。”

徐以新对孙蔚如所提意见表示同意，接下来谈了达成秘密协定的具体细节。因红军作战急需军用地图，此前又有武志平献给红军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之先例，徐以新认为借此次谈判，向陕军讨要几份军用地图是有可能的。于是，他提出希望陕军能提供一份川陕二省的军用地图。

军用地图是重要的军事机密材料，两军刚刚举行谈判，怎么可能提供军事地图呢？孙蔚如只好推托说：“我们陕军中只有陕西的单省地图，别的省

的没有。陕西的你们也用不上，回头让武参谋选一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送给贵军也就是了。”徐以新听了孙蔚如的答复，心中不由划了一个很大的问号：武特使送给我们红军的军用地图难道另有蹊跷？若如是，那么武特使的政治面貌……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该谈的话基本谈了，王宗山不失时机地说：“饭菜齐备了，双方的态度都讲明了，我看咱们还是进餐吧。还有什么要说的话，进餐时也可以谈嘛！”武志平担心会谈就此结束，议而无决，就立刻拿起记录稿，像是总结，又像是请示地说：“今天上午所议，据我领会是这样四条：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在常川驻住，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用隐蔽的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四是陕军馈赠红军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意。”孙蔚如皱眉沉思片刻，然后说：“是这四点。不过，我们既是秘密协定，就不必搞什么文字记载了。”

“对！”徐以新表示说，“信守诺言要比一纸空文强十倍，何必非要写在纸上呢！这四点精神容我回川北向军部首长汇报后，再作正式答复。”

此次谈判结束后，徐以新就很快回川北去了。二十多天后，他再次来到汉中，向孙蔚如军长转达红四方面军首长的意见。他说：“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完全尊重杨虎城、孙蔚如将军‘联共反蒋，互不侵犯’的正确主张，完全赞同第一次会谈磋商的四项秘密协议。”

孙蔚如接见毕徐以新，欣喜地打密电给杨虎城将军：“大门打开，何意待客？”

杨虎城将军复电：“举酒杯！”

地址仍在王宗山家中，参会者仍是上次会谈的四人。在一派友好的气氛中，伴之以朗朗笑声，巴山协定正式达成。时间是1933年6月24日。

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巴山协定达成后，就双方的愿望而言，是要各守防区，友好相处的，可蒋介石偏偏不允许陕军这么做，不断施加压力，要陕军主动进攻红军。迫于压力，孙蔚如多么希望红军西进，与陕军避开瓜葛啊！于是，他让王宗山代笔给武志平写了一封信：

志平仁兄勋鉴：

来涵敬悉。某方（指红四方面军）若就地不动，我们与之互不侵犯；某方若决定西行，我们可作进一步之合作，但未决定行期前似不必见面。东屏（杨虎城、孙蔚如的内定代号）意志如此，着弟转达，并请兄就近切实负责联络。东屏为人绝不虚伪，望转告某方诸同志勿过虑为禱！

知名不具

八月十八日

从种种迹象分析，红军没有西进之意，至少眼下是如此。据此，孙蔚如想与红军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令前哨部队毁掉通向红区路上的几座小桥。武志平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信号，就立刻将此动向密报住在西安的总部秘书主任杜斌丞，要他设法影响杨虎城，尽力维持来之不易的“巴山协定”。

杜斌丞作为一名地下党员，接到武志平的密报后，深感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便产生了亲自到汉中走一趟的念头。可巧此时杨虎城获悉，孙蔚如的随身夫人张玉娥因与勤务兵的风流事发而自杀，觉得应该派人去汉中抚慰孙蔚如一番。这个任务，就由杜斌丞争到了手。

临行前，杨虎城将军吩咐杜斌丞，要他到汉中后顺便妥善处理一下有关

边界的事宜。

杜斌丞到汉中后，一住就是三个月。在此期间，陕军和红军相安无事，他以自己的声望和见解确实对孙蔚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杜斌丞住在汉中的三个多月内，整个局势仍然在向恶化的方向发展。首先发生的事是蒋介石突然下令撤销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的职务；接着胡宗南派其心腹胡抱一在汉中，不断向孙蔚如施加压力。就在这种关键时刻，福建的蔡廷锴、李济深等联合起事反蒋，而江西的红军未能相应支持，起事归于失败。这一连串发生的事件，都在孙蔚如的心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惧蒋心理日渐增加。但他还是恪守信用的，不愿与红军兵戎相见，仍寄希望于红军西进，去打胡宗南。为此，他特写信让武志平去面见“西光”（张国焘的代号）兄，劝其西进。

这时，武志平已得到准确消息，知川军正准备对红军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围剿，欲彻底消灭红军于巴山地区。武志平借此机会，亲自到红区向张国焘、陈昌浩等人，把他所了解的有关川军围剿红军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汇报后，他建议红军应再派特使到汉中面见孙蔚如，以巩固陕军和红军的友谊，设法稳住孙蔚如，不要发生什么意外事故。

张国焘、陈昌浩认为武志平的建议很有道理，就当即决定，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随武志平到汉中面见孙蔚如。

黄超到汉中后，把红军带给孙蔚如、王宗山的礼物——每人十斤通江银耳——送上，并转达了红四方面军首长对他们的问候和希望。他说：“巴山协定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实践证明双方都是有诚意的，两军都信守诺言，维持了友好。希望今后不管有什么情况发生，都应该继续执行巴山协定，巩固这种来之不易的友谊。”

此次黄超出使陕军，显然与上次徐以新出使陕军大异其趣。会见毕，孙蔚如不仅没有设宴招待，而且态度也显得冷漠。不过，黄超此刻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稳住了孙蔚如。在此后不久川军发动的围剿红军的大战中，尽管蒋介石一再命令陕军相机出击，但陕军还是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没有参加战斗。

陕军与红军秘密联络的事，终于有人暗中向蒋介石告发。蒋介石立刻就发一封电报给孙蔚如：

据密报，有武志平其人，自称系陕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运输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缉，并告。

蒋中正

孙蔚如接到电报后，大起惶恐，立刻向杨虎城请示怎么办。杨虎城将军也感到势态严重，不敢再一意孤行，就说：“也只好就此为止了。不过，要善始善终，请让志平兄把情况转告红军。至于志平兄，只能委屈他离开陕军了……”

遵照杨虎城的意思，孙蔚如把武志平叫到密室，出示蒋介石的电报，让武志平看。

武志平看过电报并不紧张，平静地说：“反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杨总指挥和军长的意图进行的，怎么处置，全由军长吧。”

孙蔚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情势严峻，红军的事只好就此打住了。你再到联络点上跑一趟，把这边的意思转告他们，请他们谅解。”

武志平完成这项任务返回汉中后，孙蔚如即宣布罢免了武志平军部参谋之职，停发薪水，并责令他离开汉中。武志平又去找张国焘、陈昌浩，希望红军收留他。可张、陈出于多种顾虑，也拒绝接收他。他走投无路，只好去找地下党组织。

武志平是中共军委留上海办事处（简称特科）单线联系的一名地下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叫王右民，规定他只能发展情报关系，不准发展党员，有什么事直接向王右民请示。武志平来到西安，却找不到王右民了。还有一个地下党员与他保持着联系，此人就是《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他找到他诉说了自己被陕军赶走的情况。宋绮云听了，生气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份共产党的内部刊物《捷报》翻到一页让武志平看。武志平接过《捷报》，只见上面说：“西北军某部已与川陕地区红军发生了秘密联系，证明蒋介石内部已分崩离析……”宋绮云仍气愤地说：“这不能全怪人家杨虎城、孙蔚如，我们内部一些人办事就很不慎密，连《捷报》上都这么写了，还不等于给人家报信！”武志平提到接关系的事，宋绮云想了想说：“组织有纪律，这不是私人办事，我帮不上你的忙。我建议你还是到上海去找组织吧。”几经周折，武志平才到了上海，找到了“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这时，全国各地都在通缉武志平，王世英考虑让武志平到哪里工作都不安全，就让他仍回到汉中去，请求陕军对他给予保护。武志平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王世英解释说：“杨虎城对共产党的一贯态度是能联合则联合，不能联合也不得罪。倘有杀人灭口之心，他早就下手了，是不会以礼把你护送出陕境的。你回去找他们，他们自然会保护你的。——你是为他们办事而被通缉的，他们不能不管你。”

武志平只好又听从组织的安排，回到了汉中。当他去见孙蔚如时，孙蔚如阴沉着脸说：“你在汉中可以，但有三条你必须遵守：第一条是不许公开出头露面和熟人来往；第二条是不许有不利于我们团体的活动；第三条是不能在陕军中给以任何职务，只能是闲住，生活费自理。”

武志平答应下来，便住在汉中城伞铺街7号。

1934年年底，武志平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与他接头。

接头必须对上暗号，否则不能来往。

陌生人进门就说：“汉中气候怎么样？”

武志平说：“雨多。”

“对，多雨。”陌生人又问，“大巴山风景真美吗？”

武志平说：“那儿人更美。”

暗号对上后，陌生人从怀中掏出“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写给武志平的一张字条，并自我介绍说：“我叫王超北，公开身份是陕军警备旅军需主任，而实际身份是‘特科’联络员”接着，他又说：“我奉地下党之命，通知你将从国外归来的潘自力同志送到川陕苏区去。”

送人过境，对武志平来说是轻车熟路，并不为难。他曾以陕军特使的身份掩护中共陕西地下省委的张光远等同志，通过封锁线去跟红军联络。眼下，他虽然被罢官，而且成了蒋介石指名道姓通缉的要犯，但他仍自信凭他的旧有关系，还是满有把握把潘自力同志护送到川陕苏区的。于是，他满口答应下来。

潘自力是个文化人，20年代中期曾到过苏联留学。在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任过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陕西省委书记，是著名的渭华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1931年，他得到杨虎城将军的资助，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文学专业。因他在国外反对日本侵华，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目标太大，回国后杨虎城将军无法掩护他，便托人劝他离开陕西。鉴于此，党中央只好决定让他到川北工作。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他就到汉中以北的褒城新集镇，找他的好友阎揆要，请护送他到川北。

阎揆要亦是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陕西省政府警卫团三营营长。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拒绝潘自力请求，便设法护送潘自力过境。但限于他对陕西人情地理都很不熟悉，几次护送都未能成功。没有别的办法，才不得不派王超北去找王志平。

王志平接受任务后，地下党员徐梦周夫妇前来帮助。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给潘自力搞到一个真正的红十字会的身份证。阎揆要和徐梦周的夫人连夜又给潘自力赶做了一套棉衣，还买了雨伞、电筒、爬山鞋等出门用的东西，把一个如同乞丐的潘自力打扮成一个阔官员的样子。

王志平的丈母娘叫肖成善，在巴山脚下开一座客店，是王志平创设的川陕交通线的第一个联络站。

王志平派人把肖成善老婆婆叫到汉中城他住的地方，交待了护送潘自力到川北的任务。她是一个很有办法的老婆婆，在她的周旋下，将潘自力安全地送过了陕军的前哨天池寺哨卡。

1935年农历正月初一，红军向汉中发起攻击。陕军节节失利，一筹莫展。为了挽救危局，孙蔚如不得不派人去请王志平，派他再次出使红军，以解城下之围。

王志平正有事要到红军那里，就答应下来。他带着一大包从上海捎来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还怀揣了军事情报，机智地瞒过了城市哨卡的盘查，艰难地绕道进入红军的防区。

红军将领对王志平还不敢信任，警惕他是陕军的密探。因此，对他提供的军事情报半信半疑，为慎重起见，决定在他提供的军事情报未得到证实前不让他返回汉中。可出于往日的情份，红军将领又不能对他无礼，更不敢露出拘押的意思，就借口说后方首长想见他，便派出几名红军战士，送他到后方去。

农历正月，川陕边界地区仍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裹挟着雪砂刮得天昏地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王志平走了十多天，从这个村转到那个村，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才见到陈昌浩。

此时，王志平提供的军事情报已得到证实。陈昌浩见到王志平后，对他提供情报之事表示感谢，并说明红军攻打汉中城的意图在于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瞅准机会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已经达到，红军马上就要离开川北，劝他尽快回到陕军去。

红军西撤，汉中之围已解，按理说王志平是建了大功的人，应该得到陕军的优待。岂料事与愿违，汉中城下包围既解，特使却无用了，陕军将领因此役伤亡惨重而迁怒到王志平头上，所以当王志平返回汉中时，陕军别说收留他，就是闲居汉中也不允许了。他仍然是蒋介石通缉的一名要犯。无路可走之时，他再次提出请红军收留他，结果给他的回答仍是一番婉辞，将他拒之门外……悲哉！哀哉！

王志平被撵出陕军，孤雁北飞只好投奔延安。

到了延安，王志平见到张国焘后，大发脾气，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为

什么言而无信，发兵攻打汉中呢？为什么兵进祁连山，使西路军全军覆没呢？……”

原来，武志平曾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为了红四方面军的存在和发展，写了一份题为《塞上征鸿记》的材料，共有3万多字，呈交给了张国焘。在这份材料里，不仅写明了甘肃一带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什么季节不宜行军，什么季节可以打仗，有哪些行军路线，甚至连沿途的水资源和哪里有水井都写明了。可张国焘对这么重要的军事材料却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去加以研究。

武志平第一次在通江县苦草坝见到张国焘时，就给张国焘讲过，他曾受杨虎城的派遣，出使过马仲英部。他说，马仲英部和陕军的关系很融洽，而马仲英部和马步芳、马鸿逵有矛盾，如果红军西进，可以利用这一矛盾。可是红军西路军进军甘肃，张国焘却把武志平的话当作耳边风，根本没有告诉西路军的指挥人员。

就此，武志平对张国焘提出理直气壮的质问。此时的张国焘，虽然挨了中央的批判，但仍任陕甘宁边区主席。他对武志平的质问，不知是理亏，还是宽怀，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总是未作任何解释和回辩，而是摆了一桌酒席，又邀了陈昌浩、张琴秋、徐以新等人作陪，宴请了武志平，算是对这位吃尽苦头的密使的一点补偿，或者叫做安慰。

暗杀傅筱庵和张啸林的内幕

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和即将上任的伪浙江省主席张啸林，助纣为虐，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蒋介石下令除掉这两个大汉奸。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杜月笙执行这一命令，责成军统上海区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实施支行大队分队长暗杀计划，终于将这两个汉奸刺杀……

傅筱庵是清朝大官僚盛怀宣的干儿子，曾任过上海市第一任商会会长。北伐战争中，他顽固地站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一边，与北伐军为敌。当北伐军和孙传芳在江西作战时，傅筱庵以招商局的名义打电报给孙传芳，表示全力支持孙传芳，并答应招商局“所有江轮，悉供调遣”。当北伐军进军上海时，傅筱庵又出资200万元，为孙传芳充实军费。因此，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下令通缉傅筱庵。

受到通缉后，傅筱庵急忙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求助。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他带了家眷及金银细软，趁夜登上日本邮船，逃到了大连。经再三疏通，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党政府终于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他便由大连返回上海，再度出任通商银行董事长。在此期间，鉴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他尽管跃跃欲试，想找日本人作靠山，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深居简出，以求自保。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陷于敌手，不甘寂寞的傅筱庵再也忍不住了，便开始与日本政党、特务，派人公开来往，并宣称他将不孚众望，适时出山。

此时，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根据上司的命令，正在物色伪上海市长的人选。

傅宅的座上客周文瑞与松井的翻译是知交，两人合力向松井推荐傅筱庵出任伪市长。

松井早已掌握了傅筱庵的情况，觉得傅筱庵是担任伪市长的较理想的人选，便派人到傅宅接洽。

傅筱庵假意客气一番，然后就答应下来。就这样，傅筱庵担任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汪精卫脱离重庆，经河内来到上海，策划组织伪政府。

蒋介石指示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潜入上海，策划暗杀汪精卫。

吴赓恕来到上海，听说开滦煤矿经理许天民与傅筱庵私人关系甚密，就指派许天民与傅筱庵取得联系，让傅筱庵在汪精卫到上海后，以设宴迎接为名，将汪精卫诱杀之。

傅筱庵一面佯装允诺，一面却又向汪精卫告密。因此，许天民等人被汪精卫逮捕，后被处死。

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因傅筱庵告密有功，汪精卫继续委任他担任伪上海市市长。

蒋介石对傅筱庵的行为十分震怒，就命令上海市“统一工作委员会”立刻采取行动，设法把傅筱庵除掉。

作为“上海市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杜月笙，接到命令后，比执行别的任何任务都坚决。这是因为杜、傅间此前就存有私怨。

他们有何私怨呢？

原来，通商银行是中国首创的一家大银行，牌子老，影响大，在全国金

融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也想插足其中，并有所掌握。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宋子文、孔祥熙出于这一目的，秘密集中了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所掌握的通商银行发行的钞票，进行一次性兑现。当时，通商银行的傅筱庵正耗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建造“中国通商大厦”，手头银根很紧，无法满足兑现要求。趁此机会，宋子文、孔祥熙提出加入官股的变通办法，供傅筱庵斟酌。

傅筱庵私人怎么能斗得过政府！几经磋商，傅筱庵只好无奈接受政府提出的意见，并把董事长位子让给了官股的代表杜月笙，他自己只好屈居总经理之职。

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后，很快改变了通商银行原来的性质，变成官商合办银行。

为此，傅筱庵对杜月笙一直怀恨在心，一心想施以报复，借以出口恶气。他突然想到，在中汇银行开张时，他曾把6万元款转存在中汇银行，如果提出这笔款，无疑对中汇银行是个打击，对杜月笙也是个打击。可是，基于当时他势单力薄，不敢贸然行事，生怕落一个与虎谋皮的下场，只是想想而已，并未付诸行动。待他当了伪上海市长后，胆子突然大起来，就想出要从中汇银行提取全部存款，意在搞垮中汇银行，并扬言要以此为由，看杜月笙的好戏。

黄金荣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对傅筱庵提出警告：“我和杜月笙是弯脚踝骨的弟兄，你不要以为杜月笙不在上海，就可以随便踢他一脚了。就是杜月笙死了，还有我黄金荣在。现在不要说全部提出，就是要分批提出，即使中汇答应，我也不答应！你如果想要，就冲我黄金荣要！”

黄金荣是虎老余威在，傅筱庵思之再三，最终也没敢再提提款的事。

杜月笙身居香港，但消息灵通，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为此，他也对傅筱庵衔恨在心，以求报复。现在，蒋委员长有令，要除掉傅筱庵，正中下怀，他能不卖力吗？

傅筱庵任伪市长两年来，曾三次经历过暗杀。

第一次是他刚当伪市长不久。一天上午，他从日军司令部开完会，坐车返回江湾伪市政府。刚刚走出汽车，突然“砰”的响一声，一颗子弹从他的耳边擦过。他吓得魂飞魄散，连市长体面也顾不得了，立刻龟缩到汽车下。当行刺者正要打第二枪时，不想子弹卡了壳，被当场抓获。原来这个行刺者是伪市政府的一名警卫士兵。

第二次暗杀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月十六日。这一天，是傅筱庵出任伪市长一周年。晚上八点钟，傅筱庵在国际大饭店召开庆祝宴会。当应邀的客人纷纷入座，他开始致祝酒词时，从大厅旁的厕所里伸出一支乌黑的枪管。可惜，行刺者在扣动扳机时的瞬间，摄影记者的镁光灯一闪，破坏了瞄准视线，打出的子弹稍稍偏高了一点，使傅筱庵再次逃脱一死。枪声过后，宴会厅大乱，男女宾客你推多拉，挤来挤去，拼命向门口拥挤。行刺者夹在人群中，从容离开了国际饭店。

第三次暗刺发生在同一年的冬天。傅筱庵的妻子因病而死。为了超度亡魂，傅筱庵在戈登路寺做水陆道场。在香烟缭绕、钟罄齐鸣中，傅筱庵虔诚地跪在蒲团上，双目微闭，双手合一，正向菩萨默默祷告。

突然间，一个小和尚手持一把杀猪刀，猛扑上来，举刀就砍。保镖们眼明手快，立刻抢救，保住了傅筱庵，捉住了小和尚。

傅筱庵不等回去，就在佛堂审讯。他大声质问小和尚：“佛门弟子，应以慈善为本。我与秃驴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

小和尚破口大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凡我同胞，谁不想食你之肉，寝你之皮？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

傅筱庵暴跳如雷，将小和尚当场活活打死。

在经历了以上三次暗杀后，傅筱庵已成惊弓之鸟，终日心惊肉跳，夜间常常恶梦缠身，狂呼乱叫。为了保全性命，他特意向日本司令部要了一辆防弹汽车，又亲自物色了23名中外保镖。这些保镖，个个都是神枪手，而且精于擒拿格斗。日本司令部为了给他壮胆，特地拨给他一小队日本士兵，常驻他的私邸虹口施高塔路二十六弄二号。汪伪情报处“七十六号”的李士群，也派了二十多名特工，专门充当傅宅的警卫。在层层保护下，傅筱庵才稍稍放下心来。

现在，杜月笙奉命要除掉傅筱庵，在如此戒备森严的情况下，要下手行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为此，执行这一具体任务的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分队长陈默，专门找万墨林商量如何行刺傅筱庵的问题。

经反复研究，两人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傅筱庵内部找一个人，做好策反工作，然后让这个人找机会把傅筱庵刺杀。

方案确定后，陈默便去物色策反的对象。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他决定从傅筱庵身边的一个叫朱升源的佣人身上做文章。

朱升源幼时家境十分贫寒，靠父亲给地主当长工度日。他10岁左右，父亲病故，就流落到上海，在日商纱厂当童工。在工厂里，他受尽了日本资本家的虐待和欺侮。后来，他突然生了病，不仅不能干活，而且还需要治病。日本资本家看他没有用了，就一脚把他踢出了门外。所幸遇到一个好心的同乡，把他收留在家，并请医生给他治好了病。病好之后，在这位同乡的介绍下，他到傅筱庵家去当佣人，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

朱升源为人诚实，手脚特别勤快，很得傅老太爷的信任。傅老太爷临终前，嘱咐朱升源要好好照顾傅筱庵，朱升源答应一定听傅老太爷的话，照顾好傅筱庵。

傅老太爷死后，朱升源一直跟随傅筱庵，傅筱庵的饮食起居全由朱升源安排。傅筱庵当了汉奸后，自知难言于国人，整天疑神疑鬼，连自己的小老婆也不敢相信，唯有对朱升源相信如故。因此，傅筱庵的每顿饭都由朱升源做，他的卧室也只允许朱升源随便出入。

朱升源生性耿直，因他过去在日商纱厂当童工备受日本人的虐待，对日本人有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对傅筱庵当汉奸的事颇为不满。曾多次私下里劝傅筱庵辞去伪市长的职务，不要再当汉奸，免得受人唾骂。

傅筱庵当然听不进朱升源的这些劝告，反而抢白朱升源多管闲事。由此，朱升源对傅筱庵渐生不满，有时在背后不免发牢骚，骂傅筱庵不会有好下场。

陈默是策反老手，根据他掌握的朱升源的情况，首先在朱升源每天去买菜的市场开一座小酒馆，尽量寻找机会与朱升源接近。后来，他又拉朱升源到他的酒馆喝酒、聊天，以便掌握朱升源的心态和傅筱庵的活动情况。

待两人混得很熟的情况下，陈默使用小恩小惠拉朱升源，还给朱升源介绍了一个女人，很快就促成这个女人和朱升源结了婚。朱升源结婚后，对陈默十分感激，视为恩人，因此酒后也避讳，发泄对傅筱庵的不满。

眼看大功即将告成，陈默便把刺杀傅筱庵的任务交给朱升源，并答应事情办完，将由国民党发拿朱升源现款 5 万元，带着新娶的妻子到重庆去生活。

一是民族正气的鼓舞，二是 5 万元款的吸引，朱升源经过一番思考后就答应下来。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汪伪政权为欺世盗名也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朱升源得悉傅筱庵要在国庆之夜举行招待宴会，估计傅筱庵必然会半醉而归，于是决定就在这天晚上行刺，并把这一计划转告了陈默，要求陈默为他安排逃脱之路。

“双十节”之夜，傅筱庵果然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军政头目、伪市府官员。因在此之前，傅筱庵已接到日本政府的邀请，要他不日东渡日本，参加东亚大都市联盟会。他认为这是日本对他的抬举和信任，因此，在宴会上特别高兴，不停地与宾客频频碰杯，酒喝得早超过了他的酒量，已醉态毕露了。

晚上 12 点钟，傅筱庵终于回来了。

他步履踉跄地被朱升源扶上楼。进入卧室，便倒在床上，眨眼间就呼呼入睡了。

朱升源连喊两声“老爷”，回答他的只是如雷的鼾声。于是，他立即拉上窗帘，关紧屋门，伸手把早已准备好的菜刀从腰间抽出，然后运足力气，向傅筱庵的脖子上砍去。

傅筱庵被砍一刀，双脚踉跄，却怎么也喊不出声来。朱升源见状，又连砍数刀，确信傅筱庵已经死了，便拉开被子把尸体盖了，然后熄灯关门而去。

朱升源回到自己的卧室，换去血衣，洗净手脸，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等到凌晨四点多钟，他像往常一样，拿了买菜的篮子，从走廊推了自行车，装出上街买菜的样子，从容地从岗哨的眼皮底下走出傅氏私邸。

上午 9 点多钟，傅筱庵的二夫人见傅筱庵日上三竿还未起床，心中不由生疑，去敲门，室内又无人答应。

她推门而入，掀开被子一看，尖叫一声，向后倒去，吓得人事不省。

发现傅筱庵被刺后，常驻傅宅的日军一面向上司报告，一面关起大门，逐个查询，其中只少了朱升源。到朱升源家里去看，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已荡然无存，由此判断，杀人者一定是朱升源。于是，海军陆战队，汪伪特工队一起出动，在虹口地区实行紧急戒严，盘查所有过往行人，捉拿朱升源。

此时的朱升源早和他的妻子，在万墨林、陈默的安排下，已坐在一艘小火轮内，辗转到了苏北。后来，他又到了重庆。在重庆，他不仅领到了 5 万元奖金，而且军统局又发给他 2000 元的安家费，每月发给 100 元的生活津贴。

刺杀汉奸张啸林的工作，几乎与刺杀傅筱庵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

上海沦陷，杜月笙逃到香港后，张啸林在日本人的授意下，主办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的汉奸组织，从此就公开投降了日本。

他用日本人拨给的武器弹药，装备了他手下的党羽，专门为日本侵略者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他和他的党羽们仗着关系多、地理熟，加之在上海附近活动的“忠义救国军”中不少人是他们的狐朋狗友，因而起了日本人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搜集物资的范围日益扩大，甚至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华中一带，从中谋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张啸林、俞叶封的腰包就被银元塞得鼓鼓的。

这时候。是张啸林最红、最得意的时候，在抗战前，上海滩有杜月笙、

黄金荣压着他，在上海三大亨中，他始终排在最后一位。自从上海沦陷，杜月笙走了，黄金荣缩着头呆在了家里，唯有他仍在市面上横行。在上海的黑社会中，第一次出现了“唯张独尊”的局面。于是，他这个自称“张大帅”的人，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又想起了当初日本特务劝降时，曾许过让他当伪上海市长的愿。可是，伪上海市长的位子已被傅筱庵抢去，便决定向日本人讨要伪浙江省长的位子，也好过过官瘾。

想好了，张啸林就通过“七十六号”与日本梅机关的影佐祯昭搭上了关系。

当张啸林提出想回杭州当伪浙江省长时，李士群也想把“七十六号”的势力扩充到杭州、宁波一带去，觉得由张啸林出任伪浙江省省长对他实现这一计划极为有利，就支持张啸林回杭州，而且起劲地从中撮合，大肆活动。

影佐祯昭自从汪精卫上台后，因其在建立汪伪政权中立了大功，受到日本当局的重用，出任了伪汪政权的首席顾问，其实是汪伪政权的太上皇。他现在正想利用一些地方势力，稳定江浙一带的局势，觉得张啸林原是浙江人，在杭州又有一定的势力，回故乡去当土皇帝也是合适的。

张啸林要当伪浙江省省长的消息很快通过专用电台，传到了香港。杜月笙与戴笠商议，戴笠不敢擅自作主，便致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蒋介石当即给戴笠回电，只有两个字：“除奸！”

杜月笙把除掉张啸林的任务也交给陈默去执行。

几天以后，上海更新舞台由名坤伶新艳秋挂牌演出，俞叶封除邀请一批头面人物捧场外，还特邀了张啸林也来捧场。

陈默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干掉张啸林，于是，他派一个特务去执行这个特别任务。可是，由于陈默办事不慎，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让日本特务知道了有人要暗杀张啸林，便立刻给张啸林打了电话，说一个日本头目约他谈话，让他立刻乘汽车到日本特务机关去。

俞叶封眼看开戏时间已到，还不见张啸林，不免有点心急。正在此时，张啸林给他打来电话，说日本人约他谈话，不能来看戏了。于是，俞叶封宣布开戏。开戏后，场内灯光慢慢暗下来，所有的观众都被台上新艳秋的精彩表演吸引住了，伸直脖子，全神贯注地看戏。

就在这时，一个大汉不知从什么地方跳出来，双手持一挺机枪，蹿至俞叶封的包厢前。

俞叶封见状，刚想逃跑，不想机枪早响了，“哒哒哒”的机枪声像炒爆豆一般响着，把人们的耳鼓震得嗡嗡响。

场内的观众惊叫一声后，全部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久，听到机枪早不响了，人们才从惊恐中抬起头来。其时，打机枪的人早不知去向了。再看包厢里的俞叶封，身上被子弹射穿了十几个洞，早已一命呜呼了。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俞叶封作了张啸林的替死鬼。

又过了一个月，张啸林的小汽车刚开到福煦路的十字路口，突然红灯亮了。他发现几个人涌上来，要抓他。他急得抓耳挠腮，好在开车的司机机灵，当机立断，并不管什么红灯不红灯，脚下猛踩油门，汽车冲过了红灯，没命地奔逃。张啸林又一次从死神手里逃脱。

经过上述两次暗杀，张啸林这个黑道上闯了大半辈子的胆大包天的人终于被吓破了胆，再不敢到处走动了，整日深居简出，还雇了三十多个身怀绝技的人当保镖，住宅周围还布置了日本宪兵日夜守卫。

除奸的任务一时难以完成，杜月笙请来顾嘉棠、叶焯山商量。叶、顾两个对张啸林的保镖了如指掌。叶焯山认为，在张啸林的保镖中，林怀部对张啸林的所作所为早心怀不满，加之张啸林性情暴烈，喜怒无常，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更使林怀部怨恨日深。如果能买通林怀部，从窝里下手，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于是，他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杜月笙。杜月笙也认为这是一个除奸的好办法，就电告陈默，照此办理。

陈默接电话后，如法行事，果然买通了林怀部，并晓以抗日大义，要林怀部伺机除奸。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左右，汪伪政权与日本梅机关双方派代表到愚园路歧山村五十四号岑德广家里，为张啸林颁发伪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

不一会儿，张啸林就带着他的一帮保镖，也来到这里，接受委任。在这里，由岑德广家里的一个仆人，把陈默给林怀部的密信交到林的手中。

三天以后，即八月十九日傍晚，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来到华格臬路张公馆，拜访即将上任的伪省长张啸林。

张啸林请吴静观上二楼四姨太的卧室里密谈。正当两人谈得投机，忽听院子里林怀部和张啸林的司机吵开了架，而且愈吵愈凶，好像就要打起来。

张啸林听了，有点发火，觉得手下人在客人面前这样无法无天有失体面，就把身子探出窗口，训斥道：“吵什么！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就在这时，“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地从张啸林的嘴里钻了进去，又从后脑勺钻出去。张啸林只哼一声，就倒在楼板上死了。林怀部打死张啸林后，并不着慌，将手枪往旁边一放，点起一支烟吸着，从容地坐在大门口的一条板凳上，对院子里的人们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林怀部除掉这个大汉奸的，现在就等法国巡捕房来抓我。这事与你们无关，你们也别乱动，我的枪法你们是知道的。”

这时，呆在四姨太卧室的吴静观回过神来，便拨电话向日本宪兵队报警。

因为此时日本与英、美、法国尚未宣战，日本宪兵队要进入租界，还得征得巡捕房的同意，办了入境抓人的手续才行。因此，当日本宪兵赶到时，林怀部已按事先的布置，被带到法租界捕房去了。

延安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市长

高朗亭于 1935 年 5 月当选为延安市市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作主干了许多好事。为了延安东关小学及时开学，他不怕惹人，亲自去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请总参谋部搬出东关小学。为了保护市民的门窗，找抗大校长罗瑞卿评理。为了维护党的声誉，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揭露特区党委书记高岗的隐私……

1937 年 5 月，延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高朗亭将军为民主政权的首任市长。他在任不到 3 年，却留下许多传奇色彩很浓的佳话，至今在延安人民中久传不衰。

逼副总长让房

位于延安市老城区的东关小学，是当地一所建校早、房舍好、师资质量高的学校。左邻右舍的有钱人、乡绅和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的子女，多数在此就学。

西安事变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少人害怕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延安，就带着家眷远走他乡。东关小学也不得不宣布停课。学校停了课，那么多房子空着不用不可惜了，又且驻在延安的红军机关很多，一时很难找到住的地方。于是乎，这所学校成了红军参谋部驻扎的地方。

在共产党的倡导和协助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蒋介石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把红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八路军，立刻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帝国主义。

政治局势的变化，使延安的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逃到外乡的人们也陆续回到了延安。学生不能失学，东关小学决定复课开学。要开学，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知八路军参谋部迁出去。

谁都知道，参谋部是大机关，是不敢跟人家硬碰的。校长到处找人反映这件事，但谁听了也只是听听而已，不愿为此招惹事非，除了说几句同情的话外，什么忙不肯帮。没有办法，校长只好直接去找当时任延安市市长的高朗亭。

校长原本是个老学究，平时斯斯文文的，连说话都不高声。可当他见到了高朗亭时，也许被逼急了，也许气愤所致，丝毫不顾礼数，放开嗓门大声嚷嚷开了：“高市长，都说你是个硬汉子，俺们才选你当了市长。井岳秀的 86 师和盖世儒（国民党延川县县长）的保安团你都不怕，这八路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你就更不会怕了吧！”

高朗亭不知这位校长找他干什么，就问：“老校长，你找我办什么事吗？”

校长说：“八路军参谋部占了延安的东关小学，学校要复课开学，找谁谁不管，我只好来找你这个市长。”

当时，高朗亭年仅 24 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听校长把话说毕，早火了。他心里想：“你参谋部再有困难，也不能占学校的房子呀！学生上学，天经地义，能置之不理吗？”想到此，在面前的桌子上猛拍一掌，“唬”地一声站起来，握住校长的手说：“别生气了，请你转告学生和老师们，市政府一定替你们作主，短则 10 天，长则半月，保证开学！”

校长把高朗亭的话转告给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大家都将信将疑，但怀疑的成份为主。他们认为，一个小小的延安市市长，是碰不动堂堂八路军参谋部的。退一步讲，就是高朗亭真能动员八路军参谋部搬迁，也不会在 10 天内搬

完。

然而事实使大家真正服了高朗亭，10天后，八路军参谋部果然搬走了，而且搬走后把校舍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水缸内也挑满了水。

市府的好多人感到奇怪，就去问高朗亭这是怎么回事，可高朗亭笑而不答，不愿透露其内情。

原来高朗亭送走校长后，考虑到要解决这一问题找一般人是不可能奏效的，必须找到管用的人才行。于是，他开始打听情况。当他了解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不在延安，副总参谋长左权只管作战方面的事，不管行政方面的事，行政工作是由另一位副总参谋长滕代远管时，便开始考虑怎么去解决这一问题了。他在调查中了解到，滕代远最怕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是他有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了。

在一个天高气爽的好天气里，高朗亭去见滕代远。两人见面后，寒暄既毕，高朗亭就直言不讳地说明来意。

滕代远同志早已知道了这件事，正在为参谋部找不到合适的去处而为难。当他听高朗亭说明来意，便客气地解释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正在设法解决。可是，你也知道，在延安是很难找到房子的，参谋部的人又那么多，一时实在无法搬迁。我看这样吧，请你给校长和老师们的做做工作，我这里也抓紧想办法，再推迟一段时间，一旦找到房子就搬迁。”

论级别和年龄，高朗亭都是不堪与滕代远相比的，他这个市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县级干部。可他毫不惧上，口气十分强硬地说：“这不行，俺已经在校长面前表了态，参谋部必须在10天内从东关小学搬出去。民主政府是替人民办事的，怎么能说

话不算数呢！”

滕代远同志觉得高朗亭的话不无道理，但又一时找不到搬迁的地方，陷入了犹豫不决之中，一时不便明确表态。

高朗亭见滕代远不肯下决心，就不依不饶地说：“参谋部到底搬还是不搬？”

滕代远对高朗亭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感到不舒服，就不耐烦地说：“暂时不能搬。”

“那好，”高朗亭作出要立刻离开的样子说：“俺去找彭总评理去。”

听到高朗亭说要去彭德怀去评理，滕代远嘴里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有点紧张。他知道，彭总是苦娃子出身，容不得有什么欺压穷苦老百姓的事件发生。为了这件事，真要把彭老总惹火了，还不狠“熊”他一顿！他在高朗亭这位小市长的逼迫下，终于下定决心动员参谋部搬迁，而且下了严格命令，必须在10天内搬迁完毕。

找抗大教育长评理

1938年初，国民党的空军对延安轮番轰炸，抗日军政大学的不少校舍被炸毁。没了住处，学员们便自己动手，到延安城外的土崖下打窑洞。等窑洞打成后，学校就搬到了城外的窑洞里。抗大直属机关在搬迁时，考虑到新挖的窑洞还没有安上门窗，一些人就把附近一些疏散后空出的民房的门窗拆下来，准备安到窑洞上。

这件事被延安警察局的一名巡警发现了，就立即上前制止说：“你们不能这么干。”

抗大直属机关的同志解释说：“抗大需要尽快开课。”

“那也不能拆民房！”

“我们会找到房东赔偿的。”

为此双方争了好久，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事情陷入了僵局。巡警一个人势单力薄，见拦不住那么多人拆民房的门窗，就跑回去报告。

第二天天刚黎明，抗大直属机关的同志们抬着拆下来的门窗，刚刚走出城门，就被早已等在这里的警察分队拦住了：“对不起，请把门窗放下再走！”

抬门窗的抗大同志问：“是谁的命令？”

警察们回答说：“市政府。”

听到“市政府”三个字，抗大的同志们就不服气地嚷嚷开了：“市政府又咋啦？你们市长高朗亭还是我们抗大的学员哩，对我们抗大不能照顾一点吗？”

“谁也不能违犯群众纪律！”警察们毫不退让。

双方又吵嚷开了，谁也不肯让步，有不少过往行人都围上来看热闹。

突然，不知是什么人放了一枪，在空中“砰”的响了一声。刹那间，僵持的双方和围观的群众都被吓呆了，接着人群大乱，各奔东西。警察忙于维持秩序，却不料抗大的同志趁机把门窗抬走了。

“门窗”风波很快传到了市长高朗亭的耳朵里。他闻讯后十分生气，真想立刻去找抗大的教育长罗瑞卿，要求查处违纪人员。可是，他对一些具体情况还不了解，而且需要慎重考虑后再说，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过了两天，等情况全部了解清楚，而且也考虑成熟了，高朗亭就决定到罗瑞卿那里作一次私人拜访。

罗瑞卿对高朗亭并不很熟悉，只知道他在抗大高级班作过学员，后来当选为延安市市长。因此，罗瑞卿见到他后，只是礼节性地问了几句话，并未进行深谈。

罗瑞卿刚刚结识的女朋友郝治平正好在场，担心冷场，便走上来热情地给高朗亭递烟、倒茶。

高朗亭无话找话说，便回忆起他上抗大时当学生那会儿的生活来。这样，两人有了共同语言，罗瑞卿的话匣子被打开了，话逐渐多起来。

等到气氛融洽，彼此谈话很轻松时，高朗亭趁机把话题转到“门窗”风波上来，把那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罗瑞卿误以为那天是警察开了枪，心里就有点不快，便火扑扑地说：“警察维护群众的利益，当然是对的，但做法上欠妥，不应该当众阻拦，引起围观，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警察更不应该开枪威胁，造成恐慌。”接着，他又批评高朗亭说：“你这个当市长的，要好好管束下属，不然就白培养你了！”

高朗亭原本想从罗瑞卿这里讨回公道，妥善解决“门窗”风波，没想到警察和他自己都没了理，还被批评了一顿，心里很不服气，积压在心的火也被点燃了。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唬”地一声从凳子上站起来，也带着气说：“明明是您的下属违犯纪律，俺找您本想请您查查这事的，谁知您却反过来训俺，俺倒要问问您这教育长是怎么当的？”

“好哇，你敢顶撞领导！”罗瑞卿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您不能随便训人！”高朗亭仍不屈服地说。

听到外间吵开了架，躲在里间的郝治平忙走出来劝解。她很不客气地批评罗瑞卿说：“干嘛发那么大的火？”说着把高朗亭送出门去。

高朗亭回到市府，几天来闷闷不乐，一直想着他和罗瑞卿争吵的事。开始，他气鼓鼓地，认为罗瑞卿作为抗大的领导，他的师长，有欠长者风范，不该袒护抗大的同志，更不该给他这个小市长发火。可是，过了几天，当他冷静下来，重新审视那天的争吵，认识有了明显的不同。他认为自己作为罗瑞卿的学生、下级，不应该得理不饶人，用那种不客气的态度讲话，导致他和罗瑞卿争吵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态度不好，方法欠妥。想到此，他的气全消了，有的只是后悔和不安。

高朗亭走后，罗瑞卿心里也不好受，一直反思着这件事。他为了分清是非曲直，派人到抗大的当事人中对“门窗”风波进行了调查落实。

调查的同志查清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使他发现其中最大的出入是：那天放枪者不是延安警察局的警察，而是抗大警卫连的一个班长。这个班长之所以放枪，目的在于吓跑警察，好让抗大的同志把门窗抬走。

事情调查清楚后，罗瑞卿终于感到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伤害了高朗亭，心里沉甸甸的，觉得对不住高朗亭。

“门窗”风波不能就此撒手不管，必须向警察局有所交待。于是，高朗亭又开始考虑了结这件公案的办法了。一天，他提出一个建议：市政府与抗大直属队共同召开一次恳谈会。当高朗亭的这一建议转达给抗大后，抗大愉快地答应了，而且有罗瑞卿亲自到会。

恳谈会上，罗瑞卿首先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延安市的警察在“门窗”风波中坚持了原则，维护了党的群众纪律，应当受到表扬。抗大的同志要向警察学习。

在自我批评中，罗瑞卿公布了他们派人调查关于开枪事件的真相，并告诉大家，校方已经作出决定，对那个开枪的班长进行了处分。

罗瑞卿还一个劲地向高朗亭道歉，说他那天态度不冷静，情况不明，冤枉了高朗亭，不该批评高朗亭，希望高朗亭别计较他，今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

看到罗教育长的态度如此豁达明朗，高朗亭十分激动。他走上去紧紧握住罗瑞卿的手说：“老首长，请您原谅俺那天的态度不好，顶撞了您。俺是您的学生，今后还要跟着您学军事，学马列哩！”

罗瑞卿和高朗亭的和解，使抗大的同志和市府的同志们从中受到了教育，都作了自我批评，“门窗”风波到此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此，罗瑞卿和高朗亭结为一对好友，他们的友谊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愈处愈深厚。

面揭特区党委书记的隐私

抗日战争初期，延安建立了妇联组织，妇联主任是一位缺少文化但又长得十分漂亮的年轻妇女。

当时，高岗任陕甘宁特区（后来改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是高朗亭的顶头上司。

高岗就住在延安，因此常到延安市政府指导工作，了解情况，和市政府的好多工作人员混得很熟。这样，他很快就发现了妇联主任这个“小美人”。他很喜欢她，就主动接近她。在频繁交往中，他又发现她的男人经常下乡蹲点，很少在家里。于是，他跟这位“小美人”的感情升级，以致不顾影响，打得火热，有了那种暧昧之事。

丑闻不胫而走，很快在那位妇联主任居住的市委宿舍区传开了。

许多人对此很不满，但他们知道高岗是共产党内的大官，又敢怒而不敢言。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市长高朗亭的耳朵里。

一天，他在与市政府的一位参议谈话，提到高岗与那位妇联主任胡搞的事，非常气愤地说：“高麻子（高岗脸上有麻子，人们给他起绰号为“高麻子”）也太不像话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他居然勾搭下级之妻！”

参议出于对高朗亭的爱护，当即劝高朗亭说：“高岗这个人不好惹，最善于打击报复别人，嘴又好，善于狡辩，连刘志丹主席都惹不起，总是让着他。我看你还是莫要管这件事为好！”

高朗亭也深知高岗的为人，同意参议的看法，觉得以不惹他为好。但过了一夜，他越想越觉得高岗的行为有损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不管不行。

因此，第二天一早，他把参议的话早已置之脑后，就不顾后果地向特区党委所在的窑洞奔去，找高岗谈这件事。

高岗是跟高朗亭很熟悉的，而且素知高朗亭为人耿直、嫉恶如仇，听说高朗亭来找他，不知怎么，潜意识中就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觉得他的到来是冲着他的什么事来的。因此，他十分客气地迎接他，见到他后满脸堆笑地向他问长问短，显出格外的热情。

高岗给高朗亭递烟，高朗亭不接；又给高朗亭倒茶，高朗亭也不喝。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等稍稍平静一点，就冲高岗放起炮来：“高岗同志，延安的女同志虽少，但给特区党委书记找个对象还是有的。旁人的婆姨总归是旁人的，作为高级领导人，你可得注意群众影响啊！”

高岗十分清楚高朗亭所言是指什么。他的隐私被揭露，自然感到尴尬，脸刷的一下就变红了。如果换一个人说这些话，他会立刻跳起来，狠狠训斥一顿，把人家赶出门外的；可是在高朗亭面前，他不仅不敢发威，而且尽力忍耐着，连一句反驳的话也没敢说出口，只是心里暗骂高朗亭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高朗亭手中握有高岗的把柄，高岗是不敢在他面前耍威风的。

1932年，高岗和高朗亭都在刘志丹的部队里工作。在临直镇战役中，高岗指挥失误，被国民党的军队打得几乎全军覆没。高岗在混战中不顾军纪，临阵脱逃，半路上连枪也丢了。

当时，高朗亭在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任司令兼政委。高岗脱离战场，辗转逃到西北先锋队，被高朗亭收容。高岗有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掌握在高朗亭手中，怎么敢惹高朗亭呢！

当时看似没出什么问题，而且高岗还把高朗亭送出门外，并表示一定注意影响，减少跟那位妇联主任的来往。可高岗心里已对高朗亭种下一颗仇恨的种子。直到1939年秋，甘肃省合水县被八路军从国民党军手中夺回来时，这颗仇恨的种子终于有了发芽的机会。

高岗考虑到合水县仍处于对敌斗争前沿，危险很大；再者可以赶高朗亭离开延安，就以“挑选懂军事的县长”为名，将高朗亭调到合水县当县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高岗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成为中央领导人，他的不少部下都纷纷向他靠拢，希望得到提携和照顾。可高朗亭仍对他持鄙视态度，并不趋炎附势，向他表示什么。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暴露，高岗自杀，消息传到高朗亭耳中，

他又想起了在延安他向高岗开“炮”和高岗打击报复他的往事，感到十分畅快，并喝酒以示祝贺。

李烈钧的怪脾气

—

李烈钧先生是一位一生追随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

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黎元洪继任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上台后，为了扩充反动势力，极力拉拢各地实力人物，并对旧日同僚大加犒赏。他想起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曾从九江带兵西进，解过他的围，于是下令授李烈钧陆军上将衔并奖励大绶勋章一枚，派专人送至广州，李烈钧打发走了来使，就将大勋章挂在他家哈巴狗的脖子上，让儿子牵上哈巴狗上街闲逛，以表示他对北洋政府的鄙夷和对孙中山革命的决心，一时传为奇闻。

李烈钧就是这么个人。1923年，他击溃了陈炯明的叛军，孙中山在上海电令时，时任参谋长的李烈钧代行大元帅职权，他因此名声大显，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人物。当时，北洋政府段祺瑞为了拉拢南方军事力量，派人押送100万元大洋送给李烈钧，希望李烈钧为他所用，李烈钧明白段的企图，并不买他的账，心中暗暗一笑，收下了这笔巨款。

最初，有人以为李烈钧一定是面对金钱动了心，可李烈钧并个人并没有花其中的一分钱。他将这笔款子存放在总部的一间房内，取名“藏金室”，凡有老友和经济困难的人来访，就把人带到藏金室，说：这是北洋政府送来的礼物，见者有份，需用者自取之……

就这样，李烈钧用这笔巨款周济过不少支持革命但又穷困潦倒的国民党人，没多久，这100万巨款就被他散光了。有人笑着对李烈钧说：你这人真傻，你若携此巨款远居海外，何愁下半辈子没有钱花？李烈钧摇着头哈哈一笑，说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反累其身，用来周济穷人支持革命岂不更有意义！就是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这么便宜的买卖。

二

还有一件事使人们对李烈钧难以忘怀。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溘然长逝，时在江西的李烈钧接电到北京主持丧事，李烈钧主张在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停灵公祭，遭到段祺瑞的反对。

对此，李烈钧感到十分气愤，他指着段的代表怒斥道：社稷坛为国家所有，不是段祺瑞私人财产，总理千辛万苦，他段祺瑞才能安居宫苑，今总理不辛病逝，在社稷坛停灵公祭，段祺瑞有何理由不同意？

段祺瑞迫于各方压力，只好答应李烈钧的要求，并表示要亲临致祭。不料公祭那天，段祺瑞却借故脚肿不能前往，由内务总长代为致祭。

公祭那天，李烈钧对着聚集在社稷坛阶前的数万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大声演说起来：诸位今日热心前来祭奠孙中山先生，是对总理的尊重和敬仰，也是想瞻仰总理的遗容，现在看来，总理的遗容易见，而段执政的风采却难一睹，孙先生是主义的先导者，将来实行主义继续奋斗，这副重担落在诸位同学和民众肩上，像那些昏庸腐朽之辈，是绝对不能主持国家大事的啊！

李烈钧的话使那些段祺瑞的走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而李烈钧却望着成千上万的听众又大声说道：因为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丧权辱国，所以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样恨孙先生，怕孙先生，活着怕他，死了还是怕他！……李烈钧越说越激动，最后竟高声喊了起来：“死总理吓死了活执政！”。

当时，广大群众听了李烈钧的演说，顿时会场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的口号，会场成了宣传孙中山的主义，动员民众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场。

数年之后，李烈钧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段祺瑞，谈起往事，段祺瑞说：“协和呀协和，你要是脾气不那么硬早就阔气啦！”

李烈钧一笑，回道：“我李某人什么大事没干过？我们革命党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官，要革命！”几句话说得段祺瑞面红耳赤。

三

抗日战争初期，在家养病的李烈钧为了促使蒋介石决心抗战，一气跑到武汉，闯进国民党中央例会会场，蒋介石一见这位“硬头蛮子”，吓得抽了一口冷气，急忙起身让座，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李烈钧大大咧咧说道：“我来，就是为说话的。不过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是不会听的。我还是不说的为好。”说罢，起身要走。

蒋介石碍于众人的面子，不敢得罪这位国民党元老，硬着头皮拉李烈钧坐下。

于是李烈钧慷慨地说道：“我要说的很简单，第一，抗日主张万不可变，只要你坚决到底，失败也是成功，成功更是成功。第二，既然决心抗战到底，就不要用投降派，不要让这种人在你的左右，赶紧将他们赶走。第三，你自己坐飞机到莫斯科去，亲自和斯大林商量，他肯定会帮中国的忙。第四，时时刻刻要替老百姓着想，万不可只顾眼前小利而忘了人民大众……”

蒋介石听着，假惺惺地点着头，连叫：“好的，好的。”将李烈钧送出了会场。

李烈钧知道，蒋介石只是让他在会上说说而已，不会听他的话，心中郁闷、怒恨。这天，他正坐在汉口一家旅馆生闷气，听说周恩来也在这家旅馆，心中豁然一亮，决定登门拜访。

周恩来住在旅馆最高一层的顶楼，李烈钧身体有病，只好由儿子搀着上楼。周恩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听说李烈钧上楼拜访，急忙出门迎接。

周恩来的住所是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阁楼，房内只有一个小窗，光线很暗，周恩来请李烈钧坐下之后，抱歉地说：“这房子太暗了，只好请李先生随便坐坐。”

李烈钧环顾了一下房间，嘿嘿笑笑，风趣地答道：“不要紧，不要紧。你我都是习惯在黑暗里讲光明话的人，不怕黑暗啊！”说罢，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这一天，李烈钧和周恩来一见如故，谈话十分投机。在那间阴暗的小阁楼里，两人促膝谈了很久很久，不时传出开心的笑声。

李烈钧就是靠自己的这种硬脾气、怪脾气，完善了一个老革命党人的崇高人格。

